

校庆四十周年纪念  
学术论文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务处、学报编辑部编  
一九九四年十月

封面设计：燕朝文

外国语学院

准印证号：3455-01455

SSDWGYxY

7

G6

校庆四十周年纪念

# 学术论文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 务 处  
学报编辑部 编

# 目 录

- 论立体化教学体系 ..... 孟庆贵 (1)
- 论现代俄语零位动词句 ..... 刘利民 (14)
- 对外汉语教学听说训练初探 ..... 刘曼兰 (24)
- 中国人进行外语耳听会意训练  
    的心态分析 ..... 刘亚平 (30)
- 英语作文的写作技巧及其教学 ..... 张晨凤 (40)
- 英文报刊标题特色刍议 ..... 刘安基 (48)
- 基础阶段英语阅读调查与分析 ..... 崔素芳 (53)
- Wortbildung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 郑慧卿 (61)
- 日中語の移动动词の对照研究 ..... 李孙华 (77)
- 70年代以降の日本における大学  
    教育の規模扩大と质的向上について ..... 孔繁志 (85)
- 关于《万叶集》第五卷员外歌的作者问题 ... 李丹明 (107)
- 句型 “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 меня обманывать”  
    的语义与结构特点 ..... 黄苏华 (116)
- 关于外语教学改革方向的思考 ..... 张永泰 (131)
- 西班牙当代的“新小说” ..... 李红琴 (140)
- 班门絮语话传贤  
    ——节选自《CARMEN 译文研究》 ... 杨松荫 (151)
- 一部成熟的外国文学史 ..... 李玉民 (168)
-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 成宝田 (177)
- 邓中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 ..... 周绍成 (185)

股份制的历史和现实 .....	王希汉 (196)
鲁尔占领——廿年代法国外交政策 的转折点 .....	朱立群 (206)
大学生理想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 的影响因素 .....	朱文彬 (222)
论艺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	冯兰芳 (243)
引导·参与·务实 ——《法学基础》课教学方法研究 .....	毛庆龄 (252)
古汉语使之被动用法 .....	齐世昌 (264)
“贲以姜枣”辨析 .....	张耕夫 (280)
深深植根于爱的沃土 ——评《她的中国心》 .....	田增科 (283)
谈现代汉语中 VP+了的格式 .....	饶 勤 (289)
“沉郁顿挫”论 .....	王 南 (298)
论语言的科学美 .....	张 凡 (314)

# 论立体化教学体系

孟庆夔

## 导 言

近三十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后来在我国，人们一直在探讨和实践外国语的教学改革，相继出现了许多新鲜的教学法，如：听说领先法、滚雪球法、情景教学法、直观教学法、视听教学法、电化教学法，等等。传统的教学体系正在演变。

经过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探讨和研究，我认为，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的教学体系，应是一种立体化的教学体系。

关于立体化教学体系的构思，在我以前几篇论文中已有所涉及。如在《关于口译技巧课》一文中，我论述了立体化的教学环境。在《语言实验室是训练语言技能，培养交际能力的重要课堂》一文中，我论述了立体化的教学手段。在《浅论法语教学的新结构》一文中，我论述了立体化的教学结构。更早些时候，在七十年代初，我还写过关于建设立体化教材的几篇文章，可惜时值“文革”，未有机会发表。后来，文章也失散了。今天，我着手系统地论述现代立体化教学体系，并欢迎同行们一起来探讨、研究这一课题。

初拟这一课题包括以下内容：

论立体化教学体系

论立体化教学结构

论立体化教材

论立体化教学手段

论立体化教学环境

论立体化教学场所

作为关于立体化教学体系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本文将着重论述“立体化教学体系”这一概念的含意，以及这个教学体系产生的社会条件。

谨以此文作为我系统地研究立体化教学体系论著的第一章。其它章节，我将续写，或在原来文章基础上做重大修改乃至重写。

本文旨在阐明以下几点：

一、自有人类以来，在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着传授经验和接受经验的活动，即广义的教与学的活动。这种活动存在于立体的时空环境之中。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狭义的教与学的活动，即在一个短暂狭小的时空环境中，传授和接受被浓缩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经验总结。

三、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局限，人们不可能在那个短暂狭小的时空环境中再现人类活动的立体环境。因此造成了一整套平面化的教学体系，形成了人们对教学活动的传统观念。

四、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才数量、质量以及培养速度的需要，传统教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发生了变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现代社会心

理状态在这一变革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人们关于教学活动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在此需要声明：本文中，以及以后一系列文章中，将以外语教学的具体活动为实证。我希望，关于立体化教学体系的基本观点，将不至于仅仅局限于外语教学。

## 立体化教学体系的含义

以往传统的教学体系，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文字教材为中心的体系。我喻之为“平面教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学结构偏重知识，而忽视能力的培养；教学材料侧重文字材料，而忽视实物材料和视听材料。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场所，同教学结构、教学材料相呼应、相适应，形成一个统一体，即一个平面化的教学体系。

在如此一种教学体系中，教师教学水平之高，在于他善于摆脱平铺直叙的方法，努力用形象的语言、自制的教具，创造某种立体感，调动学生联想日常生活中所取得的立体经验——即感性知识同理性知识的结合，从而取得学生领会教学内容的效果。教师这种立体化的努力，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之大小，往往同教师的个人素质、经验和语言表达能力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名师出高徒”。传统的教学体系培养出了不少的人才，但是到了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了。

在总结传统教学体系的得与失的基础上，立体化教学体系把教师人为的立体化努力，变革为物质的立体化教学程序。在这个体系中，教师的个人素质、经验和表达能力仍占重要



位置，但是，教学水平之高低，更多地取决于教师对立体化教学体系的认识程度，以及他掌握这个体系中诸环节的熟练程度。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学校的产生以及教学活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人类创造学校，并非盲目之举。人类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大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经验，人类需要把这些经验和知识传给后代。由于每个个人的社会分工、社会经历、社会经验不同，知识水平和传授能力不等，不可能把人类基本的物质文明知识和精神文明知识，用同等的水平和同样的内容传授给后代。因此，社会的分工需要有一批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把人类浓缩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经验输送给后代人。于是产生了教师这个职业，学校与课堂这样的空间，学年与学期这样的时间概念，教科书这种人类活动经验的总结，产生了教与学的对立统一关系，结成了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总而言之，教学活动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它将人类的直接经验转化成学习者的间接经验。此后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将这些间接经验转化成新的直接经验。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讨论立体化教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

第一，立体化的教学结构：人类的物质文明活动和精神文明活动的质量，同人们的知识结构、智力结构和能力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人类上述活动的经验总结，应该包含上述三种结构，并且有助于发展这三种结构。这就是立体化教学结构产生的根据。以外语教学结构为例，它是由外语语言基础知识，外语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外语语言交际能力

诸方面构成。

第二，立体化的教材：人类通过感观认识世界，最重要的感观是视觉器官。人类传播其经验的基本方式，是动员接收者的视觉、听觉等器官，向他传达口头信息或书面信息，即用形象事物同有声符号或文字符号相结合，或者三者相结合的方式，传输经验。这就是立体化教材产生的根据。以外语教材为例，它应当由三种材料组成：形象材料（实物、画片、贴绒画、幻灯片），有声材料（录音磁带），文字材料（书本）。这就是形、声、文三结合的立体材料。今天，这种立体教材已经发展为文字材料配合声象材料（录相片、电视片、电影片）的新型教材。而电脑化的教材更是画面、音响、文字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教材。

第三，立体化的教学手段：人类传授经验的基本手段是出示形象事物，配以语言表达（口语或文字的表达），完成信息传送。这种自然存在的手段，今天演变成为机械性的电化教学手段。这种手段综合了形象、音响、文字三种信息传播手段，在外语教学中是全面训练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基本功的重要教学手段。立体化的教学手段是立体化教材得以见成效的基本保证。

第四，立体化的教学环境：人类在传授和接受经验的过程中，传授者是主动的，接受者也是主动的，有传授之必要，也有接受之需要。因此，不存在一方主动而另一方消极的态势。在这种双边关系中，传授者居主导地位，接受者居主体地位。授受经验是双方互相交流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传输和信息反馈的过程，是双向活动，而不是授方的单向活动。以教学活动为例，教师利用立体输出手段传送教学信息，学生

则利用立体输入手段接收教学信息。如此这般，形成一种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双方信息交流的立体教学环境。

第五，立体化的教学场所：学校把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经验浓缩成各种形式的教学材料。学校这个空间，应当是入类社会活动场所的缩影。仅仅是课堂教学场所，不足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立体化教学结构要求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在课堂上、视听实验室、图书资料馆、有声资料馆、声象资料馆、声象图书馆、校内各种活动场所，模拟社会活动，而后到社会实践中去实地体验。立体化的教学场所包括课堂，校内第二课堂，社会课堂。

归纳起来，“立体化教学体系”的含意就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广阔的教学空间里，高度集中地再现人类授受经验的途径和过程，使学习者在学习期间就参与实践，把所接受的间接经验转化成直接经验和切身体验。

## 立体化教学体系产生的社会条件

立体化教学体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同三个条件相关，即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生产的需要，社会心理的需要，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

### 一、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生产的需要。

最近几年，我国教育界流行这样一句口号：“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个口号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向教育部门提出如下的要求：在比以往短些的时间里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入才。同时也表达了改革教学体系的要求。

传统的教学体系，把人类浩繁的经验，凝聚成书本知识，

成为学生学到的间接经验。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还需要经过一段转化过程，人们才能把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做出贡献。历来流传的一句话，对这种学校与社会隔绝的状态做了最生动的表达——就是毕业生离别之际的惯用语：“告别母校，走上社会”。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的新经验日新月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现代的世界，必须在人才培养方面占数量、质量和速度的优势。走出校门的学生，来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应当立即用其知识、智慧、能力，为社会服务。换言之，他应当已经初步经历了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的过程，已经参与过社会实践。在其服务的部门和单位，他应当以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宽阔的知识面，较强的工作能力，尽快出成果，从而为本部门、本单位在社会竞争中生存和取胜，做出自己的贡献。

社会的需要正在急切地要求全面改革教学体系。

学校的教学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缩影。它应当模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用人们易于理解的社会现象加以说明。

军人，在真刀真枪地上战场厮杀之前，需要在模拟战场上，即军事训练场地上和军事演习的模拟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模拟拼杀一番，否则到战场上就不能保存自己，杀伤敌人。

运动员，在进入国际比赛场地拼搏之前，需要在模拟的赛场上，流血流汗地拼搏一阵，否则到比赛场上就会败下阵来。

人才，在用其知识、智力、能力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服务之前，需要在模拟的和真实的社会实践的环境中，在各种类型的课堂中学习和实践，否则就会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

设的行军中落伍。

军事训练，体育训练，都有一整套的立体化训练体系。单靠听讲军事条令，听讲动作要领，是不能打胜仗，不能夺冠军的。

培养人才，也应当靠一整套科学的立体化教学体系。只有当学校本身从传统的课堂变化为社会实践的实验基地，从知识结构、智力结构、能力结构诸方面全面培养学生成材，学校的教学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在我国，这种社会需要并非自今日始。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在不断演变、并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立体化的教学体系。这里做个简要的回顾。

以外语教学为例。众所周知，六十年代，国际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我国的外语教学领域内展开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的号召促进了这种改革的进展。《听说领先》、《情景教学》、《滚雪球》、《直观教学》等世界上的先进教学方法传入我国；实物、画片、录音磁带等，开始进入课堂。从外语教学开始的改革很快波及到其它科目的教学。这些初步探讨和实践立体教学方法的努力，在六十年代中期中断了。

七十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外语教学的复苏。《视听教学法》、《电化教学手段》传入我国，在我们学校，诞生了第一批自编的，由形（幻灯片）、声（录音带）、文（文字教材）三结合的新型教材，我们当时即称之为《立体教材》。

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

设。这种形势对外语人才的全面要求加速了新的教学体系的产生。我们探讨并实践了外语教学的《立体教学结构》，并且逐步开辟了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通过正在逐步形成中的新的教学体系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在外语教学工作 and 外事工作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个立体教学体系之优势。

几年来，新的教学体系的各个环节，正逐步进入了各级各类学校。在工厂、农村，进行精神文明的教育时，传统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正在逐步让位给电视录像宣传。

立体化教学体系，实在是时代的产物。

二、社会心理的要求。

在对课堂教学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现象。

不少教师，备课认真，讲课努力，学生的反应却并不积极：在课堂上看其它书籍者有之；聊天、做作业者也有之。问及他们，答曰：“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干巴巴没意思”，“不吸引人”等等。原因何在？

用传统的标准衡量，这些课还是有水平的，教师还是努力用生动的语言试图引起学生的兴趣。至于学生，他们虽然不满意，但是仍然肯定开设这些课程之必要性。因此，很难用教学态度或学习态度来解释这些现象。在这一类现象面前，检查教学效果的传统标准已经不适用了。

应当如何解释？

可以从另一种现象中得到启示。

以两位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中年教师为例。他们检查两类课程的教学效果。第一位教师熟悉第一类课程，却在求学时

代没有接触过第二类课程。第二位教师正好相反。听课检查的结果，第一位教师对第一类课程的课堂教学，印象颇佳，对第二类课程的教学不满意。第二位教师的印象正好相反。

这种矛盾现象启示我们，要分析研究这两位中年教师的听课心理。

这两位教师，在听讲各自熟悉的课程，即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学习过的课程，在心理上回到了当时的学习心理状态。在听讲他们各自所未曾接触过的内容时，他们在心理上回到了现时的状态。他们把听课视为输入新鲜信息的过程。他们潜意识地要求通过现代的信息传播手段，输入这些信息。于是，对于今天沿用二十多年前的授课方法，产生了逆反心理。

另一次调查证明，当这两位教师听讲一门他们都完全生疏的课程时，而主讲教师运用了立体教学手段，他们的反应非常积极，听课效果很好。

在今天，声、象、文三结合或三位一体的传播媒介正日益成为日常的立体信息传播方式。以新闻媒介为例，报刊、广播、电视构成一个立体新闻网。过去，人们满足于读报或听读报纸。今天，要求收听广播新闻，收看电视新闻。过去，人们满足于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今天，要求更多地开展广播、电视教学，更多地生产录音、录像教材。这种习惯性要求，构成一种社会心理。人们的学习心理发生了变化。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检查教学效果的两位中年教师表现出了上述的矛盾心理。至于从小就生活在立体信息传播环境中的青少年，他们对传统的课堂形式产生逆反心理，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现象。

还可以从正面证实这种社会心理要求。

有的社会理论知识课，内容较深，用传统方式讲授，学生难以接受。但是，教师引用大量的模型、实验数据、图表、调查实例、发生在学生中间或身边的事例，以及使用幻灯片，作为教学手段，仅仅是这一点小突破，却赢得了学生相当积极的反应。

教师用外语讲授一段某国历史，或某篇外国名著，用了幻灯片、录相片、或电影片，表现历史事件或故事情节，声象一体，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学生翻开课本时，字里行间浮现出的是音和画，因此学习兴趣浓厚。

以上所举，教学方法适应了学习心理，因此效果好。正所谓：“印象深，好理解，记得牢”。

以下一个实例从另一侧面证明立体化的信息传播手段之社会效果。

有这样一个场面。在一次庄严的学术报告会上，照本宣科害得场内不少学者昏昏欲睡。而辅以幻灯片、录相片、投影仪的报告，却唤起了听众的兴趣，精神为之振奋。严肃的学者尚且如此，何况青年学生呢？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普遍化，人们的学习心理与几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学生的学习兴趣表现为单一的钻进书本抠文字。今天，却表现为透过文字联想音画，达到理解、记忆的目的。不能适应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教学体系是很难存在下去的。

立体化教学体系的建立，起步于教学方法的改革，随之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教学结构、教材、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场所等一系列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形象，从传统的教书匠，变为操纵现代电子设备，能文能武的人类智慧的工程师。学生的形象，从受支配者，变为参与者。以上种种，引起了师生双方的心理变化。

### 三、现代的物质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立体化教学体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留声机、无线电广播、录音机，推动了有声教材的产生和发展，促成了语言实验室的建立。教科书辅以唱片、录音磁带，形成了早期的听读教材。

最近三十年，幻灯片的制作技术越来越现代化。录音机与幻灯机同步工作，辅助文字教材，形成了声象文三结合的视听读立体教材。

录相机把画面和音响合为一体，形成视听教材，促成了视听语言实验室的建立；视听教材配合文字教材，形成更高层次的立体教材，把立体教学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电脑的出现，把声、象、文三种材料合为一体，形成名副其实的视、听、读立体教材。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材的演变，而相应的方法、手段、环境也随之立体化。

教学活动，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并不是，也不必是全部教学活动），正逐步从传统的课堂面授，演变成实验室内的操练和模拟的社会实践。

如果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全面实现立体化的教学体系，即从教学结构、教学材料、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场所诸方面综合改革，教学效果必定更好。这一论断是

否正确，有待于大量的实践和多方面的调查数据加以验证。

## 结 束 语

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建立新的教学体系的任务。现代社会心理和学习心理将促进这种新的教学体系的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为这个新的教学体系提供了物质条件。

今天建立这样一种新的教学体系的必要性、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探讨、实践和改革，把新的教学体系命名为立体化教学体系。

我相信，这一命名将受到普遍的注意。

我相信，立体化教学体系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适用于德、智、体、美各类教育活动。

（原载 1987 年 10 月 23 日《北京科技报》）

# 论现代俄语零位动词句

刘利民

零位动词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 нулевой формой глагола)问题和句子中动词人称形式的“缺位”及“复原”有着密切关联。因此,苏联语言学界往往将这个问题归于不完全句的范畴。有的语言学者也将这个问题划入简略句范畴。零位动词句的名称繁多,这说明各家学派在确定零位动词句时所采用的标准不同。

著名语言学家 А. Пешковский, А. Шахматов 等都从事过不完全句的研究工作。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А. Попова 认为,几乎所有句子在实际运用中语义上都是完全的。如果把语义上的完整看作衡量句子完全与否的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完全句了。

零位动词句语义上是完整的,结构上是自足的,呈零位的动词谓语句义是约定俗成的。零位动词句的结构特点是句中动词人称形式“缺位”,而置于零位动词后的句子扩展成分的形态则明显受“缺位”动词制约。例如:

Татьяна в лес, медведь за ней.

句中零位动词的扩展成分 в лес, за ней 即受“缺位”动词制约。试比较: Татьяна (стремится) в лес, медведь (бежит) за ней.

我们认为，零位动词句结构中包含两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成分：主语和次要成分。人称动词缺位。例如：

1.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звинул не хуже любого чеченца; ружьё из чехла—и туда; я за ним. (Лермонтов)

2. Тише! Здравствуй! Не отпирай дверь, я—через одко, —шепотом сказал Григорий. (М. Цолохов)

3. Ты говори, когда тебя спросят, а станешь перебивать, так я тебя костылем.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4. Я ему про Фому, а он мне про Ерему.

零位动词句中次要成分的特点在于它的双重功能：次要成分功能（基本功能）和述谓功能。句中的行为表达不是靠词汇，而是通过词汇语法手段，通过整个句子。

人称动词被公认为句子述谓性的主要体现者，它的缺位使句中表达述谓性的手段同相应的动词句比较截然不同。所有俄语词类中只有动词具有独立的述谓性，但在零位动词句中，动词则不是述谓性的唯一体现者。这类动词必须同受它们支配的成分一起完成谓语的功能，动词和与其经常搭配的成分能不同程度地互相揭示所含意义。受支配成分的语义及其与动词搭配的属性可暗示零位动词的语义，从而明确整个句子的意义。

一般来说，零位动词的语义较抽象、概括。这种句子中零位动词的语义给人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试图从众多的同义动词中找出一个语义较接近的词来填补“缺位”往往是徒劳的，零位动词句一旦加上动词就会改变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和结构。

孤立地看一个句子是不是零位动词句，要看它表达什么

意义。以 Я в институт. 这句话为例。如果它是零位动词句，那它的意思必定是“我去学院”，这是这个零位动词句约定俗成的含义；如果它是不完全句，它的意思根据上下文或具体语境可能是“我往学院打电话”或“我往学院写信”等。试比较：

Я (звоню) в институт.

Я (пишу письмо) в институт.

作为潜在的谓语动词，零位动词可能表达以下语法意义：

(1) 陈述式，(2) 假定式，(3) 条件式，(4) 祈使式（或愿望式），(5) 命令式，(6) 过去时，(7) 现在时，(8) 将来时，(9) 完成体，(10) 未完成体，请看例句：

1. Вскочил, затворил шкаф, запер его,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стол.

Хлеб—под салфетку, коробочку с сахарином в карман. (К. Федин)

2. Кабы он меня повёл, так я бы от него ни на шаг! (С.

Залыгин)

3. Если бы обратно в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линграда, туда, где воевал, тогда только в свой батальон, и никула больше. (К.

Симонов)

4. Черт с тобой, пойду на любые уступки. Только бы скорее

к цели. (А. Алдан Семёнов)

5. У меня лошадь добрей остальных. К командиру полка

намётю. (М. Шолохов)

6. Ударили мы по нему, а оттуда фашисты как тараканы.

(Н. Богданов)

7.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обложен Сталинград. Отсюда путь к нему

на Восток. (В. Сапожников)

8. Глядишь; веселая девушка и замуж первая выскочит, и муж от нее никула. (В. Сапожников)

9. Лошадь с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м зашкобырдала через голову. У другой колени подогнулись, морда по уши в снег. (М. Шолохов)

10. Так и пошло; я за ним, а он от меня. (К. Фелин)

在上述零位动词句中，零位动词的语法意义是不可能通过句子结构本身全部表达出来的，上下文及语境、语调起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零位动词句中设有其它“式”的体现者时，只能表达陈述式意义。如：Он о деле；Мы за доктором；У нас лекции не часто；Весь разговор—— пять минут。

苏联语言学家 Г. А. Золотова 在《论不完全句问题》一文中认为 Казбич—— к окну；Татьяна в лес；медведь за нею；Он—— в залу。Сестра на работу。一类句子不是零位动词句形式，因为 к окну，в лес，за нею，в залу，на работу 的形式并非受动词支配。表示运动方向的静词组合（名词前置词词组）形式经常与运动动词搭配，但这并不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动词支配关系，只说明表示运动和方向的词的语义近似。

笔者认为，句中表示空间的状况 к окну，в лес，за нею，в залу，на работу 作为运动动词的扩展成分能够证明谓语的潜在，揭示了零位动词必然是表示运动意义的。从句子组合体来看，扩展成分是“潜在”动词的组合关系信号，句子成分之间存在潜在的搭配能力——结合价（валентность），句子成分结合价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及它在句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在零位动词句中，动词扩展成分通过逆向结

合价 (обратная валентность) 暗示零位动词存在, 确定其潜在意义。请看例句:

1. Татьяна в лес, медведь за нею.

2. Вы очень смешно всегда успокаиваете меня; как только я о Серёжке, вы сейчас же о моей игре.

第一个例句中 в лес 显然同潜在的运动动词有密切的关联。当然从 бросится, устремится, побежит... 等同义的运动动词中很难找出一个来“填补”空位, 因为零位动词句一旦加上动词就会改变句子所表达的意义结构。

第二个例句中的 о Серёжке 和 о моей игре 均为“说”意动词所支配的形式。

可见, 在句中, 零位动词的词汇语义必须依靠全句结构意义来确定。而这些零位动词的词汇语义往往比较典型, 易于归纳。

### 一、运动意义零位动词句的结构

1) 前置词 в 加名词第四格表示运动终点及空间:

1. Светлица тихая пуста,

Он в сад, и там смятенный бредит. (Пушкин)

2. Я завтра в Москву, а оттуда в Ригу.

2) 前置词 на 加句词第四格表示运动方向:

А ты—не медля, завтра же на фабрику. Ясно?

—Такси! На Горького. (На улицу Горького.) (Из фильма “Горожане”)

3) 前置词 к 加第三格指人或指物体的名词表示运动方向:

1. Я к вам за Костей.

2. Командир моей роты говорит: “К тебе, Соколов”, — а сам к окну отвернулся. (Шолохов)

4) 前置词 через 加第四格名词, 前置词 по 加第三格名词表示运动空间:

1. Не отпирай дверь, я — через окно. (Шолохов)

2. ...если меня не пускают в дверь — я через балкон! (А. Волошин)

5) 前置词 от, с, из 等加第二格名词表示运动的出发点:

1. Я только что от Владимира Кирилловича Хуторных.  
(А. Волошин)

2. А я ещё дома не была, с вокзала прямо сюда. (Чехов)

6) 前置词 за 加第五格名词表示运动的目的:

1. Я к вам за советом. (В. Розов)

2. Вася, за доктором! (В. Катаев)

7) 副词 куда, откуда, туда, оттуда, сюда, отсюда 等表达确定或者不定的运动方向:

1. Вы откуда? Почему без разреш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гоститалья! (К. Симонов)

2. Отсюда я больше ни ногой. (Папанн)

8) 方向副词 вперед, назад, вверх, вниз, направо, налево 表示运动的方向意义:

1. Они проводят барышню, а сами в тот же день назад.  
(Гончаров)

2. Через полчаса мы с Корнауховым уходим. У семафора расстанемся: он — направо, я — налево.

9) 具有运动方式方法意义的副词 бегом, пешком, верхом



或前置词加名词间接格表示运动工具的词组都可以表达运动方式方法：

1. У меня правило; к больному—на машине, домой—пешком.

2. Он там за такси расплачивается, а я уж бегом сюда. (А, Леонов)

## 二、说话意义零位动词句的结构

1) 主体一格名词加带前置词 о 的名词第六格表示谈话的客体：

1. Вы очень смешно всегда успокаиваете меня; как только я о Серёжке, вы сейчас же о моей игре. (К. Симонов)

2. Ты поняла, о чём я?

2) 主体一格名词加带前置词 про 的名词第四格表示谈话的客体：

Ты ему про устав службы, а у него глаза, как пуговицы.

3) 主体一格名词或代词加直接引语，表示说话内容，或者是主体一格名词加直接、间接补语以及表示行为方式方法的名词间接格形式：

1. Я ему; Василий, через полгода заводы станут, жрать нечего. А он мне; товарищ, к Новому году вся земля, все заводы огойдут трудящимся... (А, Толстой)

2. Я уж ей шуткой; Что же он вам в магазине рыбы купить не может? А она в ответ; Такой мелкой, как с рыбалки приносят, в магазине не бывает. (С. Михалков)

3. Все в один голос; зачем она тебе, пускай, идёт с богом, не унижайся. (А. Гельман)

4. К чему ты эти глупости?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4) 主体一格名词或代词加表示说话方式方法的状语:

1. Марья—ему вслед, негромко: —хлеб весь, чай, съел?

2. —Я ему, Паша, и так и этак ...—говорит Клавдия  
Кондратьевна лежащему мужу, —а он и слушать не желает.  
(И. Олшанский)

3. А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вы свободно?

三、表示“给”意的零位动词句结构核心为给意动词词组。这类词组往往是由三个成分组成，包括受事三格和客体四格，有时为客体二格。

当给意动词呈零位时，结构常常是主体一格+受事三格名词或代词+直接客体:

1. Ты бы мне ещё одну бутылку. (Островский)

2. Тоня с Соней поженится, а мы им подарок—комнату.

(М. Шагров)

四、表示“打”意的零位动词句的结构成分除主体一格外，常常加直接客体第四格补语及表示工具意义的第五格名词:

1. Ты чего...я тебя рычаком.

2. Ты говори, когда тебя спросят, а станешь перебивать, так я тебя костью.

3. —Я его в горячах ножом, —упавшим голосом сказал Прохор. (В. Шиликов)

此类句中经常出现前置词 по 加第三格名词做间接补语，表示挨打的部位:

1. А вот я тебя за это по морде.

2. —Погоди ... Я его кирпичом по башке ... Увидит!  
(Горький)

前置词 в, под 加第四格名词也可以表示受打击的部位或方向:

1. Когда придёт рыжий—я непременно камнем в нос ему...  
(Горький)

2. А такой хлюст, мокрая душонда, напишет жалостное письмо—и трудящуюся женщину, как рюхой под ноги.  
(Шолохов)

除上述几种典型的零位动词句外, 其他零位动词句根据动词的扩展成分意义就可确定零位动词的语义。例如:

1. А я их из автомата; тах-тах! (стрелять) (Г. Полоский)

2. Я еле дождалась солнца и сразу за работу. (взяться)  
(Кузнецов)

3. А бывало, мы его вздумали дразнить, так глаза кровью нальются, и сейчас за кинжал. (схватиться) (Лермонтов)

4. —В Берлине меня тоже не любят, Я дал этому прихвостню Гыйцу в зубы, и меня снова—на фронт. (послать)  
(Хорьков)

5. А этот, как его, он турок или грек? (звать)  
(Грибоедов)

有些成语化结构已经演变成为零位动词句。这些成语在运用过程中, 动词脱落呈零形式。将动词人称形式“复原”常是很难的或是不适宜的。

1. —Обещаю тебе две бесплатные путевки.

— Вот видите! За добро добром! (В. Розов)

2. А с неё какие хлопоты? Ну кашу ему сварит, на скверике прогуляет ... Ни скандалов, ни гулянок, тишь, благодать. Телевизор поглядим-и зубы на полку.

3. Всё для завода старался. А меня за это—коленом под зад! (А. Кузнецов)

4.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5.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原载《中国俄语教学》1991年第2期)

# 对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论文 指导的体会

刘曼兰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试用本）》明确提出：英语专业毕业生要“掌握撰写毕业论文（学士学位论文）的基本技能”；并规定，依据论文的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语言表达将论文分别评为优秀、及格和不及格“三等”。为了使毕业生的学士学位论文达到预期的水平，该教学大纲在课程设置部分把“学士论文指导”列为必修课，要求在一个学期内每周授课1—2学时，可见该教学大纲十分重视学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措施。



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学生撰写学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觉得论文作者在以下几方面应予充分肯定：（1）知识面有所拓宽。学生撰写的无论涉及什么领域的论文，一般都能“言之有物”，迄未发现完全属于硬写的现象；（2）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论文谋篇布局的水平固然不同，但多数能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论文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哪些部分详写，哪

些部分略写，转承、照应，多数学生还能掌握；（3）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论文大多能用英语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晦涩难懂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论文写作中也暴露了学生在知识方面存在的若干不足：（1）文章的分析缺乏应有的深度。一些论文的论证实质上是一大堆现象的罗列，对论文主题未能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2）论述层次不清。有的论文行文颠三倒四，啰啰嗦嗦，全文如同一盘散沙，令人不得要领；（3）语言文字的基本功不扎实。且不说语法错误、用词不当，就是拼写以及标点符号的运用也问题不少。

从更深层次考察，上述现象恐怕同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1）多数学生对所论述的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基础，要求论文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多少有些勉为其难；（2）英文写作始终是全面技能训练中的弱项，故一般写作功底较差；（3）完成论文写作时间过于仓促，难以确保论文的质量。

## 二

根据我近年来的实践，深感指导学生撰写学士学位论文绝非易事。看来，指导教师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抓好以下三个环节：

（一）确定主题。主题就是文章的灵魂。主题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文章有无价值，有多大价值。因此，帮助学生定好主题，对确保文章的质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所谓主题，包括两个层次的涵义，即文章的立意以及围绕立意所阐明的若干基本观点。文章的基本要求是：立意既明确而

又有意义，阐发立意的基本观点正确；高标准的要求是：在深入发掘的基础上，立意尽可能体现作者的独到见解，且力求具体分析透彻，入木三分。

实践表明，学生在确定主题时一不小心，极易滑入两个“误区”。一是主题分散，形成“多中心”，结果哪一个主题也未能得到充分论证。凡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引导学生在提出的若干主题中认真进行对比，忍痛割爱，选取其中一个最能体现作者独到见解而又有充分论据的主题。作为第二步，帮助学生从主题和实际材料出发，形成若干“言之有理”的基本观点。至此，撰写学士学位论文算是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第二个“误区”是：主题缺乏新意，人云亦云，流于一种“低水平的重复”。这是为文之大忌。究其原因，或是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本来就很陌生，无论内涵或外延都不甚了了；或是手头已搜集到的资料过于单薄，难以从中提炼出有新意的见解；或是作者疏于思考，敷衍了事。如果说第一个“误区”主要归结于作者对确定主题不得要领；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作者“无所作为”所致。经验表明，引导学生走出第二个“误区”的良方是耐心疏导，充分激发学生认真写好论文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二) 写好提纲。提纲就是文章的架构。架构搭好了，全文纲举目张，浑然一体，贯穿着一种强有力的内在联系。这里特别需要把握好三点：层次分明；详略得当；连接自然。

学生拟写作提纲最易陷入的“误区”有两个。一是纲目不清，甚至本末倒置，这样的论文必然逻辑混乱，语无伦次，令人不知所云。导师最好启发学生将文章的论点按“大道理”、“小道理”重新梳理，“对号入座”。二是详略取舍不当。

这主要因为行文不是根据阐明主题的需要，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迁就原材料，让原材料牵着鼻子走。这样，对主题的论证势必单薄、肤浅，事倍功半。解决的办法是：启发学生摆脱原材料的束缚，以充分论证主题为依据，重新剪裁材料。

(三) 润色文字。润色实质上就是使笔下的英语尽可能地地道些，再地道些。语言地道了，不仅文字的表达力、穿透力、感染力很强；而且文从字顺，令人赏心悦目。为此，甚有必要让学生避开三个“误区”。“误区”之一：中文式的英文。有的学生本来英语功力不济，以偏偏图省时省力，十之八九会写中文式的英文。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最令指导教师头痛。导师只有重点地帮助学生将中文式的英文按英文的表达习惯尽可能润色得地道些。但想通过几次辅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误区”之二：复合句的句法错误。美国人偏爱用复合句。很多中国学生则宁愿用多个简单句取代一个复合句。这主要由于运用复合句比简单句难度大得多。从我们学生的论文写作看，很难避免复合句出现句法错误，特别是主从复合句中定语从句和名词从句的错误。如果导师从这方面指导学生因人而异，有的放矢地帮助他们改正自己常犯的某种句法错误，一般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误区”之三：用词不当。这有几种情况：对词义理解错误，导致误用；对若干同义词的字义分辨不清，不能选取最贴切的用词；粗心大意，用了不该用的错词。导师应依据不同情况分别指出问题之所在，让学生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选取正确的用词，这固然会耗费不少时间，但很值得。



### 三

学生写好学士学位论文，除了导师的正确指导，在教学组织等方面也还有许多讲究。在此提出几点想法供进一步探讨。

(一) 在课程设置上，英文写作课应与听、说、读的训练同步进行，均衡发展。教学大纲已将英语写作列入高年级课程范畴，但写作训练时间毕竟太短，写作技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故建议英语专业从一年级开始就开设指导性作文实践课，以便学生从一开始就接受与其英语水平相应的写作训练，这对于高年级阶段提高英语写作技能大有裨益。

(二) 在课程设置上还应适当增加英语文化知识课。从现在我们四年必修课的整体设计看英语专业语言课程相对开得较多些，而英语文化知识课开得太少，这可能是造成学生迄今知识面仍然较窄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使学生很难达到教学大纲在文化素养方面所提出的具体要求。

(三) 可探索组织学士学位论文答辩。即由指导老师组成答辩小组，学生在稍作准备后用英语当场回答与论文密切相关的问题，最后由答辩小组根据答辩情况分别评为优秀及格和不及格，在初期探索阶段，答辩结果对论文能否获得通过主要起补充性参考作用，以后逐步过渡到起三分之一的实质性作用。

(四) 组织论文评优工作。即在所有论文完成后，由系里统一组织评出占论文总数的十分之一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再作适当修改后打印成册，以期对应届毕业生和以后的毕业

生起到应有的示范指导作用。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 中国人进行外语耳听会意 训练时的心态分析

刘亚平

“听不懂!”、“听不清!”、“记不住!”、“来不及选!”、“单词太多!”、“找不到文字材料!”、“听一遍怎么也不行!”、“顾了前面，抓不住后面”、“×××(某个词、语)什么意思?”……这些恐怕是所有中国人进行外语耳听会意(俗称“听力”)训练时心中所共有的抱怨。其中固然有水平低、基础差、要求高、难度大等客观原因，但必须承认：传统、落伍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教材正束缚着我们的心理，阻碍着我们在教学效果方面取得质的飞跃。

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在求学时的急切、刻苦、聪颖举世闻名。然而，今天我们落后了。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心理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作一番痛苦而又深刻的解剖、分析。既不能再躺在古人的功绩上，躲在先辈的荣光中悠然自得，固步自封，也不能再眼巴巴地望着洋人的高楼汽车、咖啡美酒长吁短叹、垂头丧气了。绝大部份有志于参加“托福”等出国水平考试的中华儿女，正是怀抱着上述理想，作好了物质上、生活上的准备，坐到了录音机前，准备拼搏一番的。而报考“托福”等测试的考生都知道：

试题共分三部分。耳听会意是第一部分，是最没有把握、最无从入手、最难以自学的一部分。也是考生在精神上最容易退缩、甚至全线崩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剖析中国人进行外语耳听会意训练时的心态入手。

### (1) 求全与务实

我们总是在追求十全十美，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语言学习当然也希望尽可能地确切、完整、全部掌握。然而，在听说实践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正相反，在耳听会意方面，往往只要求听懂某几个只言片语，就足以理解该句、该段，可以进行语言交流，或测试选择了。

当一个初学语言的婴儿，唧唧呀呀地吐出了“水……”、“肉、肉吃……”，这么几个音符时，哪一个当爸爸、妈妈的会抱怨“听不懂！”、“听不清！”呢？当我们在外地公共汽车上听售票员报站时，我们对于“乘客们，下一站是……”之类句式的主、谓语是不感兴趣的；而我们在听“……是王府井。”时的聚精会神，正是出自于很难请售票员“再来一遍”的心理准备。当我们边吃早点边听广播，或休息时观赏电影、电视时，又有谁在要求自己只字不漏，以至关机停电就某一个词语查完辞书，再重新欣赏的呢？

由于长期的缺乏，我们更急于得到补偿和满足。成家时，家具的“三十六条腿”也好，电器的“八大件”也好，这种超出实际可能与需要，盲目求全的价值观念正是我们在进行外语听力训练时常犯的心理偏差。也由于长期的缺乏，我们自悲、自嘲，往往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却过份地为自己所未得到的面耿耿于怀。“侃大山”时，我们很少赞美满城林立的楼群，而理所当然地为自家小屋的拥挤牢骚满腹，为

什么不“侃”——“侃”蜂窝煤球炉旁的“双门阿里斯顿！以此类推，外语听力训练时，我们大有必要及时、反复地提醒自己：我们听懂了什么，以克服慌乱，增强信心，平衡心理。

参加出国听力训练的绝大部分是成年人，掌握了我们的母语：汉语，并且在专业、本职方面多是佼佼者。所以，一个个都具有较强的“汉语自我”（Chinese self），但在外语听说方面，往往只是一个啾呀学语的孩童、一个公共汽车上的外地乘客、一个尚未置全“八大件”的未婚青年……。于是，听说训练时，我们的“外语自我”（English self）往往显得羞怯、脆弱，甚至在“汉语自我”的面前，无地自容、一筹莫展。众多学员听到一句外语后，头脑一片空白，口里一个词语亦无法复述，心领意会也就无从谈起了。从学习方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学员一般是在进行“英语→汉语→英语”的翻译训练，而不是听说的耳听会意。这样，我们就不自觉地使“英语自我”摆到了“汉语自我”的对立面上，将听外语的过程规定成为自己的英语与汉语较量的程序。当外宾一说话、录音机一打开时，弱小的“英语自我”能不在成熟的“汉语自我”面前张口结舌吗？！正如在一个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上不能接纳中国文学研究生同堂学习一样，学习外语听力时务必将汉语“轰将出去”。

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是克服求全心理的最佳方案。在外语耳听会意的训练中，我们提倡“Get what you can.”的务实态度。从现象上看，也许我们将标准降低了，但这更符合我们的实际外语水平，更符合我们的民情。在听力方法的探讨中，我们将充份阐明如何“Get what you can.”——“尽其所能”，或者说：“能听懂多少是多少”。

为了证实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妨举个实例：

录音：(Woman) The drain is clogged again and there's water all over the bathroom floor.

(Second Man) We'll have to call Mr. Morris right away.

(First Man) What job does Mr. Morris probably have?

- 选择：(A) Laundry worker  
(B) Plumber  
(C) Carpenter  
(D) Train Conductor

这道会话听力选择题包含有若干不常见的单词。如果为了求全，第一个单词“drain”就会逼得我们“卡壳”。而如果实事求是地听能听到的词语：

(Woman) ...water...over...floor.

(Second Man) ...call...Mr. Morris...

(First Man) What job...?

水平再低的学员，也不难听到以上词语，经过逻辑推理等等手段，我们就能领会到：

因为：floor 洒满了 water，要找 Mr. Morris，

所以，Mr. Morris 一定是能解决该问题的人。

又因为：(A)、(C)、(D) 都不是解决 floor 上的 water 的人，所以：(B) 一定是正确答案；而且是个管子工。

以上实例说明：求全则很可能一无所获，务实则有可能

取得成功。

### (I) 移山与隧道

我们十分理解准备报考“托福”等出国考试的学员们，推迟婚期；或将尚未成年的孩子转托他人；或四处奔走寻访师长、教材；或筹集资金，争取有关人士批准，以便脱产或半脱产；甚至泡病假、卖家产、闹离婚时的甘与苦。为了自身的奔发，为了祖国的四化，学员们克服了远远不亚于某些企业家、个体户所遇到过的困难。

而今，一旦有了学习的可能，学员们一个个摆好了单放机，有的还外接耳机，充分作好了下定决心，移山不止的种种准备。

曾经有一位在北京东北郊电子管厂工作的学员，为了凑学费，卖掉了手表、自行车，每天凌晨挤二、三个小时公共汽车，来到市区的出国考试培训班，学了四个月。学习期间用的近二十盘磁带，他字字句句听过，还作了十几大练习本的听写，甚至还背熟了八五、八六年的若干套“托福”听力题，可惜当年他没能通过考试。

他的失败引起了教学双方的震动与沉思。他从来是：听不懂第一个单词，决不听第二个；听不懂第一个句子，决不听第二句。为了一个单词，他愿意倒带上百次，可以化掉整整一小时。屡屡“听不见”、“听不清”时，他便找来音带原文，先抱着词典查遍单词短语，然后对着文字材料非“听见”、“听清”不可，毕竟有些词、音根本就无法“听见”或“听清”，于是他便抱怨录音机，抱怨磁带，甚至抱怨“老外念得太别扭！”当我们多次提醒他：不妨改改听力方法，耳听

会意不只是反复机械地“听一听一听”时，他总是反驳说：“我豁出命去了！我就不信……！”那年 VST 考试，他因为听力部份差两分而没有通过。对着这样的考试结果，想着他那两台按坏了的录音机，还有手表，以及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奔波，我们还要赞美“这种精神可嘉”吗？！

他一个人的悲剧，决不能演变成我们全体学员的悲剧，更不能再演变成我们民族的悲剧。愚公移山的精神，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现代生活节奏迅猛异常的当代，只靠这么一点精神，已无法应付中华掘起的需要，也无法应付与我们传统的考试方式大庭相径的“托福”测试的需要。

宏观上说，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史的民族历经沧桑，有过无数磨难与失败。经过我们这一代，华夏儿女还会奋斗几千年，几万年。但微观上说，每一个参加出国考试的个人，无论是踌躇满志的青年人，还是不惑之年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个别两鬓花白的教授、学者，我们谁也耽误不起了！我们谁也不愿意捧着试题，学着阿 Q，喊一声：“子子孙孙……”了！

我们应该克服一点盲目性，多提倡一点科学性。一铲铲、一筐筐地挖；一字字、一句句地听，收效究竟如何？！与其挖山不止，还不如开个隧道，或者干脆搬家。我们出国求学，本就是为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什么在出国考试的当口，不先采点他山之玉呢。

本教材的后五单元将系统论述耳听会意的技巧方法，正因为此。

眼下，我们也可以找个实例：



录音: In the springtime I enjoy taking long walks in the rain.

选择: (A) It's a nice walk kown the lane.

(B)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fix the drain.

(C) I enjoy looking at wet rocks.

(D) I like walking in spring rain.

在我们剖析“求全”心理时,我们论述了听懂只言片语,达到耳听会意,从而正确选择的可能性。现在,我们想说明:甚至在根本没有听见录音带原句(当然也就不一字一句地听)的情况下,也能正确选择的可能性。

运用快速阅读的技巧,我们可以从(A)、(B)、(C)与(D)四个选择句中找到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四个词:(A) lane; (B) drain; (C) wet; (D) rain。其中,因为:(A)、(B)与(D)读音相似,(C)与(D)词义相似。

所以:只有(D)才具有既近似于(A)或(B),又近似于(C)的双重特性,从而也最有个性。

检验原句,(D)无疑是正确选择。

结论:在这类耳听会意测试题中,包含着具有双重特性,从而也最有个性的词、或语的选择句,往往是(在要“求全”——不要绝对;语言现象千变万化。)正确答案。

学员们在半信半疑,或者又惊又喜的同时,不妨再试一道例题:

选择: (A) You cannot keep a cat in your room.

(B) Hats cannot be worn in the dormitory.

- (C) It's against regulation to fly kites.  
(D) Noisy pets should be kept inside.

其中，因为：(A) cat 与 (B) hat (C) kite 读音相似，  
(A) cat 与 (D) pet 词义相似。

所以：(A) 应该是正确选择。(请注意：至此，我们还没有听过录音带里的原句。)

试比较，原句：Cats aren't allowed in dormitory rooms.  
(A) 果然是正确选择。

在此，我们绝不是想论证：对所有的听力测试选择题都可以不听原题而作出正确选择。我们只是想说明：盲目的逐字逐句的听力方法完全可以由科学的抓关键词语的方法来代替，而且从效果上来说，只有后者才符合“托福”等测试的意识，才符合现代意识。

### (■) 没把握、再来一遍、灵丹妙药及其它

正是在求全心理的支配下、在按部就班的传统观念作用下，我们过分的求稳，老觉得没把握，缺乏一种冒险精神。而“托福”测试恰恰是针对现代西方经济、文化、学术等等领域中机会多、竞争激烈；变化快、强手林立的特点，要求考生不畏强敌，敢于进取，并能抓住时机，果决立断；还要能排除复杂的表现现象的干扰，认清本质，把握关键，解决问题。所以“托福”等对当今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门外语水平考试，也是一场心理素质的测验。

航天飞船进行倒数点火的十秒钟，不正是我们进行耳听会意测试选择时的十秒钟间隔？飞船升空成功与否的可能性，不正是我们选对 (A)，(B)，(C) 或 (D) 的可能性？航天飞

船升空有过失败，人类还是要升空；“托福”选择错个把题，天也不会塌下来。而如果在划圈选题的一瞬间，浮想联翩，或是为报考“托福”所交付的美金耽心；或是在设想到达美国、走下飞机的情景。试想，“把握”这时从何而来！内船升空的十秒钟内，飞船底座下会形成一个真空区域；我们选择的短时间内也必须形成一个心理真空（non-judgement），以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英语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少考虑，或不考虑“把握”，反而会因为没有什么干扰而更有信心，也就有了“把握”。

“没把握”的副产品，就是“再来一遍”。初学者听完一个句子，往往对听不懂的词语反应特别迅速、敏感，正是所谓“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不是问同学、查词典，就是再按一遍录音机，而对于可能听到、听懂了的词语则想都不去想一想。更谈不上记忆、归纳、推理、判断。几遍反复以后，听不懂的词语，在心理上形成一个障碍区，使头脑产生了惰性，本来可以心领意会的词语，以及全句的大意全都忘了（根本没费心去记）、抓不住了。我们不反对初学者为了熟练运用技巧与方法，以经过思索与分析的前提下，带着问题再听一遍或两遍，但必须珍惜每一次重听的机会，带着问题听。一般三到四遍为限。实在听不懂，不如暂时放下，去听前后文。千万不能形成心理上的过敏原与抗药性。

而我们再听一遍的目的，只能是为了提高耳听会意的水平，逐步做到一遍解决问题。因为在实际生活与听力测试时，我们都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再来一遍”。虽然“I beg your pardon.”是大部分中国人最早学的一句口语，但在许多场合却不能用，或者用不得。试想，你能对情意绵绵地说着“I love

you. I want to kiss you.”的情人说“Pardon”吗？

平时训练时一句话、一段话，习惯了再听一遍的学员，还容易产生连锁的脆弱心理，即通俗所说“明日复明日”的自弃心理。“托福”考试才进行了十几分钟，一位考生便停笔坐待了。问他是怎么回事，答道：“好几道题听不见，明年再考。”也许这位考生再找三十美元报个名并不难，可青春年华何以再来一遍！

恰好是这样的弱者，还会产生一种寻找“灵丹妙药”的幻想。如今社会上的确有一些热衷于“托福”的求学者，缺的偏偏是坐在案首，踏踏实实地求学的精神。化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收集了五花八门的“托福”书籍与磁带，大陆的，港台的，甚至美国原版的，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又四出托人情、找关系，到处听课。中国人讲的、美国人教的；单位办的、私人请的；各式各样的班上了一个又一个，大有当年的王孙公子求仙问道的劲头。

何苦呢？“托福”也是一门学问，是科学、是艺术，同样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是要阐明有关“托福”的技巧方法，某些技巧方法可能在短期内掌握并见效一时。但这些决不是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丁神灯。这些技巧方法必须建立在对“托福”意识、“托福”精神、“托福”观念识别扬弃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固有的思想文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样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基础上。“托福”是一个美好的词。但我们不是托美国人的福，不是托某个教师、某本教材的福。我们要托福我们自己。我们要托福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为此，我们要准备承受痛苦。

（节选自《全身心听力法》）

# 英语作文的写作技巧 及其教学

张晨风

英语二年级学生在参加专业四级考试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作文。他们常在题目面前发愣，不知如何下笔。这里固然有英语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在教学中强调格式化，如：如何写段首句作文，关键词作文，情景作文，看图作文和标题作文等，而忽略了学生必须掌握的一些写作基本技巧。这样，学生不会审题，不会构思，不会写如描述，比较，议论，因果等类的文章。写起来便空洞无物，只是英文单词的堆砌。

通过总结写作课教学的经验，我认为，写作成功的关键是学生必须首先掌握不同类型文章的写作方法，然后在考试中注意审题、构思、决定所要写文章的类型，这样就言之有物，下笔如神了。

## 一、学生所应掌握的文章的类型

通过我的教学体会并结合考试要求，学生应能熟练识别多种不同类型的文章及掌握写作这些文章的要点。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文章的类型。

### 1. 描述性文章 (Description)

此类文章用来描述某一场景，如描述写天安门广场，你的居室，书架等。常用的方法是水平描写，竖向描写及环形描写。在教学中，我向学生强调指出写作此类文章所应用的词组及表示地点，位置的介词、副词。如：above, across, against, attached to, beneath, in back of, in front of, in the center of, next to, on either side of, surrounded by, to the left of, to the right of 等等。学生在描写中，首先要决定描写顺序，其次要注意应用这些词和词组。

### 2. 时间描述文章 (Chronological order)

这类文章是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来描述的。如某个故事，某个事件的发生情况，某人的生平等。在这类文章中，时间顺序是第一性的，此外，我还总结出此类文章所应用的表示时间的词、词组并提醒学生注意其应用。如：after, ago, as soon as, by that time, during those years, from...to..., gradually, later on, prior to, subsequently, the first time, the last time, then, upon..., when, whenever, 等等。

### 3. 分析性文章 (Analysis)

这类文章是比较难写的。因为它涉及了学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这对那些没有社会经验，缺乏对社会问题深刻理解的学生是比较困难的。在教学中，我又把分析性文章分成三类：

#### a. 分析种类 (Kinds and types)

如：分析教师的种类。通过启发，学生可指出，根据年龄，可分为青年、中年、老年教师。根据职称，可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也可以根据学科分类。我又引导学生从教师的教学态度分析。学生提出可把教师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服务，把一切精力都奉献给教书育人。第二类是对工作比较负责，但从事各种赚钱的事情也占去一定时间。第三类是身在教室，心在赚钱从商，校内教学只是点缀。通过分析其它例子，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了这一方法。

#### b. 分析原因和起因 (Reasons and causes)

如分析：为什么世界上沙漠面积越来越大？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女人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物价总在上涨？为什么英语很难学好？这些“为什么”问题都是和学生的生活或体验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因此，通过引导、分析，他们可以提出很多答案来回答这些“为什么”。经过整理，依其重要性排列，学生可以写出一篇较好的分析性文章。在写作文前，教师给学生灌输的背景知识及学生的写作前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在头脑中进行的准备和分析是文章成败的一个重要基础。

#### c. 分析特点 (Characteristics)

如分析：好的服务，好的教师、丈夫、妻子等应各具备什么特点？

通过学生的日常观察，他们可以提出很多各类人的特点。教师可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整理，按重要性和明显性排列出顺序，保留普遍性，去除特殊性，这样就较好地完成这一体裁文章。

#### 4. 比较性文章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学生在生活中会经常读到这类文章，但写起来还存在一定问题，如：比较文章的格式应是什么？应比较什么，不应比较什么？就此我向学生指出，此体裁的最佳方法是先把要

比较的二个事物分成若干个部分，然后依次列出 A 事物和 B 事物的特点。即：第一部分：A…，B…；第二部分：A…，B…。与此同时，提醒学生使用用于比较的词组。如表示相同词组有：the same, similarly, in the same way, like, alike, both, just, likewise, resemble, similar to, as…as 等。表示区别的词组有：differ from, although, yet, still, unlike, on the contrary, on the other hand, even so, even though, however, in contrast to, nevertheless 等等。

#### 5. 议论性文章 (Argumentation)

如：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妇女是否应走出家庭，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助人为乐是否过时等。

此类文章的写作结合了原因和比较两类文章的特点。一些对时势敏感的学生会时常考虑这类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开始写作前，引导、启发学生在头脑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列举事例证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理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在教学中，可把学生分成二组，各持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在些基础上，经过综合，总结和加工，完成这一体裁文章的写作。

#### 二、事实和例子的重要性

在教授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刻都在提醒学生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文章中时刻注意事实和例子。

学生写作的一个特点，也是缺点，就是喜欢罗列出一系列概念化的东西，而缺乏对每个概念的进一步细致描述和解释。比如，当他们描写每一事物或事情时，总是平铺直叙。下



面是描述某房间的一段：To the left of the entrance is a dresser. Next to the dresser is a closet. Beside the closet, there is a nightstand. In front of the nightstand and beside the bed is a rug.

在课堂上，我启发学生指出这段文字的缺点。大部分同学可以正确指出它缺乏的是进一步详尽的描写。这样的文字显得很空洞。经过讨论，对这段进行了如下修改：

To the left of the entrance is an old oak dresser that once belonged to my grandmother. It is one of my most cherished possessions. Next to the dresser is a closet, which I try to keep orderly. I can't say that I am always successful, however. Next to the closet is a pretty yellow nightstand. This is where I keep my alarm clock and a few books for bedtime reading. In front of the nightstand and beside the bed lies a beige wool rug.

修改过的文字就显得生动、详尽了，并且加上了作者的个人情感。

又如学生在写作分析性文章中进行特点、描述时，也往往容易把某一事物或人的特点一一罗列出来。这样既无主次，又无特色。如在“我理想中的丈夫”的写作中，有学生写下了以下几句：

My husband would first be strong and loving. Second he is willing t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ousehold and finally he would be handsome.

这段文字的构思不错，但由于缺少了例子和事实，就不能称其为好的段落。通过强调事物和例子的重要性，经过修

改后的相应段落就有血有肉了。

My ideal husband would have to have several important qualities. First, he would be kind and loving. For example, he should never get angry with me and he would make life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 family. Second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hare i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ousehold. He would, for instance, do his share of the housework and the raising of children. Finally, he would be handsome. He would be tall and thin and with a good-looking face.

在教学中，只要我发现有学生忽略了事实和例子，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强调其重要性并帮助他们进行修改，使文章在骨架的基础上变得丰富、充实起来。

### 三、口头作文的重要性

每当人们谈到写作，所想到的就是书面写作，而往往忽视或根本没有想到口头作文。他们认为作文就是写，与口头表达无关。其实不然。在教学中，我把口头作文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口头作文做为笔头作文的准备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写文章所需要的信息，可以通过讨论和口头作文的形式取得。在教学中，当我给学生一个题目之后，要求学生分组讨论用何种方式，何种技巧来写这一文章，并相互交换有关信息。这种输入给学生提供了大量与所要写文章相关的信息，这对文章的形成有极大帮助。在此之后，分组进行口头作文的练习，在练习中，学生可互相改正在结构设计中的错误，保留有用的和相关信息，舍去无关紧要或与文章主题无关的信息。然后每组选派一名代表到班上讲述他们的口头作文，并

请其它组的同学对此作文提出评论，指出其优劣并提出改进方法。

通过实践，我总结出口头作文以下几个优点：

一、它有助于学生收集相应的信息。学生对所给题目的体验是各种各样的。如有一作文题目为“上课缺席的学生可分为几类”。一般学生只能指出二、三类，如生病或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来上课。但思考敏捷的学生可提出如不喜欢这门课，和教师闹意见，借缺席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缺席去做生意，约会等等。这就丰富了学生的思维。经过归纳总结，他们就可把缺席的学生分成若干类并依次做出解释和说明。

二、它有助于学生对所写文章结构的理解。如果只是教师讲一遍某类文章的结构，而不经过若干次的练习，学生是不会掌握的。所以大量的口头作文练习使学生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对自己作文的结构进行修改，并听取其它同学的意见，使之完善。

三、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英语教学应是综合能力的教学。听说读写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即使是专项技能训练的写作课也应服务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这一大前提。

总起来说，学生要完成篇好的作文，必须首先掌握此类文章的写作技巧，并辅之以相应的事实和例子。在动笔之前，在头脑中或口头进行结构安排，反复修改。这样写出的文章就会充实，以理服人。学生经过这样的训练，在作文题目前就会变得轻松自如了。

### 参考书目

1. Intermediate Composition Practice, Linda Lonon Blanton,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Inc. 1983.

2. 英语写作手册, 丁往道, 吴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 英文报刊标题特色刍议

刘安荔

对于学习英语的人们来说，经常阅读英文报刊是非常有益的，而且也是必需的。阅读英文报刊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标题。不少标题立意新颖，而又不拘一格，有时无法一看就懂得，但掌握了标题的规律和特点后，看懂标题就不困难了。

1. 报刊文字的标题往往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由于标题要求简明洗练，生动醒目，因此在制题时，总是省略掉虚词，只标出实义词。英语文标题中省略最多的虚词是冠词、动词“to be”，其次是连词（其中连词 and 常用逗号代替），以及介词和代词等。例如：

Japan to Rush Food, Aid to Khmers

(=Japan is to Rush Food and Aid to the Khmers.) 日本紧急调拨食品支援高棉人。

Cars, schools targets of new save-oil plan.

(=Cars and schools are the targets of a new save-oil plan.) 汽车学校是新节油计划的目标。

Woman kills husband, self.

(From 《English By Newspaper》)

(=A woman kills her husband and herself.) 一妇女杀死了她的丈夫，然后自杀。

2. 英文报刊标题常常使用缩写词（主要为首字母缩号）和节略词（即：截短法或缩短法）

PM to see MPs over big factory closures (The Times, 1981)

首相将会见下院议员商讨大厂停闭问题。

(PM=Prime Minister

MP=Member of Parliament)

UFO Sighted (The Observer, 1980)

目击飞碟 (UFO=Unidentifide Flying Object)

Irish demo clash (The Sunday Times, 1981)

爱尔兰游行队伍发生冲突

(demo=demonstrators)

3. 英文标题总是使用动词的现在时态代替其它时态，以使读者产生现实感与生动感，例如：

Indian PM survives house vote (China Daily, 1992)

(=India. PM survived house vote) 印度总理在议会选举中险胜。

Swedish oil deliveries halt as strike spreads (The times, 1980)

(=Swedish oil deliveries will halt as the strike spreads.) 由于罢工事态扩大瑞典石油将停运。

Schools ask parents for money towards books (the times, 1980)

(=Schools are asking parents for money towards books.) 校长在要求家长交书费。

4. 英文报刊标题中常大量使用动词的非限定形式

1) 不定式表示未来动作（此时常表示按计划，安排要进行的动作）

Pope to visit Japan in February (The New York Times, 1980.) (=Pope is to visit Japan in February.) 教皇拟于二月访日。

2) 现在分词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ies Vying For Malaysian Telephone Project Contract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ies Are Vying for Malaysian telephone contract.) 各家国际电子公司正在竞争承包马来西亚电话公司工程。

3) 过去分词表示被动

600 trapped by fire for 4 hours (From 《English By Newspaper》.)

(=600 are trapped by fire for 4 hours.) 600人受困于一场火灾达四小时之久。

5. 有些常用词用于英文报刊标题中时，就具有了其特定的词义，我们可将其称为英文标题词汇。这些词经常在报刊标题中出现，读者需在阅读时注意收集，并记住其特定的词义。例如：

axe: 常见的词义为“斧子”做名词用，在报刊标题中常做动词用，其词义为“解雇”(to dismiss from a job)

Governor to axe aide? 州长要解雇他的助手吗？

hold: 在报刊中标题中常见的词义是“逮捕”(keep in police control, arrest)

7 held for gambling 七人因赌博被捕  
rock: 在报刊标题中常见的用法是“震惊”“震动” to shock,  
意思是 to surprise

Gov't report rocks stock market (From 《English By  
Newspaper》)

政府报告震惊证券市场

6. 在英文标题或文章中正常常使用或代用形象化的词  
汇, 以增强吸引力或加强所表述事件的形象性。

British student knifed in France (China Daily, 1981)  
英国学生在法被刺

When ID cards are a must (South China Mouning,  
Post, 1979)

现在人人都要带身份证

7. 在英文报刊标题或文章中还常借用地名或建筑物的  
名称代替政府或其它, 常见的有: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 (英国王宫)

Downing Street: 唐宁街 (英国政府, 首相官邸)

Fleet Street: 舰队街 (伦敦报业、新闻界)

Scotland Yard: 伦敦警察厅

White Hall: 白厅 (英国政府)

White House: 白宫 (美国政府)

Capitol (Hill): 美国国会大厦 (美国国会)

Pentagon, Penta: 五角大楼 (美国国防部)

Foggy Bottom: 雾谷 (美国国务院)

Fun City: 娱乐城 (纽约)

Dice City: 赌城 (拉斯维加斯)



Motor City: 汽车城 (底特律)

Wall Street: 华尔街 (美国垄断资本)

Wall Streeter: 华尔街大老板

Elysée: 爱丽舍宫 (法国总统府)

(原载《中国电视报·英文版》1992年第12期)

# 基础阶段英语阅读 调查与分析

崔素芳

阅读教学是整个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五大语言技能的“读”和“听”一起被认为是被动接受语言的能力。根据语言学家克拉申的观点(1981),学习语言的第一步是大量语言信息的输入,第二步才是主动产生或输出语言,即通过“说”、“写”和“译”达到交际的目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阅读有明确的要求。为了了解学生阅读能力的进步和词汇掌握的情况,从而发现问题,改进教学,做到有的放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学生取得最大的进步,全面培养学生达到大纲所要求的各项标准,笔者于1992年7月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将结果做了仔细的分析,获得了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 一、学生情况和调查方法

1.1 学生情况 鉴于本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学生在基础阶段的阅读情况,笔者选择了即将结束二年级学习的英语专业本科90级学生。参加调查的62名学生中31名通过了92年全国统一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平均分为59,阅读部分不及

格。学生入学时成绩较低，学习的动力不强。这种状况更要求老师改进教学，提高效率，使起点低的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也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1.2 调查表的编制及方法 调查表共有二十五个题、101 个小项，包括了学生对自己的评估、词汇情况、对精读和泛读课的评价以及阅读的爱好及困难等等。笔者编写这份题的主要依据是：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和高年级教学大纲，二、新加坡教授 Gopinathan 有关阅读习惯的调查，三、笔者任教基础课六年的经验。答卷方式采取里克序列，即用“1 2 3 4 5”分别代表“非常同意”、“同意”、“不置可否”、“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学生只需根据自己的情况圈其中一个数字。调查由精读老师在全年级四个班同时进行，一般学生半小时左右完成了答卷。

1.3 统计处理方法 笔者手工统计了 62 份调查表及各项回答情况，并对总的结果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 二、调查结果

2.1 对两年阅读情况总的评价 学生认为他们在阅读方面有一定进步，50% 以上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下列观点：我在阅读方面有很大进步、我学到了一些阅读技巧、我学会了快速阅读。但是，很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满意他们所取得的进步；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对以上三点不置可否，这说明他们不能肯定是否取得了进步，或者说他们不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六分之一的学生认为没有学会如何跳读和略读。

2.2 调查表中专门为了解精读和泛读这两门阅读课的

效果设计了一些问题，结果见下页表。如表所示，大多数学生认为精读课上主要练习了语言点，扩大了词汇量、并做了大量阅读理解练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认为精读课帮助他们掌握了思维技巧、练习了口语、掌握了学习技巧、学习了听力和快速阅读。只有少数同学认为他们通过精读课阅读了辅助材料和练习了写作。泛读和精读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泛读课帮助他们扩大词汇量和做阅读理解练习。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认为他们在泛读课上掌握了阅读技巧、练习了快速阅读并阅读了辅助材料。

主要内容	精 读			泛 读		
	非常同意 和同意	不置可否	不同意和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和同意	不置可否	不同意和 非常不同意
掌握阅读技巧	37%	46%	17%	49%	44%	7%
练习快速阅读	31%	34%	35%	48%	38%	14%
扩大词汇量	70%	25%	5%	57%	30%	13%
练习语言点	76%	17%	6%	13%	37%	50%
做阅读理解练习	65%	27%	8%	57%	38%	5%
练习听力	37%	40%	23%	6%	25%	69%
练习口语	48%	31%	21%	10%	10%	80%
练习写作	18%	56%	26%	6%	15%	79%
掌握学习技巧	41%	44%	15%	28%	44%	28%
掌握思维技巧	52%	43%	5%	21%	33%	46%
阅读辅助材料	25%	54%	21%	43%	44%	13%

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学生认为精读课帮助他们扩大了词汇量、掌握思维技巧和学习技巧，而更多的学生认为泛读课上他们读了更多辅助材料。至于做阅读理解练习，两门课相差不多。

历届学生对课本的意见都很大，所以此次专门调查了这

批学生对两门课教材的意见。喜欢课本的只有 20% 左右，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但出乎意料的是竟有 40% 左右的人不置可否。他们不明确地表示不喜欢教材是否与教师对教材的处理方式有关呢？本文姑且不予讨论。

2.3 课外阅读历来被认为是促进学生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这方面的回答表明了情况很不尽人意。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如“我对课外阅读英语书感兴趣”、“我在课外读了很多书”、“我读了很多英文简写书”和“我读了一些英文原版书”，给予肯定回答的分别只有 40%、32%、47% 和 30%，均不超过一半。读报刊方面，有 42% 的人读《中国日报》，20% 读《读者文摘》，而读《时代面刊》和《新闻周刊》的只有 6% 和 5%。学生的阅读兴趣依次是小说、文化、文学、时事、游记、剧本和社科，最不喜欢的是法律、地理、科学和传记。

2.4 有三个问题涉及阅读习惯和技巧。对“阅读中的主要问题”的回答是，74% 的学生认为是词汇，44% 的人认为是阅读速度（这和他们认为没有掌握略读和跳读是一致的），39% 的学生认为是掌握细节，只有很少人认为主要问题是使用词典。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阅读中遇到不懂的地方怎么办？”74% 的学生靠猜意思，52% 的学生不理睬而继续读，46% 的学生会回头重读，35% 的学生会查词典，只有 7% 的学生会去查资料或停止阅读。最后一个问题是阅读之后愿意做什么，39% 什么也不愿意做，34% 愿意谈一谈，只有 8% 愿意写点儿什么。

2.5 有关学生使用工具书的情况也在这次调查之列。学生们常用的词典是“双解”“新英汉”“朗曼”，很少人用“张道真”和“韦氏”。我校阅览室有一批非常好的百科全书，学

生使用最多是《美利坚大百科全书》，但也只有 30%，其它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知识系列》和《科普百科》等，使用的人非常少。

2.6 学生学习词汇的主要途径是精读课(77%)、自己学到(63%)、泛读课(56%)和课外阅读(52%)。听力、口语课和老师没有让学生学到大量词汇。学生学习词汇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使用(81%)、通过做练习(71%)、通过记忆(60%)和通过上下文(53%)。

2.7 最后一题是“过去两年中我应该在哪方面做得更好”，87%的学生选择了词汇，82%选择了读更多的书，75%选择了读书的范围更广泛，70%选择了增加阅读量，56%选择了提高阅读技巧。

### 三、讨 论

3.1 调查的信度 调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里克序列，但由于学生的答案偏于中间（这种情况在别的类似调查中也有发现），所以若使用加权平均数则难以看出很大区别。为了使分析更加明确，笔者采用了显而易见的百分比统计法，其中“未置可否”未被列入“同意”或“反对”，1、2合为一项，4、5合为一项。

调查结果可基本上被认为是反映了学生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题是自我评估，主观成分比重较大，所以有不准确处。例如，学生自己估计的阅读速度和词汇量就有失准确，需要专门测试才能确定。

3.2 调查结果与大纲的比较

3.2.1 精读课是中国英语教学的一门传统课。虽变革呼声此起彼伏,它做为 一门综合能力课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此次调查结果表明精读课基本体现了大纲的要求,能够通过练习语言点来传授基础语言知识,也训练了基本语言技能如听力和口语。另外,通过做大量阅读理解练习,重点训练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技巧,并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更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学生认为精读课能够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技巧和逻辑思维技巧,这符合大纲上所说的“指导学习方法”和“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两点。然而,精读课也没有完成大纲上所布置的所有任务。例如,大纲明确规定要加强读写训练,但只有 18% 的学生认为他们练习了写作能力。另外,精读课重点应是训练阅读理解能力和技巧,但只有 37% 的学生同意他们掌握了阅读技巧。泛读课达到了提高阅读理解、扩大词汇的目的,但对阅读速度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离要求还差得很远。泛读课另一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对阅读的兴趣,这项在表中没有单独列出,但是从有关课外阅读的项目中可略知一二。

3.2.2 学生课外阅读情况极其糟糕,只有少部分人对课外阅读英语感兴趣或读了很多英文书,他们的阅读兴趣也相当窄,读英文报刊的人数太少。所有这些都与大纲上有关阅读兴趣、阅读量和有关文化素养的要求都相去甚远,确实急需改进。

3.2.3 使用词典的情况基本符合要求。应多用英语词典。使用百科全书的情况不太好。大纲要求学生应初步学会查百科全书,并独立解决大部分的语言难点和背景知识。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人使用百科全书,想必他们不会独立查找

资料解决问题。

3.3 本次调查为改进基础课教学和在高年级进行弥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3.1 首先，引进测试。大纲明确规定四级认知词汇量要达到 5000—6000，六级要达到 6000—8000；阅读速度四级快速是每分钟 250—300 字，六级是每分钟 450—600 字。这项调查中学生大多不知道自己的词汇量和快速阅读速度，只能做大概的估计，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所以今后教学中应补上这一点。

3.3.2 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精读课，大量地训练阅读技巧，并努力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使之成为真正的综合技能课。这里特别要强调词汇教学。学生反映阅读中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他们也觉得过去两年中应该在词汇方面有更大进步。词汇教学应得到足够的重视，相适应的方法也应该推广普及。

3.3.3 课外阅读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英语水平的提高，此次调查结果暴露出来我们这方面存在很大缺陷。我们的学生阅读兴趣不大，阅读范围很窄，主要原因之一是老师没有在这方面给予有目的的培养和指导，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分重视课本上的内容和应付如四级之类的考试，没有给学生时间进行课外阅读。鉴于上述情况，有必要在课外阅读方面做如下改进：①各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布置他们进行必要的广泛的阅读。②阅读课教师应看到课本的局限性，努力搜集各种来源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进行辅导性阅读。当学生掌握了阅读如科普类文章的一些技巧并同时培养起一些兴趣以后，他们会更主动地阅



读各方面的文章。③改革考试内容，把课本内容限制在一定百分比内，用非课本内容来考查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学到的技巧和能力。④开设报刊阅读课，通过辅导学生阅读《中国日报》、《读者文摘》、《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文章，培养学生兴趣，提高阅读政论文章的能力。⑤建立更有系统的课外阅读项目，推荐书目文章，搜集材料，搞测试，搞比赛，组织一系列旨在促进课外阅读的活动。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 Wortbildung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郑慧卿

Schon seit Urzeiten müssen die Menschen ihre Urbedürfnisse: essen, sich kleiden und wohnen, befriedigen, um zu existieren.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verändern sich auch die Bedürfnisse der Menschen, von den primären bis zu den Luxusbedürfnissen, von den individuellen bis zu den gesellschaftlichen. Alle Dinge, mit denen die Menschen ihre Bedürfnisse decken, alle Akte, die mit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 mit der Arbeit eng verbunden sind, sind durch Sprache verkörpert. Sprache ist eine gesellschaftliche Erscheinung, ist das wichtigste Kommunikationsmittel der Menschen in deren Umwelt, ist Medium zur Vermittlung der Information der Gedanken unter den Menschen. Ihr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ist untrennbar verbunden mit der Wandlung der Umwelt, mit der Verände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Das heißt, die Sprache ist zugleich Voraussetzung, Instrument und Ergebnis der Auseinandersetzung der Menschen mit der Wirklichkeit.

Sprache besteht aus Wort bzw. Wortschatz. So sind Wort und Wortschatz Produkt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 und Theorie, zugleich auch Mittel des Ausdrucks der Gedanken des Individuums. Das Wort unterliegt also als wichtiges Mittel der Nomination und Verallgemeinerung, Wertung und Herstellung des kommunikativen Kontaktes stärker als jede andere sprachliche Einheit oder Regel dem Einfluß der Faktoren und Bedingungen gesellschaftlicher Lebensprozesse. Die grammatischen Regeln einer Sprache sind zahlenmäßig relativiert und ihr System ist relativ stabil. Aber als sprachliche Grundeinheit hat das Wort bzw. der Wortschatz eine relative Freiheit und befindet sich stets im Wandeln und Entwickeln. Es bezeichnet die zahlreichen, neu entstandenen Dinge und ist das Hauptmerkmal der sprachlichen Entwicklung. Am empfindlichsten ist das Wort gegenüber den allseitigen Veränderungen der objektiven Realität, wie zum Beispiel in Zeiten der revolutionären Umwälzung und der technischen Revolution. Das Auftreten aller neuen Dinge, das Ändern der ursprünglichen Dinge und das Untergehen der alten spiegeln sich vor allem im Wortschatz der Sprache wider. Der Wortschatz als System der Bezeichnungs- und Bedeutungseinheiten muß sich den veränderten Aufgaben, Bedingungen und Bedürfnissen der Kommunikation ständig anpassen. Die Beziehung zwischen dem Wortschatz und der Sprache ist genau so wie die zwischen dem Baumaterial und Gebäude. Wort bzw. Wortschatz

ist Baumaterial der Sprache, kein Wortschatz ist keine Sprache. Wortschatz spiegelt den Stand der sprachlichen Entwicklung wider. Mit der sich ständig entwickelnden Sprache wird auch ein dementsprechend größerer Wortschatz mit reichlichem, bildhaftem Inhalt benötigt. Umgekehrt treibt der bereicherte, mannigfaltige Wortschatz wieder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voran. Daher kann man sagen, von den drei Hauptfaktoren im Sprachsystem, nämlich Phonetik, Grammatik und Wortschatz sind die vorderen zwei relativ stabil, der letztere (Wortschatz) dagegen ist am lebhaftesten und besitzt große Vitalität. Die organische Kombination und ununterbrochene Sublimation von diesen drei Faktoren sind die wichtigen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als Kommunikationsmittel dienenden Sprache.

Doch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bedeutet weder das Abschaffen der vorhandenen Sprache noch das Erschaffen einer neuen Sprache; Vielmehr entwickelt sich die Sprache mittels des Erweiterns und des Umgestaltens der Grundlexeme der vorhandenen Sprache, nicht nur deswegen, weil die Menschen in ihren Denkweisen beim Schaffen neuer Begriffe nicht von dem Vorhandenen Sprachmaterial abweichen können, sondern auch, weil die aus vorhandenem Sprachmaterial gebildeten neuen Wörter (die Neologismen) leicht zu begreifen und zu akzeptieren sind. So bilden die Grundlexeme dank ihrer Allgemeinheit und ihrer Stabilität selbstvers-

tä ndlich die Grundlagen neuer Wörter. Daher spielen neben der Entlehnung von Fremdwörtern aus anderen Sprachen die aus eigenen muttersprachlichen Grundlexemen zu bildenden Wortbildungskonstruktionen (WBK) in der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eine wichtige Rolle. Damit ist neben der Übernahme fremden Wortgutes und Übernahme und Zuordnung neuer Bedeutungen zu schon vorhandenen Formativen (Bedeutungswandeln von Wörtern) die Wortbildung (WB) die wichtigste Quelle der Bereicherung und des Aufbaus des Wortschatzes.

Unter WB versteht man die Bildung neuer Wörter, die man zu einer sprachlichen Kommunikationstätigkeit benötigt, mit vorhandenen Elementen nach Mustern bzw. Modellen. Genau gesagt liegen die Aufgaben der WB darin, den neuen Dingen, den neuen Gedanken, den neuen Vorstellungen, die im variantenreichen Universum entstanden sind, Bezeichnungen und Inhalte zu geben, neue Begriffe zu ergänzen, die sich aus der rapiden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ergeben, sowie den vorhandenen alten Dingen neue Wortbedeutungen zu verleihen, die noch bildkräftiger, anschaulicher und übersichtlicher sind.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WB erfolgt fast synchron mit der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Zwar haben die Sprachwissenschaftler vo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auch von der deutschen, seit langem im Bereich

von Wortbildungslehre, Wortbildungskonstruktion, Wortbildungslehre und Zusammenhängen zwischen WB und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schon umfangreiche Untersuchungen unternommen und dabei große Erfolge erzielt, aber in der Frage nach der Stellung der WB im Sprachsystem und der Wortbildungslehre innerhalb der Linguistik ist bisher noch kein eindeutiges, entscheidendes Urteil gefallen.

Über die Stellung, die die WB, die sowohl die Grammatik als auch die Lexikologie berührt, doch auch ihre eigenen Züge aufweist, im Sprachsystem einnimmt, und über die Stellung der Wortbildungslehre innerhalb der Linguistik sind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unter verschiedenen Sprachwissenschaftsgruppen viele sich widersprechende Ansichten vertreten worden. Auch heute haben die Sprachwissenschaftler noch immer nicht zu einer allgemein akzeptierten Ansicht gefunden. Bis zum 20. Jahrhundert hat sich eine Tendenz entwickelt, nach der die meisten Forscher der Sprachwissenschaft die WB als eigenständige linguistische Teildisziplin ansehen. Die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über die Zugehörigkeit der WB beweisen, daß sich unter dem Aspekt des stark verallgemeinert-abstrakten Charakters der Wortbildungsmittel und der Wortbildungskategorien sowie des Grades relativer Geschlossenheit des Wortbildungssystems die WB den grammatischen Teildiszi-

plinen nähert. Serfiantisch gesehen sind die WBK eng verbunden mit lexikalisch-semantischen Kategorien. Und in der Hinsicht der Verfeinerung und der Ästhetisierung der Sprache geht die WB enge Bindungen mit der Stilistik ein. Die Selbständigkeit der WB zeigt sich in ihren eigenständigen Darstellungen, sie treten nämlich in Formen der Zusammensetzungen aus zwei bzw. mehreren unmittelbaren Wortbildungskonstituenten oder der Ableitungen und Affigierungen auf. Wegen ihrer starken Produktivität und Motiviertheit tragen die WBK zum Erweitern und Bereichern des Wortschatzes und zum Vorantreiben der sprachlichen Entwicklung bei.

Wie oben erwähnt, fängt die eingehende Forschung der Wortbildungslehre und damit das immer wachsende Interesse daran mit der Forschungsarbeit der gegenwärtigen Linguistik an, besonders heute, wo die Konfrontative- und die Textlinguistik eine große Entwicklung erfahren haben. Die Forschung der WB zieht immer mehr die Wissrnschaftler an, die sich mit Theorie und Praxis der Sprache beschäftigen. Ausgehend Vom Aspekt synchroner und diachroner Sprachwissenschaft finden und erfassen sie Gesetzmäßigkeit, Mittel und Methoden der WB. Durcb die Analyse der WBK merkt man, daß die WBK ihrem Wesen und ihrer Spezifik nach Modellecharakter besitzen, und daß das ihnen zugrunde liegende Wortbildungsmodell ein morpbologisch und

lexikalisch-semantic bestimmt Strukturchema ist, nach dem Reihen gleichstrukturierter WBK gebildet werden können. Die verallgemeinbar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unmittelbaren konstituenten kann man als Wortbildungshedeutung bezeichnen. Daraus ist die Schlußfolgerung zu ziehen, daß die produktive WB den Sprachlernenden beim Erweitern und Bereichern des Wortschatzes, beim Unterscheiden der synonymen Wortbedeutung und beim richtigen Verstehen von Wortinhalt, Wortbedeutung und Wortcharakter sehr helfen.

Die selbe Gesetzmäßigkeit beim Erlernen der Muttersprache gilt auch für das Erwerben einer Fremdsprache, d. h. sobald der Sprachlernende die Grundgrammatik und den Grundwortschatz innehat, also schon die grundlegenden Sprachkenntnisse besitzt, soll er die innere Struktur und Gesetzmäßigkeit der gelernten Sprache eingehend begreifen. Dadurch bereichert man seine sprachlichen Kenntnisse, entwickelt seine Fähigkeit, die gelernte Sprache zu praktizieren. Dabei ist es am wichtigsten, das sprachliche Baumaterial-Wortschatz zu erweitern und zu bereichern, denn der Fähigkeitsgrad von den fünf sprachkommunikativen Fähigkeiten und Fertigkeiten; Hören, Sprechen, Lesen, Schreiben und Übertragen, sowie deren Vollkommenheit hängen von der Quantität und Qualität des Wortschatzes, den der Sprachlernende besitzt, ab.



In allen Sprachen, auch in der deutschen, ist die Anzahl der einfachen Wörter des Wortschatzes relativ klein und nimmt einen begrenzten Teil vom Gesamtwortschatz ein, wie zum Beispiel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etwa über 1/3. Die Mehrzahl der Wörter im Wortschatz besteht aus wortbildungsfähigen Wörtern gebildeten WBK, wie Zusammensetzungen, Ableitungen und Affigierungen. Wie wir wissen, weisen di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gegenwärtigen Sprachen in Richtung Ökonomie, Kürze und Prägnanz, Anschaulichkeit und Bildhaftigkeit auf. Zum Beispiel bei Verben gibt es mehr präfigierte und zusammengesetzte Verben als Ableitungen; bei Adjektiven sind kurze Adjektive mit Suffixen der älteren Schicht weitaus seltener als Ableitungen von Wortgruppen und als Zusammensetzungen; bei Substantiven nimmt die Mehrgliedrigkeit der WBK zu. Insbesondere gibt es auch eine unaufhaltsame Entwicklung zu Wortkürzungen verschiedener Art. Daraus kann eine Schlußfolgerung gezogen werden, daß neben Fremdwörtern die WBK wegen ihrer Wesenszüge, ihrer Funktionen und ihr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in Konkurrenz zu Wortgruppen und Sätzen stehen und am Ende sogar wichtiger sein werden. Deshalb ist es sowohl für die Sprachlehrenden als auch für die Sprachlernenden wichtig, die Bedeutung der Erforschung und Anwendung der Wortbildungskenntnisse beim Spracherwerb im Sprachunterricht anzuerkennen und nach ihren Ergebnissen

zu lehren bzw. zu lernen. Also ist der Unterricht in WB ein wichtiger Bestandteil in der Gesamtunterrichtstätigkeit und für die Sprachlernenden günstig für die Effektivierung des Aneignungsprozesses.

Es ist zu erwähnen, daß die WB bisher noch nicht ausreichend und angemessen im Unterricht berücksichtigt ist. Die traditionelle Vermittlung der Wortbildungskennnisse erfolgt methodisch in Verbindung mit dem Erläutern des Wortschatzes im Unterricht. Der Sprachlehrer faßt meistens anhand der im Textkonzentriert erscheinenden Wortbildungskonstruktionen einige Regeln zusammen und läßt dann die Lernenden ein paar entsprechende Übungen machen. Die Lehrer betrachtet die Vermittlung der WB und damit die Übungen eher als Hilfsmittel für den Sprachunterricht. Solche Methode kann nur allgemein, oberflächlich bleiben, und was die Lernenden dabei erworben haben, kann auch vereinzelt, unsystematisch sein. Von Wortbildungslehre und Wortbildungsmethode können die Lernenden auch nur einzelne Erscheinungen wahrnehmen, sie sind doch nicht fähig, zu assoziieren, oder sie wissen, daß etwas so ist, aber nicht, warum es so ist. Sie lernen passiv. Dies widerspricht dem Wesen der Sprache, handelt auch der Entwicklung der Intern- und Externesetzmäßigkeit der Sprache zuwider, denn die Sprache ist eigentlich lebendig und vital. (Mit Externesetzmäßigkeit bezeichne ich den formalen, äußeren

Bezug der Wortkonstituenten, während die Internegesetzmäßigkeit die Tief-Struktur der Wortbildungskonstruktionen meine. Zum Beispiel besteht "Fischfrau" aus den unmotivierten Konstituenten "Fisch" und "Frau" - Externegesetzmäßigkeit; "Fischfrau" aber kann, je nach Tief Struktur, ganz verschiedene Bedeutungen haben, wie

- a. Frau, die Fisch verkauft
- b. Frau des Fisches
- c. Frau, die im Sternbild der Fische geboren ist
- d. Frau und Fisch (Nixe)
- e. Frau, die Fisch is(s)t
- f. Frau, die Fisch produziert
- g. Frau, die vom Fisch abstammt
- h. Frau, die kühl wie ein Fisch ist
- i. Frau, die den Fisch gebracht hat
- j. Frau, die beim Fisch steht
- k. Frau, die wie ein Fisch aussieht,)

Nach meiner Erfahrung aus der praktischen Unterrichtstätigkeit soll der Unterricht in WB als spezieller Fachunterricht im 5. Semester mit zwei Stunden in der Woche anfangen und muß in den Unterrichtsplan einbezogen werden. Die Hauptaufgaben des Unterrichts liegen darin, den Sprachlernenden einen allgemeinen Überblick zu geb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Wortbildungslehre und deren Stellung in der sprachlichen Entwicklung, über einige auf WB bezogene Begriffe wie zum Beispiel die Morphologie, Affixe, Motivation und Idiomatisierung u. a., über Wortmorphologie und -typen, Wortbildungsmittel und -methoden, über Methoden der synchronen Analyse und Wortbildungsarten sowie über die Beziehungen der WB zu anderen Bereichen und Teildisziplinen und die Entwicklungstendenz der WB. Das Ziel des Unterrichts ist, die Lernenden dadurch zum Bewußtsein zu führen, aus der Interngesetzmäßigkeit der WBK die gelernte Sprache anzueignen, aus der Wortherkunft und der Tiefstruktur der WB die Wortbedeutungen zu erfassen. Zugleich können sie auch nach Wortbildungsregeln vom Einzelnen auf das Allgemeine schließen; und beim Lesen sind sie dann nicht mehr so gebunden an Nachschlagewerke, sondern sind in der Lage, aus den Wortbildungsprinzipien und dem Kontext die Bedeutungen von neuen Wörtern zu erschließen oder zu erraten. So lernen sie bewußter und geschickter. Die Praxis beweist, sobald die Lernenden die Methode, vom Speziellen aufs Allgemeine zu schließen, beherrschen, wird nicht nur ihre Motivation, den Wortschatz zu vergrößern, verbessert, ihre Fähigkeit, die Wortbedeutung, Wortdifferenzierung im Stil zu unterscheiden, entwickelt, ihr Interesse und Bewußtsein am Spracherwerb gefördert, sondern dabei wird ihre Sprache auch verfeinert.

Die deutsche WB ist wie die der anderen Sprachen sehr stark

motiviert. Es können sowohl nach phonetischer oder semantischer Motivation neben usuellen auch okkasionelle und potentielle Neuwörter gebildet werden wie Kuckuck, miauen und Kuckucksei, Haustür, Rundtischkonferenz, Schnelldenker als auch durch bestimmte Wortbildungsmittel, wie Affixe, Affigierungen, insbesondere auch Präfigierungen, die die bestimmten Bedeutungen und Inhalte zeigen, wie zum Beispiel die Prozesse aufweisenden Affixe; -e, -ei, -ung, ver-; die Zustände und Resultate kennzeichnenden Affixe; -nis, -schaft, er-, be-; die auf Person und Gerät deutenden Affixe; -er, -ling; die den Charakter von Wesen und Eigenschaft tragenden Affixe; -heit, -keit, -isch; das das Kollektiv beinhaltenden Affixe; Ge-, -schaft usw. Außerdem kann die WB noch die Wortart ändern; lehren (Verb), Lehrer (Substantiv), lehrreich (Adjektiv), Kurz gesagt, die Bedeutung der WBK kann motiviert sein. Wenn man schon die Bedeutung der unmittelbaren Konstituenten kennt, kann man daraus die Neubedeutung der WBK ableiten (von den unmotivierten Bedeutungen "Klasse" und "Zimmer" zur Bedeutung der motivierten WBK "Klassenzimmer")

Fast alle Sprachen weisen ein recht beachtliches Motivationspotential auf, einschließlich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prache, die ein ganz anderes Sprachsystem hat, und dieses Motivationspotential kann schwer genauer quantifiziert wer-

den. Das Vorhandensein eines bedeutenden Motivationspotentials in der Sprache ist eigentlich auch selbstverständlich. Allerdings müssen wir dabei schon einsehen, daß eine natürliche Sprache auf ein bestimmtes Maß an Motivation eingeschränkt werden muß, um als Kommunikationsmittel funktionieren zu können und für ihre Anwender erlernbar und handhabbar zu bleiben. Eine willkürliche Sprache ist überhaupt unvorstellbar.

Beim Sprachlernen spielt die Methode des Vergleichs der Fremdsprache mit der Muttersprache eine große Rolle. Die deutsche WB ist vergleichbar mit der der anderen Sprachen, sogar mit der der durch Schriftzeichen verkörperten chinesischen Sprache. Zum Beispiel gibt es semantisch und syntaktisch viel Ähnlichkeit zwischen den chinesischen und den deutschen Zusammensetzungen. Unter den Bildungsstrukturen der chinesischen Zusammensetzung sind Verknüpfungsformen (泥沙-Erde und Sand, 牆壁-Wand und Mauer, 肥胖-fett und dick), von Substantiven mit attributiver Ergänzung (紅花-rote Blume, 樹根-Baumwurzel, 血紅-hlutrot), von Subjekt-Objekt (司機-fahren Wagen, 注意-Acht geben), von Subjekt-Prädikat (日蝕-Sonne fressen) usw. Auch im Deutschen gibt es die entsprechende Zusammensetzungsformen, wie "und"-Beziehungen (Hosenrock, Politiker-Komponist, süßsauer), "Teil von" (Kugelschreiber, Dornenhecke), lokale und temporale

Einordnung ( Bergdenkmal, Abendschule ), Vergleich ( Blutrot, steinhart ), Subjekt-Prädikat ( Kindergeschrei, Kinderbetreuung, Löwenbrüllen ), Prädikat-Subjekt ( Waschmaschine, Putzfrau ), Objekt-Prädikat-Subjekt ( Wetterbeobachter, Taxifahrer ) usw. Außerdem haben die auf der linken bzw. rechten Seite eines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s geschriebenen Radikale die gleiche Funktion wie die deutschen Affixe zur Bestimmung der Wortbedeutung. I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beispielsweise bezeichnen fast alle Wörter, die das Zeichen “足” als linke Seite haben, Dinge oder Handlung, die mit Fuß zu tun haben, wie zum Beispiel 跑-laufen, 跳-springen, 踢-jn. oder etwas mit Fuß stoßen, 踏-Weg, 趾-Zehe; Die Wörter, die das Zeichen “氵” als linke Seite haben, haben die Bedeutung von “Wasser” oder “Flüssigkeit”, wie zum Beispiel; 海-See, 河-Fluß, 流-fließen, 灌溉-bewässern, 酒-Wein, 汗-Schweiß; die anderen häufig gebrauchten linken Seiten wie “言” -sprechen, “口” -Mund usw. haben alle ihren eigenen Sinn und zugleich bestimmen sie die Wortbedeutung des mit ihnen gebildeten Wortes. Die deutschen Affixe, besonders die Präfixe von Verben wie ab-, auf-, aus-, ein-, ent-, mit-, nach-, um-, zer-, usw. haben alle bestimmte Bedeutungen und legen zusammen mit dem Verbstamm die Bedeutung eines Verbs fest. Wenn man die Bedeutung von Affixen gut beherrscht, hat man eine große Hilfe beim richtigen Verstehen und Anwenden der Synonyme.

Zusammenfassend kann man sagen, daß die deutsche WB umfangreiche Kenntnisse zu vermitteln vermag, daß sie ein sehr praktisches Hilfsmittel ist und weitestgehend zu erforschen ist. Die Kenntnisse der WB zu beherrschen und richtig anzuwenden, ist extrem nützlich für die Sprachlernenden. Die Aktivität und die Initiative der Lernenden werden dadurch sehr gefördert. Ihr Wortschatz wird erweitert und bereichert, und auch ihre fünf kommunikativen Sprachfähigkeiten und Fertigkeiten werden weit und breit verbessert und entwickelt. Daher soll rechtzeitig der spezielle Fachunterricht in WB abgehalten werden, und zwar mindestens 2 Stunden in der Woche. Eine systematische Erklärung und entsprechende praktische Übungen dazu sind im Unterricht planmäßig durchzuführen. Ferner sei es dringend zu empfehlen, komplexes Lehrmaterial in deutscher Wortbildung, das in der Struktur systematisiert und rationell ist, das inhaltlich sowohl theoretische Regeln als auch praktische Übungen umfaßt, auszuarbeiten.

## **Literaturverzeichnis**

### **1. 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Worthildung**

von M. D. Stepanowa  
W. Fleischer



2. 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Wortbildungslehre  
von Johannes Erben
3. Lexikologie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von Thea Schippan
4. Funktional-kommunikative Sprachbeschreibung
5. Entwicklungs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von Karl-Ernst Sommerfeldt
6.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4/1984. 21. Jahrgang
7.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2/1988. 25. Jahrgang
8.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4/1988. 25. Jahrgang
9. zur Bewertung von Wortbildungskonstruktionen  
von Marianne Schreibe
12. 语言学概论 高名凯
13. 现代汉语词汇 周祖谟
14. 词汇知识 高文达
15. 词汇 武占坤
16.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 [美] 伯纳德 科姆里
10. Grundlagen der Methodik des Fremdsprachenunterrichts  
von V. A. Buchbinder Kiew  
W. H. Strauß, Jena
11. Worthildung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von Wolfgang Fleischer.

# 日中両語の移動動詞の対照研究

—日本語の「あがる」と中国語の「上」を中心にして—

李 孙 华

## 1.はじめに

くる、いく、あがる、さがる、あるく、はしる、はう、すべる等はいずれも日常生活の中で欠くことのできない移動を表わす基礎動詞である。いろいろな移動動詞がある。

小論はここでは、上下のうち、上の方向へ移動する日本語の「あがる」と中国語の「上」を取り上げて、意味論的な分析を施して、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意味のありかたの相違を考察したい。

## 2.従来の辞書の記述

「あがる」について『例解新国語辞典』(第二版)の意味の記述をみよう

①低いところから高いところへ動いて行く。②海や川などから、陸の方へ移る。③ふろやプールなどから出る。④きものをぬいで家のなかへ入る。⑤今までよりも上の等級や段階に進む。⑥勢いや景などがそれまでよりも高い状態になる。⑦大きな声や音がおこる。⑧冷静でいられなくて、

頭に血がのぼるような感じになる。⑨望ましい結果がえられる。⑩繞っていたものが終わりになる。㉓「訪門」の敬意をこめた言いかた。訪門先への敬意を表わす。㉔「食べる」「飲む」の敬意をこめた言いかた。この他に「内裏」が北にあったので、京都で北へ行く(『現代国語例解辞典』)と解説した辞書もある。

「上」について『現代漢語詞典』の意味の記述をみよう。(例文訳は発表者)。①由低処到高処 / 低いところから高いところへと行く。②到; 去(某個地方) / (あるところ)に行く。③向上級呈遞 / 上役に提出する。④向前進 / 前進する⑤出場 / 出場する, 登場する。⑥添補; 増加 / 添加する, 増加する。⑦把一件東西安装在另一件東西上; 把一件東西的兩部分安装在一起 / 一つのをもう一つのものの上に取り付ける、一つのもの二つの部分をセットする。⑧塗; 搽 / 塗る, 付ける。⑨登載 / 載せる, のる。⑩拧紧 / かたくまく。⑪到規定時間開始工作或學習等 / 決つた時間に仕事や学習などが始まる。⑫達到; (一定數量或程度) / (一定の數量或いは程度)達する, 足りる。

「あがる」については、すでに分析がなされている。

柴田武編『ことばの意味』(平凡社)の分析。

①到達点に焦点を合わせる(例、階段をアガッテ二階に行く。)

②始めの状態(基点)を離れることを表わす(大勢の前でアガッテしまつた。)

③非連続的移行である。完了を示す。(血圧がアガツタ、雨がアガツタ。)

森田良行『基礎日本語』(角川書店)の分析。

「人、物、事柄が(一挙に)上の段階へと移行する。上位の別の領域へと移る。」

具体的に、分析1は下から上への移動、分析2は上下両極間での位置移動、分析3はある領域段階から抜け出る、やめる、終わる。完了する、分析4は主体が抽象的な場合について論述している。

### 3.分析

#### 3.1.意義的な類似点

##### 3.1.1.移動の到達点または移動の経路を表わす場合

(1)二階にあがる (1)'上樓(二樓)。

「あがる」他に天、星球、階段、屋上、木、陸「上」天、星球、樓梯、房上、屋頂、樹、岸等など。

(2)坂をあがる (2)'上坂

低いところから高いところへ移動する場合。「あがる」と「上」の用法は同じである。(1)は到達点、(2)は経路を表わす。

##### 3.1.2.等級、位を表わす場合。

(3)学校にあがる (3)'上学。

小学校、中学校、高等	小学、初中、高中、
学校、大学、初級、中	大学、初級、中級、
級、七級など	高級等

等級、位などの場合、具体的な場所ではないが、上下、高低の別がある、下から高へと移行できるので「あがる」も「上」も同様に用いられる。

#### 3.2.意義的な相違点

3.2.1. 「あがる」にだけ用いられるが、「上」には用いられない。

- |             |                             |
|-------------|-----------------------------|
| (4) 風呂からあがる | (4)' 從浴池上来(「洗完」の方がもっと明確である) |
| (5) 雨があがる   | (5)' 雨停了, 天晴了。              |
| (6) 安くあがる   | (6)' 很容易地就完了。               |

これらの例のように、そこから出る、終わる、完了するなどを表わす場合「あがる」に対応する中国語の「上」で表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ず、「洗完」「停了, 晴了」「完了」等である。

- |            |            |
|------------|------------|
| (7) 歓声があがる | (7)' 歓声四起。 |
| (8) 収益があがる | (8)' 出現利潤。 |
| (9) 犯人があがる | (9)' 犯人露面。 |

内にこもって隠れて見えない事物, 事柄が外側へと発せられる(顕在化する)場合、「あがる」を用いるが、「上」は用いられない。中国語の表現はそれぞれ「四起」「出現」「露面」等である。

- |                |                        |
|----------------|------------------------|
| (10) 烏丸通りをあがる  | (10)' 上烏丸大街, 到烏丸大街去。   |
| (11) 先生のお宅へあがる | (11)' 上先生府上, 到先生府上去拜訪。 |

「あがる」は行へことを表わすが、「烏丸通りをあがる」の「あがる」は(内裏が北にあったので京都で)北へ行へことを表わす。「先生のお宅へあがる」の「あがる」はお伺いすることを表わす, 両方とも敬語的な表現である。

- |           |           |
|-----------|-----------|
| (12) でかける | (12)' 上街。 |
|-----------|-----------|

(13)工場に行く

(13)' 上工場。

中国語の「上」は、日本語の「行く」の意を表わす場合がある。日本語の敬語的表現の「あがる」に相当するところに、中国語のこの「上」が用いられる。(10)' (11)' がそれである。

日本語の「あがる」に相当する中国語には、他に「到」「升」などがある。

(14)夕方お宅へあがります (14)' 晚上到您家去。

(15)あの棋士は最近A (15)' 那位棋手最近升  
級にあがった (晋升)為A級。

3.2.2. 中国語の「上」に対して、日本語の「あがる」が用いられない場合

(16)(上の機関や上役などに)書類を (16)' 上書。  
提出する

上の機関や上役などに意見や希望などを文字の形で提出することを「上」で表わす。

(17)張さん、はやく走ってシユートしろ (17)' 老張快上, 投關!

(18)困難にぶつかるとそれを克服し。 (18)' 見困難就上,  
名譽にあたると人に譲る 見榮譽就讓。

前進することを表わす場合、中国語の「上」にも用いられる。

(19)この幕は君は左側の門に出場 (19)' 這一場戲, 你應該  
するのだ。 從左邊的門上

(20)この試合には、君たち (20)' 這場球, 你們五個先上  
五人は出場しない。

出場する、登場することを中国語の「上」でも表現できる。

(21)水を補足する (21)' 上水。

(22) 商品を補給する (22)' 上貨。

中国語の「上」は補足する、添加することを表わす、中国語の「上」は量的にある水準より多くなる意をもつ。

(23) 剣銃をさす (23)' 上刺刀。

(24) ボルトをしめる (24)' 上螺糸。

あるものを取り付けたり、二つの部分を一つにセットすることを表わす。

(25) 色をつける (25)' 上顔色。

(26) 薬をつける (26)' 上薬。

表面につける、ぬることを表わす。

(27) 新聞に載せる (27)' 上報、登報。

(28) 帳面をつける (28)' 上帳、登帳。

「上」は文字を記すことを表わす。登で置きかえることもできる。

(29) 車にのる (29)' 上車、乗車。

車にのることを「上」で表現する。

(30) 弦をまく (30)' 上弦。

(31) 時計のぜんまいをまく (31)' 表該上弦了。

弦やぜんまいをまくことを表わす。

(32) 出勤する (32)' 上班。

他に授業が始まる、任事が始まる「上」課、工、演等。

演出するなど

中国語の「上」は授業、仕事、演出などが開始することを表わす。

(33) 百人にのぼる (33)' 上百人。

(34) 年を取っている (34)' 上年紀。

一定の数量或いは程度に達することを表わす。

### 3.3. 主体

(35) 子供が屋根にあがる (35) 孩子上屋頂。

(36) 人工衛星が火星にあがった (36) 人造衛星上了火星。

人間と物が主体になる場合、「あがる」も「上」も用いられる。

(37) 値段があがる (37) 漲価。

緯度、熱、気温、温度、湿度、不快指数、物価、家賃、値段、地位、水位、価値、効果、成績、實力、技術、腕、名声、男振り、資格など。

それに相当する中国語は「上」ではなくて、それぞれ緯度、熱、気温、温度、湿度、不快指数、地位、水位は高低、物価、家賃、値段は貴賤、価値は大小、高低、効果、成績は大小、好壞、實力は強弱、技術は強弱、高低、腕は大小、名声は好壞、男振り是有無、資格は深淺、老嫩などである。

上述の例をみれば、形をなさぬものや抽象的な事柄は「上」の主体になることが難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 4. 結論

中国語の「上」の意義特徴

i. 上の方の到達点に焦点を合わせる。①

ii. 上下の方向と関係なく、ある場所からある場所に移動する。

iii. 数や量を補足・添加したり、物の上に物を重ねるように認識される動作である。

iv. 事物が開始する。

参考文献



例解新国語辞典(第二版)

現代国語例解辞典(林巨樹)

新日漢辞典(遼寧人民出版社)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

ことばの意味1(柴田武編)

基礎日本語意味と使い方(森田良行)

(原載《日本国語学会平成元年春季大会要旨》)

# 70年代以降の日本における大学 教育の規模的拡大と質的向上について

——大学制度の改革を中心に——

孔繁志

## 一、はじめに

70年代以降の大学制度改革は、量的に拡大された大学教育に対する国家的再編成と整備の過程である。その目的は経済発展における人的能力開発とハイタレント、マンパワーの養成と云うことに在る。その改革の基調は経済社会の要請に応じて、国家指導の強化と大学制度の補完と整備によって質的向上を図ることである。それが故に、大学教育は量的にも拡大され、質的にも向上されたにも係わらず、大学が従来抱えている問題は未解決で深刻化してきた。日本の大学教育は今なお[追い付き型]社会の特徴が根深く残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大学制度改革の中心課題は質的向上である。質的向上には経済的社会的要請に寄与することと国民が一人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の発達に役立つことと二つの面が有るべきである。今日の制度上の改革の中心課題として1)大学教員内部の活力が充分に発揮できる自治制度の確立、2)個人の多様性、創造性の尊重と国家社会の共通性、規範性の育成との関

連の調整という二つのことが上げられる。制度改革の推進に当って適当な国家指導が必要だというものの、大学構成員と国民全体からの協力を得ることも大切であろう。

## 二、大学の量的 大過程と現状

本章では、大学を中心に、70年代以降の高等教育の変貌を量的に説明しようとする。統計資料はすべて文部省の『学校基本調査報告書』を利用した。

### 一、大学教育の規模拡大

1. 規模拡大の過程が続けられて来た。つまり1970年以降の20年間は規模拡大と言う高等教育の大衆化は著しく進んで、今日に至っている。

2. 高等教育の規模拡大の担い手は私立大学と私立短期大学である。20年間にわたる国家計画に取り入れ、不断な整備と調整を経た私立大学は、今後とも日本の高等教育機関の中で一番規模の大きい部分を占め続けるであろう。

3. 在学者の増加率から見て注目されることは、国公立大学が相当高い水準を保ち続け、私立大学の増加率が急速に低下の方向に向かったことである。この相違の原因は、先ず私立大学の学生数は膨大なので、その増加率が高くなりえないという点に求められる。二つ目の原因は、国立大学の制度における一定の地位と比重を守ろうとしてきた従来の措置と係わる。三つ目は大学教育の規模拡大がもう限度に着く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ある。もとより3対7といった「二元的」比例で拡大されてきた高等教育には私立大学の地位と

質などの問題という悩みが有つた。私立大学は公共性の有る教育に寄与する使命を負う機関として、また高等教育の大衆化の担い手として、その役割が大きくなつたが、一方で教育の量的拡大に應えるための資金が足りないという感を持っている。そしてまた、国公立大学の規模拡大によって国公立大学体系が強化され、大学の質を保証する見本としての国公立大学の地位も一層強化された。引き換えに私立大学教育上の質が問題になつた。大学史から見れば政府は巧みにこの「二元」の区別を利用して来たと言えるが、二元の平等などの問題は一貫して論争の一つの焦点である。

## 二、規模拡大のなかみ

1. 国公立大学では、1学部当たりの学生数を増大することによつて拡大が行なわれた。私立大学では大学数の増加と1学部当たりの学生数の増大の双方によつて拡大が行なわれたことが分かる。

2. 1970年から1988年までの国立大学数の増加が20校であるのに対して、私立大学は83校増加した。私立大学の規模拡大は何より先に学校数の増加によるものである。学部数について、国立大学の64学部の新設に対して、私立大学では172学部が新たに設置された。新設大学数の増加は私立大学が国立大学の約4倍であり、学部の新設による拡充も私立大学が国立大学の3倍ほどであつた。

3. 1大学当たりの学生数については、1988年と1970年の二つの時点のデータによれば、国立大学は1046人の増大、私立大学は224人の増大であつた

4. 国立大学の規模は70年代以降も60年代に遜色の無い量的拡大を見せた。また大学教育の著しい規模拡大による制度の変貌が起きたとしても、国公立大学対私立大学の3対7の比例はそのままである。

### 三、学校の規模の変化

次に大学の規模を概観する為に、学生数別の学校数の推移を見てみることにする。

1. 学生定員1千人以上の学校数が増大したことは国公立大学の共通点である。

2. 私立大学の場合、学生定員1千人以上の学校数とその学校数が全私立大学数に占める割合が共に大きくなった。中でも学生定員1千人から5千人までの学校数の私立大学全体に占める割合が41.6%から55.6%へと増大したことが目立っている。学生定員1千人以下の学校数は減少した。これが私立大学の学校数の推移の特徴である。

3. 国公立大学の場合、学生定員1千人以上5千人以下の大学の割合が小さくなったが、5千人以上の大学の割合は1970年の19.5%から1989年の30.4%へと大きく増大した。これが国公立、特に国立の大学数の推移の特徴である。

以上見て来たように、大学の全般的な量的拡大の過程で各大学の規模もそれぞれ大きくなった。大学間の学生数の格差は小さくなっているが、国立大学が特に平準化されたように見える。

### 四、大学教員について

大学生数と大学数の他に、大学教員数も分析の分野に入れる必要が有る。本務教員1人当り学生数の推移について

は、1970年と1988年との二つの時点を取つて比べてみると、国公立大学は8.3人から9.3人へと微増し、私立大学は30.5人から24.3人へと減少しているが、私立大学の教員1人当り学生数は国公立大学の約3倍であることは従来の通りで、変わっていない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の1971年のOECD調査書における文部省の解釈は、第一に私立大学は国公立大学より人文社会系学科が多い為であり；第二に 資金不足を克服する必要から来る対応であると答えた。

### 三、大学制度改革の背景と課題の推移

今の大学制度改革を考える時に、先ず70年代から今日までの大学制度改革の背景、課題の提起（論議）を見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本章は1971年の中央教育審議会答申『今后における学校教育の総合的な拡充整備の為の基本的施策について』と1987年の臨時教育審議会『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第四次答申』及び70年代以降の教育白書を利用して、政府側の認識をまとめることにしたい。

#### 一、70年代の大学制度改革

##### (一) その背景

政府の白書や書物の中に四つのことが良く改革背景として指摘されている。

1. 時代的要請。高度経済成長期から安定経済成長期への歴史的な転換期を迎えたということが有る。
2. 経済社会の要請。科学技術の発達と技術革新の高度化と謂う経済的、社会的要請が有る。

3. 国民からの教育要求。教育の量的拡大に伴って、質的向上が問題に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

4. 教育工学の展開と現代教育手段の利用。

## (二) 教育改革構想に関する視点

1. 生涯教育の構想

2. 能力、適性に応じた教育への指向。

3. 人間性の育成。

## (三) 高等教育改革の五つの中心的な課題

以上の三つの視点に立って、大学の組織、課程、管理運営、経済界との連携、政府指導と助成と云つた五つの面から改革が試みられた。

1. 「高等教育の大衆化と学術研究の高度化の要請」に応じて、大学の目的性格による「種別化」及び「大学制度の教育組織と研究組織の機能的な分離」を図る。

2. 「高等教育の内容に対する専門化と総合化の要請」に応じて、社会的に「多様な進路」に応じた新しい教育課程を設計する。

3. 自主性の確保と閉鎖性の排除を目指して、「教育と研究組織を再編成」し、「効率的な管理運営体制」を確立する。その為に大学の「規模の合理化」、「学長を中心とする中核的な管理機関の指導性」の確立が特に重要視され、これによつて、緊張な競争状態を停止させようとした。

4. 大学が「自主的」に「国家社会に対する公共的な機関」としての責任を負って、大学間の協力や産業界や地域社会などと積極的な連携を持つ体制を造る。その為教員の人

事改革が必要である。

5. 大学の活動と発展を政府の「合理的」な計画に取り入れる。政府は「倍增計画」のような全面的、「長期的計画」に基づいて、望ましい方向へ大学を誘導し、助成する役割を果たす。

## 二、80年代の教育改革

臨教審の『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第四次答申』からその背景、視点と課題を整理してみることにする。

### (一) 改革の背景

#### 1. 時代的要請

今日の教育改革要請の背景には日本はすでに明治以来100年間に亘たる追い付き型近代化の時期を越えて、文明史的な転換期に差し掛かっているという認識が有る。日本は今日「21世紀に向かつて社会の成熟化への展開、情報中心の科学技術への転換、新しい国際化への移行時期に差し掛かっている」。言わば、今日の教育改革は日本の経済社会の発展と共に生じに内在的な社会変動に対応する為のものである。

#### 2. 従来の教育の持つ問題や限界の問題

これまで行なわれて来た教育は日本の近代化に寄与したが、それ自身に様々な問題点や限界が有る。大学について言えば、今日の大学には国際的水準營の教育と研究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にも係わらず、「大学は概して閉鎖的であり、機能が硬直化し、社会的及び国際的要請に充分答えていない」。更に大学の在り方に対する人人の不满、不安と期待が日々強くなってきた。



### 3. 教育の質に関する反省

これまでの教育問題の持つ本質的原因などについて、教育基本法及び民主主義的教育理念に立ち返るように反省が行なわれている。教育目標として、(1) 廣い心、健やかな体、豊かな創造力、(2) 自由、自立と公共の精神、(3) 世界の中の日本人、などが最も重要だと考えている。

#### (二) 修正された教育改革の三つの視点

1. 個性重視の原則を基本的な原則とする。
2. 生涯学習体系への移行
3. 経済と社会の変化への対応。

#### (三) 大学教育の五つの課題

1. 大学の個性化、多様化、高度化と活性化、大学設置基準などを根本的に見直し、その大綱化と簡素化によつて大学教育の充実と個性化と活性化を図る。その実現を促進する為に大学評価と大学情報を公開する。同時に大学院の飛躍的充 と改革に取りかかる。

2. 生涯学習体系への移行と関連して、大学入学者選抜制度の改革と大学入学資格の自由化、弾力化を図る。

3. 経済と社会の変化への対応措置として、学術研究の積極的振興の為、大学における基礎的研究を推進し、大学と社会の連携の強化と学術の国際交流の推進を図る。

4. 公的財政支出の充実、資金の多元的導入、自主的、弾力的な財政基盤の強化など高等教育の質的向上を支える財政改革を図る。

5. 大学の自主性と自立性を確立し、開放的、弾力的な人事措置を図り、教育と研究を活性化させて、社会に開放

するといった方向で、大学の組織と運営の改革を推進する。

#### (四) 70年代と比べての今日の大学制度改革の背景と課題の特徴

1. 時代的、社会的要請に応じる改革を求める点の強調は一貫しているが、70年代の経済第一主義の教育改革の背景と比べて、今回の改革はより廣い背景を持つている。「社会の成熟化」の為に、経済的要請以外に社会的、文化的、人間的な要請もより多く配慮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つたので、教育の多様な機能を果たすことが強く要求されている。

2. 科学技術の面の要請については、70年代は技術革新の為の教育ということが強調されたのに対し、今回は世界的水準の学術振興ということ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その為、大学院の充實と改革ということが特に力を入れるべき所とされている。

3. これまでの教育の在り方についての反省が注目されている。「個性重視の原則」を最も基本的な原則とすることによつて日本教育の根深い病弊である画一性、硬直性、閉鎖性を打破することが狙われている。これまでの教育に関する「能力主義」の考え方或いは視点は経済的、社会的であつたが、今回の改革では教育的視点も見逃してはいけなないと考え始められている。

4. 70年代の改革案において、改革の具体化に最も實質的な意味を持つものは長期的教育計画に基づいて発展する教育体系の確立と国家の指導力を充分に発揮できるような教育制度を目指した改革の推進ということであつた。しかし

最終答申に取り上げられた提案はこれと違って、すでに確立された国家主導的教育体制の下で、主に教育の法制と行財政の制度によつて、国家が如何にして、教育機関、教育関係者、更に教育そのものを活かすか、ということに係わっている。この点は70年代の改革案と今日の改革案、とを比べた場合の最も大きな相違点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 四、70年代以降の大学制度改革

### 一、「大学設置基準」の改正

政府が大学をマクロ的に管理し、コントロールする手段と言うと、「大学設置基準」が先ず上げられる。これは根本的に言えば、大学の最低の質的レベルを保障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大学評価の尺度は70年代以降幾度も改正された。「大学設置基準」の改革について指摘できる改正の特徴は次のように整理される。

1. 大学教育に対する国家の管理と規制を強化しようとする。
2. 国家指導と規制を前提に、その枠内で大学制度の弾力化を図ろ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3. 以上のような性質を持つた改正はあくまで教育の効率の向上と新しい情勢に適應することを図るための制度上の技術的な改正であり、下からと謂う戦后民主主義教育体制の掲げた教育理念には相当大きな距離が有るので、大学教育制度の根本的な改革は依然として難しい課題として残されていると言うべきであろう。

## 二、大学の管理、経営体制の改革

臨教審は「教育改革に関する最終答申」において、日本の教育が明治以来の近代化の過程において、効率性を重視し、継続性と安定性を求める傾向の強い教育制度の特質も有つて、ともすれば画一的、硬直的なものとなり、個人の尊厳、個性の尊重、自主的精神の涵養がなされず、個の確立、自由の精神の尊重などが十分でなかつたことを反省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と述べた。

大学の管理、運営体制の効率性は70年代に入つて格別に強調され、政府の教育施策の中心的な内容であつた。教授会評議会、参事会が組織され国家公務員として、当然に国家によつて任命される学長には教授会、審議会と中枢執行機構を統合する権限が与えられた。学長を中心とする中枢管理機構の確立によつて、国立大学に対する国家の指導力が保障され、大学行政の効率化が進められたのである。

## 三、大学の研究組織の改革

大学の教育組織と研究組織の機能的な分離が最も大きな変化だと見えるが、本文では学部レベルの大学を中心に述べる。

### (一) 大講座制の登場

この大講座制は教育研究組織の改革措置として有効である為の不断の検討と研究が必要である。前にも言及したが、教育上の経済的効率性の重視がその中心的目的をなしているが、なかならずその背後には最小の投資で最大の利益を上げると謂う経済的な要請が潜んでいる。

### (二) 新しいタイプの学部と大学の創設

筑波大学、放送大学、医科大学、科学技術大学、総合科学部、人間科学部の設置、学群、学類制の採用などが目を引く。また、教育内容の再編成と研究課題の設置が教育研究組織の再編成より難しいことも予想される。

#### 四、教育法令の改正と制定

この問題を考える時、今日の大学教育とその改革の実態は大正期の大学教育と大学改革と非常に良く似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ので、両方を比較してみよう。海後宗臣、寺崎昌男著の『大学教育』において詳細に論及され、寺崎論文の「日本近代大学大史における新制大学制度の位置について」に簡明に要約された大正期の大学改革の要素は以下の五つである。

1) 「帝国大学制度そのものは温存したが」、2) 「公立と私立大学及び官立単科大学の設立を許容し」、3) 「大学を学部主体の組織に改め」、4) 「公私立大学にも学部教授会などの自治の管理機関の設置を認める反面」、5) 「国家の必要に応じる学術技芸」の教授研究を全大学に求める。

教育の基盤と背景をなす社会体制と教育理念が天皇主義から民主主義へと転換したことを除いて、この五つの要素が今日の大学教育に落としている影を明確に感じ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70年代以降の大学教育に関する法令の改正と制定に本質的には大正期の大学改革で主張された五つの改革要素をより精密化し、強化したものである。例えば、大学教育の多様化、効率化、自治、教授会と評議会の保留、学長中心の行政機関の強化、大学の社会的連携を保証する参与会などはその性格を持つている。1970年代以降の

教育改革の過程は政府主導の教育の法体系の精密化の過程でもあつた。

## 五、日本の教育学者の大学教育制度改革

教育改革に関する政府の一貫した関心は経済的、社会的な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定説となつている。教育学者はまたこれと異なる様様な意見が有り、なかなか合意に到達しにくい意見も多い。教育学者は経済的、社会的視点だけではなく、教育的な視点も重視すべきだと強調している。

### 一、教育制度発達史についての見方

#### (一)「国家主義」的教育制度の功と罪

1. 教育を考えるに当たつて優先的に国家や社会の繁栄を考え、その目的の為に人人の教育の在り方を決定しようとするもの(教育における国家主義的な考え方、日本教育の歴史的特質)である。

2. またこの方針が日本の急速な近代化を達成せしめたと謂う見方も成立する。

3. その問題点として、「この国家主義の理論に従えば、教育は必ず国家の利害から決定された一定の知識内容を画一的に注入する仕事にならざるを得ず、従つて当然に中央集権主義、統制主義、権威主義、序列主義、学歴主義と謂つた色彩の濃いもの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この一連の現象は正に今日教育上の弊害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もある」。

4. 教育本来の自律的役割を如何に確保して行くかと謂う極めて困難な問題となるに至つた「追い付き型教育」で

ある。

## (二) 今後の教育改革の課題と方向

国家主義的教育から人間主義的教育へと転換しようとする。改めて国民一人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の教育要求を不断に吟味しつつ、教育を国民の手による自律的な営みへと再編成して行く。

## 二、70年代以降の大学制度改革について

### (一) 大学制度改革の三つの特徴

政府の大学政策と實際上の行政施策の展開の側面から見た大学改革の特徴は三つ上げられる

1. 産業界の強い要請であつた後期中等教育多様化の課題を完成させるものとして、大学の種別化を含めた高等教育制度全体の多様化の完成。

2. 国民に解決を迫られた大学を巡る諸問題に対する、国家主義的近代化、合理化を原理とする一連の対応。

3. 高等教育計画の実施。

### (二) 大学制度改革に関する評価

教育学者はこれらの大学改革の特徴をどのように見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大沢勝氏など編著の『講座、日本の大学改革』におい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産業界の要求に補強された様様な大学政策の展開を通観すると、それらが少なくとも形式的には、大学と社会、国民教育制度と大学、大学の内部改革の問題構造を拾い上げ、政策側なりの解決策を国民に提出するという形が取られ、一定の国民の合意を取り付けえたが、本質的に「それらは戦後大学改革が残した未決の諸課題に対する、反改革的原理

による政策的解決対応であつた」、また「大学は国民的な学問文化の創造を通して、国民大学との強固な紐を形成しえないまま、言わば無媒介且つ無限定に産業社会の要求した人材選別、労働力養成機構の中に深く組み運まれていつた。この社会的機構の中で、温存され拡大された大学間格差を基礎に、能力主義による価値の一元化の下での大学のピラミツト的序列体制が次第に形成されて行く。一方、国民は大学の本質と固有の価値への理解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国民教育制度の中に開かれた大学を専ら競争主義的な進学体系の一つの対象目標として意識して行く。二つの要因は相乗作用をなして、大学の序列化をより強固なものに仕上げていつた」と述べ、この改革に非常な憂慮を示している。

大学教育制度改革の原則と方向を巡る意見の相違と不一致と係わつて、寺崎昌男氏は大学制度改革の實態にも各大学自体の内部改革との一致しない部分、言わば「二元性」が有ると指摘する。つまり、個々の大学の自治の原則に基づいた自主的な内部改革は多種多様な形態を取つて進行しているが、ともすれば各大学の個別的な事情や条件にその主要な視点が向けられて、個々の大学内部の条件改善への傾斜を強める反面、その普遍的意義の点検と現代社会の変化に伴う大学そのものの質と量の変化の總体的に着眼する長期的視野に立つた実践は必ずしも進展していない。

一方、国の大学改革は広範な国民的合意の形成と改革主体の形成に係わる長期的展望を欠いた施策によつて行なわれている。大学の内部改革と国全体の改革とがそれぞれ



れ独自の論理を持つと共に、その協調と協力も欠いている

この改革實態の二元性が生ずる要因の一つに、教育理念についての理解の相違が有るが、大学制度改革に関する具体的で詳しい研究は70年代に人つてから始められたことで大学改革の理論的研究の不足ということも有る。しかし、これらの研究がこの十年間に盛んに行な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今後の大学改革に役立つに違いないと思われる。

### 三、公的教育機関としての大学教育の現時的課題

公的教育機関或いは公共性を持つ教育機関としての大学が直面しつつある現時的課題を巡つて常に五つの側面から検討されている。

#### 1. 大学制度原理についての研究

この研究の目的は国民の大学教育についてこの理解と自覚を促すことにある。

2. 人材選抜機関としての大学の性格への批判と大学間の格差の縮小を図る研究。

#### 3. 私学に関する研究

#### 4. 地域と大学の関係についての研究

#### 5. 大学構成員とその権利を巡る研究

四、人間教育民主教育理念の実現を目指す大学制度改革の道

日本の大学改革の課題に関して五つのことが主張されている。

#### 1. 公教育制度は社会体制と社会計画の下で構成され、規

定されるが、大学制度の多様化について、真の国民的合意はどうすれば達成できるか。この社会体制と社会計画は公教育制度が成り立つ前提であり、国民の合意は大学教育改革の前題である。

2. 大学改革は制度、機構上の再編成だけではない。教育と研究の内容の変化が質的な意味における大学改革である。

3. 大学改革は社会的事業であり、大学を学者、研究者、学生によつて構成される特権的な場と見なす概念を克服すると共に、大学内の人的な諸関係の民主化が大学改革の基本的条件だということを自覚する必要がある。

4. 大学にとつてだけの自治、自由は原理的には存在しない。「大学内における学問創造と教育実践が究極的には、国民全体の市民諸権利の実現に向けての営為であることを、そして大学改革もまたその為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自覚される必要が有る」。

5. 大学の自主的な改革を保証し、優先する民主的な機構の形成が必要である。

以上見てきたことから、大学制度改革について、政府側も教育学者も各自に明白且つ体系的な考えを持つていることが理解できる。そして、政府側が一貫して主導権を発揮して来たと言えるが、この両方が相互に批判し合い、またその意見を相互に受容し合うことによつて日本の大学制度改革が進められて行くように思う。

## 六、まとめ

大学制度改革には成功と代償と二つの面が有るように考えられる。本章では前の各章の内容をまとめると共に、自分の考えも述べてみたい。

### 一、現在の大学の制度上の特徴

欧米の大学教育制度の特徴に照らして、以下の三つの点が現在の日本の大学制度上の特徴として上げられるように思う。

1. 厳密的な大学制度と多様性への指向
2. 国家指導の強化と画一性、硬直性
3. 設置主体による区別

### 二、大学改革の二つの大きな課題

日本の学改革の課題と言えば、その問題を考える目的と角度によつて違つた意見が数え切れないほど多種多様であるが、その根底に有る制度上の課題として二つの大きな課題を上げてみたい。

#### (一) 大学の自治的制度の確立

大学と国の関係は月並みの話しのようであるが、如何なる日本の大学制度改革の書物にもこの自治が論じら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その難しさが分かる。

1. 能率主義的な考え方
2. 政府とのつながり
3. 合理的な管理運営

三つの要素が絡み合つて、相互作用しながら、大学自治を

目指す制度改革の展開を左右する強い力となる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

## (二) 個人と国家社会の関連

これは大学教育が個人の発達と国家社会の発達をどのように捉えて大学教育を行なうかのことである。周知のように福澤諭吉が明治の始めに国民の「独立自尊」を唱え、「立国は私なり」と主張していた。もう一方、国の立場から「立派な国を離れて立派な国民は存在しない」と強調していた。これを一応後発国における追い付き型の教育を巡る論争として見る。しかし、日本は現在経済社会の成熟化時代に差し掛かっている。新しい時代にふさわしい職業人と一般的人間をどうすれば統一して養成するかと云う課題はすべての国の教育が抱えている問題であるが、日本は特にその解決が迫られている。

以上に述べた大学の自治、個人と国の関係という二大課題はややもすれば教育哲学の研究領域に入るように見えるが、考えれば現実的な課題でもある。

## 三、70年代以降の大学制度改革の示唆

### (一) 大学教育の質的向上について

質的向上を図る制度改革の過程は量的拡大過程より長期的で、そのうえ国民全体の教育に対する自覚と協力が無ければ進められない。

### (二) 個人の多様性、創造性と社会的文化的共通性との関連について

情報化時代の社会では情報伝達の技術と手段の発達につれて人間の社会的文化的共通性の養成が容易になつた

一方、国民は次第に国家社会の爲の大学教育から一人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の発達を目指す大学教育へとその教育要求の重点が変る。個人の発達、個性、個人の多様性、創造性の尊重という面と社会的文化的共通性、規範性の強調という面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の論争も激しくなつて行き、如何にこの二つの面の関連を統一して把握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は曾て無く重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であろう。

### (三) 教育投資とその合理的な配分について

大学教育制度の改革と教育問題の解決を図るに当たつて教育投資の増加とその合理的配分が最も重要と前提条件である。

## 七、おわりに

以上は主に日本の学者の研究について分析して、まとめて来たが、中国の大学教育実態と制度改革の参考とするために、次の5点を指摘したい。

1. 不完全な教育目標は日本の教育制度の画一性と硬直性を生ずる最も根本的な原因である。

完全な教育目標には国民が一人ひとりの人間としての発達と国家や経済社会の発展への寄与という二つの面が含まれるだけでなく、個個人が人間として成長することによつて国家や経済社会の発展を図るという個個人と社会の関連も含まれるべきである。日本の従来教育目標は個人の発達が見逃されて、国家の経済社会の発展への寄与だけが實質的な意味を持つていけると言える。そ

して、このことが教育の歪みや制度の画一性と硬直性を生ずる最も根本的な原因になつた。「追い付き型」社会の教育だからと言つても、個人の間人としての発達を無視するのは教育的ではなくて、必ず避けるべきである。

2. 多過ぎた、強過ぎた国家の干渉が大学教育の自制制度を弱体化する基本的な原因である。

国家は法律や法令によつて大学教育全体の自治制度の確立、整備と改革だけ援助すべきであつて、個々の大学の具体的な教育研究と管理運営に直接的に手や口を出して干渉を与えるべきではない。特に条件を付けた多種多様な助成金によつて干渉を行なうことは近視眼的なやり方であつて、大学の活力を活かすこともできず、大学の自治制度に損失をもたらす恐れが大きい。

3. 大学改革は将来と国民全体の利益に係わつて、国民全体の教育の自覚と協力がなとできないので、各階層と各方面の国民に亘つた広い範囲で民主的に、慎重に検討して合意を得た上で進めるべきで、ただ経済界や政界の名士の意見に耳を傾けるべきではない。改革の過程は国民全体の教育の自覚を高める過程であり、国民全体の教育要求と意見を受け入れる過程でもあるべきある。

4. 教育投資を経済投資としてだけ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経済投資を重視するのと同じように教育投資を重視すべきである。もう一方、教育投資を膨大な管理運営機関に使うのではなく、的確に教育研究とそれに携わる学生や教師などのために使うように工夫する必要がある。

5. 発展途上国にとつて、国からの教育投資が「重点大

学、学部、専門」と「非重点大学、学部、専門」に分けて行なわれるのは一般的なやり方であるため、大学間の不平等と大学全体的な質的向上の遅れを生む可能性がある。それを避けるには、不断に新しい情勢や従来投資計画の欠陥を検討し、投資構造と配分の転換や調節を行なうべきである特に重点的に援助することは将来の大学全体の質的向上に関連し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る。言わばバランスが取れるように「重点校、学部、専門」の援助と大学全体の発展を政策的に振うべきである。この問題は経済社会が発達すればするほど目立つようである。

(原載《1993年度北京日本学  
国際研究会論文集》)

# 关于《万叶集》第五卷 员外歌的作者问题

李丹明

## (一)

《万叶集》是日本上古时代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下，贵族及知识分子继承丰富的歌谣传统而创作的歌集，共二十卷，收录了三百多年间的四千五百首歌。第五卷，在二十卷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而其中三十二首“梅花歌”显得格外突出。在三十二首歌之后，又有“员外思故乡歌两首”，如下：

○我が盛り いたくくたちめ 雲に飛ぶ 薬食むとも  
またをちめやも (847)

(盛年再难至，衰老总堪哀。纵然食仙药，青春岂再来。)

○雲に飛ぶ 薬食むよは 都見ば いやしき我が身  
またをちめべし (848)

(与其食仙药，但求见京城。不肖虽卑贱，青春必再生。)

以往对上述两首歌的作者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大伴旅人，也有人认为是山上忆良或麻田阳春等，但大多认为是大伴旅人。而且，认为“员”为“数”意、“员外”为“数外”，即三十二首歌后续的歌。本文就“员外”一词的含义做粗浅的探讨。



## (二)

从歌的用语上看，“员外思故乡歌二首”（下略为“员外歌”）与《万叶集》第三卷的“帅大伴卿歌五首”（331—335中的331）有相似之处。“我が盛り またをちめやも”与847首的初句和结句相同，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员外歌”就是大伴旅人所作。众所周知，在古代，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引用他人的诗句的情况并不少见。况且，“仙药”、“灵药”等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词汇在《万叶集》中只是山上忆良的独家产品（《沈痾自哀文》（896））。

根据以上理由，认为“员外歌”是山上忆良所作歌还为时尚早，但与忆良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下面对至关重要的题目中的“员外”进行探讨。

“员外”，仔细分别，似有三种解释：

A，员——物数，这里指歌数。“员外”——歌数以外、即梅花三十二首以外。

B，员——官数。“员外”——这里指三十二歌人以外的歌人。

C，“员外”作为一个词，指“定员外”（定编外）。据《说文解字》解释：

员，物数也从贝口声凡员之属皆从员（徐锴曰古以贝为货故数之王权切）。《辞源》（1915年版）：

〔员〕（于权切音圆先韵）①官数。如设官若干人谓之若干员。②与陨通……。

日本《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

〔员〕①数。物或人的数。员数。令义解——职员。/谓～员者员数也。官省寮司等。各有员数也。\*参天台五台山

记一/“取金银如员持来。”②人数。(下略)

这样看来，似乎所举 A、B、C 中以 B 为佳，即所谓“三十二歌人（官）以外”。然而，首先从用字上看作者不可能是大伴旅人和山上忆良以外的人（关于这一点在后而将述及）；其次，梅花三十二首连同员外歌等乃是附在送至吉田宜的书信中的，从反映赏花会作歌情况及出席情况上来看，亦不可能有三十二歌人以外的人（详见伊藤博先生关于梅花歌会排座次的著名论述）。所以，B 不能成立。

那么，A 如何？

前例中有“取金银如员持来”句，其中“员”为“数”意。然而《参天台五台山记》是平安朝后期僧侣成寻赴大宋朝写的纪行文，所以不能给上古的《万叶集》作注释。而且，不但没有发现奈良时代用于“物数”的实例，翻阅《辞源》、《辞海》等，也没有反映中国古代作为“物数”的用法。《周礼·夏官庾人》中有“正校人员选”；《史记·平原君传》中有：“前自赞于平原君曰：‘……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句，也只是指“人数”。退一步说，即使有用于“物数”的例子，在旅人、忆良的时代，也因为存在定员以外的官，即“员外”，从而理应避免这一说法。

### (三)

据《续日本纪》记载，养老二年（公元 718 年），即吟咏“梅花三十二首歌”和“员外歌”的十二年前，已出现“员外官”：

（养老二年）九月庚戌。……从五位下波多真人与射为员外少辅。

（养老四年）冬十月戊子……从五位下巨努朝臣足人为员

外少辅。

在梅花歌、员外歌所吟年代以后的例有：

(天平宝字七年)十二月丁酉，……中臣真麻伎从七位下。  
但马员外史生。

(续后记卷十二承和九年七月)中纳言藤原朝臣吉野大宰  
员外帅。春宫坊大夫文室朝臣秋津出云国员外守。

举不胜举。

在中国，“员外”始见于南北朝时代，隋开皇时，尚书省二十四司中各设有一名“员外”。唐朝李峤(644~713)也曾奏设“员外”官数千人。

日本平安朝时代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时刻意识自身及他人的出身和官位的高低，从而称大宰帅大伴旅人的歌为“员外……歌”实有不恭之嫌。即使“员外歌”确为梅花三十二首以外的歌，在当时，自然也会避免使用“员外”一词。

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即大伴旅人以自谦的口吻称自己的歌为“员外歌”呢？

如果观察吉田宜的歌(864~867)及前文，就会发现，“梅花三十二首”、“员外歌”及“松浦歌”等同是构成寄给住在京城的吉田宜的书信中的内容。然而，从大伴旅人和山上忆良各自爱用的万叶假名：

(忆良)阿加迦何枳企社斯志周提那飞弊武母欲利远

(旅人)安可加我吉伎射之子须底奈比返牟勿用现越

(原田贞义《万叶集歌人事典》)

看来，“员外歌”与“梅花三十二首”等同是一人笔录或编集的。另外，在寄给吉田宜的信中还附有“后人追和诗三诗”

(861~863)，该题目上注有“帅老”二字，表明笔录者或编集人对大伴旅人的崇敬心情。那么，同封寄上的多首歌中，有的记有敬称“帅老”、有的援用自谦的说法“员外”，这种设想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据《续日本纪》和《万叶集》记载，大伴旅人在神龟元年（724）二月获官品正三位，神龟四年，任大宰帅。正三位的大伙旅人任相当从三位的大宰帅，看上去似乎是左迁，而且，历来就有藤原氏的阴谋造成大伴旅人左迁的说法。

然而，《续日本纪》中，有因奈良麻吕政变，右大臣藤原丰成受左迁的记载：

（天平宝字元年七月）戊午。敕曰……知构大乱。无敢奏上。及事发觉。亦不肯究。

……宜停右大臣任。右降大宰员外帅。

承和之变以后有：

中纳言藤原朝臣吉野大宰员外帅。

上述例子，说明左迁者大多在事变中曾有失职行为。但是，大伴旅人赴任前并未发生事变，所以左迁不可能是事实。（参阅五味智英《大伴旅人序说》）再者，《古事类苑》中有：

帥は、……古来大臣以下朝廷の顯職に在りしものを左遷するには、員外帥を以てせしこと屢にして、公廩を給して政務に預らしめず、府にも入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职原抄》：

有权帅者、不任大貳、任大貳者、不任权帅、虽无其谓、已为流例。

说明如果大伴旅人是员外帅或权帅，那么自然不会同时任命大貳。可是，在“梅花三十二首”中，就有“大貳纪卿”的

歌。所以，从多种角度均可否定大伴旅人是员外帅的猜测。  
那么，山上忆良有否可能是员外官呢？

(四)

《续日本书纪》宝龟五年（774）条有：

比年。员外国司、其数实繁。句。

天应元年（781）有记载：

昭曰。惟王之置百官也。量材授能。……仍置员外。近古因循。其流益广。……民之受弊。实为此焉。……宜内外文武官。员外之任。一皆解却。但郡司官毅不在此限。

又其在外国司。多乖朝委。……随事贬降。

在据上述记载四十多年前的天平初年，是否有员外国司，不得而知。但是从宝龟五年员外国司很多看来，其存在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天平初年筑前国国司的史料，有如《令义解》或《三代格》引用的大同三年（808年）五月十六日太政官奏文：

大同三年五月十六日奏云。省大宰府监典各二员。置筑前国事。自尔以来。或别或隶。至延历十六年。又废国隶府。今得府解称。临交替事。细加检校。未进调庸。兼欠失正税器杖戎具等类。每物有数。此是擢行之日。彼此相让。无心国政之所致也。望请。分置官人。以为别当。专一其心。今济国务。然则带国之名不乖令条。欠负之烦。绝于国内者。臣等商量。承前府带之时。或下官符而定别当。或府司相量。分置其人。同僚之官。兼于国务。勘责杂怠。不同比国。望请。省大同元年所增监典。便允国司。庶令所守有别。各济繁剧。谨录事状。伏听天裁。谨从申闻。谨奏。闻。

……。(注：《律令》大宰府条有“大宰府带筑前国”。“别当”通常指设置国司。)

其中“承前府带之时。或下官符司相量。分置其人”，说明山上忆良任筑前国国司，完全有可能是经大宰府等“相量”后，作为大宰府官员兼任的。另外，因有“大宰府带筑前国”的规定，所以筑前国国司与其他国的国司有所不同。

正是在筑前国国司日常工作繁忙、且权力有限的情况下，山上忆良感叹自己的余生不能成就大业，才有 868~870 歌及前文的牢骚：

忆良闻，方岳诸侯、都督刺史、并依典法、巡行部下、察其风俗。(以中国诸侯举例，宣泄不能巡行视察的苦衷)

在给住在京城的吉田宜的书信中，将自作的歌题名为“员外歌”，这样，作为从朝鲜半岛归化而来的吉田宜，仅就“员外”一词，便尽知忆良的处境及抱负了吧。这里，虽不能断言忆良就是“员外”，但事实上，他至少也不是能与他人相比的国司。

“员外歌”中两次出现“久毛尔得夫久须利”(可使自己飞上天的仙药)，这种药，在中国称为可羽化登仙、长生不老之药。据《山海经》等讲，炼就此药，须用水银、砒霜等有毒化合物。然而，求此神药的背后，隐藏着崇拜神灵的思想。

一般认为，大伴旅人拥有老庄式的神仙思想，而山上忆良则为儒家的信奉者。其实，山上忆良也并非没有神仙思想，《沈痾自哀文》(896 后)中的“敬重百神、鲜夜有阙”便是证明。而更有说明力的是，《万叶集》洋洋四千多首和歌中，只有山上忆良用过“神药”、“合药”、“药”等词汇(参见《万

叶集总索引》)。

(五)

以上，就有关“员外歌”中的“员外”一词及歌作者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歌作者最有可能是山上忆良，“员外”意为“定员外”，是作者自嘲的表达，其中含有向同具大陆文化思想的吉田宜吐露心曲的意向。归纳文中理由，如下：

①山上忆良生活的天平初年，“员外官”繁多。

②山上忆良和大伴族中，大伴为“员外”的可能性无，而山上忆良虽不能断言是“员外”，但作为自嘲的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③山上忆良憧憬“仙药”，这在《万叶集》明记作品中，只有山上忆良的《沈痾自哀文》等出过。

古来对“员外歌”论述甚多。如下一个确实无疑的结论，还尚需对《万叶集》第五卷乃至《万叶集》通篇做一番更为细致的考察。然而，鉴于时间和能力有限，只能留给他日再作。衷心希望各位专家给予指正。

(注：员外歌汉译文参考了杨烈先生译文。另，所引文献为汉文者均因印刷问题改为简化字。)

参考文献：

小学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万叶集》(1973 第二版)

河出书房新社日本古典文库《万叶集》(1979)

《万叶史的研究》中西进著

平凡社《万叶集总索引》(1978)

岩波书店《万叶集的作家与作品》五味智莫著 (1982)

尚学图书鉴赏日本的古典《万叶集》稻冈耕二著  
(1980)

- 河出书房《日本国民文学全集》土屋文明译（1958）  
学灯社国文学《万叶集如今留有什么问题》（1983）  
学灯社别册国文学《万叶集必携》稻冈耕二编（1979）  
汲古书院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二卷《上代文学与汉文学》（1986）  
雄山阁《万叶歌人事典》（1982）  
有精堂《万叶集事典》（1975）  
樱枫社《万叶集形成之谜》山口博著（1985）を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 句型“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 меня обманывать” 的语义与结构特点

黄 苏 华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освящена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 построенным по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хеме «не + номинатив... чтобы». В статье даетс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описываемых конструкций. Упор делается на детальном разборе опорного слова с оценоч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в препозитивной ча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которого выступает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 или местоимение. Автор обращает долж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возможное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и появлени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вариантов.

在俄语教学中，我们时常能见到“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 меня обманывать”这种句型。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复合句，是借助于词汇—语法手段组合的成语性结构，常用于俄语和文学作品之中。

但是，这种复合句的语义和结构特点在苏联和我国国内出版的语法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例如，一九七〇年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出版的《现代标准俄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和一九八〇年苏联

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语法》（第二卷，句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 II, Синтаксис）都没有提到“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这样的结构。

《70年语法》在《代词对应句》一章中指出：“用 чтобы 来连接的代词对应句可以有自己特有的模式，其特点是主句的谓语或对应词之前有语气词 не”，并例举了一系列模式，诸如：“не такой…， чтобы”；“не так…， чтобы”；“не такой…， чтобы”；“не так…， чтобы”等。该章还指出，在这种模式的句子里，“主句中事物或特征的数量和性质与副句所表示的现象不符合；副句表示不可能实现的行为”（1970：689—690）。《80年语法》在《修饰句》一章中指出，当句子具有性质特征意义时，如果主句包含问题或否定，副句用 чтобы 连接，表示结果关系；当句子具有性质和数量不足的意义时，主句必须具有代词修饰语和否定语气语，副句用 чтобы 连接，表示结果关系，副句表示一种主观上认为不可能的非现实的结果（1980：505—507）。《70年语法》和《80年语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主句带有否定语气词 не，副句用 чтобы 连接的复合句作了说明，虽然在论述和例句中都没有提到“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 меня обманывать”这样的句子，但是对我们认识和掌握这个句型有很大的启示。

句型“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在语义和结构上有自己的特点，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Г. Н. Смирнов）把这类复合句归纳为“не + номинатив… чтобы”的模式（1982：33）。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对俄语为非本族语的人来说，理解和掌握这一句型，并用它来丰富自己的俄语表达能力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有必要进行探讨和研究。为此，笔者阅读了有关材料，收

集了不少例句，试图就“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这一类型的复合句的特点进行粗浅的分析，以供教学中参考。

这种句型的结构特点是，语气词 не 和通常具有评价意义的基础词是主句中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副句用 чтобы 连接，表示副句的内容纯属虚构，在说话者看来是不可能的、非现实的。例如

① 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 раскрывать свою тему. (С. Воронин)

② Не чужая же она, чтобы с ней слова не сказать. (из газеты)

整个句子的语义是，由于主句的主语缺乏某种特征，所以副句中的行为中不可能实现的。从字面来理解，主句表示的性质意义与副句中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如例①，主句的意思是我不傻，而副句的意思是会公开自己的题目，但是，在这种特定的结构中，副句通过 чтобы 作为连接手段，便具有了否定的情态意义。因此，如果副句是肯定句，则表示否定意义；反之，副句中出现了否定语气词 не——否定之否定，则表示肯定意义。所以，例①应译成“我不傻，不会公开自己的题目”，例②应理解为“她不是外人，可以跟她谈谈”。

在修辞问题 (ритор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即结构上是疑问句，但表示陈述意义的句子里，否定语气词 не 被 разве, что 代替。此时，主句在形式上是肯定句，但实际上仍表示否定意义，而且整个句子具有更加鲜明的感情色彩。例如：

③ Как же можно, чтобы я врал? дурак я разве, чтобы врал? (Гоголь)

④ Что я вам, алкоголик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чтоб в одиночку,

не чокнувшись с хорош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вино потягивать?  
(А. Крси)

说话者使用这类句子，实际上表示断然的心定。如例③，说话者所要表示的真正含义是：我才不傻呢，我决不会撒谎。

有时，句子还出现表示不满，惊讶等意义的感叹词语，更加强其否定的语气。例如：

⑤ Господи, да что я, лошадь, чтобы выпить столько жидкости! (В. Попов)

⑥ А, боже мой, что я, грудное дитя, чтобы сахар сосать?  
(В. Панова)

主句中的基础词，即表示评价意义的词，可以是名词(例①, ③等)、形容词(例②)，也可以是指示代词 *такой, таков, тот* 等，例如：

⑦ Не такая она, чтобы из-за этого сердиться.  
(С. Боруздин)

⑧ Обстановка не такова, чтобы можно было медлить. (《70年语法》)

⑨ Годы не те, чтобы за молодыми тянуться. (М. Герчик)

不同的词类作基础词，会赋予句子意义一些细微的差别，同时，不同词类作为基础词的句子也有各自的特色。下面将分别加以说明。

—

名词作基础词。名词本身的词汇意义和表评价意义的特点是不尽相同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名词是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的贬义词，常用词有 дурак, дура, сукин сын, идиот, враг, жулик, нахал, сумашедший

以及 болван, нень, осел 等。

⑩ Я же не сукин сын, чтобы руки в ход пускать.  
(С. Цвигун).

⑪ Нет, Миша не идиот, чтобы поступать здесь на службу.  
(Н. Чуковский)

⑫—Да пуцай человека уважает. Я ему не пень подколодный, чтоб на меня садиться да меня же чем попада обзывать... У меня гордость. (В. Распутин)

2. 名词是中性的词, 无否定的感情色彩, 但是具有特征意义。由于主句中的主语缺乏这一特征, 所以就不可能产生副句中叙述的结果。常用词有 миллионер, богач, старушка 等, 例如:

⑬ Ведь не миллионер же он, чтобы швырять пятьсот рублей за всяко просто. (С. Воронин).

⑭—Вот что, я не старушка, чтобы меня под руки водить! —рассердилась вдруг Саня. (Н. Богданов)

миллионер, богач, старушка 都是中性名词, 不具有否定色彩, 但是它们有明显的特征。миллионер 和 богач 的主要特征是“富有”, старушка 的主要特征是“年老”。主句中的主语不具有这些特征, 因而就不可能产生副句所表示的行为或结果。

3. 名词是中性的词, 并不具有明显的特征意义, 但是它所表示人和物具有某种特定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和性质等。常用词有 генерал, солдат, батрак, артист, пассажир, новичок, девочка, контора, декорация, совхоз, такси 等。这组作为基础词的名词正在不断增加。

⑮ Я не генерал, а ты не солдат, чтобы передо мной  
гнаться. (С. Михалков)

⑯ Он же не Юрий Сенкевич (注:航海家), чтобы мотаться  
по всему свету и бороздить моря и океаны.

⑰ — Паша, я тебя ни о чем не прошу, — только дай мне  
справку.

— Я не контора, чтоб давать справки. У меня печати нет  
(Ю. Трифонов).

⑱ — Ну и помог бы! — разозлилась неожиданно Оля. — Я  
не декорация, чтобы на моем фоне снимали ор-р-ри-гинальный  
дворик! (М. Комиссарова)

这些没有明显特征意义的名词作基础词时,副句所表示  
的行为或结果必须与主句基础词的词汇意义相吻合。如例⑮  
士兵要对首长立正行礼(特定的行为);例⑯航海家四海漂泊  
(特定的生活方式);例⑰布景要起衬托概括作用(特定的性  
质),等等。基础词 солдат, Юрий Сенкевич, декорация 等本身  
无特征意义,但当它们用于“не+名词一格, чтобы...”这种  
结构时,就获得了评价意义,同时也产生了否定的感情色彩。

一些表示动物的名词也往往作基础词,说明主句中表  
示人的主语,常见的名词有 скотина, лошадь, корова, русалка,  
(人鱼), рысак (走马) 等,例如:

⑲ Она не скотина, чтобы покупать ее! (К. Амиров)

⑳ — Пойдемте, больной, на обмывочный пункт.

— Лучше бы называть не обмывочный пункт, а ванна.  
Это красивей и возвышает больного. И я не лошадь, чтоб меня  
обмывать. (М. Зощенко)

⑳ Я не русалка, прости господи, чтобы под водой ходить.  
(А. Беляев)

在这组句子里，主句表示一种强烈的否定：人岂能与牲口、鱼类相提并论，因而从句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时，说话者表示极其不满、气愤的感情。

名词作基础词时，主语通常是用人称代词、普通名词、专有名词和指示词 *это* 来表示，当人称代词、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作主语时，它们通常表示人（见例①—⑳）。*это* 作主语时，它可以表示人（例㉑），也可以表示物（例㉒⑳）。

㉑ И кто такой Ариэль? Это не принц крови, не важный сагиб (老爷), чтобы ревновать к нему. (А. Беляев)

㉒ Это тебе не такси, чтобы разводить больных. (из газеты)

㉓ Это не порядок, чтобы до венца к невестке приезжать.  
(Чехов)

如果 *это* 作主语并表示人，基础词通常是表示某种具体概念的名词；如果 *это* 不是指人（这种情况不多见），基础词可以是表示具体概念的名词（例㉑），也可以是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例㉓）。

在本结构中，作为基础词的名词前可以有说明它的形容词或具有特征程度意义的代词修饰语 *такой* 等。名词前出现 *такой* 的句子比较常见。

㉔—Нет, Винченко не круглый дурак, чтобы цепляться за такую пакостную штуку, как жизнь. (П. Лебеденко)

㉕ А я не такая дура, чтобы этого дожидаться. (В. Катаев)

⑳ Он... не такой уж нахал, чтобы присвоить украденные деньги. (Н. Камбулов)

㉑ Не такие это были богачи, чтобы тратить лишние деньги. (《70年语法》)

以上这组句子里，基础词通常是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贬义词或具有特征意义的中性词，такой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只起加强语气的作用。

当表示人（如 человек, народ 等）和表示人的性别（如 мужчина, женщина, парень, девушка 等）的名词作基础词时，такой就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成分。例如：

㉒ И прораб Лютьев не такой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 позволить кому-то сидеть сложа руки. (А. Рекемчук)

㉓ Не такой народ люди, чтобы глумиться над глухим. (З. Тоболкин)

㉔ Все были уверены, что Добряков не такой парень, чтобы вдруг потерять душевное равновесие. Но он потерял его. (П. Нилин)

㉕ Не такая дама Захарченко, чтобы болтать о пустяках. (Л. Никумин)

㉖ А Оля не такая девушка, чтобы прятаться по углам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украдкой... (В. Козлов)

在这组句子中，作为基础词的名词评价意义很弱，如例㉖中的 девушка 仅表示是个姑娘，本身并不具有明显的特征意义或评价意义，因此把 девушка 一词去掉，整个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试比较：А Оля не такая, чтобы прятаться прятаться по углам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украдкой... 然而，如果把



такой 去掉，整个句子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就会含糊不清，往往需要加以说明，使 девушка 获得明显的特征意义，整个句子才能成立。试比较：А Оля не девушка, чтобы иряться по углам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украдкой. Она старый, опытный партийный работник, видала виды.

“не такой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等句子的意义是主句中的主语完全不具备实现副句中的行为所必需的性质和特征。通过对不少例证的分析，我们发现，与其说主语缺乏必要的特征或品质，不如说肯定主体具有某种特征和品质，从而不会去干副句所描述的行为。如例②③就可理解为工地主任柳基也夫是个精明的人，他是不会让别人闲着没事的。

除了 такой 以外，таков, таковский 和 тот 也可用于这一结构。

②④ Не таков человек Дудников, чтобы объективно судить о людях. (из газеты)

②⑤ Не тот он был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 ему было возражать. (Ю. Герман)

②⑥ Люди мы не те, Максим, чтобы мстить. (В. Лавринайтис)

таков, таковский, тот 使用的频率低于 такой。它们用于这种结构时，意义很相近，只是在修辞色彩上有所不同。таков 属书面语，таковский 具有口语俗语色彩。而带 тот 的结构则强调主句中的主语所表示的人不属于能完成副句中行为的那种人。

## 二

形容词作为基础词时，通常都是性质形容词，整个句子

的含义是，主句中的主语由于缺乏性质形容词所表示的特征，因此就不能引起副句中的行为或结果。

作为基础词的形容词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具有否定的特征意义，常用词有 дурной, глупый, наивный, жалкий 以及 отпетый, окаанный 等。第二组无否定的特征意义，常用词有 маленький, малый, старый (表示年龄); крепкий, слепой (表示生理特点); внимательный, простой,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表示性格特点); богатый, нищий (表示经济状况) 等等。这些形容词除单独作基础词外，还可以与 человек, дитя 等名词连用，但特征意义或评价意义主要由形容词来表示，有无 человек, дитя 等名词无关紧要，句子的意思不受其影响。例如：

③7 Да что мы, окаанные какие, чтобы идти против рабочих, против солдат? Не враги они нам. (3. Воскресенская)

③8 Я не дурак и не слеп, чтобы меня за нос водить. (А. Ананьев)

③9 Не дитя же она маленькое, чтобы ее печаль можно было развеять шуткой. (Ч. Айтматов)

④0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моя мама не нищая, чтобы всем двором ей собирать деньги на платье (А. Бикчнтаев).

作为基础词的性质形容词还可以与指示词 такой, так, до т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настолько 等连用，表示主句中主语具备的特征还不到足以实现副句中行为或结果的程度。这种结构在《70年语法》、《80年语法》以及我国国内出版的语法书中都有较详尽的说明，本文不用赘述，仅举几个例，以供参考。

④① И, конечно, не такой он отпетый человек, чтобы дама его содержала. (М. Зощенко)

④② Видимо, не так прост был этот Окентий Свободный,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о нем что-то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умя-тремя словами (Г. Марков).

④③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я крепка, чтобы беззаботно думать о будущем (Д. Асенов)

④④ Я не до т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глуп, чтобы не разобрать, холодно мне или тепло. (А. Фет)

《80年语法》指出：“在富有表现力的言语中，这样的句子往往用以表达对特征本身的断然否定。Я не так наивен, чтобы…就表示‘я не наивен’，Он не до т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глуп, чтобы就表示‘он не глуп’” (1980: I, 505)。

目前，作为基础词的形容词还不如作为基础词的名词那么丰富。

### 三

指示代词作基础词，常用的有 такой, таковский, тот 等。такой 作为基础词的结构——“не+такой, чтобы…”属能产型。在这一结构中，主句的主语可以表示人，也可以表示事物或概念。例如：

④⑤—Что обещал, то и сделаю! Я не такой, чтобы врать. (Г. Белых, А. Пантелеев)

④⑥ Не такое дело, чтобы можно бы решить полюбовной сделкой. (Гоголь)

④⑦—Не такая, —он говорит, —теперь эпоха, чтобы нам, мужчинам, унижаться перед женщинами… (П. Нидин)

④⑧ Не такие у меня нервы, чтобы копить. (Чехов)

④⑨ Не такая об мне слава идёт, чтобы меня женой назвать.

(А. Арбузов)

“Не+名词(或形容词), чтобы…”的句子中,主句中主语所缺乏的特征和性质是具体的,是由基础词的词汇意义来体现的。而在“не+такой, чтобы…”结构中,主句中主语所缺乏的特征和性质并没有具体说明,只是用 такой 做了总的概括,然而,其内涵在副句中得到了体现。如例④⑤,是通过副句中的 врать 一词。

当主句中的主语表示人时,“не+такой, чтобы…”与“не такой+человек(народ…), чтобы…”同义,见例②①—②③。

таков, таковский 也可以作为基础词用于这种结构,例如:

⑤⑩ Но не таков Игнат Дыбин, чтобы не допытаться. (Г. Троепольский)

⑤⑪ Случай не таков, чтобы его можно было спокойно наблюдать из-за стеклянной стены! (А. Шубин)

⑤⑫ Врешь ты всё! Ты всё врешь! И про Сергея Саввича наплевай. Не таковский он, чтоб на чужих баб глядеть. (З. Тоболкин)

以上这些句子与 такой 作为基础词的句子意义相近,但在修辞色彩上有所不同(见本文一。)

指示代词 тот 作为基础词时,主句中的主语通常由具有某种概念意义的名词来表示。例如:

⑤⑬ Нет, Леха, нет. Ты уж прости. Не тот день, чтоб из дому ходить. (Е. Носов)

⑤⑭—Они вовсе не хотели гибели мира. Наоборот. Они

понимали; если юстиция не восторжествует, мир как раз и погибнет.

— Не тот случай, чтобы из-за него мир погиб. (А. Ваксберг)

⑤ Не тот у нее характер, чтобы нуждаться в утешениях. (Н. Томан).

在这类句子里, не тот 通常表示“不合适的”,“不需要的”,“不是所期待的”,“不是原先想象的”等意义,副句中的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例⑤),或者是不合时宜的,不必要(例⑥, ⑦)。

如果主句中的主语表示人, тот 一般不单独使用,而与 человек 等名词连用。

#### 四

“кто ты такой, чтобы...”的句型在口语中经常遇到,它也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这一句型的特点是,主句由 кто+人称代词+такой 构成,虽然没有否定语气词 не,实际上包含着否定意义。说话人带着强烈的感情否定副句中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例如:

⑥ Ты кто такой, чтобы на меня так глядеть? (В. Распутин)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算什么人,你不配(或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这样瞧着我!又如:

⑦ — Неужели ты не простишь меня?

— Не в прощении дело, кто я такая, чтоб прощать или не прощать? (Р. Ибригимбеков)

⑧ А вы кто такие, чтобы забирать у меня скот? (А.

Андреев)

有时 такой 可以省略，例如：

⑳ А кто же мы, чтоб ты знал? (М. Кумин)

在这类结构中，主句中的人称代词通常是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用第二人称代词时，说话人表露出对谈话对方的蔑视、讽刺、不满、抗议等情绪；而第一人称代词时，说话者并不直接反驳对方，而是采用这个形式上是问句的结构，表示对谈话对方所讲的内容持不同意、批评、嘲笑、讽刺的态度。

### 小 结

“Я не дурак, чтобы…”是用词汇—语法手段连接的成语性复合句。否定语气词 не 和 静词一格是主句所必需的结构成分，副句要用 чтобы 与主句相连接，“не+静词一格, чтобы”是该句型的固定模式。

这种句型的语义特点是主句表示否定主语具有某种性质或特征，副句表示虚拟的，不可实现的行为。主句表示否定的理由，副句表示否定的结果。

基础词在主句中通常作静词性合成谓语。主句一般是双部句，结构简练，除主要成分外，很少有附加成分。主句的时间通常为现在时，有时也用过去时，很少用将来时；主句的时间主要由纯系词 быть 的变化形式来表示，偶而，可以见到半实体的系词。

该结构的主句和副句的位置固定，主句在前，副句在后，主句和副句主体一致时，副句的动词大多用不定式，用过去时的形式不多见（例⑳）；主句和副句的主体不一致时，副句的动词可用不定式，也可用过去时的形式，用假定式的例句

较为少见(例④)。绝大多数情况下,副句中动词用不定式。

该句型主要用于口语和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随着现代俄语的发展,这一结构在言语中的使用频率正在不断增加。

### 参考书目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197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Том I, Синтаксис,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Смирнов Г. Н.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типа «не + инфинитив... чтобы». В кн. «Переходность в системе слож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98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华邵主编:《现代俄语语法新编》,1979,(下册,句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光准:俄语表评价意义的复合句,1984,《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原载《黑龙江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 关于外语教学改革 方向的思考

张永泰

## 一、外语专业与专业外语——寻找结合点

把外语本身作为一门专业知识学习，还是以外语为工具学习其它专业知识，这是我国外语教学长期存在的困惑问题之一。挂牌“××外国语学院”和综合大学“外语系”的教学单位，过去都不约而同地把侧重点放在语言文学的教学上，一般称之为“××语言文学系”，统称为“××语系”。不论毕业生撰写的论文是关于文学的，语言的，社会问题的，甚或其它专题的，颁发的学位证书，一律冠之以“文学学士”或“文学硕士”。这是因为这些教学单位的课程设置，尤其是高年级的课程设置，均偏重于语言文学方面的缘故。如精读课的内容大多属于以书面语言为主的文学性课文；泛读教材的内容也以文诤诤的书面语言，如小说、散文、诗歌体裁为主；语法和语言学的课程更不厌其烦地设有“实用语法”、“理论语法”“高级语法”、“结构语法”；“词汇学”、“实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符号语言学”，等等；更不用说有关文学的课程，如“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学选读”，乃至“诗词格律”、“修辞学”等，不一而足。有些课程，



即使学生能钻得进去，也很难走得出来。教学方法以语法为纲，重研究和知识的掌握，轻实践和技能技巧的操练。然而，学生毕业后又有几个是搞语言文学研究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的呢？简直是凤毛麟角——基本不对口。随着形势和社会需求的发展，在我国也逐渐开始了几种急需的专业外语人才的培养工作，如经贸大学的“外贸××语”、旅游学院的“旅游××语”，等等。奇怪的是，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在对外交流的工作实践中，使用起来并不顺手。究其原因，还是外语水平不够。在教学过程中，虽然专业知识加强了，外语水平却大大降低了，再加上专业知识多用汉语讲授，外语和专业便形成了“两张皮”。

当前，我国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需用外语人才的决不止文学语言、外贸旅游这几个专业，更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新闻艺术等方面的需要。外语教学单位如果分别开设那三百六十行的专业课（且不说这是不可能的），学生毕业后也不可能在供需数量上做到一致或基本一致。

于是，出现了所学专业与工作内容的“不对口”现象，即毕业生学过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具体工作单位又无合适的人选。结果只能是互相凑合。至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是否能互相适应，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工作上的一定损失。

于是，在用人单位也出现了另一种困惑：是录用学外语的去适应各种不同的专业需要呢？还是由搞不同专业的人“半路出家”去学外语，以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

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学生学习英语，少数人学俄语，只

在极个别的中学开设日语。至于其它几个国际通用语种，如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只有在大学从头学起。由于中学师资素质，教学条件以及其它社会因素，即使所开设的语种，也很少有学生能真正入门。而语言学习本身，大学四年时间本来就不充裕，加上专业知识的因素，就必然会顾此失彼，无所适从。于是，出现了旅游部门不愿接受旅游外语毕业生，因为他们听说能力较差；外贸毕业生语言能力跟不上；出版部门反映学生笔译水平不能适应需要，等等现象。

而对这种形势，大学外语教学，尤其是象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所谓“小语种”的教学何去何从，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回答似乎应该是：寻找外语专业与专业外语的结合点，合理调整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培养能以最快速度适应各类专业工作的外语“通才”。

到底什么是外语专业与专业外语的结合点呢？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具有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并能很快适应不同专业工作需要的“通才”。

外语专业是专业外语的基础，专业外语是外语专业的延伸和发展。没有扎实的外语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熟练的技能技巧，就不能自如和娴熟地运用专业文化知识；反之，没有相关专业的专业知识，所掌握的外语知识和技能技巧也只会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全面的外语基本功是外壳，有关的专业知识是内核；前者是形式，后者为内容。只有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两张皮”糅合成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运用外语这个工具，为有关专业工作服务。

## 二、基础与实用——课程设置的宗旨

要解决“通才”的培养问题，首先必须从课程设置着手

(这里指的是以外语讲解的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从截至目前的教学实际来看，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首先必须走出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以“名牌”大学为依据，代代相传；从实际出发不够，不注意不断完善和改进。“名牌”大学，历史悠久的外语院校自有它们师资力量雄厚，经验丰富，教学设备好等长处，但也大可不必处处效法，事事摹仿，更无须自己在那里学过什么课程，便开设什么课程。真正需要的是，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和客观效果设置课程。既要考虑进一步深造和搞研究工作的需要，更应该考虑实用。否则就可能事倍功半，学用脱节。

第二个误区是：好高骛远，名目繁多，缺乏实用性。例如，单为语法和语言就设置多门课程，甚至从修辞学到诗词格律无所不包，唯恐遗漏其它院系开设的课程，唯恐学生的知识面不够宽，档次不够高，以至不少课程把学生带进了死胡同，把外语教学引向学究式和“钻牛角尖”的“研究”，徒劳而无功。

第三个误区是：因人设课，随意增减，缺乏目的性和稳定性。过多考虑具体教师或某个外国专家的“特长”，按他们的要求设置课程。只要教师变动，专家更换，课程也随之变化。甚至为照顾某个教师出国，不对必需课程负责，随意删减或改动先后顺序。这显然有本末倒置之嫌。有的院系至今没有形成一套相对稳定，学用结合的课程设置，其基本原因便在于此。

为更好解决“通才”的培养问题，根据我们的体会，课程设置应该遵循下述原则：

1. 既要设置语言知识方面的课程，如语音、词汇、语法，又要设置语言技能技巧方面的课程，如听力、口语、写作、翻译等。两者相比，应以后者为重点。

2. 在加强语言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基础上，要适时安排文化专业知识课程，如报刊新闻，文学选读，文化名人，各种概况等。在顺序上，要先语言，后文化专业知识。要以语言基础保证文化专业课的教学；反过来，又要以文化专业课的学习来提高语言水平，扩大语言的实践范围。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3. 文化专业课程的设置要以社会需要为参照物，不断更新知识内容。既要考虑所学语言和有关文化知识的发展变迁，更要考虑我国国情的变化。要以需要为出发点，以实用为归宿。

4. 理论性强的课程要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不应面面俱到，追求高深；实践性强的课程要有连续性，反复性，要呈螺旋形的上升趋势。如口语课，要从生活会话，经过复述——概述——评论，直到讨论——辩论——即兴演说。

5. 加强必修课，减少甚至取消选修课，增开讲座。这样，便于集中有限教学时间和精力，突出重点，增强学生对所设课程的注意力。尤其是“小”语种，每班人数不多，选修课从管理上到学生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安排，可开可不开的课程，原则上不开；有的可以讲座形式加以弥补。

6. 课程开设在先后顺序上要科学化、系统化。例如，应先开设有关口头语言的课程，后开设笔头语言的课程；先开设写作课，后开设笔译课；笔译课要先开外译中，后开设中译外；如此等等，以保证教学上的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也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内容重复。

7. 课程设置要相对稳定，未经充分论证不轻易增删，或改动顺序。

需要突出强调的是，有关语言知识和技能技巧方面的课程开设，要在“基础”二字上下功夫，即一定要以培养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的外语人才千方百计地作努力；而文化专业方面的课程设置一定要在“实用”二字上做文章，以适应未来的工作实际的需要。这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语言基本功要扎实，掌握的文化专业知识要实用。这就是所谓外语“通才”的基本含义。

### 三、实践与指导——教学方法的探索

外语，或者说语言，作为区别于其它知识和学科的基本特点，便是它的实践性。其表现形式在于交际和沟通。离开实践，离开交际与沟通，便没有语言存在的必要。因此，外语教学造就的“聋哑人”（即听不懂，说不出的人）和“文盲”（即读不懂，写不出的人）都是失之偏颇的教学方法的劣质产品。根据外语的这一特性，一切有关外语知识的讲授都应该而且必须落实到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技巧上。应该说，外语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同一的，那便是实践。

孟庆夔教授在《论立体化外语教学结构》（载本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一文中，把教师的职责归纳为“讲授知识，训练技能，指导实践”。这是一种高度概括而又重点突出的提法。这三个看似平行的动宾结构，却清楚地反映了教师在外语实践中的决定意义和指导作用。“讲授知识”，包括讲授语言知识（语音，语调，词汇，语法）和文化专业知识（如各种概况，新闻，文学，艺术等）。“训练技能”则是指把所讲授的

知识转化为听、说、读、写、译的技能技巧。这两方面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又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而“指导实践”则是指教师在外语教学中的根本作用。这个作用贯彻始终，它集前二者之大成，以实现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因此，可以说，教师在外语教学中的根本意义，在于正确指导学生进行外语实践。

那么，“正确指导实践”的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大致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教学要以实践为主体，并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实践既是指口头实践，又指笔头实践，也指翻译实践。实践就是学以致用，在“用”字上下狠功夫。必须改变只是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放在从属、被动地位的情况。外语“聋哑症”就是在这种教学方法下造成的。因此，要有讲有练，精讲多练，以练为主，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实践能力上去。

其次，实践应当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尤其是在起始阶段。不能放任自流，以免以讹传讹。有的学生想练，也敢练，但错误成堆，“洋泾浜”外语俯拾即是。这样的错误实践越多，后果越不可收拾；学生下的功夫越大，就越难得到纠正。所以，教师必须费心，费力，费时间，全身心地指导学生进行实践。

再次，实践的内容应该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在对实践的指导中，教师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语流，遣词造句以及知识内容都应该严格要求。当然，这首先要要求传授的知识是正确的，准确的。同时，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外语水平高，知识面广，应变能力强的外语人才，而不是培养只会外语，不通汉语，只会表达外国事物，不懂中国国情的假“洋鬼子”。

同时，教师指导实践时运用的语言（当然是指外语）应该是正确的，规范的。要根据学生水平的提高和能力的发展，不断有所变化。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因为指导者在语言文化上的表率作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

最后，指导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操练实践要持之以恒，贯穿始终。一般的弊病是，初学阶段由于内容接近生活，新鲜感强，比较注意语言技能技巧的训练，到了高年级就过多倾向于专业文化知识的讲授，至多也只是进行一定的笔头实践，口头实践不断退化，学生对初学阶段的那种口语感到乏味。此时，教师应及时使语言实践向高级阶段过渡，引导和指导学生向诸如专题讨论或辩论等方式转化。教师要采用耳濡目染的办法，千方百计地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要制造语言环境，开展各类诸如编写外展板报或刊物，外语演讲比赛，外语系列讲座，外语演出等多类实践活动，大力加强第二课堂。同时，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而持久的语言学习习惯（可以包括自觉排除母语干扰的习惯，非规范语言不讲不写的习惯，敏感地发现错误并自觉地纠正的习惯，动用外语规则举一反三的习惯，依据上下文理解某个词或词组或句子的习惯，从实践中寻找规律的习惯，等等）。



当前，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迅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竞争机制推向新的高度，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是多语种、多专业和多层次的。要适应这种形势，高校的外语教学体制有必要进行较大的改革。然而，培养外语基本功扎实，知

识面宽，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强的外语“通才”，则仍然是一条应遵循的基本道路。用人单位对那些外语讲得“洋”，用得“活”的毕业生推崇备至，就是因为他们的外语实践能力强，语言地道，用得上。“洋”即是指语言地道规范，听着舒服，读着上口，不是“洋泾浜”；“活”即指知识面广，应变能力强。这样的外语人才，便是我们所说的“通才”。

在这方面，我们作了十余年的探索。本文所述的观点还需要在今后实践与探索中受到体验、修正，以臻于成熟。事实证明，这些做法还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当然，道路还是漫长的，改革正未有穷期。我们仍将不断努力，继往开来，争取更大的成功。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 西班牙当代的“新小说”

李红琴

历史的脚步在 1992 年的西班牙留下了重重的足迹，这是西班牙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风头尽出的一年：巴塞罗那空前盛大的奥运会、塞维利亚万国博览会、马德里作为欧洲文化首都举办了一系列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近些年来，西班牙文坛的情况也象 1992 年盛事氛围中的西班牙一样，可以说是一派异彩缤纷的景象。如果说在西班牙文学史上有过使他们引以为骄傲自豪的“黄金年代”，我则认为，西班牙文人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力图掀起西班牙式的“文学爆炸”，进入文学史上的又一辉煌年代，姑且不论这个“文学爆炸”是否已经到来，至少西班牙文学创作者们在世人面前摆出的不甘寂寞的姿态及他们为此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出现的“文学爆炸”现象至今对世界文坛发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班牙——西班牙语母国，更是首当其冲，受到这股巨大力量的震撼。历史、文化方面的诸多因素，使西班牙广大作家，几乎是“本能地”接受拉美文学作品的“辐射”，从中汲取营养，引为借鉴。从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七十年代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倒台，新的政治格局代替了法西斯的独裁专政，人们没有言论自由、知

识分子噤若寒蝉的局面不复存在，大批流亡在外的文人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是繁荣西班牙文学事业的一股力量。新政局带来的民主气氛也为广大作家自由地写作和发表各类作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民主自由的政治气氛，经济建设也有长足进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西班牙已发展成为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1987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三年保持在百分之五以上，其目前的经济发达水平，虽在欧共体中仍排在倒数第四的位置上，但比起战后的西班牙，其发展速度是快的，变化是可观的。塞拉笔下的小酒馆及那些衣衫破旧的小市民群体形象，在今日的西班牙已难以寻觅。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精神需求和欣赏品味也随之变化。正象出版事业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所起到的必要的推动作用一样，西班牙出版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对一个文学高潮的到来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在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这块不大的国土上，在不到四千万人口的国民中，不但有报刊一百六十多种，全国性的杂志一百多种，而且每年大量出版新书，1950年，每年仅出书三千多种，而1984年则达三万多种，其中仅小说一项，每年新作品约有一百五十种。

早在1985年，西班牙文化界认为西班牙文坛上出现了“新小说”现象，缘由是一批年青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文学和出版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年青作家赫苏斯·弗雷洛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贝尔维尔·尹》可以认为是上述文学现象的第一个信号。当我们敢于把文坛上的某种情势和动态称之为一种“现象”时，必不可免地会从两个基本方面去寻找论据，即作品的发行数量和作品质量。从未同时出现过如此众多的作家，

从未发表过如此之多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选择出的有质量作品的绝对数目也是可观的。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来看，五、六十年代主宰西班牙文坛的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小说被多种风格、异彩纷呈的流派所取代，文化市场成了选择作品的重要标准。著名小说家胡安·贝内特曾多次号召文学作品“为民众服务”，“新小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进入文化市场，满足人们日益升格的文化需要。它们不但流派各异，而且类别多样化，有历史小说（往往是以历史故事为基础，旁征博引发挥成有时代意义的新小说）、爱情小说、知识小说、魔幻现象主义小说、心理小说、色情小说、风俗、或称为新风俗小说、黑色小说、马德里新小说、安达露西亚新小说、抒情体小说、电视连续剧小说、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等等。如果说在西班牙内战前和内战期间，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学品种曾称雄文坛，产生过多部优秀作品和象洛尔卡、马查多这样享誉世界的诗人，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战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开始，小说成了一种时髦的、流行很广的、受大众喜爱的文学品种。

八十年代初西班牙开始出理的“新小说”由战后四代作家共同介入形成，至今他们和平共处活跃在文坛上：以塞拉和德利韦斯为首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作家；塞拉于1983年发表了《献给两名死者的玛祖卡舞》；第二代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是加西亚·奥特拉诺，马丁·盖特以及胡安·马塞尔；其次是以胡安·贝内特为首的一批放弃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家，胡安·贝内特于1989年发表了小说《半明半暗中》；接下来是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是“新小说”的主力军，下而这几位作象可以认为是这批人中的核心人物：赫苏斯·弗雷洛、亚

历杭德罗·甘达拉、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索莱达·普埃托拉斯、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以及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除此之外，还可以把爱德华多·门多萨和胡安·何塞·米利亚斯也列入上述作家之中，尽管这两位作家早先于他们名噪文坛。1975年，弗朗哥政权垮台，爱德华多·门多萨发表《萨沃尔达一事的真相》，胡安·何塞·米利亚斯发表《愚昧即智能》，文学界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发表被视为“新小说”的起点。

西班牙战后的这第四代作家一般出生在四十年代，他们的童年生活是在刚刚结束内战时的西班牙度过的，他们的青年时代正逢“弗朗哥主义”最猖狂的岁月，在大学生活中开始形成反对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强烈的思想意识。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们曾得到“社会小说”甘法的营养，但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以为然”，有些人进而站到反对甚至批驳“社会小说”的立场上。作为小说家，他们就是在这个年代开始形成“新小说”的某些意识。六十年代，他们从欧洲文学作品中读到很多新鲜的东西，又受到左派知识分子文学思想的影响，就未来的小说应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有着很大的争论和分歧，但从本质上看，这些不同见地对推动西班牙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建树意义的。

“新小说”在题材、风格、艺术技巧及使用语言方面都与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新小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中诞生，这不仅仅指1975年以后在西班牙国内有发表各类作品的自由，在论及“新小说”的一些特征时，我们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新小说”在写作技巧、选题、结构安排等等艺术技巧

的使用上，是不循章法、充分自由的，即没有，或没能形成以之为主导的，或主动脉的某种文学流派，虽然有不少评论家冠之以不同的名字，如“后现代主义”，“开放现实主义”等等。因此“新小说”没有既定的格调，不受政治信仰、思想意识的约束，不囿于某种得到公认的文学模式，没有美学的公式口号，不接受任何一种文学流派、美学观点或思维方式的“专政”。可以说，他们了解甚至熟知传统文学作品的结构和写作技巧，他们并不是一概摒弃，但不为其左右，而是按自己的意愿对先师们的经验进行取舍，他们也不是瞬间一哄而上，而是依个人意志，或局部地借鉴“他山之石”，或独树一帜，写出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笔触的印记。穆尼奥斯·莫利纳曾言：“从塞万提斯到福克纳，我拥有八百多位导师。”“新小说”的作者们不仅承受了西班牙传统文化的巨大财富，也广泛地汲取其它文化的丰富营养，在信息通讯工程进入电子时代的今天，他们的所闻所见是广博的，对新生事物的反应是敏感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痕迹。

“新小说”作者们有一个几乎是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偏爱描写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他们一般不把“寂寞”这种情感当成麻烦来处理，而是认为唯其“寂寞”才能产生作者追求的气氛，只有在“寂寞”的氛围中才能进入格外清醒明智的境界。他们擅于挖掘和描绘人类内心深层的物质，精心品味人类的情感和心绪，因此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变成文学作品中的唯一重要人物，“意识流”、“内心独白”这种写作方法得到了极好的发挥。

从小说命题方而来看，“新小说”改变了“社会小说”以群体生活或斗争为题材，而是选择个人的事件或个人经历为

主题。“社会小说”中的“我们”变成了“新小说”中的“我”。不描写群体发生的事件或社会的矛盾，而是“我”如何在自我矛盾、自我斗争、自身经历中去寻求自己、反省自己和重新认识自己，他们并不超脱于社会之外，而是通过个人的角度去反映整个社会的风貌，去认识和理解社会的问题。作家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说道：“说到底，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一种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作为小说选题，“新小说”作者们还偏爱神话故事、历史传奇或历史神话故事、新风俗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叙述个人经历的抒情体小说日渐增多，如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的《黄雨》。受拉美“文学爆炸”中“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带有神话、虚幻情节的小说，如路易斯·兰德罗于1990年发表的《迟暮年华的游戏》，把描写现实和引人入胜的神奇幻想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部成功之作，颇受读者青睐。

语言直接显示作家的写作风貌。虽语言风格因人而异，或朴素平易、或流畅华丽，但一般而言，“新小说”作家们在使用语言方面是刻意追求的，是讲究完美的。在语句结构和语意翻新方面他们甚至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胆量和勇气十分可嘉。

论及西班牙“新小说”现象的种种特点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一文学现象中有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色彩，那就是“女性文学”在西班牙文坛的斑斓图画上，愈发显得突出和不容怠慢。这与其认为是一种文学现象，不如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女性文学”这一提法开始于八十年代，现在已有一批成熟的、有经验的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她们一般以揭示女性内心世界描写家族历史、描写被置身于社会生活之

外的女性等等内容为题材，她们细致入微、情意绵绵地深挖人物心灵的隐秘，向我们展示了丰富、宽广、真实可信的视野，起到了鞭策和教育广大妇女在民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用。她们之中最突出的作家是：罗莎·蒙特罗、埃斯特尔·图斯盖特斯、索莱达·普埃托拉斯等等。

在“新小说”日益占领文坛的形势下，西班牙文学界一致认为，近几年来，从西班牙国内其它地区使用的语言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作品也在“新小说”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如加塔兰语、加利西亚语和巴斯克语等等。使用这些语言的作家们写出不少优秀作品，其中不乏全国文学大奖获得者。

为了进一步向读者介绍西班牙的“新小说”，现就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新小说”文学现象中的实力派人物作一具体的分析。作家于1955年出生在西班牙北部莱昂省的一个叫作贝卡尹曼的村镇上。他曾学习法律，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但从业不久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是记者、诗人和小说家。（“新小说”中的不少优秀作品出自诗人手笔，有人认为这是“新小说”的一大特点）。作为诗人，他发表两本诗集，1979年发表《迟缓的公牛》，1982年他的另一本诗集《雪的怀念》获得全国文学豪尔赫·纪廉诗歌大奖。然而真正使得作家在西班牙文坛上名声大振和得到重要位置的，是他发表的一部叫《黄雨》（1988）的小说，这是一本抒情体小说，可以说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性格冲突，写的是比利牛斯山下一个被大自然摧毁、被人类抛弃的村庄，村内唯一的幸存者用内心独白的形式向我们讲述着一切；村内居住的所有人或先后弃他而去，或尸埋寒土，父母先后死去，女儿死去，长子在一天的清晨也悄

然离去到他乡谋生，妻子终日沉浸在对另一世界子女们的怀念之中，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自缢而死……，主人公身边除了一条狗陪他度过余生以外，只有黄色的雨、黄色的空气、黄色的悲伤……一切都是黄色的，那是孤独、悲哀、死亡的象征。他被毒蛇咬伤后开始发烧，昏迷中他向我们回忆着村内的一切往事，他再次听到女儿萨拉发出痛苦的呻吟，他再次见到妻子自缢时用的草绳，一连串的事情向他预示着他就要死去了，众多死去的亲人及邻人化作幽灵出现在家中，厨房内飘出母亲点拨灶火的热气……，他们在他们中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死亡变得并不可怕，他平静地挖掘着自己的坟墓，用仅留下的一颗子弹结束了爱犬的生命，因为他不愿意让它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静静地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黄色的，黄色的雨、黄色的空气，黄色的悲伤……

正象当前西班牙很多“新小说”一样，《黄雨》没有众多的人物和曲折跌宕的情节，作者借苍茫凄厉的背景展示出为一般人所不熟悉的人物及生活，抒发内心隐秘的心情，显得悲凉、神秘。“人类的寂寞”、“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苦斗”是当今世界文坛颇为时髦的题材。书中的事并非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伴随着工业的高度发达，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大面积的土地荒芜，农村被遗弃，只有少数眷恋乡土的老人们孤军奋战。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描写的村庄原型，是他诞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这在今日的西班牙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我读着这本书时，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联想到胡安·鲁尔弗笔下的村庄——科玛拉，及游荡在那里的幽灵们；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及笼罩在那个村庄



的“百年孤独”，这仅仅是由于文化的原因，西班牙作家和拉丁美洲作家才心心相通的吗？

《黄雨》是一部抒情小说，作者把诗歌中的十一音节和八音节诗巧妙和谐地搭配在一起，增加抒情效果，每段文字开头的第一个单词不是编进去，而是突出另立一格，在形式上象一部史诗，据作者本人讲使用这种格式的用意还在于突出内心独白的效果。语言极其朴素流畅，不故弄玄虚，一切显得十分自如，融寂寞之情于破败的村庄景色中，意蕴深长，让人感到淡淡的神秘。

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的另一部小说，是他于1985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月色下的狼》。作者在小说的扉页上写道：“1937年秋天，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共和战线崩溃，共和战士们没有任何退路，上百名幸存者在山势陡峭和人烟罕至的坎达布连卡群山中藏身，躲避“胜利者”对他们施加的迫害。寻找机会重新集结以图东山再起，或逃避到安全地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被子弹击中，共和战士的尸首遍布于群山。极少一部分人在经历了百般劫难之后，终于到达了边界线，求得在他国的避难权。然而，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为此付出了他们一生中最可宝贵的年华，他们的经历在人民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回忆。”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是西班牙战后幸存的士兵，出于要活下去的本能，他们经历了种种可怕的磨难：安赫尔深夜从山里溜回村庄，父亲用颤抖的双手把终生劳作积下的钱送给他，让他不要投降，永远不要回家。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永远不会得到原谅”，安赫尔和妻子相见时，他对妻子无限爱怜，因为她注定终生要在寂寞中等待一个“影子”、一个“鬼”、等待一头山中的狼。

三十年代结束的这场西班牙内战，在西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因此多年来它一直是无数小说创作的主题，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多方位的表现。一般来说，“新小说”作家们对这一题材已日渐疏远，象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这样的作家，完全站在新的角度上，用不同于前人的思维方法去使用这些素材，阐述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出生的村庄几年前被沼泽吞没了，但是对家乡、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一直是他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他说：“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童年的经历更重要了。”作者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部小说《忘却的河流》是一部游记小说。有趣的是，作者（书中的旅行者）是沿着一条十分熟悉的道路跋涉着沿古鲁埃纽河河口出发，去寻找河流的发源地，寻找几乎失去的“自我”，寻找那些被人忘却的“真实存在”。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除发表诗歌、小说外，作为记者多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有散文、杂文、文艺评论等等，其中部分收在集子《在巴比亚》中。

八十年代初在西班牙形成的“新小说”象拉丁美洲六十年代掀起的“文学爆炸”一样迅速占领了文化市场，市场效应又进一步推动了“新小说”的发展，然而西班牙文学界对“新小说”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从作品选材来看，“新小说”有脱离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倾向，象西班牙社会的弊病、某些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得不到反映；政治上推翻独裁统治，带来了民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后，似乎任何一个“文人”都可以自信写出“伟大的作品”，出版界为迅速获得经济效益，在推出一些新人和优秀作品时，也不乏粗制滥造，良莠不分的倾向；设立各种文学大奖的初衷是推

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但在今日西班牙文坛上，各种大奖满天飞，名堂之多、奖金数目之大令人瞠目，其商业化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纵观“新小说”全貌，它充满生气，表达方式丰富完美，立意新颖奇特，写作技巧日臻成熟，出现了胡利奥·利亚马萨雷斯、爱德华多·门多萨、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胡安·何塞·米利亚斯、索莱达·普埃多拉斯等等一批优秀作家和杰出的作品，他们打破了西班牙文坛多年以来的寂寞。由于这一新局面的出现，令很多素有丰富传统文化的欧洲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出现和发展对繁荣西班牙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化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原载《外国文学》1993年第6期）

# 班门絮语话贤传

——节录自《CARMEN 译文研究》

杨 松 荫

书名翻译琐谈

怎样看梅里美的小说 CARMEN 音译成为《嘉尔曼》或《卡尔曼》或《卡门》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举一个例子：有一部 1940 年由美国人拍摄的电影，英文名字叫做 Wsterloo Bridge。直译成为汉语就叫做《滑铁炉（大）桥》。这个“滑铁炉”是什么呢？是个地名。世界上的城镇冠以此名的有七个：在北美洲，美国有三个，加拿大有两个；在非洲，塞拉利昂有一个；在欧洲，比利时有一个。比利时这个“滑铁炉”是原始的、正宗的。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到“滑铁炉”字样，就自然会联想到 1815 年 6 月 18 日拿破仑从此一蹶不振的滑铁炉战役。这下子可就南辕北辙，所谓张冠李戴是也。这部影片故事发生在伦敦。伦敦城里有滑铁炉火车站、滑铁炉大街、滑铁炉大桥。可是这是一部美国电影。硬叫中国观众把美国电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英国的伦敦、伦敦的滑铁炉大桥，真的有点儿勉为其难。聪明的译者避开地名翻译（直译手法），把电影名字翻译成《魂断蓝桥》。诚然，这个译名中，只有一个“桥”字和原文相合。能够认为这样就不忠于原文吗？不可以这样认为的。我没有赶上这部电影在中国的放映，不晓得海上报上是

如何做宣传的。假如说，这是美国的故事影片《魂断蓝桥》，这个中文译名并不会伤害影片本身。相反，还可以吸引、招徕观众。就说“蓝桥”吧，它在陕西蓝田东南的蓝溪上。古代传说中，此地有仙窟，是唐代裴航遇仙女云英的地方。唐代传奇小说《裴航》（见《太平广记》）讲述长庆年间秀才裴航在蓝桥驿遇见一位织麻老妪的孙女云英，想娶她为妻。老太婆告诉书生，必须用捣药的玉杵臼为聘礼。后来裴航果然得到玉杵臼。裴航和云英婚后双双入玉峰洞为仙。明代的传奇剧本《蓝桥记》、《蓝桥玉杵记》、《玉杵记》都是表现这个爱情故事的。在我的老家吉林地方戏至今仍然上演《蓝桥会》哩！所以，中国观众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个爱情故事。加上“魂断”两个字，正好点出爱情悲剧这个“题”。不是常说，翻译是创造性的劳动吗？实质上，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没有离题。我认为恰好扣题。假如，把原文的人名、地名照搬、照译，而中国读者不熟悉、不习惯或者造成误会、误解，那是何苦来？如果译者做一番改动，翻译为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译名（如《魂断蓝桥》）我想原作者也会感谢译者。因为译者创造性的译名帮助作者和读者（观众）的沟通。试想，那一座滑铁炉大桥让观众在离座时候顿然悟出个中底蕴，“啊！”的一声恍然大悟，不是很有些诗情画意，余音缭绕么！

至于 CARMEN 这个名字怎么翻译为好，应当从它的读音谈起。这个专用名词按照注音，应当读做 [karmen]。可以音译成为汉语的：嘎（喀、尕）赫（鹤、荷）麦讷。颤舌音 [r] 在法语发音中可用大舌，如乐、勒尔、尔；可用小舌，如赫、荷、禾。其它译法不准确。那么，为什么会翻译成为前面的三种名字？我们无法查考老一辈翻译家给书名命名的初

衷。只能做一点推测：1. 译者是借用英语发音转译过来的；或者 2. 尊重约定俗成的习惯，如卡门；3. 不知道这个词的正确发音。这丝毫也不奇怪。法文辞书内通常是不收入这个词的。个别辞书收入了，可是查不到它注音（例如：有的文学词典中查得到，那是在介绍这本小说，不可能给注音的）。小说故事本身发生在西班牙。女主入公是吉卜赛人，用的是拉丁文名字。要正确给定译名，真的难为了译者。4. 或者译者为了方便，故意翻译为上口的名字。照我看来，翻译成《嘎赫麦娜》为好。理由是：1. 音译基本相对，中国人、法国人读起来都是一码子事；2. 嘎，说明这个人性格特别；娜，看得出来此人是女的；3. 虽然译名没有把拉丁原文中“歌、诗以及梳棉女工”的原有意味传达出来，但是，“嘎”字已经点出她的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从实际情况看问题，任何事情，兼得固然理想。要是二者必需选择其一，我认为翻译为《嘎赫麦娜》挺合适。我的这个议论是马后炮。既然，前面提到的译名已经通行几十年，对于大家都习以为常，构成约定俗成的名字，没有必要另起炉灶。议论这个问题在于，提醒后学。

关于书名的译法，还是不要弄什么条条框框为佳。翻译家应当开动脑筋搜寻吸引中国读者大众注意力和好奇心的书名，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定名。例如：英国 Oliver Twist 翻译成为《雾都孤儿》就很好。假如弄个忠实于原著书名的《奥里维·垂思特》，中国读者有谁感兴趣？依我看，《基督山恩仇记》比《基督山伯爵》要来得好。所谓“信”，是说本质非表面。再说，中外读者（包括作者、译者在内）在风俗习惯上大不相同，硬把外国人定名习惯“引进”中国，非要中国人接受，能有几多好处可言？按照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冤冤相

报”在中国是根深蒂固。讲“报恩和复仇”合乎中国人的胃口，也同小说内容完全一致，再比如巴尔扎克的 *La Cousine Bette* 和 *Le cousin Pons*，不要看人人都懂，要中国人张口说出来是何许人还要费一悉思索哩！法文定义 *Le cousin, la cousine* 是 *enfant ou descendant d'un oncle ou d'une tante*。这真叫中国译者颇费踌躇。原因是：只要不是父母所生的同辈亲戚人等都是 *cousin, cousine*。在汉语中，用来表达这种混合称呼是叫法由于异常丰富，更增加了翻译难度。堂、姑表、姑舅、两姨（兄、弟、姐、妹）…都是这个法文称呼的对应词。傅雷先生颇具匠心，独辟蹊径，躲开同辈人称谓，改用下一辈的口吻，翻译成为《贝姨》、《邦斯舅舅》。灵活之中透着忠实，创造里头不违背原书宗旨。不是很得体吗？我看，那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译名，害译者、伤读者，到头来也达不到忠于原著的初衷。假如书名吸引人，一看就觉得有意思；不但不会对作品构成损害，反倒增光添彩。

必需是强调说明：我们讨论翻译艺术问题，涉及三位硕果累累的前辈翻译名家。傅雷大师在“革文化命”的大悲剧中不幸作古。他的劳作永驻人间，他的业绩和青史同在；其他两位仍然在文坛、译坛驰骋。依据君子协定，谈论译事不涉及译者其人。我们的探讨、评论旨在学习借鉴。在巨人面前颐指气使、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不允许的，也上不道德的。要有高山仰止的态度。但同时，也无需贾桂似的，自惭形秽，妄自菲薄，低人一等。科学就是科学，事实就是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必须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心口如一的作风。

### 还是用“吉卜赛人”表达合适些

Bohémien (ne) 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波希米(女)人还是吉卜赛(女郎)人抑还是茨冈(女)人?

这个词是从 La Bohème 演绎出来的。La Bohème 就是欧洲中部的波希米亚。这个地区和摩拉维亚构成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因此 Bohémien 的第一个含意是波希米亚人，即捷克人是由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构成的。就如同中国人包括广东人、上海人、东北人、西藏人是一个道理。厘清这层含意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小说里头的 Bohémien (ne) 和波希米亚人并无任何关联。那么，翻译成波希米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问题不在于对与不对。而是有没有这个必要使用这样的词语翻译过来。既然世界上有一个民族在捷克的土地上定居叫做波希利亚人，似乎不必再费心思造一个“波希米人”。何况，我们对 Niger 和 Nigeria 这两个国家也分别叫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这种容易混淆的译名很可能让读者把两者等同起来，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为即使从历史及现实看，波希米亚人都具备其固有的内涵。波希米亚谷地在史前时代就有人居住，公元前一千年克里特人迁徙到此地。从此以后，还有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后裔阿瓦尔人。历史上这个地区一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还是避开“波希米人”这个译法，躲开“波希米亚”这个固有地理名词为上策。有办法吗？法文里有不少如 romani, romannichel, gipsy, zibgari, bohémien; gitan; tsigane... 都是特指这一部分人群的。他们原来居住在印度，十世纪前后向世界各地流散，成为一个以游居、歌舞、游乐为主的民族。我认为，上述词汇尽管表达不一，指的完全是一个相同的群体。既然这



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定名，还是统一称呼为宜。这和日常生活中的称呼变换不是一回事。例如：我丈夫、我先生、我们那口子、他、孩子他爸、我老公…这样看来，不论小说中出现前面提到的哪个词，一律翻译成为吉卜赛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不是西方人。西方人一眼就懂得的，东方人不一定就懂得。人家花样翻新算作有生气，给我们来个花样，我们摸不头脑，不要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里是不是也有作者的责任呢？西班牙人管吉卜赛人常常称呼为 Gitan (e)。作者曲用 Bohémien (ne) 给译者设了一个圈套。是的，苛求古人不能说是公允的。何况，梅里美自己在给朋友的信（1845年5月16日致蒙迪约夫人）中说，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出 CARMEN。在奋笔疾书情况下，作家梅里美实在没有工夫字斟句酌。有考古学家头衔的梅里美并非在此处做考证，他是写在爱情小说。他的信手拈来倒给译者设了个不大不小圈套。再者说，欧洲读者毕竟习惯于多种称呼的变换，而不会出现混淆的。

### 用“烧鱼、炸货”不是更好些吗？

例句：Tous connaissaient, et ses poissons et ses beignets encore mieux.

叶译	大家都认识他，	当然更认识他的	炸饼和煎鱼了。
傅译	大家都跟他相熟，	跟他 的	炸鱼 和 炸面块 更其熟。
郑译	他们都认识他	尤其熟悉 他的	煎果饼和煎鱼。

讨论和评议：poissons 煎鱼—炸鱼      beignets: 炸饼—炸面块—煎果饼

传统上，鱼，可以烩、炖、煨、烤、烹、炸、煎…法国

如此，西班牙也差不多，但地区不同，口味相异。作者在此处仅仅使用 *ses poissons*，并没有提及烹饪方法。不过，既然 *le poisson* 是鱼类的总称，此处作者使用复数并且用了个主有形容词 *ses*，讲的是“饭铺老板的鱼”。自然指的是：饭铺老板做的各种鱼类食品。那么翻译为“他烧的鱼”就可以躲过许多麻烦事。*le beignet* 这类食品类似我国维吾尔族人吃的油炸包子。可是 *le beignet* 1. 形状扁平，2. 里面的馅儿可鱼可肉可蔬菜可水果。所以叫炸糕、煎饼就变成了中式小吃，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的意见，糊模一点，不如称之为“炸货”。这样，中国人一看就懂。况且，前面三种译文（炸饼、炸面块、煎果饼）会给读者何种令人难忘的、让人流口水的印象呢？

我想，第一：作家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个“我”是大兵，讲述的是下层劳动者的故事。使用语言应当符合人物地位、身分。第二：这个简单句谁一看都明白。从表面上翻译出来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他（饭铺老板），而更为认识他的鱼和他的炸货。一个动词，*connaître* 认识、了解、明白、懂得，作者在此处想要说明，第一：人们经常光顾这个饭铺，所以认识老板，顾客之所以光顾此饭铺，是因为他烧的鱼和他的炸货可口香甜。傅译把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大师选用“相熟”和“更其熟”，“相熟”是因为常来常往。第二，我想稍稍改动一下译文，是否以可这样翻译：大家都是常客，因为他烧的鱼和炸货香甜可口。这里涉及到怎样翻译 *connaître encore mieux* 的问题。“认识老板”和“更认识他销售的食品”来自何处？通常，吸引顾客的总是菜肴、环境、气氛、态度，而菜肴无论如何总是占第一位的。人们光顾饭馆并不是

打算关照老板的生意。这种译法是否脱离了原文？不然。钱钟书先生主张“化境”，翻译家首先是杂家，其次应当是画家，就是说，应当是位形象思维画的画家。理解原文绝对不是要求译者仅仅字字明白，句句清楚达到功成圆满了。要经过消化理解，则要调动形象思维的功能，形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画幅，进一步让画幅活起来，像电影导演改编文学名著那样。然而，翻译家不能就此止步，他要把视觉艺术形象转变成文字艺术“形象”。因为，有了画面，才能够体会到“意境”，进而融会贯通这个“意境”。最后，作为词家的翻译家把这一个“意境”选择尽可能恰到好处、准确无误的词语描绘出来。这是一个从原文文字——而活动画面——而中文文字复杂转换过程。所谓“化境”，是要求译者表现作家在字里行间似乎欲言又止的那种境界。换句话说，应当要求译者尽最大努力，调动一切可能的文字手段缩短译文和原文的距离。让中国读者在内容的理解上尽可能缩小“衰减”度。

### “跳上我的脖子”和“郊区尽头”

1. 小说中提到的 le Jardin des Plantes 翻译成“植物园、公园”，是怎么回事？这要从这个专用名词的产生谈起。这是一家自然历史国家博物馆。是在法王路易十三时代建造的，坐落在巴黎第五区，靠近塞纳河边。现如今，这里有植物园、暖房、动物园、标本厅、实验室、图书馆，还有一个天然形态动物园，里面放养着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虫类和哺乳动物。这样，就弄明白了，所谓 Si vous n'avez pas le temps d'aller au Jardin des Plantes pour étudier le regard d'un loup... 之类，是作家梅里美在直接和读者交流。他在巴黎的寓所离这座人们通常叫做植物园的地方仅仅有几百米远。作家哪

里会有照顾远在东方的读者的先见之明！何况，这篇小说是他的急就章，顺着思路，信笔写来。在“七星社”版本中的多处改动可以当左证。再者说，阅读小说不是科学研究，大家实在没有必要一个字也不改动。试问：“植物园”或“公园”里如果有狼谁还敢于涉足？不是要吓死人吗？“动植物园”的翻译固然不错，去掉“植”字，干脆叫做“动物园”省去许多麻烦。一位思路敏捷的朋友建议用“生物园”。我说，这就非常有创造性！拘泥于名实不再相符的约定俗成的“植物园”那个老套子，不会不给非当地人造成错觉。毕竟，广大中国读老并不晓得巴黎植物园里面还饲养着许多动物，所以动物园也包括在内呀！

2. ...à l'extrémité du faubourg nous arrêta<sup>mes</sup> devant une maison qui n'avait nullement l'apparence d'un palais.

傅译…到城关尽头的一所屋子前面停下，屋子外表绝对不像什么官邸。

郑译…到达郊区尽头的时候，在一所看来丝毫不像宫殿的房子前面停下。

叶译…我们在郊区的尽头处停下了步子，走到一所外貌颇不雅观的房子前面。

傅译	城关尽头	屋子外表绝对不像什么宫殿	到…停下
郑译	郊区尽头	看来丝毫不像宫殿	到达…在…停下
叶译	郊区的尽头处	外貌颇不雅观的房子	在…停下了步子

有两个词需要研究、讨论：

1. le faubourg 的定义①一座城市的城区以外的部分；②

大城市郊区的居住空间。

2. le palais 的定义：可以叫做宫殿、官邸、宅邸；在这个定义里头还有一个夸张、讽刺的定义：某某的豪华住宅或者被当作是豪华的住处。

十九世纪的科尔多瓦城虽然已经存在的千年以上（如果不把公元45年恺撒和小庞贝在科尔多瓦附近大决战计算在内，从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入侵算起，这座城市也有一千多岁了），城市规模仍然不大，二十世纪的今天也只有二十几万人口。梅里美那个时候，城区和郊区规模本来都很小，不像现如今区别如此明显。况且，faubourg 本身原本就属于城边子范畴，城市扩大后也自然被包括在城区之内。所以我主张使用“城边子”这个概念。“城边子”并不是大范围意义上的城市边缘。本来，城市就不大，使用城市“尽头”让人感觉城市好大、距离好远。关于 le palais，这里不是指的“宫殿、官邸”之类，而是“豪华住宅”。大家都十分明白；要去的地方既非国王总统元首的宫殿、官邸，亦非高官富贾大亨的宅邸。用“住宅”就足够了。否则，不合乎情理和实际，变成画蛇添足。

“城关尽头”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它存在于城市和郊区的结合部，“郊区尽头”具体指的是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市郊区和乡村交界处吧？！少说也要远离城市好多公里哩！

我们试着翻译一下：来到城边子，我们在一所绝算不上豪华的宅子前而停下来。

3. Moi j'étais au mieieu de la chambre, chargé de tous ses emplettes, ne sachant où les poser. Elle jeta tout par terre, et me sauta au cou, en me disant ;

傅译 我站在屋中央,捧着一大堆食物不知放在哪里好。她把一切摔在地上,跳上我的脖子,和我说:

郑译 我呀,我站在屋子中间,手里捧着一大堆买来的东西,不知往哪里放才好。她把所有东西全扔在地上,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对我说:

叶译 我这时站在屋子的中央,拿着她所买的一大堆东西,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她把所有这些东西扔到地上,双手抱着我的脖子,对我说:

傅	捧着一大堆食物	不知放在哪里好	把一切摔在地上	跳上我的脖子
郑	捧着一大堆买来的东西	不知往哪里放才好	把所有的东西全扔在地上	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
叶	拿着她所买的一大堆东西	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	把所有这些东西扔到地上	双手抱着我的脖子
试译	摆在我身上这玩意儿	不知道如何	把她搜罗来的一股脑儿摔在地上	狂热地拥抱、亲吻我

评论和探讨: sauter au cou de qn. 是“热烈地、由衷地拥抱某某”。“拥抱”二字从何时起在汉语文学语言中启用,这要由训诂学家去考证。“拥”字则古已有之,例如《汉书》:“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总不能说是抱着汉武帝刘彻脖颈的后部吧!)初学者最要紧的是仔细认真研读原文。切莫掉以轻心、粗枝大叶、望文生义,这是最为要不得的。切记:随时小心,处处留意,麻痹大意往往连“荆州”也保不住。同时,任何人都应该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做小学生。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老一辈翻译家们在欣然命笔或者急就章的时候时而

会产生类似的纰漏，那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事情。

关于本例句中的 *chargé de* 还得交代两句。用“捧着”或者“拿着”没有充分体现作家用词的内涵。这里场景是说：“Carmen 大把地大方地尽情地挥霍傻“大兵”的钱，搜罗了一大堆吃的。这个傻小子当了冤大头不算，还充当 Carmen 的跟班脚夫。她轻轻松松蹦蹦跳跳。这个倒霉蛋手提肩抗腰挎，甚至嘴里叼着哩！景象的确别有一番情趣。疾心的傻小子企图用破费钱财来满足风骚的吉卜赛女郎。这一个，即当大头又是小“力笨”；那一个，欢快得像个麻雀。那么，实心牢意的巴斯克小伙子总免不了还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心甘情愿的描述。否则，为什么要用 *chargé de* 来表达，用 *portant* 不是也照样通顺吗？

我们试图这样翻译一下：我呆呆地站在屋子中央，不知道把擀在我身上这一大堆玩意儿如何处置。她倒干脆，把她搜罗来的统统摔在地上。然后狂热地拥抱、亲吻我，并说道：说实在的，任何译文都不会十全十美，天衣无缝。我相信，将来总会有人能够超过前辈。

### 关于争睹女人下河洗澡

净身沐浴是文明人类之必需。女人下河洗澡怕人看大概是父系社会以来愈演愈烈的“文明社会”的宝贝遗产。在西班牙却有另一番风情，成群女人聚集在河里洗澡净身嬉戏，好事多情的男子汉们麇集在岸边远远眺望观赏遐想。在这里，自然不讨论民风民俗，我们仅仅对语言转换表达感兴趣。下面提出讨论几个例子：

例一：On m'a dit que quelques mauvais garnements se cotisèrent certain jour, pour graisser la patte au sonneur de

la cathédrale. .

傅译 有一天几个轻薄无赖凑了钱，向大寺司钟的人行贿。

叶译 有好几个爱捣乱的家伙，曾经有一天集资买通了天主教堂的敲钟人。

郑译 有几个无耻之徒有一天筹集了一笔钱，用来买通大教堂的敲钟人。

郑译	有几个无耻之徒	筹集了一笔钱	买通	大教堂的敲钟人
叶译	有好几个爱捣乱的家伙	集 资	买通	天主教堂的敲钟人
傅译	几个 轻薄无赖	凑 了 钱	向	大寺 司钟的人行贿

这里要讨论 le garnement. 用“轻薄无赖或爱捣乱的家伙或无耻之徒”是不是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原作的意义？le garnement 的两个定义中指明为“不大听劝，不那么驯顺的；吵吵闹闹的，不守纪律的”，前一个指青年，后一个指儿童。限定得清楚明白。小说所表现的实际场景也不容许含糊。看热闹的和下河洗澡的必定是年轻男女。有家有业的成年人或者大老头子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观赏女人下河洗澡，岂不让人笑掉大牙！老太婆洗澡会有人看吗？所以年龄界线是不可能逾越的。那么，可不可以用“青年无赖或者少年泼皮”呢？可以，但是言重了。男人们在河岸边眺望（这里头的“游戏”规则”十分明确，男人们尽管看，但是必须在约定俗成的界线之外）妇女下河洗澡，一不“伤风化”，二不叫“耍流氓”。看热闹的人们够不上流氓坏蛋水平。使用“轻薄少年、轻薄小子、爱捣乱的家伙、招惹是非的家伙”起码是不得体。根据此时此地的场景，用“起哄、凑热闹”则比较适宜。下



河洗澡在夕阳西下之际，就是为了别了看得不清楚、不一目了然、不一览无余。好事之輩明明知道看不出什么名堂，仍然趋之若鹜、乐此不疲。究其实，人在黄昏后，熙熙攘攘的男子汉们远远眺望雾气蒙蒙的河面，在光线昏暗 中，水蒸气罩下瞥见到的大概仅仅是影影绰绰的灰白点点女人倩影在远处晃动，这样也就心满意足了。青春少年们不过把这项活动当作晚饭之后一种开心、散心、找乐的手段。你有洗澡嬉戏的权利，我有“隔岸观裸”的自由。这叫做各得其所，谈不上谁不要脸谁无耻。所以，我倾向借用“纨绔子弟”。理由是：1. 普通读者不在乎辞书上怎么说。约定俗成观念把“纨绔子弟”和娇生惯养、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联系在一起；2. “子弟”包含着青年和少年；3. 地方上有钱有势人家子弟没人敢惹。胆大妄为，什么“馊”主意全敢出，什么不合乎“常理”的事也敢实践。隔岸观“裸”显然不算胡作非为，任何人都可以驻足一观嘛！但是有胆力、魄力和财力买通司钟（我不知道担任此职务是否神职人员，起码他得是个虔诚的教徒吧！）对这样的人物与其说是“买通”，倒不如说是司钟要“卖面子”给纨绔子弟们。

例二：Du haut du quai, les hommes contemplent les baigneuses, (écarquillent les yeux et ne voient pas grand-chose.)

叶译	站在 码头上的	那些男人	呆呆地 望着这些	浴 女；
郑译	堤岸上面，	男人们在	欣赏这些	沐浴妇女，
傅译	堤岸上头，	男人们	欣赏这些	浴 女，

我以为“浴女”这个词创造得再好不过了。在文明社会

里，任哪个时代 社会、群体、男女界线总是或多或少泾渭分明的。此时此刻——日落黄昏后，此地此景——遥遥相对，岸上河下，“望眼欲穿。”这幅浴女戏水图，倒类似印象派油画，蒙蒙胧胧模模糊糊，哪里会有人去分辨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只不过在那里凑热闹，瞎起哄，他们远远地站在河岸边并非为了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只不过在那里做一相情愿的美梦，玩上一点自我安慰、想入非非的把戏而已。

通常，在流经城市的河流两岸都修筑着护堤、护岸、护栏之类，有的还修建江边小公园等。本故事发生的时代还没有这类设施的可能性。原文中运用 *du haut du quai* 这个并不准确的字样。*le quai* 是堤岸，也是码头。翻译成“码头”显然不妥：码头是渡人、运货的地点，一般是建有设施的；码头不会高出河面许多的，旅客以及货物都要经过码头上下船。码头和船照理看来不应当有高度差，实际的高度差也肯定没有多少。再说，码头高处（上面）是指的哪里呢？我认为应当取消“高头、上面”，因为堤岸的“高头、上面”是什么地点，哪个读者能够说得清楚呢？所以，干脆就用“河岸”。

动词，往往是一句话的核心成分。这个 *contempler* 的确起着关键词的作用。字典上是这样讲的：1. 全神贯注地凝视着；2. 含情脉脉的、想入非非的或者感情激荡地久久端详；3. 专一于他的思绪；4. 沉思，冥想。看起来，第二个定义比较适用于本文此地的场景。用含情脉脉，显然不可取，大老远的，女人们在尽情地嬉水，小伙子们跟谁去含情加传情！？那么，用想入非非，内心感情激荡之类显得过分露骨，又不切合这一个“实际”。麇集在河边的“男子汉部落”组成复杂，成员也不固定。运用心理描写词汇来表现这个动作，似乎勉

为其难。这个动词的“根”在于“看”。没有“看”何谈其它？用“凝视”说明眼睛盯着某人某事，目不转睛；用“出神”以表现“神魂颠倒，想入非非”。就这样，似乎还不够劲儿。很有必要来扩展思路找寻对应译文。如用“出神地凝视”如何？那么，前面的“男人”就显提过分呆板、傻气。我想借用《红楼梦》中的一个词——情种。那么，可以把这句子翻译成为河岸上的情种们出神地凝视着河下浴女。

例三：Aussitôt que l'angélus sonne, il est censé qu'il fait nuit.

郑译	…人们	就	认为	黑夜来临了。
傅译	…大家	便	以为	天黑 了。
法译	…	就	算是	黄昏 了。

既然作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故事，行文使用文绉绉的词语就没有什么不妥当。前后两个半句连起来：

（教堂钟声一响，）权 当 夜幕降临。

做这样改动的理由是：能够有勇气来到河边，在名副其实的众目睽睽之中，在广大小白脸儿的眼皮底下，大胆宽衣下河洗澡的女子，也绝非那些“深闺人未识”之辈。要知道，瓜达尔基威尔河是横穿科尔多瓦城的。有胆量到这条河里面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尽情嬉水者，哪里会不晓得，静悄悄地沐浴都不免招引好事之徒驻足一观。更何况，在夕阳西下、眼擦黑的时候，一大群妙龄女郎带着她们特有的有银铃般的欢声笑语、尖声喊叫，自由自在地脱衣下河，哪能不招花惹蝶？当然，谁也不能说这些青年女子没羞没臊。不过胆子真够让普通人咋舌的。怕看的，不敢来。就是有的女子鼓起勇气来

了，也常常羞于宽衣下水；成群结队来了的，大家相互歪着肚子，早把害怕二字“扔到爪哇国”去了。敢下水的，就不怕着。只要教堂钟一响，宽衣解带下河嬉水。洗个自在，乐得痛快。还有谁去理会那么多“妇道纲常”，清规戒律？这样的活动，本来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情，竖着耳朵听钟声，闭着眼睛看太阳。请看，这是一幅多么光明磊落、生气勃勃、熙熙攘攘、摄人魂魄的生动画卷！

例四：et se fiant plus à l'angélus qu'au soleil.

傅译	对	晚祷的钟声	比对 太阳更信任。
郑译	相信	晚祷的钟声	而不相信 太阳。
叶译	对	晚祷的钟声的	信任胜过对 太阳的领先信任。

从上面简单的排列中可以发现，三位老前辈的译文都被束缚在 se fier à 上，无法放开手脚。三种译文都使用了“信任或相信”太阳。这就说不通了。“青春女子嬉水河下要在 1. 教堂敲响钟声和 2. 夕阳西下之后。她们“听”钟声“响”，“看”太阳“落”。就是说，“待到日落黄昏后”，就要宽衣下河。再大大咧咧的女子，也不大肯在阳光灿烂的大天白日任人观赏自己洗澡呀！问题在于，在这个天主教国家晨，在民众心理，教会对谁、对什么都是举足轻重、说一不二的。就是说，只有教会是最有权威，说了算的。钟声一响，就算天黑。所以，在这里无所谓，也不存在“信任”谁或者不“相信”谁的问题。

我们试图对译文做些许改动：

只待晚祷钟声，一任太阳高挂。

或者，只听晚祷钟声的，那管太阳落不落。

(原载《师范英杰——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获奖文集》)

# 一部成熟的外国文学史

李 玉 民

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文学史》下卷，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问世，至此、上、中、下三卷终成完整。

纵观我国编写出版外国文学史方面的状况，我们发现这一工作确实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由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1964年1月出了上卷，直到1979年11月方出下卷，全书共53万言，论述简要。其他如《德国文学史》、《美国文学简史》等，均出了两卷本。至于《法国文学史》，在解放以前也出过几种，计有1923年李黄，1929年袁昌英，1930年徐霞村，1932年夏炎德，1933年穆木天等编写的，但均为简史。篇幅较大的独有1946年出版的吴达元先生的《法国文学史》约80万言，规模虽不小，但基本上是德·格朗日(Des Geanges)所著文学史的中文翻版，且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文没有吃透，译述中夹生的成分颇多，往往不知所云，读来不免有隔雾观花之感。

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可以说是我国自有外国文学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外国国别文学史。一部文学史，纵然规模很大，如果不能自成系统，缺乏新的创见，那也无法肩负文学和历史的三重使命。而《法国文学史》，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下卷，给人最突出的感觉，可以概括为“国人独步”四个字。全书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始终贯穿自己的思想观点。

编著者纵观作家、作品和流派的嬗变，囊括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影响和思想艺术特点，潜心搜辑，锐意探求，洞烛幽隐，不趋时尚，务去陈言，自出机杼，显示出我国学人在对待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恢弘气度和大家风范。自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来，我国早就有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的优良的传统。本书编著者在评述法国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时，既注意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又重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崇洋媚外的仰视，又不是闭关锁国的俯瞰，而是着意于民族间文化的平等交流，从而表现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的磊落胸襟。就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文学史的完成，标志我们已超越“拿来主义”的阶段，进入吸收借鉴的化境。

编写外国文学史，最容易先入为主，沿袭既成的论断，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编者往往浅尝辄止，随意取舍，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法国文学史》则不然。编著者不是从现成的结论出发，也不是从主观模式出发，更不带个人的偏爱和好恶，而是全面把握，详尽占有并深入研究第一手材料，详思精审、广纳慎取，在此基础上引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这样去论述作家和作品，就避免了随意性和猎奇性，评述中肯准确，语言简洁形象，既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又言面可信，信而有征。

《法国文学史》的编著者，运用了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摒弃了时时作怪的庸俗社会学，把作家放到他的作品中，把作品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又把文学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分析，去研究，这样脉络清晰，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每个作家、每个流派在文学发展之中，都有其符合客观实际的恰切位置。对待每一个作家的评价，著者

既不忽略作者通过其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又不人为地拔高贬低各自的成就。

这种方法的运用，尤其表现在新近出版的下卷之中。著者从总体上去把握文学现象，尊重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就摆脱了一律以现实主义划线的程式，高屋建瓴，从容纾徐地按照实事求是的方法去评价作家、作品和流派，即使是那些向无定评或难下断语的作家和流派，编著者也能从容无懈、精当准确地给予评价。这样，就保证了这部文学史严谨的科学性。

譬如，以诗歌为主的巴黎公社文学，是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它诞生在革命的战火中，它以其“为革命服务”的鲜明特征，揭开了文学史的崭新一页。本章执笔者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文学的代表、“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鲍狄埃的文学成就，指出了《国际歌》“是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以恢宏的气势、庄严的风格，表达了无产阶级消灭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要求。”与此同时，编著者也看到了巴黎公社文学毕竟是无产阶级文学草创时期的产物，还不是当时文学中的主流，在评价中做到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对于法国象征派诗歌，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家一向评价不高，《欧洲文学史》甚至说它“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在《法国文学史》下卷中，编著者全面分析了法国象征派的前驱、同路人及象征派的主要代表诗人，指出这是一股“文学巨流”，它不仅在“十九世纪末风靡全欧”，而且引发了象征派的戏剧和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对象征派主要代表诗人兰波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继波德莱尔之

后，为现代诗歌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诗歌形式上，他对散文诗的发展贡献尤大。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奉兰波为不祧之祖。直到今天，兰波仍是文学史家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样恳切的结论虽然着墨不多，但须在分析大量的文学现象，把握住文学发展的整个流程之后，才能够作出来。

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流派竞起，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人材辈出，各流派间呈现出一种或承继，或交织，或渗透，或交融的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复杂局面。即使同一个作家，在其文学创造生涯的不同时期，也接受了不同文学流派的影响，其作品自然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这样就很难用一个面定的模式和统一的标准对作家进行分类，因此在分类撰写和评述作家方面难度相当大。然而，编著者并没有避难趋易，就简去繁，而是扎扎实实地研究材料，从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中爬梳剔抉，于其中洞见隐藏在现象下面的本质，给读者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如小说与戏剧两章，经过煞费苦心的反复推敲，然后分类评述。这样的分法固然并非无懈可击，然而由于编写者下了十足认真的功夫，我国读者才得以看见那个时期小说与戏剧繁荣的全貌。编写者精研材料，既把握全局，又抓住作家特点，入乎其内，故下笔准确，出乎其外，故评述精当。再如诗歌一章对象征派诗歌的描述和界定，是近年来对象征派诗人最精确、最明晰的评论。

对于史家的要求，中国历来的德、才、学、识之说。所谓“德”，就是要敢于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投人之所好，不避人之所忌，以客观事实为准绳。在一定时候或某些问题上，这“德”就表现为胆。的确，要公允地评价自然主义作



家和象征派诗人，没有一点勇气和睿智深邃的眼光，那是不行的。参加编写《法国文学史》下卷的几位同志，都学有专长，他们各自所撰写的章节，往往就是他们长期潜心研究的课题。书中处处体现出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至于主编柳鸣九先生，从章节大纲的策划拟定，到全书文稿的修改统一，都事必躬亲，而且下卷40万字中，他本人撰写的就有24万字之多。全书120万字中，由他亲自执笔的文字就超过一半以上。不仅此书的编辑过程是如此，这也是柳氏治学的一贯作风。他在主编《20世纪法国文学丛书》时，每书必作序，每序必有新意，有学术价值。这样的名副其实的主编，在近年的学术丛书的编辑中，是不多见的。

这部文学史运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着眼于法国文学发展的历程和全貌，承认各种文学流派存在的现实及其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给予合理的历史评价，这就打破了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一元论。这是文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现实主义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流派。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现实主义本身也要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更新。

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之后，究竟是出现了断层，还是继续发展，这是我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回避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以前谈到19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学，除了巴黎公社文学这支火炬和少数几个亮点，总给人以一团漆黑的印象，似乎资本主义到了腐朽没落阶段，法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然也是腐朽没落的。自然主义这一流派的遭遇就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成为法国文学中的主要流派，但

它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十分突出的。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书籍中，随处都能见到对自然主义流派的指责，把它说成是庸俗的、虚伪的“伪科学”，“把现实主义庸俗化了”，不仅把它斥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对立面，还把它归入落后的、腐朽的、甚至反动的文学流派。譬如《欧洲文学史》中就断言：“自然主义在当时就起着反动作用。”巴雷斯和洛蒂则属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家。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和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不认真研究有关的原始资料，不考虑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把握作家本身创作的历程，不重视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采取一刀切和以现实主义划线的武断态度，就难免评价失实，甚至抹煞一些重要作家的历史作用。编著者突破了现实主义一元论的樊篱，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全面把握有关材料，溯本穷源，详尽地分析了左拉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创作，然后指出：“左拉的自然主义在其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一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是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这一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廓清了长期笼罩在自然主义头上的迷雾，还自然主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对于左拉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其难度要超过巴尔扎克。在左拉的创作历程中，包容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其作品内容亦包罗万象，但由于著者尊

重历史，严谨求实，把握家族史的全局，注重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因而就明晰地揭示了左拉与巴尔扎克既有承袭、又有发展的因缘关系，发掘出那些过去为人们忽视或无视的价值和内涵，作出了一些很有创见的分析。

编著者正因为理论上有所突破，才能公正地、历史地、科学地评价那些在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在过去其他的外国文学史中往往是被抹煞或被打入另册的。比如对龚古尔兄弟，指出了“作为自然主义的先驱作家，他们的《热曼妮·拉瑟顿》可视自然主义小说的典范，其余作品，属于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向自然主义过渡的范畴。”他们的小说：“为自然主义流派起了开路作用，把法国文学的发展推向前进，其影响也远远超出法国国界。”读之令人心平气和。又如对巴雷斯，编著者并没有袭用陈说，简单地把他归入“为帝国主义服务、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而是经过认真严肃的分析，把作家和作品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从而揭示出巴雷斯的民族主义的思想立场，来自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严酷的社会现实。普法战争中法国遭到惨败，割地赔款，备受凌辱，其于故土沦落的悲愤之情，“应该得到理解。”此种情况，易地皆然。这类入情入理的严正细笔，显示出著者毫厘不爽的史家气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通过艺术的语言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凡是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淘选而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首先是由于其艺术价值。自然，社会主义的文学评论，必须注意作品的思想性。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思想性抬到了不适当的地位，在编写文学史，尤其外国文学史的时候，对于思想性较好的作品，尚能分析一些艺术特点，

而对于思想上没有太多可取的作品，往往一笔带过。持之日久，似乎较多地、详尽地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倒成了一个禁区，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在分析一部作品艺术性的时候，又往往着重典型和细节。其实，典型和细节并不能代表艺术性的全部。须知，文学史不是思想史，也不是文学思想史，一部文学史如果不着重分析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的艺术特点，那就失去了它作为文学史的职责。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除了主流作家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作家，这才形成了文学发展的浩浩洪流。柳氏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尤其是近出的下卷，用了较多的篇幅和笔墨来分析作品和流派的艺术特色，即便对那些非主流作家，对于其作品的艺术性也给予充分的注意和公允的评价，这就使得这部文学史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这是令人欣慰的观念上的更新。如对莫泊桑这位短篇小说大师，编著者也作出了准确而精辟的评价，用语朴实，意旨深远，篇幅小如蠡壳，意蕴大若沧海，显示出编著者驾驭材料，揭示本质上的高度功力。

对于在其他外国文学史中向来不予注意其或一笔抹煞的某些作家，编著者亦用了相当的篇幅进行分析。如对布尔热细微独特的心理分析，对洛蒂的异域图景和海上风光描绘，勒南的科学实证精神，凡尔纳五光十色的浪漫想象，象征派戏剧的相继崛起等均有颇具创见的评述，对丹纳这样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作出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指出丹纳的艺术理论“构成了完整的现实主认创作思想体系，是狄德罗以后现实主义艺术论的最辉煌、最精彩的一次发挥，是对法国写实主义文学经历了几个时代发展到19世纪的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总结。”

《法国文学史》到下卷算是告一段落。但我感到，与其说下卷是终篇，勿宁说是开篇。20世纪的法国文学各流派将百花齐放呈现出九派汇流、波涛汹涌之势。细读《法国文学史》下卷，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文学流派变迁的萌芽，听到文学新潮逼近的脚步，预感到主编者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整体把握。我们期待着他的《法国20世纪文学史》的问世。

注：《法国文学史》下卷，柳鸣九主编，人是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4期）

#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成宝田

—

近几年来，在我国文化战线上，围绕着民族文化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包含着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全盘西化”的一部分。在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的兴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攻势，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必然会有许多新的变化，但是绝不能忽视民族特色。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损失。

在对待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问题上，“五四”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批判地继承，这是唯一正确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正确的主张作了透彻的阐述，他多次强调对待民族传统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同时，他又

指出，对待历史遗产，要给以批判的总结，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与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总是和三个矛盾纠缠在一起，这三矛盾、一是，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二是，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区域性的古典农业文明的矛盾，三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矛盾。由于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所引起的冲突中往往三种矛盾交织，从而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盲目排外的心态和唯洋是崇的心态，不时交替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时期以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中国什么都不行，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这就是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所以深入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但关系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关系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我们的民族尊严，关系到引导人们坚持什么方向乃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现实的历史发展是历史长河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至少有四点积极意义：

第一，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光荣感、振奋民族精

神、提高民族主体意识发扬爱国主义。

第二，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了解、促进思想交流、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祖国的统一进程。

第三，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和健全人民的精神生活、有助于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第四，当代西方家庭危机、人情淡薄、拜金主义盛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路。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二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的选择往往决定着知识群体的走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较多地吸收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结构，儒家哲学中有一个积极的因素，重人生、关心时事、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因此这支队伍的爱国主义思想显得比别的国家更为源远流长和光彩照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困惑、扬弃到弘扬的过程。然而可贵的是这批善于思辩的思想家能在困惑中再生，在痛苦的上下求索中较客观的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善于从客观现实的社会需求出发，以近代意识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分解、扬弃、吸收、创造出具有活力的民族新文化。魏源、林则徐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及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从古香古色的今文经学中汲取营养，继承经世致用的学风，结合对西洋文化的认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变法的理论支柱，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谭嗣同的《仁学》更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学、



道学、明清经世致用的思想精华和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学的合理内核。至于章太炎，则擅长吸收古典、创新国粹，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魂”的铸造扎下了根基。正是由于这一批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扬弃和弘扬，才使繁衍了几千年的中国旧文化在进入近代后不仅能够合理地延续和更新而且成为许多进步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显示了巨大的精神活力。

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邹容、陈天华、秋瑾、为了唤起革命的激情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一旦和近代进步政治斗争相结合就显示出生机，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对中国旧文化传统的扬弃中使中国文化具有近代意义，而且在实践中陶冶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性格。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千多年积累和发展中，确实沉淀出许多糟粕，但总的说来，它仍然是讲究治术。面对现实而不脱离实际的；是理性的，而非神学的；是有条件主张变革的，随历史的发展它完全能够自我更新，自我开放，以适应现实需要。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一接触，不但立即变成了近代爱国思潮的思想基础，而且还有许多成分或因子直接向近代爱国思想发展演化。例如，“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的通权达变的哲学观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的决不休止的进取精神；“舍生而取义”（《孟子》），“杀己以存天下”（《墨子》）的舍己为人的价值取向；“主耳亡国，国耳亡家，公而忘私”（《治安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孟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子安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的高尚情操，它们都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成了近代爱国思想的火种和酵母、激起了爱国思想的层层波澜。所有近代爱国思潮的每一朵浪花中无不拖着一个传统文化的悠长背影，也无不蕴涵着一个传统文化的坚实内核。即使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的主体是“民”，而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重民思想”就成为孙中山十分珍视而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思想遗产，民本思想和重民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所在，孙中山把重民和民本抽出来赋予同近代民权相通的涵意纳入自己民权主义的思想轨道，用以增加自己理论上和民族的历史色彩，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纵向联系。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论维新志士还是革命先驱，不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某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都是从旧的传统思想营垒中挣脱出来、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推动时代变革和时代前进的斗士，但他们又都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旧思潮的激荡中怀着挽救民族的危亡、振兴中华的炽烈爱国热情，从旧传统网罗中冲决而出的知识分子，大都受到了传统儒学的思想影响。他们将社会的严酷现实和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文化三弦合一，传统文化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文化增深了浓烈的时代气息。

###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儒学。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在现代化建设中占重要位置，儒学中有不少东西在

今天看来还是有其一定的社会价值。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要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对社会主义的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要扬弃传统，批判继承，优化选择。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化。

例一：儒家认为人是具有独立意志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可夺的志即独立的意志。坚持独立意志，也就是坚持人格的尊严。儒家从肯定独立人格出发，提出了关于理想人格的构想。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统一。智、仁、勇这是一个全面的人格理想。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儒家人格最精确的表述，这种理想人格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广大人民都起了伟大的激励作用。《易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坚持独立的意志永远前进，具有宽阔的胸怀、宽厚待人、这是人生处世的基本原则，儒家理想人格的理论、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例二：儒学中有不少东西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在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中不仅可能而且应当容纳和吸收传统儒学中那些有益的个人道德修养方法。这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培养新的优秀品德是有积极意义的。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是儒学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因此在悠久的儒学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富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例如，儒学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强调学以致用，提倡因材施教，尊师爱生，都是至今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一些

最基本的教育思想和原则。在教学方法方面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排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学法；《中庸》中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都有值得今人借鉴的地方。而儒学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也正是我们今天社会亟需倡导的风气。可见传统儒学在教育方面有大量的优秀遗产是可能通过改造实现转化为现代教育事业服务的。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化，一是使儒学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文化因素，发掘儒学中富民、立功、廉洁等积极因素，大力促成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工业化与优秀的人文主义相结合。二是使儒学与科学、民主、法制、教育等现代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克服儒学中的封建主义因素。三是中西文化互补，引进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传统儒学，使中国文化在扬弃传统的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化。在这方面日本、新加坡等国一些现代企业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佐证的实例。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证明在新的历史和背景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东亚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之后，自我创新。可能正在形成东西方结合的东亚发展的新模式。

例三：《孟子·滕文公下》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符合真理，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治一乱，交替进行。应用辩证法的规律来说，一治相当于量变，一乱相当于质变。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治世尚文、乱世尚武”。这是对的，今日中国革命已经取胜，进入建设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子，自然应予以重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不能不牵涉到孔子，因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严格地说，中国每个

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孔子思想的烙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仁是指人要相亲相爱；义是指社会要有安定秩序，目前我国对内制定的达到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的计划就属仁的范围，要求安定团结就属义的范畴，对外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和平共处就是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观点的具体运用。特别是“义、信”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植根于民族的传统之中，都是以传统为前提的。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赋予现代化以自己民族的特色，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当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说明，现代化不能由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嫁接和移入，而必须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它也是西方国家中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日本在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比美国更为典型。当今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和民族自信心的缺乏，实质上正是民族本根精神失落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底深厚，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我们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消化和创新结合，批判和继承结合，才能对世界文明作出我们民族的贡献。

（原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谈邓中夏对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的突出贡献

周绍威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所以党从诞生之日起又同时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而分析、制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际步骤。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开始于1922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后的严酷斗争中，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与完善进行了顽强、执著地追求和探索。

邓中夏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问题都能目光如炬，远见卓识，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和党的政策、策略方针有着突出贡献。本文从这二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 (一)

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919年

的“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担任了前后两个时期革命的领导者。然而，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都有一个渐进的、彼消此长的过程。这个现象，从“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另外，从中国共产党本身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在党的“一大”党章反映出来，没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与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当前的革命性质，它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和其它党派发生政治联系。党的“二大”在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对象的基础上制定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和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初步显示了领导能力，而斗争实践，特别是在国民革命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谁是领导者，谁是同盟军，谁是朋友及斗争策略等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其中最突出的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所以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形成，也标志着在无产阶级的影响帮助下旧式的民主革命运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转换与演进。很明显，从辛亥革命以后到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它的政治影响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仍然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其二是领导地

位和领导权却在转移和失落之中。的确，这在当时是个复杂的政治现象。在国民革命期间，对如何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全党在当时缺乏系统的、深刻的理解。原因之一，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有较大的影响。

陈独秀在这时期是代表我党主要负责人。他曾试图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作全面剖析。1923年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阶级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在其中，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及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上，都低估了工人阶级，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这是他的阶级分析的主要弱点，陈独秀说：“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上也很幼稚”，工人“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可以说，他的“二次革命”论的要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60、164页）“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3页）这里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领导力量，显然是错误的。

在这同时，党内也有部分同志片面认为，无产阶级的革



命性、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它“天然的是国民革命的领导着。”当然从历史趋势认定无产阶级属于革命领导地位的必然性，是正确的，但过分强调“天然”，就会起到削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作用。在实际斗争中，这种思想也危害着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这些理论争鸣中，邓中夏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阐述了国民革命中各个阶级的地位、作用和相互的关系。在当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旗帜也更加鲜明。他于1923年12月至次年1月连续发表论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士运动的文章，具体分析他们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中国青年第二期，1923年12月8日）而工人群众，无论在民主革命中，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最勇敢的先锋队”，“最重要的主力军”。（《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九期，1923年12月15日）他针对党内存在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1924年11月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的力量》。在这篇文章中，他详尽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形成发展过程，论证了我们的组织尽管幼稚，但从党诞生到至今短短三个时间里，竟然能组织起近30万工人参加到我们工会中来，这在从来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件可惊的事”。他批驳道：但在自京汉罢工失败后，不仅是一般的同情者，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对于工人阶级力量也开始抱过分的怀疑，就是一件奇怪的现象了。所以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我们的力量》邓中夏文集第101页）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归纳了三点

理由。第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也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第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助手”；第三，“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作国民革命之领袖”。（《中国工人》第二期，1924年11月）这样，邓中夏中当时基本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和前途等问题，为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作出巨大贡献。

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合作的特殊方式。这种合作的形式应该有利于我党去争取和掌握领导权。党应该正确认识和掌握两个阶级领导地位与领导权的交替转换过程。民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能够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接受领导，但其固有的软弱与动摇性又决定了它必然要在统一战线中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当时，受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同志就十分不清醒。在省港罢工过程中，部分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一直抱着消极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在1927年邓中夏在总结广州工人罢工经验时写下《1926年之广州工潮》，在争取革命领导权一节中尖锐指出：“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要建立资本主义，必然仰仗帝国主义之协助，结果与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革命。所以领导权如果被资产阶级抓去，则革命便是宣布死刑。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邓中夏文选》第371页）在省港罢工期间，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党团书记，直接参与和领导了省港罢工。在罢工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陈独秀的特派员

来广州后惊性失措，横加指责，说什么，现在是国民革命时期，一切靠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人应该守本份，尽量和他们合作……。邓中夏实在忍无可忍，痛斥道：“这里明明有几十万工人，罢工明明还在进行，身为总书记的人，却瞪着眼睛对外边说罢工已经停止，这究竟起什么作用！”（《邓小夏传》第184页）他排除右倾干扰，使省港罢工能较顺利进行下去。邓中夏同志始终处于革命的中心，凡是在原则问题上他不调和，不妥协，在当时就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还是在省港罢工期间，广州工会之争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当时广州黄色工会领袖，准备一个阴谋，主张香港、广州分开成立罢委会，阴谋夺取香港罢委会的领导权。当时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意见不一致。邓中夏同志分析说：“这类资本家及其走狗所组织的工会，当然是来捣乱我们工人阶级阵营的，是与我们工人阶级为自己利益所组织的真正工会作对的。……”（邓中夏文集《评广州工会之争》第233页）当时，为了争取和保证党和工人阶级对省港罢工的领导，他主张在罢委会上边，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而其中应按人数为比例，由工人自己选举若干代表，组织伟大的代表工会。次种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关于组织问题，统一问题，立案问题，纠纷问题，以及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与工人阶级自己有关的问题，不要仰赖官厅或法律解决，工人阶级应有自决的精神，正是邓中夏同志的正确建议，使罢工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有了组织保证，省港罢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

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外，邓中夏还阐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如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武装斗争等等，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 (二)

列宁曾说：“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02页）党的“二大”以后，邓中夏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自此以后，他始终处在革命实践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始终把政策和策略问题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策略思想同样突出和丰富。这又是邓中夏思想的一大特点。在实际斗争中，他特别注意总结正反两面经验，反复论证革命政策、策略的重要性。

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但有的地区农民运动在错误策略方针指引下，做纯经济奋斗，所采用的政策方针过于左倾。这样和某些地主结下生冤死仇，使农民运动遭到极大破坏。他总结中指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现状下做农民运动，应该以立下农民团结的基础为第一要义，如果于这个基础有损害时，应该对于对手方之冲突，力求避免，不然，逞一时之气，鼓一时之勇，结果自己的组织，根本断尽，有什么用处呢？”（邓中夏文集第70页）又如在“五四”运动中，由于封建军阀的迫害，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动摇，当时党内外有一种错误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摆脱危机。邓中夏在纵观全局后正确地指出：“……不应该在群众起恐慌之

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方法，想借此以泄愤，或拿来替代现时困难的斗争……。”（《邓中夏文集》第600页）他主张应改变罢工的政策和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这个意见一贯彻，上海工人罢工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掌握政策‘就是’所谓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P760）邓中夏重视政策和策略，就是重视改造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就是重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特点，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可贵的是，邓中夏在实践中，能自觉地拿起这个武器指导实际斗争。在国民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用暗杀方法进行革命。韦德烈士就是一例，用手枪刺杀了军阀洪兆麟，但自己也牺牲了。他疾呼，韦德烈士牺牲精神虽足取，韦德烈士暗杀方法不足取。他站在无产阶级政策、策略高度深刻指出：“……如果提倡暗杀就是引导民众去对付某一个人，不去对付某一个阶级。再则便是引导民众相信了个人狭义的力量，忘记了阶级组织的力量，这不是我们革命政策之自杀吗？”（《邓中夏文集》第206页）

邓中夏自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至1933年9月就义，年仅43岁。然而在他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提出许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思想。这是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组成部分。这份宝贵理论遗产，对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群众工作仍有很大指导作用和教育意义，归纳起来，有2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关系问题。由于邓中夏多次担任领导全国职工运动工作，所以时常遇到这方面问题。邓中夏多次作了深刻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他不赞成一味搞单

纯的经济斗争，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所以每一次实际经济斗争，不能把它看做最终目标去奋斗。他说：“比如资产阶级打不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被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邓中夏文集》第557页）所以工人阶级斗争，不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二者统一起来，目的是工人阶级完全解放，这样斗争就是有意义的。但同时，他又坚决不赞成忽视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的空喊政治观点的作法，例如当时中国工人生活，苦难到了极点，因此他要求“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邓中夏文集》第557页）他忠告同志们说：决不能“徒务清高之虚名，而弃置切身之实利”，“群众如果没有经济的利益作中心，要他们团结与组织，比在石田上播种要他生长出嘉苗良穗尤为难能。所以我们不论做何种的民众运动，对于经济的利益这一层，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可忘记的。”（《邓中夏文集》第71页）由于他能够处理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所以在复杂实践中都能不断取得胜利。这个经验，在今天的群众工作中也是十分宝贵的，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其次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1374页）邓中夏在实践基础上特别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如他在总结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取经验时，就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他总结的一条是“事先领得工资。”25年2月1日，资本家开除纱厂工人，许多工人情绪激昂，奔走相告，群谋对付，迫不及待即日发起要工。工人领袖极力劝告“莫乱动”，劝告

“领得工资再举”。邓中夏总结指出：“这样一个长的时间和大的数量之罢工，假使当日不领得此项可以支持半个月生活的工资，那么不到一星期，工人便要生活恐慌而归于失败了”。（《邓中夏文集》第109页）另一条是“罢工口号要适当”。邓中夏特别注意罢工的口号，认为口号不在于调子多高，不搞公式化。而是要将工人身受的隐痛描写出来，并要得到社会同情。工人在罢工中自己打出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中国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工人抱工人的义气”。邓中夏评价说：“这个带有民族性的口号都是有相当的力量的。”“又都是工人自己的俗语所构成，自己的意识所凝聚，自然一听得就风靡一时勇气百倍了。”（《邓中夏文集》第110~111页）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必须掌握各种形式和手段，因为“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0页）邓中夏的策略思想也是贯彻了这一重要原则。对待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不去斗争是政治上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但以此为由，就想不和国民党发生关系，这在当时也是错误的倾向。邓中夏分析说：“国民党党员包含有各阶级的成份，自然包含有各阶级的意识，有些党员代表资产阶级而右倾或反动这是不足为怪的。”又说：“……只有加入国民党内去占多数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左派联盟，以打击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右派势力，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邓中夏文集》第370页）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邓中夏是运用的十分熟练的，这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而不是本本上的马列主义。今天研究邓中夏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仍有十分有益的

启迪作用。

邓中夏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理论遗产要深入学习与探讨。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邓中夏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党的政策、策略思想，对于今天深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因此，探讨，研究，宣传早期共产党人的宝贵思想理论遗产，为今天现实政治任务服务，是我们党史理论工作者当前重要工作之一。这一点想必是大家的共识。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 股份制的历史和现实

王希汉

国家所有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在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推行股份制又是国家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了解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推行股份制的现实性，就有必要对股份制作历史的考察。列宁曾经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 一、股份制的历史

股份制又称股份经济，它是通过发行股票而集资经营的经济形式。

股份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早在古罗马的社会中，由于当时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曾出现过包税商组织的股份委托公司。虽然这种组织与现代股份公司相差甚远，但确有类似之处，所以经济史学家认为，这是股份经济的前兆。15世纪到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在欧洲的某些城市里，股份制得到了一定程序的发展，出现了超地区的城市商业组织，如康枚达商业组织，它的特点是：一部分成员为执行业务者，他们按合伙的原则，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责任；另一部分成员为不执行业务者，他们对公司债务仅负有限责任。当时的欧洲还出现了“独占公司”，如1577年成立的“西班牙公司”、1581年成立的“土耳其公司”、1600年由伊丽莎白一世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这种公司是通过股份集资的方式成立的。它的特点是：个人资本作为股份为个人所有，投资者按股本结算利润。超地区商业组织和“独占公司”的发展，为股份公司的产生作好了准备。经济史学家认为，这是股份公司产生的准备阶段。17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种独立的固定的集资组织形式，适应这种需要，1657年英国出现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公司组织。在英国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第一次确认了公司是法人代表。当时股本变为长期投资，股息定期发放，股票市场出现。于是传统的股份形式过渡到了现代的股份公司。经济史学家认为，股份公司正式产生。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个别资本家的资本和少数资本家的联合资本为数有限，不能满足兴办规模巨大的企业的需要，这就使个别资本的有限性和创办大企业所需要的巨额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就用发行股票的办法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成立股份公司。所以19世纪后期，股份经济迅速发展，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股份经济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形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在垄断形成后，

股份公司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栋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股份公司进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基本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诞生后，股份经济并没有从这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消失，相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还利用过股份经济的形式发展本国经济。经济史学家认为，这是股份经济的发展阶段。

股份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股份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它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存在过。股份经济没有确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 二、股份制的“利用——废止——再利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迅速废止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推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在工业、贸易、金融中，曾采用过股份经济的形式，创办过与外商合营的工商业股份公司、运输股份公司和其他股份公司，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东欧的剧变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利用过股份经济的形式。我国解放初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城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推行的也是股份经济。可惜，股份经济的形式后来都废止了。为什么？第一，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利用股份经济形式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第二，股份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认为股份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第三，马克思认为，股份经济是在资本私有基础上对个人私有

制的扬弃，是由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本身仍然是私有制经济存在的形式。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是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了，如果国家再搞股份制就是倒退。人们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股份经济被取消了，然而经济并没有高度发展，相反，经济建设困难重重。路在何方？股份制又成为人们认真思考的对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东欧的剧变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又恢复了股份经济的形式。这种形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允许本国企业发行股票，组建股份公司；二是采取有限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联合举办合营企业。1982年，前罗马尼亚《关于国营经济单位劳动群众入股参加筹集经济发展资金的法律草案》规定：国营企业可以发行股票，也可以转让股票。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出现了股份经济，各地相继试办了一些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为什么得到了恢复利用呢？第一，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也逃不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不能保证他们的预言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要敢于摒弃已被实践证明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结论。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怎样走，所有制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但也要借鉴外国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经验，敢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尝试资本主义的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第二，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股份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内容不同。股份经济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联合，资本主义经济是指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利

用它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制度。其次，产生的条件不同。股份经济产生于集资经营、联合生产的要求。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条件是：大批失掉生产资料的又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和开办资本主义企业所需要的大量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是依靠暴力准备起来的。再次，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不同。股份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是由它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三，共产党人认识到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和社会主义股份公司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公司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由于私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少数垄断资本家控制了股份公司的股票，因而股份公司具有私有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公司取得了社会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形式，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对资本家个人所有权的否定，它与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相对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股份公司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是归劳动者和劳动者集体所有，经营者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股份公司的劳动成果，除了补偿生产中的各种消费外，其余的部分一是按国家规定的税种、税率上缴给国家，一是作为企业的积累基金和福利基金，一是企业内部按劳分配，一是以股息和红利形式支付给股东。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股份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第四，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股份公司的股东并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和股东是两个不同范畴。股东是指向股份公司入股的投资着；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它是凭借资本所有权对雇佣劳动者进行剥削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所有者。具有一定数量界限的资本是股东变为资本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东并不都是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公司

里的私人股东，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持有的股金远远达不到转化为资本的数量界限。即使在个别情况下，存在股金转化为资本、股东变为资本家的可能，只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手段，这种消极的现象是可以防止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股东并不能成为资本家。第五，社会主义国家的股息收入并不是剥削。因为社会主义股息和资本主义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股息是凭借资本所有权而取得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职能资本家为取得入股资金并把它变为职能资本，不得不从产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采取股息和红利形式付给股票持有者。资本主义股息是一种剥削收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股息是对推迟消费的补偿，体现了资金剩余者和资金需要者的互助合作关系。第六，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是前进还是倒退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凡是按照生产力的要求，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改变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前进，把本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改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倒退。

历史经验证明：股份制的废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没有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而顺利发展，而股份制的恢复利用，一开始就显示出引人注目的生命力。这不能不使共产党人得出这样一条结论：股份制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好形式。

### 三、对国家所有制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我国将成为现实

对国家所有制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必要的。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一直把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并且是最高最好的形式。东欧的剧变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国家所有制不一定是全民所有制最高最好的形式。

南斯拉夫早在 1950 年开始进行改革时就宣布摒弃国家所有制，实行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认为，国家所有制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因为生产资料由国家控制，直接生产者不过是国家的雇佣者，因而导致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管理权相分离。而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集体和个人，而属于整个社会，它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直接经营管理，并由劳动者直接支配劳动成果，这样就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前罗马尼亚把国家所有制改为“全民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其目的是想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家所有制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全民所有制不一定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家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全民所有制的最高最好的形式。因为国家所有制也存在着许多弊端。第一，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企业投资往往成为一种行政性手段，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对投资的效益没有经济责任。职工与所有制实际上无关，自然也不会关心资产的效益。一方面都争着投资，另一方面对资产损益又无人关心，这是国家所有制一个突出的弱点。第二，国家所有制产权模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任何人也不能具体占有、使用生产资料，没有一个真正为财产增殖负责的权利和责任的主体；另一方面，国家所有制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而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它很难承担经济运行主体的任务。第三，国家所有制企业，一般都存在着“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因而工作效益差，经济效益低，甚至出现严重亏损的现象。股份制就是解决这些

弊端的最好选择。因为：第一，实行股份制企业，国家、企业、职工共同投资入股，三者都是企业的股东，企业目前的经营和长远发展都与三者收入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经济效益、企业的前途会更加关心。第二，股份制是产权明晰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所谓产权明晰化的真正含义是：确定能够对财产增殖负责的主体。实行股份制，投资的主体由国家换位给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具有法人的地位，对资产有独立经营权，它成了对财产的占有、使用的真正负责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股份公司对国家按股分红，依法交税，实现了两权分离，解决了企业改革的最大的难题。第三，股份公司如果盈利，国家、企业、职工三者都受益；如果亏损，三者都要受损失。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大锅饭”、“铁饭碗”的根源。第四，在股份公司里，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并不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公司财产所有权也不是掌握在股东手中。股东一旦认购了股票，就立即放弃了对这部分资金所有权，而取得股权，所有者不能凭借股权对资产进行支配和控制。在股份公司中，主要股份为公有，所以公有制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股份制既能保持全民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又可以避免国家所有制的各种弊端。用股份制改造国家所有制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改造国家所有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公有制，而是为了取消一元化的国家所有制，代之以二元化或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二是，改造国家所有制，实行股份制，并不是废除国家所有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实行股份制。一般地说，小型国营企业不实行国家所有制，也不实行股份制，可以拍卖，转移产权。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规模巨大的骨干企业，仍然采用国家所有制。



对大中型国营企业适宜推行股份制。但要经过试点，不宜盲目推广。

对国家所有制进行股份制改造又是可能的。我国大体上具备了改造的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禁区已被打开，思想认识端正了。经济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法制逐步健全，人们的股票投资和股息收入将有保证。这就为我国发展股份经济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了更多的物力财力，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加，1986年底，居民储蓄存款达2238亿元。随着经济的好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一有资金，二有市场，这就为我国发展股份经济提供了物质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股份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股份制的技术运用上和法律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欧的剧变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先于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就为我国发展股份经济提供了社会条件。当然，我国发展股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从事股份公司的专业人员缺乏，股份公司法还没有制定，股票市场还没形成，股份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还没有普及，等等。但我们确信，这些困难是会逐步克服的。

对国家所有制进行股份制改造又是合理合法的。我国宪法关于生产资料的法定形式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既然宪法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当然也会允许股份制的存在。因为股份经济就其所有制形式来说，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所有者投资入股而形成的一种联合所有制形式。股份制是多种所有制中的一种所有制，自然属于合法之列。历史唯物主义告

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说，股份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式样性，股份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试点经验表明，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股份经济在我国的兴起是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的。

发展一种经济形式并不是任意的选择，它必须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国家所有制存在的问题。国家所有制的弊端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股份制，条件的初步具备使我国有可能实行股份制，实行股份制又是合法合理的，股份制在我国变成现实不会遥远了。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 鲁尔占领——二十年代法国 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

朱立群

1923年1月11日法国出兵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促成了二十年代法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变，而且直接导致了道威斯计划的出笼，并进而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分析法国出兵鲁尔的原因入手，着重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困境，以及鲁尔占领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和深远影响。

法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到四年就武装出兵鲁尔，直接起因是德国赔款问题。而赔款之所以成为问题，则因为确立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凡尔赛条约》只规定了德国应该偿付战争损失的道义原则，而未确定德国所应赔款的数额，更没有确定赔款的支付原则。因此，确定德国赔款总额、支付方法、分配比例，以及如何迫使并非情愿赔款的德国如期如数地支付赔款，就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热点问题。

法国在历次战胜国或与战败国的会议上，是力主德国多

赔款的强硬派，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赔款是经济上重建法国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其它欧洲国家。法国东北工业区被夷为平地，田原荒芜，八十多万幢房屋遭到破坏，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运河、公路不能通行，物质损失高达 350 亿马克（1）。战后法国不仅要为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地区耗费巨资，还要支付数量可观的退伍军人年金和伤残人员抚恤金，每年仅这两项开支就占法国政府全年开支的一半（2）。如此巨大的支出，加重了法国政府的经济负担，它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家短期债券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则指望外部的援助。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很快做出了原则上停止对前盟国贷款的决定（3）。这样，法国政府只好把外部援助的希望寄托在德国赔款上，赔款成了法国的“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战后初期法国先后两任总理白里安和普恩加莱都曾在议会表示，“如果一个国家遭受了令人发指的侵略，它的十个省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在胜利之后，它却被迫自己出钱在四年战争给其国土造成的废墟上重建家园，这是极其可耻的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要求的仅仅是应得的款项”（4）。如果德国拒不承担赔款的义务，“我们就狠狠地抓住他们的脖领子”（5）。

其次，除经济重建的需要外，赔款还与法国的政治安全利益密切相联。一战后法国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号强国，但奇怪的是法国并不感到安全。法国政界人士普遍认为，法国从凡尔赛会议上获取的优越地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法国众议院议员保罗一蓬固早在战后初期就指出，“危险的年代主要不是眼前，而是将要来临的日子”（6）。这种悲观的不安情绪，

主要来自于对德国潜在力量和潜在威胁的恐惧。1920年6月，法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凡尔赛的德国，无疑是个战败的德国，但她同时又是个保持完整、未受损伤、甚至加强了团结的德国。今天德国虽然是软弱的，也许明天她就会重新变得可怕”（7）。德国的工业潜力和人口优势都超过法国，她的经济会迅速恢复，并在“20年到50年里比法国更强大”（8）。再加上德国极富侵略性，又不满足于凡尔赛条约的屈辱安排，德国的报复是极其可能的。法国《东西两半球》杂志编辑鲍特鲁斯在1914年、1916年、1917年曾先后发表过几篇有影响的文章，阐述德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侵略性。他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说：德国有可能重新使人类屈服，认定这一危险的标准并不是她在战后将重获的可见的力量，而是其持续不断地要统治、扩张、压迫的渴望”（9）。他的这一观点，给当时正在遭受德国欺凌的法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国害怕自己将成为下一次战争的受害者，因而从订立凡尔赛条约起就奋起为追求安全而努力。在凡尔赛和会上，法国先是提出把法德边界设在莱茵河，由于英、美反对，只好接受和会提出的莱茵河左岸和右岸五十公里内实行非军事化的安排。之后法国又力争与其它国家结盟，分别和英、美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由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整个凡尔赛和约，做为和约附约的法美共同防御条约也就没有生效，而因为法美和法英条约确定有连带关系，法英条约也随之失效。英美对法国安全保障条约的失效给法国造成了极大影响，使她更感到不安全，从而促使法国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德国的优势。而保证优势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严格执行使德

国处于屈辱地位的凡尔赛条约。普恩加莱曾一再说过，凡尔赛条约“是我们的法律”，“我们必须尊重它，并使所有国家都尊重它”（10）。维护凡尔赛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法国就能在“合法”的旗号下，迫使德国尊重现状，并对德国的违约行为进行制裁。而强制德国赔款，用赔款重负将德国压得喘不过气来，既是法国保持优势的重要条件，也是其能否维持凡尔赛体系不变的一块试金石。

因此，赔款问题既与法国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又是其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它对法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双重意义。

然而，法国的如意算盘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不仅德国以种种手段规避赔款，法国的昔日盟国——英国也从中掣肘，多方阻挠。更加上美国催还战债，就使赔款问题复杂化了。

德国顽强地反对凡尔赛条约所有条款，对于要她支付巨额赔款更是从上到下一片抗议之声。德国未能如期提出令协约国满意的赔款计划，以及未交付规定的赔款现金，造成1921年3月协约国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局面。1921年4月底，巴黎赔款委员会提出德国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并紧接着提出了赔款支付计划。按此规定，德国每年应支付盟国20亿金马克，再加上相当于德国出口总额26%的不定年金，德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要用于支付赔款（11）。德国政府虽然被迫接受了这个计划，但在支付了第一年所应支付的10亿金马克现金之后，便开始利用通货膨胀做为反对赔款的主要武器。德国工业和金融巨头在政府的默许下，抵制有关缴付赔款的各项措施。他们拒绝缴税，让资金“逃往”国外，使政府不能再从银行得到贷款，从而给国家预算造成经常性

赤字。政府则通过帝国银行发行的没有任何信用保证的纸币进行弥补。这样一来，德国既可使协约国无法监察其预算，又可借口财政破产，没有支付能力，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延期赔款要求。1922年7月，德国维尔特政府通知赔款委员会，它无力继续支付赔款，请求将支付期限延至1924年底，这实际上是要求完全修改伦敦赔款支付计划。

法国对德国的建议极为愤怒，认为是德国政府故意不采取措施改善财政金融，而英国对德国则极表同情。在战后历次赔款问题会议上，英法总是矛盾重重，这种不和主要是因为英国在战后欧洲的利益与法国相去甚远。英国是庞大的殖民帝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其全球利益，而不象法国基本上局限于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视安全问题为相对次要的问题，正如战后英国首任驻德国大使达伯农勋爵所说，德国已被解除了武装，“英国对德国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产生的恐惧再也不存在了”（12）。英国内阁1919年8月制定的“十年规划”，即是把军事计划和军事预算建立在十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的假定之上（13）。在欧洲大陆，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力量均势，反对任何一国取得优势，这与法国追求的目标恰恰对立。在英国看来，和约已经签订，安全已有保障，因而经济和贸易的繁荣才是英国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鲍德温首相和赫伯特·阿斯奎斯在1923年分别说过的两段话很有代表性。鲍德温说：“不列颠帝国在外国的利益首先是经济的和商业的。当我们谈到和平是英国最大的利益时，我们指的是英国的商业和贸易。这对我国人民的的生活是重要的，而它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能更为兴旺”（14）。阿斯奎斯就赔款问题建议道：“你采取或提议的任何做法必须属于

这样一种做法，即不论你要求什么，或不论你施加压力寻求什么，都将不会破坏、甚至损伤德国的经济生活，并因此而对国际贸易的整个结构产生不利的影晌”（15）。英国置经济利益于首位，并把自己的经济贸易繁荣寄托在德国的复兴上，因此就要求在赔款问题上对德国做出让步，减少赔款数额，反对强制制裁德国。正是由于上述考虑，英国把德国延期支付赔款的要求看做是合情合理的，是解决德国通货膨胀，复兴德国经济，进而繁荣欧洲的前提条件。

法国对英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普恩加莱抱怨说，英国也不想一想将来，“她不考虑真正可怕的危险并非仅仅威胁法国和比利时，也会威胁英国和整个欧洲：德国会突然成为经济上的霸主，而这将会使她得到她曾希望通过战争赢得的一切。接受英国政府的看法，而又不损害我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16）。就在英、法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催还战债如雪上加霜，对法国形成又一新的压力。

1922年2月，美国国会设立了一个“世界大战外债委员会”，其职责就是追还战争期间欧洲各国向美国所借的103亿美元的借款。英法是最大的债务国，同时也是债权国，但英、法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债权是针对沙皇俄国的（17）。由于新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笔债务成了无法追回的“死债”，因此造成英、法的心理不平衡。法国从凡尔赛和会以来就一直主张把偿还美国战债与德国赔款联系起来。要么美国减免战债，法国同意减少德国赔款；要么德国如数赔款，法国如数偿还战债。也就是说，偿还战债的前提是法国能如数得到德国的赔款。面对美国重提战债，法国政府在5月份再次重申债务与赔款相联系的立场（18）。1922年8月1日英国政府



发表“贝尔福声明”，表示英国将免除其对盟国和德国的所有债权，但前提条件是美国也放弃债权。法国对英国的建议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个看似宽容的建议会破坏战争债务国的团结，并间接迫使法国在得不到任何赔款保证的情况下考虑偿还战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感到自己被英国和美国抛弃了，它们在赔款问题上要求法国接受德国没有支付能力的说法，而在战债问题上，却不肯理解法国的支付能力！因此，法国决定不做出任何让步。1922年下半年，战债与赔款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之链。美国拒绝免除欧洲战债，英国因此拒绝免除其对法国的债权，法国拒绝减轻德国的负担，赔款问题更陷入僵局。

1922年8月伦敦会议上，普恩加莱提出新的“产品抵押”政策。鉴于德国通货膨胀严重，马克一钱不值，法国要求把德国的鲁尔变成“赔款省”。这一政策遭到英国的激烈反对。8月及年底的两次伦敦会议和1924年初的巴黎会议因此陷入一片争吵之中，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议会和军方不断向普恩加莱总理施加压力，要求出兵鲁尔。普恩加莱感到，不采取行动，“将没有任何结果，只能损害他作为强硬人物的名声”（19）。他决定，德国一旦有违约行动，法国就立即以此为借口占领鲁尔。

机会终于来了，12月26日赔款委员会确认德国没有在9月30日如期偿付电报电线杆和木材的实物赔款。1923年1月11日，在英国的强烈反对中，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以保护“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为名，侵入德国鲁尔工业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出兵鲁尔，是法国渴望得到德国赔

款，而赔款问题又陷入僵局后，所采取的以武力向德国摊牌的极端措施。也是法国对英、美盟国的意志较量，更是大国政治、经济利益激烈冲突的表现。

## 二

但是，占领鲁尔后法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把鲁尔变成赔款抵押品这一举措首先遭到了德国的“消极抵抗”，也使国际社会更加同情德国，孤立法国，英美两国更团结一致伺机削弱其影响。而法国1923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其陷入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境地，更使法国无法顺利实施其独断专行的强硬路线。法国为摆脱经济困境和安全困境铤而走险，又不得不因金融困境和外交困境而抽身退步，并顺从地接受道威斯计划的安排，而道威斯计划正是战后二十年代对凡尔赛条约的最大修正。

鲁尔被占领后，德国人对法国的憎恨心理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德国政府下令鲁尔地区的工人和公务员进行“消极抵抗”。德国马克在惊人的通货膨胀中变成了废纸。“消极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9月底，也就是说，到10月份法国才真正开始使鲁尔成为“抵押品”。鲁尔各工业部门同意以煤炭等各种工业产品偿付赔款，但这一过程仅仅持续了二个月。到11月底，普恩加莱就同意把赔款问题交由各国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交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去解决，使用扣押手段保证赔款的偿付实际上已不再可能。

普恩加莱从1922年8月提出“产品抵押”政策，1923年1月更以武力占领鲁尔，可是为什么在德国解除“消极抵抗”命令，法国似乎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又转而放弃“产品抵押”政策，并同意由国际社会去解决赔款问题呢？深刻的原

因在于法国国内经济危机和英美的所做所为上。

如前所述，战后法国因重建经济的需要对德国赔款寄予厚望，然而这位“解围之神”却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了压迫德国支付赔款，保持法国外交行动的独立性，法国在重建方面没有更多地依赖英国资金的支持，而是靠发行内债来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到1923年底，法国在重建上就已花费了11.4亿英镑，再加上给退伍和伤残人员支付的9.5亿英镑的抚恤年金，总计为20.9亿英镑<sup>(20)</sup>。这样巨大的花费，使法国财政入不敷出，支出两倍于收入，预算赤字甚至超过了战争期间的水平<sup>(21)</sup>。到1922年底，法国大约有766亿法郎的短期债券即将到期，对法国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战后法国与德国相反，在金融方面实行紧缩通货政策，追求使法郎的币值恢复到战前的较高水平，而不是根据国民经济的现状重新确定法郎币值，并使之在反映现实的水平上保持稳定。美国银行家多次建议法国政府不要追求高币值，指出“使法郎重回黄金平价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能够实现，法国也不应该这样做”<sup>(23)</sup>。一方面是财政支出膨胀，一方面又是金融紧缩，这种矛盾的双重政策，就象硬要装成好人的跛子难以持久。法国经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法国财政部的有识之士早在1922年11月就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建议立即大幅度减少政府支出，平衡预算。这意味着削减军事开支，放慢重建的速度。1923年1月，也即出兵鲁尔的同时，法国财政部长要求国会全面增税20% (double decime)。如果这一措施得以实行，将消除法国一年的预算赤字。但是，国会和报界对于增税一片反对。普恩加

莱也认为，在增税问题上与国会发生冲突可能会影响公众支持出兵鲁尔。于是，增加税收这一重要措施就搁浅了。

其实，危机的征兆从出兵鲁尔就显露出来了。法郎的外汇比价缓慢下跌，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开始上升。老百姓受报界影响，将其归咎于农业部的政策，农业部长亨利·舍龙因而被人们称为“贵舍龙”(Chéron-la-vie-chère)。到9月，德国消极抵抗结束，形势可望好转，法郎却大幅下跌，从15.92法郎兑换一美元跌到1923年底的19.61法郎兑一美元。整个1923年，法郎贬值30.94%，生活费用上涨15%<sup>(24)</sup>。法郎贬值，物价上涨，引起人民不满，也使法国政府难以继续靠向人民借债度日，处境越来越困难。而鲁尔占领到10月份才使“产品抵押”成为可能，且持续短暂，所得到的实物赔偿在支付占领军费用之后所剩无几<sup>(25)</sup>，法国不得不减少占领军人数，鲁尔占领实际上变成了法国的负担。

法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使她在鲁尔占领即将使德国屈服之际失去了后劲。普恩加莱到这时才认识到增税的重要性，全面增税20%的计划再一次被提上议程。普恩加莱警告国会说，如果政府的税收措施不被完全采纳，将是“国家的灾难”。“如果我们希望保持一种真正独立的政策，首先需要再一次保证我们的财政地位不受威胁”，否则，“国家就要改弦易辙从鲁尔撤军”。“船已有漏洞，要及时补上，耽误不得”<sup>(26)</sup>。但是，迟至1924年2月，法国参议院仍没有通过政府提出的增税计划。而这时即使通过了，也已经太晚了。

就在2月，新一轮法郎贬值又开始了。这次是急剧下跌，2月17日，法郎兑英镑的比价还是97.63:1，到3月7日已跌到113.05:1，3月8日更在一天之内下跌10%，达到

123:1 的最低水平。现在，只有国际资本才能拯救法国货币了。一方是资本雄厚的美英银行家，一方面是在痛苦中挣扎的法国，鹿死谁手已初见分晓，在外交政策上法国已经没有了独立自主的本钱。

法国出兵鲁尔后，英国就开始蕴育强烈的反法情绪。英法关系本来矛盾重重，出兵鲁尔更加深了英国对法国的敌视。但是，战后英国保持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对法国采取强制干涉手段。因而，英国一面宣称“善意的中立”(benevolent neutrality)，一面等待时机施加影响。法国财政金融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英国是觉察到的，而且外交部早已请财政部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报告，并准备了各种施加压力的措施(27)。英国财政大臣私下里高兴地对德国人说：“法郎是我们最好的助手”，“它是英国人最终也是德国人手中屋有的对付普恩加莱的最好武器”(28)。英国财政部提出的趁机迫使法国就范的措施，包括没收战争期间法兰西银行做为战债抵押存在英国的黄金；低价出售英国人持有的法国债券；对法国大宗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等等。这些措施如果真正实施，将推波助澜，使法国立即陷于混乱。英国金融审计官内姆耶甚至认为，根本用不着上述非常手段，只要英国提出她将以“非常宽容的条款”重新做出战债安排，以换取其债务国不再使用强制手段对付德国，就能使法国就范。法国所欠英国战债为一年期的财政债券，总数为 6.12 亿英镑。内姆耶提出利用债务安排施加影响，也就是在展延财政债券上做文章。1923 年 9 月，英国官员就曾婉转地向法国总理暗示，如果两国的分歧不能解决，英国政府感到难以继续使 6.12 亿的债券延期。1924 年 1 月初，法国社会党人托马斯代表普恩加莱与刚刚上台的英

首相麦克唐纳举行非正式会谈时，麦克唐纳露骨地威胁说：“如果英国政府不再展延法国财政债券的偿还期限，法郎就会贬到 250（意指 250 法郎兑一英镑），难道不会吗？”（29）

美国当然也不愿放弃这一迫使法国就范的大好机会。法国在偿还战债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早已惹恼了美国人。1923 年底，美国国会不失时机地又掀起了要求法国偿债的高潮。法国驻美大使在向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柯立芝总统及国务卿已重申不会“立即敲我们的门，纠缠着我们偿债”，但是法国在华盛顿最好的朋友都认为我们应做出某种姿态来平息美国人的愤怒（30）。

到 1924 年 4 月，随着法国财政金融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处境更加困难，英美对法国施加压力的目标已不再是鲁尔问题，而是要法国接受新提出的道威斯计划，因为如果法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鲁尔撤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技术问题而已。3 月份法郎跌至谷底，以摩根银行为首的华尔街财团给法国贷款 1 亿美元，以稳定法郎，制止疯狂的国际投机行为。这笔期限为六个月的贷款，还远远不能解决法国的困难，法国不仅需要 9 月到期的这笔贷款转变成长期贷款，而且在以后两年之内还需要 1 亿美元的贷款（31）。7 月到 8 月，谈判道威斯计划的伦敦会议就要召开。在这个各国需要凭借实力讨价还价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法国却要依靠外国资本维持其金融秩序，到九月份美国国务院能否授权摩根银行延长贷款偿还期限并继续提供新的贷款（32），就要看法国是否接受道威斯计划，改变外交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并在赔款问题和制裁德国违约行为问题，以及从鲁尔撤军的时间安排上能否与国际社会合作，也就是接受美英的安排了。

毫无疑问，法国只有接受道威斯计划。赔款又一次减少了，原由法国领导的赔款委员会改由另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移交委员会代替，法国再也不能擅自判定德国违约而对其实行制裁，法比军队必须在一年以后全部撤出鲁尔。在伦敦会议上，法国没有顶住任何压力，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难怪参加伦敦谈判的法国总理赫里歇在他下台一年以后曾表示：“法国的外债限制了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行动。有时人们确实怀疑法国是否能保持她的独立。昨天法国还到处拥有债权，今天就变成了一个经常性的债务国。而你知道一个债务国在对待其它国家上是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的”（33）。

### 三

1924年6月1日，普恩加莱内阁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倒台。法国人民既压倦使用武力，也反对全面增加税收，使普恩加莱的鲁尔占领即缺乏国力基础，又没有人民的支持。普恩加莱在竞选失败后仍然坚信他的对外政策没有错，错在他对国内经济关注太少，错在“法国人民太疲倦以至于不能追随他”（34）。然而不管他如何辩解，鲁尔冒险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对德强硬政策的破产。从此以后，法国转而实行对德和解政策，类似出兵鲁尔的行动，即使在30年代形势严峻，德国一再挑战的情况下也再未出现。

法、英、德在赔款问题上的较量，实际上是大国在战后竞争加剧，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为各自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激烈争夺。鲁尔占领，即是这种激烈争夺的表现。然而，战后法国既没有经济优势，又因举措失当而失去了政治优势，从而注定了在这场争夺中既难以同英国较量，也难以使德国屈服。

经济问题确是法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法国正是从自身力量的限度中，认识到了外国资本的重要性。没有英美资本，法国很难从衰退中恢复经济，也很难从金融危机中拯救法郎。由此进一步使法国认识到了盟国的重要性。在欧洲大陆上，没有英国的合作，法国追求安全的外交政策将难以实现。过去追求的优势变成了一种幻想，号称欧洲大陆一流强国的法国，不过是欧洲势力真空中的一种盲目自信。一旦法国靠着这种自信试图独断专行，她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凡尔赛条约不再是神圣的了，法国的所谓优势也就不复存在。法国安全的维护更是要靠英国的帮助。从此以后，法国在对外政策上对英国的依赖日益加深，尽管法国曾试图从美国寻求支持，并借助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力量来增加其与英国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均未成功。三十年代法国完全追随英国绥靖德国的危险政策，追根溯源即在二十年代发生的这种变化中。

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没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确立良好的起点，因而欧洲各国虽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持久稳定的和平。而法国在战后抱住凡尔赛条约不放，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怀恨在心的敌人，也没有赢得一个真正的朋友。虽有小协约国因利益相关站在法国一边，但其力量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法国外交政策正因为此而缺少必要的选择和回旋余地。二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法国要么铤而走险，要么一味求和，无论是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其外交政策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由此可见，和平与稳定，不仅需要力量平衡，还需要利益的平衡。最大限度追求一己私利，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法国占领鲁尔留下的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乔丹《大不列颠、法国与德国问题：1918—1939年》(W. M. Jordan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19—1939*) 伦敦 1943年版，第116页。

(2) 同前书，第112页。

(3) 勒努万《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二十世纪的危机，1924—1929》(Pierre Renouvi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3 *Les Crise Du XX Siècle De 1924 à 1929* 巴黎 1957年版，第234页。

(4) 1922年1月19日普恩加莱总理在法国议会发表的演说，转引自C·维戈兹基等编著《外交史》第三卷上册第47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5) 1921年3月16日白里安总理在法国参议院的演说，转引自梅尔《重建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Charles S·Maier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Stabilizat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in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40页。

(6) (7) 沃尔夫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和法国——凡尔赛之后和平战略的冲突》(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 纽约1940年版第12页、第33页。

(8) 前引勒努万书，第236页。

(9) 施特普斯1917年6月1日发表在《东西两半球》杂志上的文章，转引自前引乔丹书，第7页。

(10) 舒克《法国在欧洲优势的终结——1924年金瓯危机与接受道威斯计划》(Stephen A·Schu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Chapel Hill, 1976年版第196页。

(11) 关于赔款安排，见韦尔——莱那尔《德国赔款与法国》(Etienne Weill——Raynal *Les Réparations Allemandes et La France*) 巴黎1947年版，第三卷；伯格曼《赔款的历史》(Carl Bergmann *The History of Reparations*) 伦敦1927年版，第3—26页；前引梅尔书，第223页—249页；前引舒克书，第15页。

(12) 前引沃尔夫斯书，第243页。

(13) 齐世荣《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4) 保罗·肯尼迪《外交背后的现实》(Paul Kennedy《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伦敦1981年版,第229页。

(15) 前引沃尔斯书,第224页。

(16) 前引乔丹书,第130页。

(17) (19) 前引舒克书,第9页、第24页。

(18) 内尔《法国外交政策1914—1945年》(J·Néré《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from 1914 to 1945》) 伦敦1957年版,第49页。

(20) 前引乔丹书,第112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前引舒克书,第38、40、37、53、230、86、98—103、103、100、158、150、158、231页。

(32) 因战债问题,美国务院规定对债务国贷款要报经国务院批准。

(原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

# 大学生理想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初步研究

朱 文 彬

大学阶段，是理想形成的关键时期。研究青年大学生理想的特点及影响其形成过程的心理因素，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采用调查、谈话、问卷和个人总结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外语师范学院英、法、德、日、西、俄六个系的 83 级和 84 级的本科学生，以及英语 83 级大专班的学生共 143 名为研究对象，对青年大学生理想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其结果如下：

## 一、青年大学生理想的特点

表 1 说明，143 名受试的理想大致可分为五类：①不安于现状，立志从事社会变革，愿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占 11.19%；②成就一番事业，或考取研究生，出国留学，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占 43.36%；③不追名逐利，清白正派做人，或与世无争，平平稳稳度过一生的，占 15.38%；④找一个合乎自己兴趣的工作，在社会允许

的条件下争取更多的个人实惠，以实现有幸福的家庭、高级的享受、能轻松愉快、悠闲度日的，占 26.5%；⑤只想找一个赚钱多的工作，以享尽人间一切幸福的，占 1.4%。

以上结果表明：

1. 大学生中间的多数人虽然都热爱学习，渴求知识，积极向上，也爱党、爱祖国、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但他们已不再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而是较注重个人的名誉地位，追求物质享受，向往轻松愉快的生活，只是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才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2. 男女大学生在理想的追求上，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在愿为祖国、为共产主义奋斗方面，在追求金钱和个人实惠方面，男生多于女生。而在不追逐各利、清白正派做人、考虑工作兴趣，以及向往美满幸福家庭和高级享受方面，女生则多于男生。

3. 从“填空”与“答题”的情况来看，表 2 材料表明，影响大学生理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是知识的积累与概括、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实践活动及社会的政治变革。在十二项影响因素中，这四项均排在前 4 位；而名人学者、学校集体、英雄模范及党团组织的影响，则均排在末 4 位。

从“填空”按分数排序与“答题”按人数排序制成的大学生理想形成因素的比较图来看，两条曲线近乎平行，表明二者相关（见大学生理想形成因素比较图）。

4. 调查材料表明，影响大学生理想形成的因素是复杂的，往往不是单一的因素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有机联系、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表 1 男女青年大学生理想差异的比较

性别	受试人数	项 目	其 它												
			为实现共产主义	为个人利益	为个人前途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为个人理想
男	43	人数	1	1	7	15	5	2	1	2	4	1	2	0	
		百分数	2.33	2.33	16.27	34.88	11.62	4.65	2.33	4.65	9.30	2.33	4.65	4.65	
		次第	6	6	2	1	3	5	6	5	4	6	5	6	
女	100	人数	0	0	7	38	4	14	5	13	2	7	5	5	
		百分数	0	0	7.00	38.00	4.00	14.00	5.00	13.00	2.00	7.00	5.00	5.00	
		次第	0	0	4	1	6	2	5	3	7	4	5	0	
总计	143	人数	1	1	14	53	9	16	6	15	6	8	7	5	
		百分数	0.70	0.70	9.79	37.08	6.29	11.19	4.20	10.98	4.20	5.59	4.90	3.50	
		次第	11	11	4	1	5	2	8	3	8	6	7	10	

16人

62人

10人

24人

10人

9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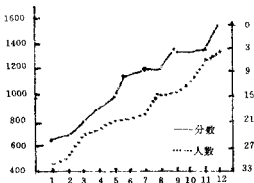
表 2 影响男女青年大学生理想形成因素的比较

性别	受试人数	项 目	其 它											
			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年龄的增长	个人的实践活动	社会的政治变革	家庭生活方式	书籍报章电影	朋友同学	领导教师	名人学者	学校班集体	英雄模范	党团组织
男	43	分数	120	149	169	208	229	245	270	327	333	387	397	402
		人数	8	6	9	9	4	3	1	1	0	0	0	0
		次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女	100	分数	336	422	513	537	546	562	575	675	669	793	884	956
		人数	20	16	12	10	12	7	7	7	2	2	2	0
		次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计	143	分数	456	571	682	745	795	807	845	1002	1002	1180	1281	1358
		人数	23	22	21	19	16	10	8	8	2	2	2	0
		次第	1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 二、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过程

那么，青年大学生的理想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受那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呢？研究表明：

(一) 理想的形成有赖于社会生活条件和个人的生活方式。



男女青年大学生理想形成因素比较图

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也是受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和个人的生活方式所制约的，并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政治变革、经济政策、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等等，无不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那么，社会生活条件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对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起作用的呢？调查材料表明：

1. 十年浩劫的精神创伤，动摇了人们的某些信念。

在我们的国家，人们的总思想意识本来是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支配的，但由于十年浩劫，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制，革命的光荣传统，社会的道德风尚，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给这一代刚刚懂得观察社会、辨别是非的年轻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把他们从小建立起来的那种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信念动摇了，从而产生了许多疑虑，提出了种种问题，并且直接影响到他们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

一位同学在谈到社会变革对他理想形成的影响时这样写道：“童年向我天真烂漫，憧憬着共产主义的未来，对生活充满信心。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在我的心灵中掀起了一种不信任的危机，过去号召的，现在进行批判；过去被打倒的，现在又上台了；过去父母讲的、老师讲的、报纸上登的、课本上写的，现在都错了。这种反反复复，使我由过去什么都信，变成了什么都不信。在这期间逐渐形成了我反对传统的思想和性格”。这种由社会情境的结合所产生的认识向稳定的个人信念过渡，往往就构成了他们的认识基础，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形成和发展。

可见，社会的动乱与变革对他们心理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各种追求和理想的产生，无不起源于他们对社会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认识。因此，研究如何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大量接触西方文化，造成了某些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的改变。

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是社会生活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形形

色色的宣传工具提供了大量的国外信息。使青年大学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他们学的一是外语专业，天天接触的是外国文化，朝夕相处的是外国专家，生活在一起的又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因此，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更为突出，不仅西方的一些思想意识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在理想和追求方面也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

正如一位同学在她自己的总结中所写的：“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由于不断接触西方文化，对某些国内的东西也总是用国外的标准来衡量，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也部分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在思想、生活、就业诸方面都向着开放型转化”。

西方文化对青年人学生的影响不仅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思想意识、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较为突出。调查材料表明，在143名受试中，属于在思想意识方面受到影响的有62人，占总人数的43.35%；属于工作作风方面受到影响的有31人，占总人数的21.68%；属于在生活方面受到影响的有25人，占总人数的17.48%。受影响不大或没受影响的只有13人，占总人数的9.09%；没有回答的12人，占总人数的8.39%。当然，各种影响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渗透的，只是在内容和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无论是由于受到积极的影响变得奋发进取也好，还是由于受到消极影响而形成了某些糊涂认识和消极感受也好，在他们思想变化的过程中，“比较”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这种“比较”是在他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实现的。由于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发现了中国和外国在许多差距，形成了许



多新的认识。其次，这种“比较”是在他们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及观看西方的电影、电视中实现的。在这些作品中，不仅大量地表现了西方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表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与人际关系。由于它是以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所以往往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第三，这种“比较”也是在经常的教学活动中实现的。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师的政治态度、思想水平、教育方式以及工作作风等等，无不时时刻刻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由于它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是在掌握知识、概念和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进行的，因而更具有理论性和概括性。

因此，如何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影响，吸收其积极的、先进的、与我有用的东西，抛弃那些消极的、落后的、颓废的东西，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从制度到方法，从领导到师生都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和对待的问题。

### 3.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理想的多样性。

调查材料表明，在 143 名青年大学生中，有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有把实现所谓“以我为中心的多元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也有毫无理想和追求的。生活在同一社会的青年大学生在理想和追求方面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说到底，也是受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和个人生活方式所制约的，是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的，因为理想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

首先，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劳动报酬及奖励措施的差别；由于人们对职业的地位、态度和情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表现。因而也引起了青年大学生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社会道德观念个

人道德认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随着矛盾的发展和深入，就表现为理想发展的不同水平，以及对职业和前途的不同的追求和向往。

其次，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少数人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动摇了人们的正确观念，也使一些思想意志薄弱的年轻人产生了追求个人名利、贪图虚荣享受的奢望。为了个人的目的，往往不考虑党和国家的要求。不接受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甚至也不顾及个人的尊严，违背客观规律，背离时代要求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去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奋斗”，从事一种毫无价值的追求。

此外，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人与人之间也还存在着思想意识、道德水平以及理想和世界观方面的种种差异，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青年大学生的理想的形成。

一方面，我们承认社会存在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学生理想的形成并不是由社会生活条件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内外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也可以使他们形成的理想具有不同的特点。这首先要以大学生本身与外部的社会生活条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为转移，同时也取决于大学生本身的情绪、观点、立场、习惯以及发展变化的趋势等方面的心理因素。所以在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过程中，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内心状态，不改变他们思想体系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任何外来要求都不可能成为形成新品质的源泉。忽视了这一点，就等于忽视青年心理发展的固有规律；重视了这一点，就可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 （二）个人内心矛盾的发展是理想形成的重要动力。

青年大学生是带着各种早已形成的观点与思想体系进入高等学校的，这种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社会长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内心状态，是他们认识和对待周围一切的根据，也是他们的理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体系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新的外部要求能激起他们的内心矛盾，使新的要求变成他们自身的需要，不仅可以改变某些旧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还可以促进新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形成。调查材料表明，以下情况是激起青年大学生的内心矛盾，促使思想转变的有效动因。

### 1. 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产生了对祖国的责任感。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理想，但在实现这一理想的奋斗中，人们的贡献却大不相同，这是和一个人的理想水平分不开的。总的来说，只有高水平的理想，才能产生高强度的动机，才能激励人去克服各种困难，争取更大的成就。

一位同学在他的总结中这样写道：“我惊叹西方的发展速度，崇拜他们的经济管理制度，欣赏西方青年的那种视依赖别人为耻辱的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比我国，我又发现我国比西方落后一大截，但我并不为我生在中国惋惜，反而唤起了我的上进之心，决心干一番大事业，为祖国的早日腾飞做点贡献。有人说我说大话，但这确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中国必竟是我的祖国”。

他们之所以不是把理想仅停留在认识和选择阶段，而是把个人的理想和祖国的理想结合了起来，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落实到对事业的追求上来。就是由于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认识到我国在发展速度、经济管理、文化教育

以及某些精神面貌上的差距；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决心为祖国的早日腾飞做出贡献。一个人只有真正具有了崇高的精神目标，认识到了人的崇高职能，他个人的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评价才能随时产生出来，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坚定不移，因为有了对高尚理想的追求，就是在心理上或精神生活上进入了理想的境界。有的心理学家说，人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做出的每一步努力，都能使人体验到一种极度欢乐的心情，如果把理想的实现称为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们每天都能在日常趋向理想目标的活动中体验到步入天堂的欢乐。所以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使他们产生对祖国的责任感，是促进他们理想形成的重要措施。

## 2. 看到劳动成果的社会价值，激起对事业的热爱。

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着思想的发展。调查材料表明，看到劳动成果的社会价值，所激起的对事业的热爱，是青年大学生理想形成的一条有效途径。一位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的同学写道：“我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们工作很忙，面工资却并不高，社会上对他们的工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他们还是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当他们过去的学生来探望他们，谈及现在做出的成绩，并真诚地感激老师当年的教诲时，我就切身感到这些学生的成就，就是教师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感到了做一名博学多才的教师的无上光荣。”

这位同学由于他亲眼看到了父母亲在教育战线上的辛勤劳动，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学生的尊敬与人们的好评，也体现了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但这一切，不仅

有赖于父母对工作的态度，同时也是与他们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分不开的。父母亲在教育工作中所获得的这种实际的社会地位和特有的幸福感，是他所羡慕和追求的；而父母的工作态度和实际的业务水平又是他目前还不具备的。正是这种需要与可能之间所激起的内心矛盾推动着她的理想的形成和发展。

3. 重新评价自己过去的生活道路，提高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

调查材料表明：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往往是以过去的生活经验总结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青年大学生理想形成的过程也是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自我分析、自我评价和自我追求的过程。只有当他们批判地评价自己的生活道路，考虑如何正确地对待现实和争取美好未来的时候，才强烈地感到需要追求真正而有意义的生活，并决心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一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同学说：家庭的平庸状况无形中使我也养成了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习性。大概也是我过去为什么那么胸无大志，只想找个好妻子的缘故吧。我小时候尊敬父母，为哥哥们感到自豪，但现在回头一看，他们竟是那么的平庸。我除了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诚实的品质外，恐怕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至于说胸怀大志、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就更无从谈起。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爱我的家庭，但我看不起他们的平庸，我喜欢爸爸、哥哥们的坦率耿直，但也为他们的自鸣得意、不求进取感到惋惜。”

从这段真情实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新的理想的形成是以父兄作为镜子而获得的。是他从生活经

验中深刻地感受到正是父兄们缺乏理想和追求，才使他们平庸度日，从而也导致了被人“看不起”和为之“惋惜”。他本人也正是在分析父兄的生活道路的同时认识了自己，而决心改变现状、积极向上。

可见无论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如何，或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如何，在理想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是不可能对学生理想的形成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的。

4. 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与坎坷，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青年进入大学后，生活就向他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毕业后做什么？自己在未来社会中会处于怎样的地位？将来的命运如何等等，都是青年大学生十分关心的问题。一位同学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时说：“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出人头地，在社会上谋取一个尽可能高的地位，使自己成为一个得到社会承认、受到人们尊敬的人，以使我的后代不再重演我们兄弟几人因家庭地位不高而遇到的种种麻烦与不幸。”

另一位同学写道：“生活的艰苦，使我懂得了钱的重要，我想将来一定要多赚钱。可是这种幼稚的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变得淡漠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地位的向往……我要尽自己之所能，不断地进取，去取得别人的承认，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调查材料与上而的例子都清楚地表明，青年大学生对于自己在未来的社会体系中占何种地位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关心，是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感受分不开的。他们体会过“生活的艰苦”，饱尝过被别人瞧不起的滋味，遭受过由于家庭社会地位低而带来的种种“麻烦”与“不幸”。这种痛

苦的体验，对他们思想意识的影响是强烈的。不仅是“激动”、“愤怒”，而且还将这些在具体情况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感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概括为一定的人生哲理。认为只有有了社会地位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此，要“图强”，要“进取”，要争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别人的“尊敬”。

可见，无论是以社会政治变革或家庭影响为契机而形成的理想，或是以自己过去经验的总结为基础而形成的理想，无不都是以个人的情感体验为基础的。这种环境因素所激起的内心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强烈要求改变家庭及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推动着他们理想的形成和发展。

总之，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不仅决定于他们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于外界环境影响与他们心理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产生出他们的需要与愿望，目的和意向，而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发展，推动了他们理想形成和发展。

（三）理想的形成不是一次完成的。

理想的形成要经历一条艰苦而漫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生活条件是理想形成的决定因素，外部环境与心理发展水平之间矛盾是理想形成的内在动力，而理想的真正形成还有赖于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地锻炼和不断地提高。正如一位同学在总结中写的：“我的理想是经过现实无数次的碰撞之后才产生出来的，它是经历了无数的矛盾和斗争后才逐渐坚定起来的。”

调查材料表明：

1. 掌握富于情境性的道德准则是理想形成的初级形式。关于理想的概念常常是与某些具体人物的个性分不开的，是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开始形成的。对儿童来说，家长和教师的思想与行为就是正确的代表；英雄的形象，就是崇高理想的化身。听从家长和教师的教导，学习英雄的高尚品德是我国思想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广大青少年理想形成的重要条件。

一位同学在谈到他的理想形成过程时写道：“小时候，我所受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听的是象雷锋、黄继光、罗盛教、王杰等英雄故事。在众多的英雄故事中，使我幼小的心灵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英雄都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于是我立下了要向英雄们学习的志向——为别人做好事。数九寒天，我们顶风冒雪，天还不亮就到学校，把教室的地扫得干干净净，黑板擦得能照出人影来，为的是能让大家在一个整齐干净的环境里读书学习。星期天，我们到车站去做好事，帮助大爷大娘卸车拿东西。尽管我们有时也很累，但心里高兴，因为我们也能象英雄一样为别人做好事了。”

英雄形象对青少年理想的形成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富有个性的具体形象可以使青少年更直接、更生动、更正确地领会英雄的崇高精神和完美的个性，在情感上容易受到强烈感染和共鸣，在思想和行动上容易找到自己和英雄的差距，从而在内心激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虽然自己还不具备英雄的优秀品质，但已从英雄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行动方向和奋斗目标，从而容易使主观体现于客观之中。任何一种教育效果不是取决于教育者的主观意图，而是取决于学生本身的情绪、观点、立场以及行为习惯等心理因素，外界



对他们的要求要经过他们的头脑的加工之后才能为他们所接受。

## 2.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推动着理想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我们知道，少年儿童所掌握的道德概念往往具有很大的情境性，他们常常是在脱离道德情境选择和道德情感的多样性的情况下进行概括的。而青年大学生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与实践范围扩大了，各种知识与信息的来源也大大增加了，随着认识体系与行为方式的发展，原来依靠外在强化的过程，就逐渐为内在化的过程所取代，成人对他们的外在控制也就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为他们个人如何认识和行为的结果所取代。

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不同的人都在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影响他人，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他们接触到较为复杂的问题以及与原有认识不相符合的社会现象时，就会产生许多矛盾，提出种种问题，甚至会出现动摇和反复。

一位同学在谈到她的理想的变化过程时写道：“上大学后，由于学习外语专业，主要接触的是西方文化，特别是当外国专家在课堂上津津乐道地讲述他们所特有的‘绝对自由’，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个性时，我的思想上就十分矛盾，因为这些与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相差太远。于是我开始思考，或许他们是对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应该尽情地去享受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雷锋牺牲时年仅二十几岁，正是青春大好年华，没有享受就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样做是否值得呢？与此同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动

摇”。“再看周围社会，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牺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出卖灵魂的人，不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吗？从小的方面来说，许多小商大贩为了赚钱，把商品以假冒真，以次充好，坑骗顾客，不也是为了自己吗？”

“耳闻目睹身边发生的一切，我想，在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环境里，黄继光、董存瑞能够做到为他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时代所造成的，而今是更多的人在向钱看，那种舍己为人的行为实在太傻了，我又何必把舍己为人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而为之奋斗呢？”

这是一段思想变化过程的真实描述，这位同学的理想为什么会发生动摇呢？为什么打算放弃舍己为人的崇高理想呢？这是因为青年大学生的理想形成要经历一个由认识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它既依赖于认识，又依赖于实践。理想作为一种认识过程，本身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的，而认识水平的提高还依赖于实践。所以，真正理想的形成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不断实践的结果。

3. 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确立对高尚理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有人说，理想是事业的大门，人生观是做人的向导，这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它生动地说明了理想和人生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培养青年大学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他们以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为向导，进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因此，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上形成高尚的理想，应该成为青年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基本动机和基本方面，成

为他们的人生信念，生活态度和实践方面。

当然，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所应追求的理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需要高度的社会完善与个人思想上的成熟。一个人只有当他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高对生活意义的认识，自觉地评价自己的生活道路以及与周围人的关系时，才会明确自己所应真正追求的目标。

一位同学在分析他的理想形成过程时这样写道：“报上发表了罗健夫、张华的事迹后，他们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对自己的理想重新进行了思考，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罗健夫在‘四人帮’横行时仍坚持搞科研，迫害对他算不了什么，疾病对他更不可怕，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国的科研领域填补了空白，他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还有那些老山前线的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放弃了家庭的温暖，舍弃了舒适的生活，离开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来到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战场，又是为了什么呢？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使我深思，是的，人活着也许不应该只为了自己，为了几张钞票，为了一部彩电，为了一台冰箱，为了眼前的个人利益去干损人、损国、出卖良心的事情，也不应该一切只围绕着一个‘我’字，应该想到为社会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这样生活才算充实，才有意义。”

罗健夫、张华以及老山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之所以使这位同学的心灵受到了深深地震撼，并对过去的理想进行了重新思考，这是因为他从英雄们的事迹中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找到了一个青年大学生所应真正追求的东西。从英雄们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范例中使他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

念。英雄们用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前进，而从不考虑自己应如何从社会上去索取，去占有的伟大思想境界，使她认识到了理想的作用和人生的价值；英雄们把幸福和温暖都留给了人民，唯独把痛苦和牺牲留给自己的伟大献身精神，使她认识到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的真正含意，而且自愧不如。这种对生活经验的重新概括而形成的理论认识与强烈情感体验的结合，是使她在对待人生和理想方面发生重要转变的内在动力。正是这样一种动力，才使她认识到“人活着不应该一切只围绕一个‘我’字，也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这样生活才充实，才有意义。”同时也使她认识到那些损人、损国、甚至出卖良心的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崇高的精神目标，认识不到人的真正社会价值。一句话，他们没有抓住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是迁就眼前的事变，为个人利益所驱使，因而干出了许多既害人也害己的事情。

当然，一个人的理想和人生观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各种因素总会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促使人们去重新探讨理想和人生观的问题。因为理想本身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如果概括了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就容易产生积极而崇高的理想；如果概括了伪、恶、丑的东西，就容易形成消极颓废的思想，而现实的东西一旦成为人们所反映的对象，就可能作为个人的理想表现出来，成为人们学习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只有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上，高尚的理想才能真正的形成。

### 三、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有赖于社会生活条件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十年浩劫的精神创伤，大量接触西方文化，以及巨大社会变革所造成的人们心理上的变化，是影响理想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但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并不是由社会生活条件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内外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调查材料来看，目前大学生中间的多数人已不再把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而是较注重个人的名誉地位，追求物质享受，向往轻松愉快的生活。这不仅反映了大学生的实际思想水平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也给教育工作提出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因此，必须引导青年大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看到改革进程中的进展和艰难，看到蕴藏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体验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也使他们逐渐认识自己，认识到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关怀与期望，感到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从而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社会现实，并逐步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伟大理想。

(二)个人心内矛盾的发展是理想形成的重要动力。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到劳动成果的社会价值，重新评价自己过去的生活道路，以及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与坎坷，是激起青年大学生的内心矛盾，推动理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此，不仅要引导青年大学生认识到人的崇高职能，具

有远大的奋斗目标，还要引导他们善于把理想和追求不只是停留在认识和选择的阶段，而是要把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理想的确立与理想的实现之间的矛盾明确起来，从而产生高强度的动机，推动他们去为理想的实现而克服种种困难。在这一过程中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地进行自我分析，正确地总结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不断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三) 理想的形成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不断认识，不断实践的结果。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于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才产生出他们的需要与愿望、目的与意向，推动着理想的形成和发展，而高尚的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

(四) 关于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方法问题：

1. 80年代的这批青年大学生出生在一个浩劫和动荡的年代，成长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时期，紧紧抓住社会生活条件对他们理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一环。

2. 青年大学生对他们不信任的人虽有闭锁和不愿暴露真实思想的一面，但对他们所信任的人也有愿意接近和希望得到别人关心与帮助的一面，只要创造关心与信任的条件，进行理想教育还是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

3. 理想的形成不是通过强求和盲从的方式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宣传和榜样教育就可以形成的。它需要由

本人自觉自愿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人的义务与职能去决定。他取决于本人的政治立场、理论水平以及对生活的态度。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的理想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的期望。

4. 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其途径也较为复杂。因此，进行理想教育时不能只是通过单一的途径或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必须象列宁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大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如立场、态度、观点、情绪愿望及个性等方面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艺术而机智的手段，并持之以恒，不断深化、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5. 要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复杂性，要看到我国社会上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官僚主义、以权谋私、一切向钱看等等，人与人之间也还存在着思想意识、道德水平以及理想和世界观方面的种种差异，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青年大学生理想的形成。研究表明，采取提前警告与预防的措施，把思想工作做在问题发生之前；经常开展对社会道德现象的讨论与评价，建立起正确的集体舆论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从根本上改善对社会生活各个过程的控制，找出缺乏远大理想和产生道德缺陷的一般原因和个别原因，有根据地为消除这些因素制定出必要的组织措施和教育措施等等，在理想教育过程中都可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原载《江西教育研究》1988年第1期）

# 论艺术教育在高等教育 中的作用

冯兰芳

在普通高校进行艺术教育，我国由来已久。从辛亥革命后，教育家蔡元培先生锐意改革，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学说，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特地创设并亲自讲授艺术史和美学课程，提倡组织北大学生成立各种艺术研究会等，并聘请著名艺术家来北大讲学，使北大学生课内外生活大为丰富，腐败的风气、封建的色彩有了明显的改观。蔡元培先生创设的包括艺术教育课程在内的大学课程体系也提高了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使北大成为国内第一流大学和各大学学习的楷模。

目前，我们也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高等学校正担负着培养跨世纪的高素质的人才的重任，它做为全社会最高层次的教育形式应含有全社会高层次的高水平的审美教育。审美教育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教育正是实施美育教育的主要内容与途径，大学生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与他们的审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许多艺术实践证明：艺术教育能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批评能力，使他们能自觉地接受一切健康



美好的事物，抵制和批判丑恶事物，明辨是非，做正直的人。

艺术教育以它包含着人类的追求和理想的丰富内涵，美的形象和令人愉悦的形式陶冶着大学生的心灵，使他们产生热爱自己的祖国，追求真理的动力，体现了德育的功能。

艺术教育能优化智育，培养大学生的形象思维的能力，启发人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对其所学专业有促进作用。丰富的艺术文化知识还可拓宽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他们的交往能力，和活跃敏捷的思维能力，有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

艺术教育以它真挚美好的情感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培养人宽容、豁达的性格。有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艺术教育中，音乐做为最普遍和最深入的精神形式，在大学生各种思想生成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文化技术交流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交流。西方的文化、道德、准则、价值观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近几年，西方文化渗透与泛滥，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形式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引入对大学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由于我国文化政策的混乱，电影、电视、书刊与其他一些文化形式公然宣传西方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学校正面教育被抵消。大学生在思维上受着各种现代哲学思潮的侵染和腐蚀。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向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倾斜。“奉献与索取应等价”“人生价值在于为所欲为，不应为别人活着”的观点得到相当多的学生的赞同。对于正面教育产生逆返心理，由此产生了人生观的动荡与模糊，使他们的人生观确立变得困难而复杂，因而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评价，使他们在受到困难与挫折时及易产生彷徨、苦闷等心态。面铺天盖地而来的流行音乐正

是迎合了他们这种惶惑心理，促使了这种消极苦闷情绪的增长。

在我院一个年级 90 名大学生调查中，不识谱或不怎么识谱的学生占 72.2%，因此，大部分学生不具备基本的审美基础，在各种有益和有害音乐并存，商品音乐泛滥的形势下，他们缺乏判断力和批判力，不能自觉地接受优秀健康的艺术而排除庸俗甚至有害的艺术。在一些学生喜欢的通俗歌曲中，内容以“情、爱、恨，悲、苦、愁”的港台歌曲居多，宣传的是《人生就是戏》、《美酒加咖啡》、《让我一次爱个够》有些歌曲的内容是低俗有害的。如《爱情是游戏》，歌词是这样的：（男）“听说你最近又有了男朋友”（女）“这又有什么稀奇，爱情本来是场游戏。”（男女）“爱情不过是场游戏。”这里所宣传的不是崇高的爱情，而是低俗的情爱和玩世不恭的情态。这对大学生的腐蚀与毒害是显而易见的。英语××同学说：“尤其是受到挫折之后，再听失意、迷茫、死去活来的歌使人感到世界一片灰色，活着真没有意思。”××同学说：“有些同学本来是积极向上的，但受了‘好花不常开’‘今朝有酒今朝醉’等歌曲的影响，认为努力进取‘活得太累，不如趁年轻好好玩乐。’”而有些大学生不愿沉醉在压抑的歌曲中，于是就听“劲歌”，如英语××学生说：“如听崔健的歌曲，跟着他一起疯狂”，“发泄心中的不满与空虚”。用一种‘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德语××学生说：“我现在谁的话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大学生这种心态和精神面貌与我们的教育目标严重相悖，一些低俗的音乐，对大学生的毒害与腐蚀是不容忽视的，这样音乐教育就被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大学生接受较高层次的音乐文化教

育，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全面素质，艺术教育体现出它的独特的功能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参与全国教育“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调查中，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269份问卷显示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将音乐欣赏作为“陶冶情操，接受教育，艺术享受”为第一目的者有174人，占总数的65.7%，为第二目的者有86人，占总数的32%，就是说，在接受此答案中的264人中，至少有174人，多至260人将音乐欣赏做为陶冶情操，接受教育和艺术享受为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大学生的音乐基本素质低下，但追求社会进步，追求真善美，在改革的大潮中，思索人生，增长知识则是大多数大学生的愿望。英语×××说：“通俗音乐已经不可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与需求，随着知识的飞速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渴望欣赏高层次的音乐”。大学生看重并渴望通过艺术形式作为提高人生修养的美育途径，对大学生实施艺术教育顺应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性潮流，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在我国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却向我们展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的一个侧面。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在全国普通高校开设艺术选修课的意见》(教办字025号文件)大学生对音乐文化的需求反映出大学音乐课的特点。普通高校开设艺术课的目的是培养有高层次文化和有广博知识的全面发展的人，它无意培养艺术家，它在教学目的、内容、方法与艺术专业院校师范学校艺术专业和中小学的杂而浅显的音乐课有很大的区别。它应从大文化观念出发，从音乐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与民族等学科交叉渗透，从音乐家的生平，创作思想、作

品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思想紧密相联系。大学的艺术教育课在大学生的思想生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德语×××说：“人的一生是坎坷的，上大学后更感到活着不容易。许多无形的烦恼困扰着我，使我感到悲观，然而听老师讲贝多芬的生平，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理与生活上的打击，他痛苦却不沉沦，他使我真正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英语×××说：“当我欣赏《黄河大合唱》那激动人心的旋律时，由衷地产生一种热爱自己祖国、振奋向上的激情，冼星海鼓弃国外优异生活报效祖国的精神值得我们青年学生学习。现在，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时代，同时也是需要青年贡献力量的时代，我们应学习冼星海的精神，努力学习工作，为祖国富强出力。”听交响乐使大学生感到“从没有过的振奋”，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真谛在于去奋斗，去拼搏。”使他们认识到“低俗的音乐就像慢性毒药，深深渗入你的身体，等你察觉它的毒害时已为时过晚。”每个学期，都有学生抹掉低俗音乐磁带而换上世界优秀名曲，校园广播站、学生宿舍响起了世界名曲与民族音乐，图书馆有关音乐书籍借阅量增加，英语×××说：“因受老师的影响，我们已开始努力理解贝多芬、英扎特。并且理解到流行音乐未能领略的东西，从而达到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层次。”十几年来，我院毕业生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受到了好评。北师大在搞毕业生调查中称赞我院学生业务好，艺术修养好，知识面宽，在学生中比较“转得开”。国际旅行社培训部称我院毕业生“厉害”（指思想与文化素质好）。有的毕业生在完成外语教学之余还义务为本校开设音乐欣赏课，受到师生好评。留任北大的研究生×××还为北大外语系组织了合唱队。他们表示，在将来的生活与事

业中，应学习音乐大师们对待事业、友谊与人生态度，知难而进，在事业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益求精，以报效我们祖国和人民，无愧于人生。艺术教育所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深深地打动着学生们的心，产生着意想不到的德育效果。

在改革开放中，大学生面临着空前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他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拓宽思维，扩大知识面，并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大学生是知识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专业知识，但他们的音乐文化知识与其他知识却不成正比，不知《春江花月夜》是我国古代名曲，把传说中的俞伯牙、钟子期当成是现代音乐家，甚至把聂耳说成是外国音乐家等。这种低层次的文化素质使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们“不敢开口说话，害怕驴唇不对马嘴。”大学生渴望了解世界优秀文化知识，音乐文化史课程使学生通过音乐教育进一步了解人类发展史及社会的诸方面，并与其他文化形式融汇贯通，如音乐文学是我国文学中独树一帜著称于世的特殊贡献。李白、白居易、苏轼等许多文学家都精通乐律，欣赏古代琴歌《阳关三叠》就要讲到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之安西》及唐代诗歌严格的音韵要求，讲中国近现代的歌曲创作就要讲到维新变法与学堂乐歌，欣赏《黄河大合唱》就必须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史，介绍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时就要涉及法国18世纪文学，讲到法国自称是伏尔泰的学生，当过路易十五的秘书，王室公主的音乐教师这个企业家、戏剧家博马舍艰难而复杂的一生，他的创作思想及他写的费加罗的三部曲。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就要讲到德国诗人席勒。美声唱法与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较早的意大利，音乐之父巴赫与宗教文化，贝多芬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他的创作影响等。音乐与其他诸学科的交叉渗透使大学生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学生们惊喜地发现音乐的涉及面及内涵竟是如此广阔，音乐文化课做为—门独立的学科既保留了他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又与其他学科纵横相联系的这一形式为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学生XXX说：“刚开始选修音乐课只是想放松放松，没想到这门课真让人感动，真受教育，真学知识。”

武湘涛教授在中国航空教育学会“七五”教育科研课题组研究《音乐优化智育的功能》的专题调查中文“如果说人们对于麻省理工学院为什么开设那么多音乐人文课程感到费解，面主人答复是，我们不仅培养工程师，还希望在我们学生中出‘总统’这一传闻当作‘佳话’或‘趣闻’的话，今天，在联邦德国的有关资料中已找到具体的例证，他们不仅有许多高级官员对音乐艺术深有造诣，而且，近二十年来，真出现过不少‘音乐总统’。谢尔总统是作曲家，施密特总统是钢琴家，魏茨泽克总统不仅小提琴拉得好，还曾在乐队里吹过小号与长号……”当然“音乐总统”是广义的，音乐能优化智育这也是有口皆碑的事实。震惊全国瞩目世界的学术带头人李四光、钱学森德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面梁思成、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也是乐队队员。音乐能优化智育的功能在外语院校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这是因为音乐与语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丰富的音乐性，在各种语言的语句中，抑扬顿挫的语气，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的交替，体现了语言的节奏性，面在音色、力度、速度等因素

方面，语言与音乐在表达上大致相似，俄语××说：“俄语中有多种句型，重读与非重读如同音乐的节拍一样，句子的起伏与音乐的起伏相仿。学习音乐有助于我讲出有韵味的俄语。”音乐的节奏、速度、力度的训练对于学习外语的语音语调自然流畅，清楚地表达语句极为有益。如果用不同音高的音符在规定时间内不间断地清晰地快速进行练习，可以有效地提高口腔及舌位的灵活性。西班牙学生说：“西班牙语语速快，语感强，快速的音乐训练可帮我更快更好地复述句子。”实践证明，经过良好的声乐训练，在日常语言交流中可以有意做到合理地控制运用气息与“共鸣”讲话（如同话剧演员一样）增加声音的强度与音色的优美，流畅、动听的效果。在90名学生调查中，有65.5%的学生认为音乐有助于听力，语音语调有所提高。艺术实践还可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与交往能力，克服因心理紧张而词不达意、杂乱无章甚至因慌乱而引起挤眉弄眼吐舌头等不良习惯，锻炼了学生高雅的风度、大方的举止。在9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你认为音乐可助你了解外国政治、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这一题目中，有87人认可。音乐文化课补充或进一步完善了大学生这方面的知识结构，使学生在工作中如鱼得水，法语×××说：“在与外宾交往中很难不涉及音乐，若你能讲得头头是道可使双方进一步沟通，产生共鸣。但如果人家提到某位音乐大师你却从未听说过或驴唇不对马嘴，岂不是让人笑话文化素质太低！”我院开展艺术教育十余年的经验证明：大学艺术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它要有正规的艺术教学形式，只有开设相对系统的、全面的艺术综合性课程，才能培养出大学生高层次高水平的审美修养，这是课外艺术讲座和艺术活动难

以做到的。但又必须要强调它的实践性，使学生在艺术实践中参与、感受、鉴别美。在实践中考察美育的涵义、功能和它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必然联系。十余年来，我院确实培养了一批批有艺术文化素质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德语学生用德文写出音乐论文《论格鲁克的歌剧改革》，英语学生在音乐厅为翻译解围使外宾竖起大拇指，在国外中外留学生联欢会上，我院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较丰富的音乐文化知识获得好评。音乐班学生在中央广播电台对日本举办的日本歌曲大赛中被日本听众评选为第一名，在法国举办的“北京法语歌曲比赛中获第一二名的好成绩被邀请免费旅游法国，在全国举办的外语类院校各语种的歌曲、朗诵、戏剧大赛中，均获优异成绩，我院合唱团还在各级比赛中获奖。中国唱片总公司还为音乐班发行了英语歌曲磁带，1984年音乐班考取研究生人数占全院总数的45%，考取外交部高级翻译人数占全院考取总数的45%。北京日报于1993年6月在题为《外语比赛中连获大奖》的文章中得到了“该院形成了实用性强，适应性强的办学特色，该院学生外语交际能力强、语音、语调语感好，外语文化知识面宽”，“在众多外语名牌大学学生及社会人士参加的外语比赛中连获佳绩，使人们对这所学校刮目相看”的评价。

（原载《高校美育文集》）



# 引导·参与·务实

## ——《法学基础》课教学方法研究

毛庆龄

高等院校法制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高校法制教育对于全面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在全国高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的精神，我院自1987年正式开设了法学基础课（以下简称法学课）。

法学课作为一门必修课，如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效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针对学生的特点与实际，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学生从被动的“要他学”转化为主动的“他要学”的自觉性，从而使他们通过本课的学习达到认识法的本质，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知法守法，自觉地维护法的尊严和能以法为武器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现将我们在引导学生认识在现实社会中法的地位、作用法对人的切身关系，自觉重视学法；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包括学生执教，组织模拟法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理论联系实际，以案讲法，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等方面的作法，概述如下：

## (一)

教育的针对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也是法学课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学中，我们始终注重调查研究，针对学生的思想和认识实际，启发学生自觉进行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类法规日臻完善，但通过几年来的调查了解和教学实践，可以看出，近年入学的大学生，虽然在中学的阶段一般都曾程度不同地接受过普法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开课前，不少学生对于什么是法，社会主义法的作用，法与人的关系等基本常识，或知之甚微，或认识相当混乱，因此，对上法学课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对本课学习的目的、态度等在思想上，认识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和一定的消极心态：一，我国社会现实是权大于法，学法没用；二，法是治坏人的，我是好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流，我与法无缘，法与我无关，干嘛要学法；三，法是应付打官司的，不懂法可能要吃大亏，但人生一世能吃上几场官司呢，真要打，凭我大学程度现抱佛脚带着官司学法律也还来得及，更何况还可请律师代劳，何必未雨绸缪，占去那么多学外语的宝贵时光学法呢？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法的作用日益明显，学点法有益无损。但法律千条万律，枯燥晦涩，难懂难记，还要考试，太累人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针对上述情况，绪论课中，我们除了阐明高校开设法学课的政策依据与法律依据外，对开设本课的目的、意义，本课的性质、任务、内容体系与教学要求都向学生作扼要的说明，同时注意从我院及各高校历届学生中自觉守法与违法犯罪等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对比，帮助学生了解法律与人的

密切关系，使他们懂得大学生学法、知法与守法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我们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引导学生认识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大学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如在宪法教学中，讲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时，着重论述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一致性（或者说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互为依存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表现为两者互为依存条件而同时存在，义务是实现权利的基础，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只讲义务，不讲权利，不能培养和增进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容易使人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以自我为核心，忽视甚至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实际上还反映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不讲行使权利就是不讲民主和自由，不讲履行义务就是不要集中和纪律。因此公民在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一些大学生中存在的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立起来，分裂开来，甚至只讲享受权利，不讲尽义务的错误倾向，而这种只要索取，不作奉献的倾向可能导致犯罪堕落的后果。在进行部门法的教学中，我们紧紧抓住权利与义务这一主线，引导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公民处于各种法律地位应如何正确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并如何依法与各种违法侵权行为作斗争。

由于学生学有所获，积极的心理逐渐取代消极心理。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按照要求，积极参加教学活动。一些学生还不时将个人或亲友遇到的法律问题、见诸于报刊、广播电视

中的法案和他们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与法相关的社会现象的疑问与困惑向教师咨询，与教师共同探讨。以求真正学懂弄通，并提高依法办事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能力。应该说，法学课已成为一门为学生接受，受学生欢迎的公共必修课了。

## (二)

大学生大多具有乐于表现自我，乐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的特点。为了使他们的这一特点转化为学习动力，我们采用了能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教学参与机会，使他们能通过实践教学的尝试认识自我和增长才干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群体的观点看则是一种自我教育，比之教师的灌输在某种意义上更易被接受。

例如，在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一章的教学中，我们曾采用过由部分学生代表上讲台执教，组织教与学的学生当堂进行评教评学，最后由教师小结的教学方法，大部分学生对此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中上台讲课的学生备课认真，执教严肃；听讲的同学也能按要求在预习的基础上专心听讲，认真回答问题，或提出问题，课堂气氛十分和谐融洽，对此学生还在团委主办的《语滴》小报上，以“法学课教学改革”为题，对这一教学方法予以报道和充分肯定。

本学期，更进一步改变过去课前先由教师协助拟定教学提纲，再由学生按提纲备课的办法，而是由教师与学生中推选的授课“教师”一起先学一步，在弄清宪法的本质，指导思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特点与关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与思考，自拟教案，自撰讲稿。他们不仅翻阅了不少书籍，还在内容的组织编排与方法上动脑筋，力

求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课堂上，有的执教学生着重对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规定及其内含进行讲解；有的联系我院学生的实际情况，着重阐明大学生应如何正确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和履行公民的义务；还有的同学引经据典通过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与资产阶级人权与公民权的分析对比，得出了“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平等性与一致性的特点，而即使在所谓最自由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总而言之，资产阶级人权是狭隘的，而不是普遍的人权，对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它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得出，博得了众多听课学生的喝彩。这样一个政治性的结论，是由教师的口中道出，还是从学生口中由衷地道出。在听课学生中产生的可信度和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特别在目前某些社会心理条件下，更是如此。

我们还组织模拟法庭，由学生扮演各种角色，诉讼审理案件，这也是增加学生教学参与机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之一。为了进一步拓宽学生受教育的天地，使学生得以走出校门，通过感性认识，提高法律意识，在北京市劳改局和第一监狱领导的热情支持下，我们组织部分学生到第一监狱对社会上犯罪与罪犯改造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别开生面地开展了对在押犯的帮教联欢活动。年轻的大学生怀着几分好奇，几分恐惧和倍感压抑的复杂心情走进大墙之内，对于监狱他们多是从影视或书刊中认识的，无非是冰冷沉重的手铐脚镣、低矮潮湿的牢房、管教人员的厉声喝斥……。但

来到现实中的第一监狱，学生们首先受到的是监狱各级领导和管教人员的热情接待，监狱政委亲自介绍了这座监狱的历史，我国近期刑事犯罪的一般特点及我国对刑事犯罪分子教育改造的政策和具体作法，使学生对监狱概况和我国劳改制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在监狱长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在押犯劳动的车间、男女监室、犯人们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的操场，在通道四壁张贴的犯人们出的墙报，他们的书法绘画作品及各种竞赛评比的成绩。在帮教联欢大会上，学生代表宣读了致管教人员的慰问信和致在押犯的帮教信，同时将同学自愿捐出的青年修养、法律常识、文艺作品等图书赠给了在押犯人，希望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恶从善，争取光明的前途。一个在押犯代表向师生追述了她是如何步入犯罪深渊和在监狱中如何接受改造悔过自新的。这个六十年代毕业于我国某工科院校化学系的高材生，外祖父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革命老前辈，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专家学者，她虽已过不惑之年，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为了出国和追求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竟投向了台湾情报机关门下，成了窃取国家科技情报的特务，被依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她那发自内心，充满无限悔恨与内疚的自我剖析深刻、真实而发人深省，她那对大墙外面亲人的日夜思念的亲情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自己弃恶从善，从新作人的勇气和决心，是真实动人的。弃旧图新之心是应予以同情和支持的，但叛国之罪饶恕不得。她的现身说法道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即一个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又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果放弃思想改造，淡化法制观念，同样会误入违法犯罪的歧途。对于来自大墙外面的大学生，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借鉴。

这次法制教育的实践活动是生动的，令人难忘的。其成功之处不仅仅在北京电视台、电台及有关报刊作了肯定的报道，更重要的是它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学生在参与这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凡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都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写了自己的体会。“一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从××犯罪谈起”，“永远刻在我心中的一页”，“高墙外的深思”，“泪水与微笑”，“铁窗生活给我的思考”……篇篇都表达了同学们对学法、知法、用法、守法和大学开设法学课的理解与认同；对大学生活的珍惜；以及对我国政府对犯罪分子所实施的教育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的支持。一个学生写道：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狱中会有如此善意的感化，我想这一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 （三）

以案讲法，形象生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层层剖析，深入浅出，是一种深受学生普遍欢迎而又可收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教学形式。

#### 一、以案讲法的应用原则

1. 案例的选择应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生突破难占，掌握重点，加深记忆。

2. 案例的选择要贴近生活，并尽可能选用大学生是当事人（或违法犯罪者、或被侵权人）的案例，以增强真实感，亲切感，也有利于学生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行为表现，在对比与反思中懂法用法。

3. 分析案例时，除了援引有关法律规范，对本案的案情、案犯逐一分析判定外，还应联系当事人的思想意识、心理品

质、道德修养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寻求揭示案犯违法犯罪的内因，从而引导学生注重自身思想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完善，以实现本课法制教育与思想教育相辅相承，协调一致的功能。

4. 以案讲法教学形式的采用要适度、适量，要从教学内容的实际需要出发，切不可单纯迎合学生乐于听案的兴趣，把法学课上成案例与案情发布会，更不能变成侦破故事会。案例的介绍，只能用于辅助、加深，而不能代替或冲淡对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法律规范的讲授。

## 二、以案讲法教学形式的适用

以案讲法的教学方法，适用于本课教学的全过程，但我们特别注重在以下三个阶段中采用这一方法。

1. 以案讲法，上好绪论课，为本课教学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及各种心理障碍（如前所述）在绪论课教学中，我们特别举出了学院根据环境保护法向造成对我院家属宿舍1号楼严重粉尘污染的某厂提出经济赔偿的要求，并用该厂支付的经济赔偿为该楼各户封闭阳台的实例。以说明生活中随处可遇法律问题，不懂法将无从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还通过对我院七八级鹿××抢劫案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八七级张××因“一步棋之争引来的杀人案”的介绍与分析教育和引导学生从中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社会主义法与人（公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不仅惩治违法犯罪分子，更重要的是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也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知法、守法，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and 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文化上层次的高低与法制观念的强弱之间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作为文化上高层次的大学生，如不认真学法，不努力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依然可能落得违法乃至犯罪的可悲下场。

第三，违法与犯罪有时只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的转就不仅取决于行为人的法律意识的强弱，往往还与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密切相关。大学生庞××与张××的悲剧固然有其因法律意识淡漠而违法犯罪的一面，然而强烈的虚荣心，幼稚的侥幸心理，极端的报复心理，不计后果的感情冲动等不良思想心理品质和缺乏最起码的文明修养，也是使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大学生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不仅需要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较新的知识体系，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学法、懂法，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重要的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思想境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2. 在讲授教学重点与难点时，可采用个案分析或通过对数案的分析对比，帮助学生突破难点，掌握重点，弄懂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例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刑法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习中又常被学生混淆的两个概念。为了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教学中我们选用了盗窃工厂库存电缆与盗割变电站供电专用电缆的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和学生一起找出上述两案的罪犯无论实施的是盗窃还是盗割的行为，其直接作用的物体都是电缆，刑法中

犯罪对象的概念就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人或物，因此以上二案中的犯罪对象都是电缆。在此基础上又和学生一起继续分析前案的盗窃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工厂对其财产(电缆)的所有权，而另案盗割行为则是给社会公共安全(供电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危害(即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的人身与公私财产的安全)，刑法中犯罪客体的概念即指犯罪所侵害的，受刑法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虽然两案中犯罪对象都是电缆，但是由于两种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直接客体)不同，因而前案以盗窃罪论处，后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从而说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虽然一般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也有着诸多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区别是，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并决定着犯罪行为的性质，而犯罪对象则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一般也不影响对犯罪行为的定性。

3. 运用案例教学上好总结课，提高学生分析、推理和正确运用法律的能力。

通过 36 学时的教学所进行的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教师法、诉讼法及国际法的教学，应该说只能对基本理论和各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部分条文作一般性的讲解(有些部分还要求讲得深些，透些)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然而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各种行政的、民事的纠纷的调处，对各种行政、民事、刑事案件审理判决，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案件的审判往往不仅依照一个法律的数个条款，很可能需要依据几部法律的诸多条款，且还要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如何教会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各法处理和解决简单乃至稍许复杂的法律

问题，并引发学生继续学习的兴趣为以后步入社会能依法应付和解决各种法律问题打下一定的基础，我们十分重视在总复习课上，选用案情较为复杂，涉及人或事较多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断处，指导他们先从逐一排列本案中出现的各种法律事实和行为人人手，继而分析基于各法律事实，产生、变更或终止什么法律关系；从每个行为人的每个具体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程序的大小和是否引起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对其产生社会危害结果的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等，逐一分析，层层深入，最终得出结论：本案中出现的哪些行为和行为人合法，哪些行为违法；哪种行为已构成犯罪，违法违反了何法，犯罪触犯的是哪条刑律；对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及行为人应分别依据何种法律程序予以论处；以及对于合法行为及受违法或犯罪侵害的当事人如何依法予以保护。这样的复习方法较其他复习方法，有概括性、系统性、综合性强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

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感到：

1. 以案讲法是沟通教师与学生教与学情感相融的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学生说：“结合案例分析，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变活了。”运用这种方法教学，教师讲起来丝丝入扣，生动具体，学生听起来层层深入，津津有味，又入耳入脑记忆深刻。

2. 以案讲法，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各类案件的分析，不仅能加深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反过来还可以培养学生用所学的书本对社会中的各种法律现象和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判断和正确处理的能力；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保证了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果。

3. 以案讲法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学生认为，通过教师对概念的讲述，案例的分析，使他们掌握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学会了一些灵活运用知识的方法，作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拓宽了他们知识面和学习的领域、认识到了守法、护法或违法、犯罪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心里素质等方面的关系，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一名英语系的男同学说：在法学课中，通过诸多案例，看到一些人因为是法官，或者过失，或者疏忽大意等而犯罪入狱，着实吓我一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就有马马虎虎的毛病，而且爱和别人开玩笑。万一玩笑开重了，我因马虎而伤害别人，被判刑入狱，到那时后悔也晚了。通过案例教学能在学生思想上敲响警钟，为其自觉加强思想修养，增强法律意识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提供一定的启示。

（北京市高校德育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会交流论文）

⑥

# 古汉语使之被动用法

齐 世 昌

一、陈承泽《国语法草创》说：

他动字之为致动者，甚为罕见……惟他动字转为被动后再转于致动者，古书中颇多有之。如《左传》“杀御叔弑灵侯”，谓使御叔见杀灵侯见弑也，惟近世文亦罕见之矣。

他动词的使动用法虽“甚为罕见”，今讲古汉语使动用法者无不涉及，而对他动词“转为被动后再转于致动”的这种特殊用法，古文中即使“颇多有之”，而论者甚少。

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的“词在句中临时职务”一节中曾对这一语法现象作过如下表述：

当说话人要使宾语所代表的事物具有某一及物的行为的时候，就把表示这一行为的外动词放在宾语前面。这个外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并不是主语所表示的事物发出的，而是宾语所表示的事物发出的，甚至二者都不是，而是第三者所发出的。例如：……“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面求也”（史记·苏秦列传）“禽将”是使其将被擒，擒的行为出自第三者。

陈、王二先生都指出一些动宾结构具有“使宾语被动”的语义，但是他们都未举出“行为出自第三者”的句子；而“行为出自第三者”的句子并不少，构成了一种使动的特殊用

法，①故应予以特别的重视。

二、他动词与宾语构成动宾结构，并非一般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同时兼有使动与被动意义，还能以“于”引进施动者或处所，这种动宾补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使动用法，可称之为使之被动用法②，这种句子就是使之被动用法句。S1（施事主语）+V（他动词）+O（宾语）+于+S2（动词施事者或处所）。例如：

〔甘茂〕曰：“……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战国策·秦二）

“重公于齐”，他动词“重”（尊重、敬重之意）与宾语“公”（甘茂）是使动关系，然而他动词“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并不是主语讲话人“苏子”、也不是宾语“公”发出的，而是由介词“于”引进的施事者“齐”（齐国）发出的。意思是，〔我〕请使公为齐国所尊重。又例如：

昔者夫差耻吾君子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国语·越语上）

“夫差耻吾君子诸侯之国”，他动词“耻”与宾语“吾君”（越王勾践）是使动关系，然而他动词“耻”所表示的行为动作既不是主语“夫差”、也不是宾语“吾君”发出的，“耻”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发出者未出现，“子”所引进的是处所“诸侯之国”。“夫差耻吾君子诸侯之国”的意思是，夫差使我们国君在诸侯面前被侮辱。

不管介词“于”引进的是施动者，还是处所，它都是表示被动的标志。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就曾指出这种“于”字的被动句的特点，他说：“说出施事的人物或处所，把

外动词放在“于”字的前面。古人似乎把施事的人物和施事的处所看做同类的东西，所以运用同一的结构形式。本来外动词是要求宾语的，现在外动词后面没有宾语，并且紧跟着介词“于”字，可见行为是施及于主语所代表的事物的了。”

③使之被动用法句的宾语变换为兼语后，则“于”字的这种作用就更明显地突现出来：

$S_1 + V + O + 于 + S_2 \Rightarrow S_1 + 使 + O + V + 于 + S_2$

对此种使之被动用法句诠释家多采用使令兼语主动句解释，如“重公于齐”高诱注：“重，尊也。言将使齐尊重公。”使之被动用法句为何不用使令兼语被动句注释，而用使令兼语主动句注释将在后文论述。

包括未出现施事者的，使之被动用法句在古汉语中颇不少。例如：

(1) 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史记·周本纪)

(2) 王不如资韩朋，与之逐张仪于魏。(战国策·韩一)

(3) 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谷梁传·庄公九年)

(4) 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卫必折而从之。魏亡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兵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5) [士]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也。(论语·子路)

以上各句中带重点号部分的意思是：(1) 韩使周为秦所疑；(2) 王与韩朋使张仪为魏所逐（即王与韩朋使魏国逐张仪）；(3) 公子小白使公子纠被鲁国人所杀；(4) 秦国使卫国为魏国所兼并（即秦国使魏国兼并卫国）；(5) [士]不使国君之

使命受侮辱。

这种句子就其主语与宾语间可能有的领有、隶属、复指等语义关系来考察，可分为四类：

(一) 主语与宾语之间没有领有、隶属与复指等语义关系。

此类句子受事宾语所代表的人事物，与施事主语所代表的人事物各异，但它们还都不是他动词的直接施事，而另有“于”引进施事，或省略施事。主语与宾语的语法关系是主动；使宾语被动；主语与宾语所代表的人事物，从语义上说，既非领属关系，又非复指关系。例如：

(6)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国语·齐语)

(7) 王欲，则信公孙郝于齐，为韩取南阳易谷川以归，此惠王之愿也。(战国策·韩一)

(8) 大成午从赵来，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战国策·韩一)

(9) 茂诚贤者也，然而不可以相秦。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塞濊胡而野江东。(战国策·楚一)

(10) 张子谓秦王曰：“重樛里疾而使之者，将以为国交也……臣闻其言曰：‘王欲穷仪于秦乎？臣请助王。’”(战国策·秦一)

(11)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吕氏春秋·察传)

(12) 昔者夫差辱吾君王于诸侯，长为天下所耻。(吴越



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13) 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汉书·董仲舒传)

(14) 秦卒有他事而从齐，齐秦合，其仇君必深矣。挟君之仇以诛于燕，后虽悔之，不可得也已。(战国策·秦三) “诛于燕”，鲍彪注：“使燕诛相。”可知“诛于燕”为诛〔相(燕相)]于燕”之省。

(15) 夏，与顷公战于鞍，伤困顷公。(史记·晋世家)

以上10句，例(6) — (13)，均为出现宾语的；例(14)，为省略宾语的；例(15)，为省略介词“于”及施事的。各句带重点号的部分意思是：例(6)寡君想使管仲为群臣所杀；例(7)昭王使公孙郝为齐国所信任；例(8)你使我为赵国所尊重，〔我〕使你为韩国所尊重；例(9)楚王曾使召滑为越国所重用；例(10)楚王想使张仪为秦国所穷困吗？例(11)国人……使之(这件事)为宋君所闻；例(12)吴王夫差使我们国君在诸侯面前受侮辱；例(13)桓公使疑难问题为管仲解决，寡人使疑难问题为君(董仲舒)解决；(14)齐、秦带着齐国的仇恨使燕相为燕国所诛杀；例(15)〔晋〕使顷公受伤被困。

(二) 主语与宾语有领属关系。

此类句子主语与宾语均为受事，主语所代表的人事物与宾语所代表的人事物有领有、隶属关系。例如：

(16) 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战国策·齐四)

(17) 某固愿闻名于将命者。(礼记·少仪)

(18)〔晏嬰〕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19)〔秦王〕以母淫通于嫪毐，闭之于雍门宫，故顿弱曰：“不能掩威于六国，而掩威于母也。”(战国策·秦四高诱注)“威”，威名。

(20)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记·晋世家)

(21)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史记·孙于吴起列传)

以上各句重点号部分意思分别是：例(16)君王使功名在后世被传扬；例(17)我本来愿意使名字为传话人所知；例(18)〔晏嬰〕使美名为诸侯所宣扬；例(19)秦王使威名未能为六国所掩盖，反而使威名为其母所掩盖，例(20)宋襄公新近使军队为楚国所困；例(21)吴起……使之(他的主张)为楚国所推行。

(三) 主语与宾语是复指关系。

此类句于主语与宾语均为受事，主语所代表的人事物与宾语所代表的人事物相同，宾语复指主语。例如：

(22)于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庄子·盗跖)

(23)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吕氏春秋·异用)

以上二句重点部分意思分别是：例(22)孔子使自身不为天下所容。例(23)万物使其自身为人所用。

(四) 主语与宾语是并列关系。

此类句子主语与宾语均为他动词的受事，二者为并列关系。例如：

(24)昔夏之方有德也，远物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

这句是“夏禹贡金〔于〕九牧”之省，意思是夏禹使金为九州之牧所贡，即夏禹使九州之牧贡金。

三、使之被动用法句是使令兼语被动句的简化式，即以动宾补的结构表达使令兼语被动句的内容，二者语义相同，可以相互变换。利用变换关系能认识并建立使之被动用法句的句法规则。如果说使动用法的句法规则的建立有使令兼语被动句为其认识的基础，那么，使之被动用法句的句法规则的建立则有使令兼语被动句为其认识的基础。例如：

(a) 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诸侯。（国语·楚语上）

(b)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国语·齐语）

(a) 式可变换为 (b) 式：子南之母……戮子南于诸侯；而 (b) 式变可变换为 (a) 式：寡君……使之戮于群臣。使令兼语被动句中“子”字被动句部分还可以变换为“为”字被动句。

所以，使之被动用法规则的建立得到语言事实的支持。从变换的角度看有两种句型说明使之被动用法规则的建立具有可靠性与合理性。

(一) 使之被动用法句和与之相应的使令兼语被动句相互变换，则证明  $S_1 + V + O + 于 + S_2$  中的“V”他动词是使之被动用法。例如：

(1) (a) 王不如复雎，而重仪于韩魏。（战国策·楚二）

(b) 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史记·孟尝君列传）

(2) (a) 且王(楚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战国策·楚一)

(b) 秦亦将易置赵之臣,令其所爱信者用于赵。(战国策·魏二吴师道补正)

(3) (a)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国语·齐语)

(b) 君何辱讨焉?使〔之〕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4) (a) 〔齐王〕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罢而伐与国,广邻敌以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战国策·齐二)

(b) “信仪于秦王”,命使仪言信于秦王。(《战国策·齐二》高诱注)

(5) (a) 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战国策·楚一)“滑”,召滑。

(b) 念莫可使〔之〕用于秦者。(史记·张仪列传)省略的“之”,代“莫”所指代的人。

以上各组(a)句是使之被动用法句,均可变换为(b)式的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二者有相互变换关系。(b)式的存在事实,为(a)式的使之被动的语义找到了根据。但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还可进一步变换为使令兼语“为”字式被动句。例如:

(6) (a) 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诸侯。(国语·楚语上)

(b) “戮于诸侯”,言为诸侯所戮。(《国语·楚语上》韦昭注)

(7) (a) 毛先生一至楚,使赵重于九鼎大吕。(史记·平

原君列传)

(b) “重九鼎大吕”，言为天下所重也。(《史记·平原君列传》司马贞注)注释者以“九鼎大吕”指代“天下”。

以上各组(b)句是后来训诂注释家的话，都是为使令兼语被动句的“于”字部分“戮于诸侯”、“重于九鼎大吕”作注，说明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可变换为使令兼语“为”字被动句：

使子南戮于诸侯⇒使子南为诸侯所戮

使赵重于九鼎大吕⇒使赵为天下所重

先秦两汉时期与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共时变换的使令兼语“为”字被动句也已出现。例如：

(8) 其〔暴王〕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贱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贱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墨子·尚贤)

(9) 今七败之祸未复，而欲以罢赵攻强燕，是使弱赵为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为弱赵之所以守。(战国策·赵三)

(10) 勿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史记·邹阳列传)

(11) 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公子所鱼肉。(史记·晋世家)

这些使令兼语“为”字被动句的出现，说明把使之被动用法句变换为至今现代汉语仍然保留着的这种使令兼语“为”字被动句，是认识S1+V+O+于+S2结构语义的最好办法，同时说明使之被动用法规则的建立是合乎道理的。

(二)使之被动用法句与使令兼语主动句的变换又进一步证明使之被动用法规则的可靠与合理。李临定先生曾论证了现代汉语使令兼语被动句与使令兼语主动句的变换关系。④

这同样适用于古汉语。例如：

(12) (a) 楚王逐张仪于魏。(战国策·楚三)

(b) [楚王]使魏逐之。(《战国策·楚三》鲍彪注)  
“之”，代张仪。

(13) (a) 故王不如无罪景鯈，以视齐于(又作“以”)有秦魏，齐必重楚，而且疑秦、魏于齐。(战国策·韩一)

(b) “疑”，楚使之疑。(《战国策·韩一》鲍彪注)  
“之”，代齐。

(14) (a) 吾又恐东周之贼己而以轻西周恶之于楚。(战国策·东周)“吾”，代昭翦。“恶之于楚”的“之”亦代昭翦。

(b) [昭]翦恶东必善西，西善翦，则楚亦因重西矣。东欲坏其交，故贼翦，翦死则西无内主于楚，东西得使楚恶之。(《战国策·东周》鲍彪注)“恶之”的“之”，代昭翦。

(15) (a) 貂勃常恶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曰：“敬闻命。”明日，任之于王。(战国策·齐六)  
“之”，代貂勃。“安平君”，即田单。

(b) “任之于王”，(安平君)白王，使任用之。(《战国策齐六》鲍彪注)

(16) (a) 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也，周不敢不受。(史记·周本纪)

(b) 韩强与周地，令秦疑周亲韩，则周不敢不受……(《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

(17) (a) 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谷梁传·庄公九年)

(b) 公子纠将为乱，桓公使使者视之，使者报曰：“笑不乐，视不见，必为乱。”乃使鲁人杀之。(韩非子·说林下)

六组各组 (a) 句均可变换为 (b) 句。其中 (11) —— (16) 的 (b) 句都是后代训诂注释家的注文，对使之被动用法句采用使令兼语主动句注释，而其中 (17) 句的 (a) (b) 两句叙述同一件事，一句以使之被动用法句叙之，一句以使令兼语主动句叙之，从句型变换规律说，(a) 句可变换为 (b) 句，变换过程如下：

公子小白 (桓公) 杀之子鲁 ⇒ 小白使之杀于鲁 [人] ⇒ 小白使之为鲁 [人] 所杀 ⇒ 小白使鲁 [人] 杀之

综观秦汉时期，这四种句型均已同时存在，且有着相互变换关系。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使令兼语主动式居大多数，其它三式均属少数。古汉语使用量少的句型，于现代汉语中已不复存在，特别是它的语义不易为人所理解，用变换语义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句型，则是了解其语义的方法之一。作者、说话人采用哪一种句式，则根据上下文语境可随意选择。由于使令兼语被动句 (包括“于”字式和“为”字式) 和使令兼语主动句的存在且与使之被动用法句有着变换的关系，证明了使之被动用法规则的存在。

四、辨析举例。使之被动用法的研究，对古籍注释、古文教学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如果了解掌握了使之被动用法这一句法规律，对有关句型的讲解、释义、翻译的处理上，则会比较更为方便，而且易为准确，否则，总嫌隔靴。例如：

(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对他动词“信”及这一句式的注释、翻译有不同的几种：

(1)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sup>⑤</sup>“‘彼其’，犹言‘他那个’；‘忠实心’，忠诚笃实的品质；‘士大夫’，指将士。此言

‘这是他那忠实的心肠真诚地使将士们对他信赖的缘故’。”

(2)《大学语文》：<sup>⑧</sup>“诚信，诚然取信”

(3)《史记选讲》：<sup>⑨</sup>“李广的一片忠实心情对于士大夫确已发生真诚的信仰啊！”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本释成使令兼语式，从而可体察出注释者对句子的理解：(1)认定此句是使之被动用法句；(2)省略了宾语“之”（代李广）；(3)灵活翻译。因此，注释者首先补上宾语“之”然后变换为使令兼语“为”字被动句，再变换为使令兼语主动句：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

⇒彼其忠实心诚信之于士大夫

⇒彼其忠实心诚使之为士大夫所信

⇒彼其忠实心诚使士大夫信之

据此句式进行灵活翻译，强调宾语“之”，用“对”提动词前边，译成：

他那个忠实的心肠真诚地使将士们对他信赖。

只是这样解释，才能令人明白为什么“信于士大夫”一句，很多人按“使士大夫信任”等一类的使令兼语式注释、翻译。当然，不能认为这是一种随意的翻译，毫无规律可循，因为注释者可以不提这种“使之被动用法”的规律，但对这类句式变换关系却很熟悉，就象对“写毛笔”一下子就变换为“用毛笔写”那样熟悉，所以不讲“使之被动用法”规律，也能注释出合于这个规律的句子。

《大学语文》本注释：“诚信，诚然取信”，从而可体察出注释者认此句为被动句

《史记选讲》本注释成：“……对于士大夫确已发生真诚



的信仰啊！”从而可体察出注释者对句子的理解：（1）未看成被动句；（2）更未看成使之被动用法句；（3）把“信”译成“发生……信仰”，是把“信”看成“名词”，在这里作动词，显然太蹩脚，当然也不对。

从句法角度分析，这句是被动句，把被动句改换成使之被动用法句，有的可以，但要有条件，即主语是受事，与宾语所代的人事物有着领属关系，且为同一人事物的整体与部分的领属关系。故上文“信于士大夫”可增补“之”代李广作宾语。这种办法用来讲解、翻译是可以的。但从语法来说，则不应认为“信于士大夫”是使之被动用法句，否则“于”字被动句都可按照这种方法改换成使之被动用法句。然而此种讲解却证明使之被动用法句的存在。

（二）当秦（苏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煌于道，山东六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战国策·秦三）

对他动词“重”以及这一句式的注释和翻译也有几种不同：

（1）《战国策》宋代姚宏注：“重，尊也。使天下诸王侯尊赵王也。”

（2）《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sup>⑧</sup>注释：“使赵国地位大大重要起来。”

（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sup>⑨</sup>注释：“使赵国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

从姚宏的注释、翻译中可以体察出：注释者认为此句（1）“重”，他动词，被动用；（2）是使令兼语被动句；（3）省略了介词“于”及其引进的施事“天下诸王侯”。因此，补上“于”及施事，然后变使令兼语被动句为使令兼语主动句：

### 使赵大重

- ⇒使赵大重于天下诸王侯
- ⇒使赵大为天下诸王侯所重
- ⇒使天下诸王侯大重赵

据此基本句式然后灵活译出：

〔苏秦〕使天下诸王侯尊赵王。

其实，这种句式《史记》中就不少。例如：

- (1) 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孟尝君列传）
- (2)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平原君列传）

司马贞《索隐》注：“九鼎大吕，国之宝器。言毛遂至楚，使赵重于九鼎大吕，言为天下所重也。”司马贞认为“九鼎大吕”是指代“天下”，“重于九鼎大吕”即“重于天下”，也就是“为天下所重”。“天下”是指“天下诸王侯”。

可见，“使齐重于天下”与“使赵重于九鼎大吕”的句式是一样的。“使赵大重”与之一比较，就发现这里明显省略了补语，所以“使赵大重”之后可补上“于山东六国”，然后再按使令兼语主动句翻译。

从句法角度分析，这句是使令兼语被动句，没有省略不省略补语的问题，直译为〔苏秦〕使赵国非常受尊重。如果一定再变换为使令兼语主动句，当然最好用“于”引出施事；如果不引出施事，而译成“使尊重赵国”，这倒是古汉语常用的省略兼语的办法，但意义不够显豁，所以不如补上。至于其它两种注释：“使赵国地位大大重要起来”、“使赵国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都是从“使赵国大大被尊重”（即“使天下诸王侯尊赵王”）这一根本句式和意义引申出来。

(三)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苏轼·答谢民师书）

《宋文选》<sup>⑨</sup>注释：“比喻掌握事物的特点就象要把风拴住和捉住影子那样的困难，所以下面接着说，能够了解、认识事物特点的人是很少的，能够准确、生动地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的人就更少了。”

“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这句是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本文注释、翻译时采用变换的手段，变换为使之被动用法的“V+O+于+S<sub>2</sub>”的句式结构，然而把“于心”这一介词结构的意思丢在了另一边。但这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心”与主语“人”（在此句中变换为中心语“者”了，有领属关系。“人”在这里完全可以代替“心”），故可以省略不译。尽管如此，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应该说沿着使令兼语句的办法译下去，变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为使令兼语主动句，是不是与原句意义更靠近些：能够使自己大脑思考并认清客观事物特点（的人是很少的）。

“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这又是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只是承上文动词“使”后边省略了兼语“是物”。本文注释、翻译时也是采用变换的手段，变换为使之被动用法的“V+[O]+于+S<sub>2</sub>”的结构，又增添“准确、生动”两个形容词。其实，当然可以变换为使令兼语主动句：能够使自己用语言文字把这些客观事物表达出来（的人就更少了）。

“使”字句的翻译，“使”字的去留不是随意的，而上边的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的翻译也当遵循它的句式规律。上边两句的翻译，除了从使之被动用法句角度进行翻译，也可

以从使令兼语“于”字被动句变换为使令兼语主动句的角度进行翻译，但都应从这一语法规律的理论角度加以说明。不讲规则理论，完全靠对古文各种句式的熟悉，当然是可以讲过去的，但恐怕不是科学的方法。

附注：

①②宋玉珂《古汉语使动的一种特殊用法》（中学语文教学 1983 年第十二期）

③王力《汉语史稿》第 820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 6 月版）

④李临定《“被”字句》（中国语文 1980 年第六期）“被字句与兼语句”一节曾论证使令兼语被动句与使令兼语主动句的变换。

⑤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 年 10 月版。

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

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年 11 月版，郑权中选讲。

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7 月版，朱东润主编。

⑨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 8 月版。

⑩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7 月版。

（原载《古汉语研究》1993 年第 4 期）

## “賚以姜枣”辨释

张 耕 夫

《史记·滑稽列传》：“賚以姜枣，荐以木兰。”现在通行的各种选注本<sup>①</sup>都是把其中的“賚”字注为“调和”，把这两句解释为“用姜枣来调味，又加进木兰”，不存在分歧。实际上，这条注释与原句意是有出入的。

《史记》的原文是：“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堊灶为椁，铜历为棺，賚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sup>②</sup>“賚以”两句姑且不论，其余前后五个分句，都用比喻表达了表里两重意思。它们字面上是说从装殓到葬埋的过程，<sup>③</sup>实际上却是说从烹调到进食的过程，表现了优孟“以谈笑讽谏”的幽默的语言风格。从句式上看，每个分句都是由一个动词（或动宾短语）与一个介宾短语组合而成；而这种句式，又与比喻的修辞方式相关联。字面讲丧葬，从这方面看，动词（或动宾短语）（为椁、为棺、祭、衣、葬之）用的是本义，介宾短语（以堊灶、〔以〕铜历、以粮稻、以火光、于人腹肠）用作比喻；实际所指的是烹食，从这方面看，动词（或动宾短语）用作比喻，介宾短语用的是本义。这是一种参互为喻的手法。“賚以”以下五句还是排比句。根据原文的上述修辞方式和行文特点可以断定，“賚以”两句也应该是字面讲葬法，实际讲烹调的。就是说，“賚”这

个动词的本义应该与丧葬有关。显然，原文中的“葬”字，我们不能依照它的本义去理解“葬之于人腹肠”的实际所指；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这句所指是吃到人肚子里去，就把“葬”字训为“食”。“赍”字也是这样。但是，各家的注释，却大都依据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以下简称《考证》）“当作齐，调也”的说法，<sup>⑩</sup>把“赍”看作“齐（剂）”的通假字，释为调和、调味。《考证》之说源于《史记索隐》：“按：古者食肉用姜枣，《礼·内则》云‘实枣于其腹中，屑桂与姜，以酒诸其上而食之’是也。”<sup>⑪</sup>《索隐》不误，因为它是注释这句话的实际含义。而《考证》忽略了原文的修辞特点，曲解了《索隐》作注的本意。

从训诂上看，“赍”的本义是持物送人。《说文》：“赍，持遗也。”《广雅·释詁四》：“赠、饗、赙、赠、遗、赍，送也。”一般用于活人。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赍贷于钱。”《索隐》：“与人物云赍。《周礼》注‘赍所给与’也。”<sup>⑫</sup>有时也用于死人。例如？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庄子·列御寇》）<sup>⑬</sup>

庄子的话和优孟的话，旨趣相通，句式相类，可以互为参证。“赍以姜枣”与“〔以〕万物为赍送”，两句中的“赍”字理应都解作送葬。古人有以珠玉等物随葬的礼俗，《荀子》说“衣服曰赗，玩好曰赠，玉贝曰琯”，“赠赗所以送死也”；<sup>⑭</sup>“姜枣”或许就是比作珠玑、玉贝之类的殉葬品。此外，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有“赍棺”的条目，释为“赠送死者

之棺木也”，也认为“赍”可以用于死人。<sup>⑥</sup>

其实，在《考证》成书前一年出版的庄适、胡怀琛、叶绍钧选注的《史记》（万有文库本），就已经对“赍”作了正确的注解：“持以与之也。”

至于“荐以木兰”，“荐”有进献之义，如《左传·隐公三年》：“潢、汙、行潦之水，可以荐鬼神”，是常见词义，无须论证。

总之，“赍”“荐”两动词应释为与祭葬有关的意义，同“为椁”“为棺”“祭”“衣”“葬”相一致。“赍以”两句字面意思是：用姜枣来送葬，再献上木兰；实际是指：用姜枣来调味，再加进木兰作佐料。

#### 附 注

①如：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郑叔中《史记选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

③王伯祥在《史记选》注文里指出了这段文字的修辞特点：“故意用棺、椁、赍、荐、祭等丧仪的字面，随口打趣。”

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考证》还指出：赍，《艺文类聚》“引史作齐”。

⑤⑥同②。

⑦刘文典《庄子补正》，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⑧参看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9，光绪17年本。（或：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⑨重印本第38册，1982。所引书证似与释义不尽相合，故不录。

（原载《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

# 深深植根于爱的沃土

——评《她的中国心》

田 增 科

徐福铎的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在8月号《中流》杂志登出后，很快就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全文转载。读者争相传阅，乌云老师的事迹，感动着千千万万和她有着同样“中国心”的中国人。特别在广大教师中间，反响尤为强烈，他们从乌云身上，看到了做人、从教的的一个新高度，找到了不断进取的一个新的参照系。那就是：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为了下一代，奉献出你全部的爱。

一篇几千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一时间在中华大地上竟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这是文学界近年所少有的。可以说，它是近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可喜的新收获，是作家响应党的号召，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向人物心灵深处窥视、开掘，为共和国一个普通公民竖立起的一座爱的丰碑。

是的，全文字字句句渗透着人间的至爱。是爱的哺育，使乌云这个日本孤儿才获得了新的生命；是爱的奉献，使乌云这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才获得了人民那样真诚的尊敬。深深植根于爱的沃土，这就是乌云；为社会主义祖国无么奉献，这就是乌云合着时代拍节而跳动的一颗“中国心”！



乌云——她的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这个四十多年前在侵华日本法西斯武士道惨剧中幸存下来的日本孤儿，能活到今天，能有今天虽不富有但却生活得充实而有意义，成为一名受人爱戴的人民教师，岁月的风风雨雨，该是多么不容易啊！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围绕着乌云的成长，就是一曲曲动人的爱的哺育的颂歌。

首先，当然是她的蒙古族阿爸和汉族阿妈，两位善良的中国牧民。是他们，“从死人堆里把她捡回了家”；是他们，从自己嘴里抠出口粮，一口口把她喂养长大。请再仔细读一读《妈妈，妈妈》一节里，那些动人的片断描写吧：

“当她捧起盛着热腾腾的拨面的碗，多少次看到阿爸、阿妈在一旁悄悄吞咽着野菜。”

“那次，她发高烧，阿妈做了拨面，端着碗，举着勺，守在她身边；唤着她，等着她；多想让她吃一口，她不想吃，闭着眼睛发抖”。“她醒来，看见阿妈结结实实地搂着她，为她捂汗，双层的大被紧紧盖着母女俩，淋漓的大汗已经把被褥湿透。”

多么善良可亲的父母，多么动人心扉的细节。善良，慈爱，真诚，这就是中国父母为她上的人生第一课。乌云幼小的心灵里，注满了母爱的温馨。

她上学了，生活的天地扩大了。这时，来自老师的爱，来自同学的爱，来自党和国家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较之一般的母爱，自是有了更高层次。“学校了解他的身世，让她享受了特等助学金”，“她被保送上了大学，特等助学金伴随她一直到大学毕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祖国对下一代的辛勤培育与殷切期望，给乌云的“中国心”更镀上了

矢志不渝为真理和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灵光。这，便是她热爱中国，终于选择了中国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她曾深情地说：“我是一位日本人，我爱生我的祖国日本，更爱养我的社会主义祖国！我几次放弃回日本定居的机会，因为我深切感到，日本虽然物质生活很富有，但物质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在中国，我精神愉快，内心充实；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人民，已经离不开山区的孩子们……”（徐福铎《我为什么写乌云老师》，1990年9月8日《中国教育报》）

“灵台无计逃神矢”。爱的神箭，就这样把乌云的心与养育她的社会主义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了。祖国和人民对她的爱的哺育，在她的心灵里犹如太阳能的储积；又像能量的释放，把这爱再无私地奉献给孩子们。乌云觉得这是她应尽的神圣义务与责任。确确实实，乌云用她的爱心，谱写出了催人泪下的奉献者之歌。

三十年播种育苗，三十年呕心沥血。在《我的生命属于中国》一节里，作者采用近似电影镜头的叠印手法，以“乌巴克西”（蒙语：老师）的亲切呼唤，引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映现出一幅幅鲜明的画面：对莫日根的因材施教；对金小的慷慨资助；帮花宝哈，化顽石而为铁；教包玉山，经淬火面成钢……。“三十年来，她教的学生数以千计，有多少孩子曾经在她家里住，在她家里吃；有多少孩子想喊她妈妈，刚入学的孩子大都十二、三岁，生活不能自理，她既当班主任，又当保育员，学生们从家里带的炒面、干粮都放在她家里，她给他们热着吃；学生们想家了，她给他们出路费；学生们病了，她往医院里背，从家里端来可口的饭菜。她很乏很累，但她为幼小的学生们拆洗了多少床被褥；她不富有，但她为因

难的学生贴了多少薪水。”一桩桩，一件件，从这些看起来平常琐屑的事情上，我们岂不仿佛看见了，她曾经承受过的母爱的折光？岂不仿佛聆听到了，这位曾经受到过社会主义祖国良好教育，如今又自觉地移恩泽于他人的人民教师爱的心律？

祖国和人民对她的爱的哺育，滋养她长大成人，成为一名有理想、有觉悟、有知识的人民教师；她把爱又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奉献给她的学生们，使她的情操和人格一起得到升华，成为一个共和国为之骄傲的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乌云老师对于我们这个国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她的典型意义，大约正在于此吧。

教育可以塑造人，教育可以净化人。乌云之所以在两个祖国之间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正显示出了教育的伟大力量。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她有机会体验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姑且不去说格根庙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吧。单是两次瀛洲之行，与她长年在库伦沟的单调而充实的教书生涯的对比，就在她心灵的天平上产生几多的倾斜与感情的不平衡啊。不错，日本有她的亲哥哥，有哥哥宽敞的住宅，有繁华的衡市，有现代化的享受，有哥哥为她描绘的“只要回国定居”，“一切均不用考虑”的蓝图。但是，这些使她感到的却是“陌生”、“冷情”，“一种难言的惆怅和孤独。”而她在库伦沟的家，虽只有两间小屋，一席泥炕，她却一想起就感觉“温暖”、“充实”，因为这里“浓缩着人间的情和爱。”《身在瀛洲》一节，写得多么感情激越，令人心潮难平啊。作者采用两地场景交替呈现的画面对比方法，透视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她的爱，她的情，丝丝缕缕，都牵着

她生命中扎下的中国根：

“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活泼可爱的孩子，淳朴憨厚的乡亲，离了他们，就失去了乐趣，像被暴雨打失的羔羊；就失去了根基，像被狂风卷折的小草。”

人生经历告诉她，物质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精神愉快，内心充实，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事业有成的人，这才是值得终生为之追求的啊。乌云的“中国心”像草原上的一泓湖泊，纯净而明澈；乌云的性格里，已经铸进了牧民的执着与强悍。明乎此，就不会惊异于她做为一个血管里流着日本血液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哥哥嫂子陪着她在电视机前观看中日女排之战”时，“不知不觉地竟为中国队大声叫起好来”；明乎此，就会很容易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恋着科尔沁草原这片热土，两次飞去了，又两次很快地飞了回来，像孩子般投入母亲的怀抱。她心里装的是五星红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装的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与骄傲！

作者在谈采写体会时说：“创作呼唤真实与崇高，应该塑造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力量与人格力量的形象，以净化人们的灵魂，激发人们的理想，振奋民族精神。”（徐福铎《我为什么写乌云老师》）现在看来，他不光做了这样的努力，事实上，他已经很好地实现了他从思想到艺术所追求的目标。经过作者深入地采访与挖掘，特别是“我的中国心与她的中国心产生了共鸣”，现在，矗立凸现于读者面前的乌云老师，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力量，闪烁着时代光芒的典型人物形象。

这篇报告文学在写法上，也如他所描写的主人公一样的本色、自然。作者没有过多的做文学性的渲染，只是款款叙

来，讲着一个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作品以乌云“乘中国民航客机向大阪飞去”，“银白色的飞机从大阪起飞，飞向大海”，飞回中国，为大的框架，把主人公半生悲欢离合的际遇，先剪碎，然后又加以组接，立起小标题，划分为五节，两条线索一主一副，超越时空，交错地描述展现。这样写，读者既能清晰了解主人公纵的生活历程，又能一幅一幅看到主人公横的、包含着眼泪也洋溢着欢笑的逼真生活画面，使它具有了感染人的力量。

笔者也是一个教师。读了这篇报告文学，既感到了作家能为一位普通教师立传的欣慰，又深愧较之乌去老师，自己对于祖国、对于事业的爱与执著追求还相去甚远、甚远。希望文坛上多出现这样的好作品，希望我们的作家，我们的人民，都有一颗像乌云老师一样晶莹、透亮的“中国心”！

（原载《作品与争鸣》1990年第11期）

# 谈谈现代汉语中的 “VP+得/不+了”的格式

饶勤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补语是外国学生学习语法的一个难点。为了帮助学生掌握这部分内容，我们探讨了补语中的一些问题，本文想讨论一下儿句法格式“VP+得/不+了”的两个问题。

第一，现代汉语中“VP+得+了”的使用情况。

“VP+得/不+了”是可能补语的一个类型。有人把它看成固定格式，这是很恰当的。从结构上看，“VP+得/不+了”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VP”可以是单个的动词，也可以是单个的形容词）它不象别的动词词语中间可以插入其它成分，比如一些动宾结构的动词，如“当家、出头、作主、得势、掉队”等，进入到“VP+得/不+了”的结构我们不说

\* 出头得/不了      \* 作主得/不了      \* 掉队得/不了

而要说：出得/不了头      作得/不了主      掉得/不了队  
因为这个固定格式要把动词中的宾语离析出去，使它成为整个结构的宾语，才站得住。从意思上看，整个格式表示一个

固定的意义，即“有（没有）某种可能性”。

我们知道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的使用率远远低于否定形式。<sup>①</sup>这里想讨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使用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

当 VP 是动词

吃得了|吃不了    喝得了|喝不了    抽得了|抽不了  
看得了|看不了    学得了|学不了    听得了|听不了  
睡得了|睡不了    到得了|到不了    说得了|说不了  
打扫得了|打扫不了    凑合得了|凑合不了    解决得了|解决不了

接待得了|接待不了    实现得了|实现不了  
由得了|由不了    值得了|值不了    算得了|算不了  
怪得了|怪不了    欺骗得了|欺骗不了    吓唬得了|吓唬不了

成全得了|成全不了    征服得了|征服不了

一般说，“VP<sub>能</sub>+不+了”都能成立，而“VP<sub>能</sub>+得+了”则不一定，如我们一般不说“由得了，算得了，怪得了，成全得了”等，如果说也只限在下面的情况下。

一、在反问句中可以使用。

如：这事儿怪得了小王吗？

他们靠武力征服得了非洲吗？

这家由得了你吗？

由于反问句表达的意思与它的形式相反，所以实际上只是用了肯定形式。

二、在问句的回答中可以使用，这种问句中必须含有“VP+得+了”，而不是用能愿动词提问。

如 这块表值得了二百块钱吗？

←—这块表值得了二百块钱。

或说——值得了。

当 VP 是形容词

好得了|好不了 新得了|新不了 红得了|红不了

软得了|软不了 乱得了|乱不了 难得了|难不了

浅得了|浅不了 穷得了|穷不了 快得了|快不了

明白得了|明白不了 容易得了|容易不了 热情得了|热情不了

积极得了|积极不了 便宜得了|便宜不了 聪明得了|聪明不了

当 VP 是形容词时，“VP<sub>得</sub>+不+了”都可以说，整个格式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推测和估计，而且说话人对自己的推测，估计有很大把握，令人不容置疑。

有人认为“VP<sub>得</sub>+得+了”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没有，我们认为“VP<sub>得</sub>+得+了”用得少是事实，可也不是绝对不用，在下面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一、当“VP<sub>得</sub>”表示变化意思时，“VP<sub>得</sub>+得+了”可以使用。

如：他的病好得了。

屋外的柿子软得了。

句中的形容词不再表示某种性质或者状态，而表示这种性质或状态的实现过程。补语“了”补充说明形容词进行的情况。当说话人说“软得了”时，软的性质还没有实现，说话人认为柿子有从不软到软的可能性。如果形容词在客观上没有变化的意思，那么“VP<sub>得</sub>+得+了”就不能说。



如：我们不说：“这条路近得了”。

因为“近”在这儿只表示性质，没有从不近到近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这么说。

另外还可以从说话人的愿望看，如果 VP<sub>得</sub> 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是说话人期望得到的，则“VP<sub>得</sub>+得+了”就可以说。比如我们说“这孩子聪明得了。”“新时期的农民富裕得了”，而不说“这孩子笨得了”。“新时期的农民穷得了”。有些中性 VP<sub>得</sub> 如果是说话人期望得到的也可以说。比如有一条裤子不合适，遇到个巧裁缝会说：“这条裤子长得了”。“这条裤子瘦得了。”一方而裁缝能使裤子由短变长，由肥变瘦，一方面也是说话人期望达到的。

二、在反问句中，“VP<sub>得</sub>+得+了”可以使用。

如：他平时作业就这么马虎，考试仔细得了吗？

在饭馆吃饭便宜得了吗？

这类情况与 VP<sub>得</sub> 一样，虽然用的是肯定形式，却不表示肯定的意思。

三、在问句的回答中可以使用。条件是问句中必须含有“VP<sub>得</sub>+得+了。”

如：(1) 这天儿把肉放在晾台上坏得了坏不了？

坏得了。

(2) 暖气还热得了吗？

还热得了。

第二，试分析“VP+不+了”中“VP”的语义特征。

先看例句

(1) 这么多的饭，我吃不了。

(2) 这饭尽砂子，我吃不了。

同是“吃不了”表示的意思不同。例(1)“了”表示“完结”，的动词，意思是“饭太多了，我吃不完。”例(2)的“了”也是动词，却不表示“完结”，“了”没有意义。意思是“这饭尽砂子，我不能吃。”对例(2)，赵元任先生在《北京口语语法》中曾经提到过，他认为“了”没有意义，“是一种傀儡补语”。<sup>⑩</sup>这个名称很形象，严格地说，这种傀儡补语应该叫可能补语的特殊类型。由于一种句法格式既能表示傀儡补语，又能表示意义的补语，就有可能产生歧义，赵元任先生认为要消除歧义只能利用上下文。我们认为除了考虑上下文，还可以考虑“VP”本身，因为“VP”是格式中唯一的变量。我们注意到更换VP，可以使格式的意义发生变化。比如单说“吃不了”，既可能是有意义的补语，也可能是傀儡补语，而单说“死不了”，就只能是傀儡补语，不会是有意义的可能补语。这说明“VP”的不同，对格式是有影响的。我们暂且把能表示两种意思的VP叫“VP<sub>1</sub>”，把只能表示傀儡补语一种意思的VP叫“VP<sub>2</sub>”。

#### VP<sub>1</sub> 举例

吃不了 喝不了 抽不了 盛不了 用不了 花不了  
看不了 说不了 做不了 干不了 裁不了 装不了 运不  
了 搬不了 要不了 买不了 洗不了 穿不了 种不了  
考不了 批不了 写不了 搁不了 消化不了 回答不了  
接待不了 吸收不了

#### VP<sub>1</sub> 的语义特征

(一)VP<sub>1</sub> 必须是及物动词。VP<sub>1</sub> 都具有弱持续性的特征，而且在一定时间里这些VP都能重复进行。如“吃”，它的持续性很差，可是在一段时间里可以重复进行，而如“忘”，虽

然是及物动词，可是“忘”是强持续性的动词，动作发生以后不可能再重复。

(二)  $VP_1$  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有量的规定性。所以说  $VP_1$  所涉及的对象不能处于单个状态。量是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可以用数量词组，也可以用名词词组，代词词组或者以代词为修饰成分的偏正词组。对具有一定数量的对象， $VP_1$  才有重复进行的可能性，补语“了”才有“完结”的意思

如：(1) 我一天抽不了一包烟。(烟的量由数量词表示。)

(2) 这么多的房间，我打扫不了。(房间的量由偏正词组表示。)

因此，当  $VP_1$  涉及的对象具有一定量时，我们就可以断定它是表示“完结”意思的可能补语。

比较：(1) 这房子我收拾不了。

(2) 这么多房子我收拾不了。

例(1)的“房子”没有数量规定，“收拾不了”是傀儡补语，例(2)的“房子”有一定数量，“收拾不了”是表示有意义的可能补语。

(三) 不论是“ $VP_1$ +不+了〔完结〕”还是“ $VP_1$ +不+了〔傀儡〕”都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推测，这两种格式都能用愿动词“不能  $VP_1$  (完)”代替。

如：(1) 我一天抽不了一包烟。(我一天不能抽完一包烟)。

(2) 这烟我抽不了。(这烟太呛，我抽不了。)

而当  $VP_1$  所涉及的对象没有数量规定时，也可以用“不会  $VP_1$ ”代替。

如：他是个老实人，干不了这种事。(他是个老实人，不

会干这种事。)这里要强调“VP<sub>1</sub>”涉及的对象没有数量规定,否则就只能用“不能 VP<sub>1</sub>”代替。

如:我们一上午干不了二十亩。

可以说:我们一上午不能干完二十亩。

不能说: \*我们一上午不会干二十亩。

VP<sub>2</sub>:

死不了、活不了、困不了、醒不了、病不了、离不了、出不了、渴不了、去不了、走不了、戒不了、饶不了、休息不了、迟到不了、凑合不了、折腾不了、贵不了、贱不了、硬不了、矮不了、卫生不了、干净不了、新鲜不了、明白不了。

VP<sub>2</sub>的语义特征:

VP<sub>2</sub>的范围比 VP<sub>1</sub>大,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形容词都可以。(出现在可能补语中的动词都是口语中常用的。我们不说 \*飞翔不了、\* 注视不了等。) VP<sub>2</sub> 都没有弱持续性的特征。如“死、想、爱、恨”等都是强持续性的动词,而“醒、困、惹、饶、走、去”不是强持续性的,却不能在单位时间里重复进行。如“离不了”,这个动词发生以后,离的状态就形成了,不能重复。

二、VP<sub>2</sub>所涉及的对象没有量的要求。这主要是针对 VP<sub>2</sub> 中的及物动词说的。“VP<sub>2</sub>+不+了”是“了”不表示意义的傀儡补语,格式中的“不”不是否定补语“了”而是否定 VP<sub>2</sub>, VP<sub>2</sub> 没有重复进行的特征和“了”不表示意义是一致的。所以 VP, 所涉及的对象有没有数量规定,对整个格式没有影响。

如:(1)我一个人去不了那个地方。

(2)我一个人去不了那么多地方。

例(1),例(2)都是傀儡补语,虽然例(2)有一定数量,可

是“去不了”仍是“不能去”，而不是“去不完”。

三、“VP<sub>2</sub>+不+了〔愧儡〕”除了能用“不能VP<sub>2</sub>”代替，还能用“不会VP<sub>2</sub>”代替，这与“VP<sub>2</sub>+不+了〔愧儡〕”不同，用“不会VP<sub>1</sub>”“VP<sub>1</sub>+不+了”代替，要以VP<sub>1</sub>所涉及的对象没有数量规定为前提，而“VP<sub>2</sub>+不+了”用“不会VP<sub>2</sub>”代替是没有条件的。

比较（1）有你管着，他抽不了烟。

（2）队长饶不了他们几个人。

例（1）的动词是VP<sub>1</sub>，全句意思是“有你管着，他不会抽烟”，因为VP<sub>1</sub>的对象没有数量规定。例（2）的动词是VP<sub>2</sub>，虽然VP<sub>2</sub>涉及的对象有数量规定，全句仍表示“队长不会饶了他们几个人”。

能愿动词“会”和“能”都表示具有某种可能性，但是二者是有区别的。

比较：（1）外面太吵了，他睡不了。（…不能睡）

（2）时间还早呢，他睡不了。（…不会睡）

（3）她一个人出了门。（…不能出…）

孩子有老师带着出不了事。（…不会出事儿）

这种区别能帮助我们辨别“VP<sub>1</sub>+不+了〔愧儡/完结〕”和“VP<sub>2</sub>+不+了〔愧儡〕”。

对“VP+不+了”中的“VP”的语义特征的分析很肤浅，只观察到一些现象，就勉强列出了一二三，请各位专家、读者指教。

注：

①刘月华《可能补语用法的研究》，载《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

③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第210页  
《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 “沉郁顿挫”论

王 南

杜甫天宝十三载作《进雕赋表》(据仇兆鳌《杜诗详注》),以“沉郁顿挫”自许其作。杜诗影响渐大,此四字遂成为评杜的专用语,进而又成为文学理论中使用率颇高的概念,并得到了文论家的阐发。“沉郁顿挫”是杜甫创作风格的重要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已见于众多的杜诗专论。本文拟就“沉郁顿挫”的文学理论内涵进行探讨。

## 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多见于古代诗论著作。而“沉郁”一语,原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汉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文评扬雄《方言》一书云:“非于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良为勤矣。”(《全汉文》卷四十)梁任昉《王文宪集序》用语与此相类:“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沉郁澹雅之思,离坚合异之谈,莫不摭制清衷,逸为心极。”(《文选》卷四六)陆机《思归赋》:“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深。”也是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而这种“沉郁之思”及由此形成的文风,往往与诗人的个性、学识、阅历相关。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如唐李峤《上高长史述和诗启》即有“才非沉郁”语(见《全唐文》卷二四七)。广

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如杜甫即把“沉郁”的文风与“鼓吹六经，先鸣数子”的学识修养并提；《退庵诗话》言：“子美以学力胜，故语多沉郁。”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如司空图《送草书僧归楚越》言“以导江湖沉郁之气”（《全唐文》卷八〇七）等。凡此都可以在杜甫及具有同类创作风格的诗人的为人为诗中得到印证。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在这篇体现作者的诗论思想的纲领性文字中，钟嵘在称颂他所处的时代的同时，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此处的“沉郁”仍是指理性思维的深远有致，但已涉及诗歌内容的表现和诗歌艺术的评赏。从《诗品》书中也可见，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灵祇待之以改煇，幽微藉之以昭告”（《序》），“文已尽而意有余”，“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文繁而意少”和“但用赋体”的“意浮”之作。而《序》中“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一段文字，更是鲜明地指出了诗人在作品中表露的深沉之思与变化动荡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联系。在品第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如评《古诗》“意悲而远，惊心动魄”，托名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曹植诗“情兼雅怨”，阮籍诗“发幽思”，“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左思诗“文典以怨”，“深于潘岳”，应璩诗“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颜延之诗“情喻渊深”，等等，都与杜诗的“沉郁”相近。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



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期。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先于杜甫的自许，宇文道《庾信集序》以“吟咏情性，沉郁文章”评庾作（《全后周文》卷四）。又如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评张九龄诗：“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评李百药“翰藻沉郁，诗尤所长”等。而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沉郁”在杜甫的创作和对杜诗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现。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著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浦起龙指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读杜心解》卷四之一），“快”者，轻灵畅快，恰与“沉郁”相对，即为一证。“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望岳》），“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独坐》），真如幽谷寻径、泥途曳足。甚至见于清浅小景：“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秋雨叹》），甚至自遣文字：“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甚至调笑笔墨：“西汉亲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戏题寄上汉中王之

首》。天地岁月、人生家国之感无从化解，诉诸笔下，时见尽情铺叙又神收意敛，成为一种“赋”中之“兴”的文势，皆雄浑凝重，发人深思。杨伦评杜《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诗曰：“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并以《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诗为例。虽然严氏“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说为后人所非议（如钱振铎《滴星说诗》），但以“飘逸”、“沉郁”概括李、杜二家诗作的风格，却颇能得其神韵，几成不易之论。

杜诗的“沉郁”，不同于李白的飘逸，也异于白居易的质实或李贺、孟郊的凄苦。简言之，主要有如下内涵：其一，对屈原等前辈诗人抑郁、发愤精神的有意识的继承。杜甫崇尚屈原及屈作，首先是基于杜稷宗法、道德操守及自我信念上的认同。屈、杜在精神上乃至创作上的这种共通之处，古代文论中多有论及，如《昭昧詹言》卷八引朱熹评屈原《九章》之“愤懑而极哀悲”时，认为“杜公居夔居潭诸诗，正是如此”。又言“杜公立志，许身稷契，全与屈子同。”（又见方东树的“沉郁”说）《白雨斋词话》卷一说：“不根抵风骚，乌能沉郁？”都是有代表性的看法。其二，在思想本潭与儒家的政治、人格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位“在儒家界内”（《艺概·诗概》）的忠臣，杜甫一生视朝纲的重振和自身价

值的实现为一体。他不满现实，却能自觉地“止乎礼义”，矛盾、愤懑的情绪经过头脑中规范而严谨的儒学体系整理，流至笔底的只能是不激扬、也不偏狭的“沉郁”了。正如胡应麟评杜甫“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二句为“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凉之思”（《诗薮》内编卷五）。《昭昧詹言》评及杜诗“用意用笔，怨而不怒”（卷二），《白雨斋词话》讲“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序），“性情之厚”（卷一），也指出了“沉郁”的诗风与儒家思想、儒家文学观的这种关系。其三，杜诗在起兴、取象、结篇等艺术表现方面的特色。即《沧浪诗话》中与李白诗之“飘逸”相对而言之意，也即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称道元结诗“比兴体制，微婉顿挫”的由比兴见微婉之意。这一点多见于论著，前文也已论及，不赘。

## 二

讨论“沉郁顿挫”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意义，应了解清人方东树和陈廷焯的“沉郁”说。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以“桐城派”的观点论诗文，尤重“义理”。他视“沉郁”为优秀诗文的重要特点，认为这一特点贯穿于自屈赋、杜诗至清诗的一切成功之作中。方氏结合实例反复使用“沉郁”的概念，主要体现了如下认识：首先，杜甫仍是“沉郁”诗风的代表者，其“沉郁”表现在“一气喷薄，真味盎然”、“苍凉悲壮，随意下笔而皆具元气，读之而无不感动心脾”（卷八）等整体风格中。评曹植《赠白马王彪》之“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卷二），杜诗继承了这种风格特点。其次，评析汉魏诗作中的“沉郁”，指出这正是杜诗“沉郁”之风的近源。如评

古诗《结发为夫妻》“沉郁顿挫，后惟杜公有之”，曹操《苦寒行》“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嗷杀，后来杜公往往学之”。曹植诗中的沉郁顿挫也有“开杜公之宗”的意义。（以上俱见卷二）这也证实了《杜诗镜铨》言杜诗的沉郁顿挫得汉魏“神理”非孤立之见。再次，方氏指出，庄、骚同为雄奇浪漫的“天地之至文”，已有“醒豁呈露”与“沉郁深痛”之别。“沉郁”中必有“深痛”之情，而汉魏风骨正是承接了屈赋的“沉郁深痛”——不仅是文风，更是精神取向，故屈子的“沉郁”是杜公的远祖。这与前文所论杜诗“沉郁”的内涵也是一致的。《昭昧詹言》虽然往往兼论“沉郁”与“顿挫”，但二者实有内体和外用之分（参后文）。

诗词作品中的“沉郁”风格在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得到了大力推崇和理论表述。针对浙派词家的后进者所渐生的浮滑浅碎之病，陈廷焯总结了自己早年学杜的经验，标举“沉郁”：“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自序）“作词之法，首贵沉郁”，“诗之高境，亦在沉郁。”（卷一）并对“沉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沉则不浮，郁则不薄”，“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离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抵风骚，乌能沉郁？”（卷一）“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卷二）“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卷三）“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沉至。故知沉郁二字，不可强求也。”（卷四）“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

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卷六）“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然必须沉郁顿挫出之，方是佳境。”“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卷七）

陈廷焯不仅象方东树一样视“沉郁”为古今佳作的共同处，如卷一言：唐、宋名家词“似不必尽以沉郁胜，然其佳处，未有不沉郁者”，并且把“沉郁”或“沉郁顿挫”讲为一种包括从诗、骚之学的风雅、比兴，六朝、唐宋论家的“神”、“言外”、“境”、“穷而后工”，到清代浙西、常州词家的“清空”、“醇雅”、“意内言外”、“幽约怨悱”、“寄托”诸说的最高诗学标准，建立了虽宽泛却不肤浅的“沉郁”说。其说大致有四层意义：（一）作品内容充实，又须有言辞之外的神韵，即“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等。（二）来自现实生活的哀怨之情，出之以比兴手法，即“怨夫思妇之怀”、“孽子孤臣之感”；卷二评王沂孙词以“沉郁”与“超脱”相对而言，也是沉郁之情的现实感。凡此“皆于一草一木发之”。（三）抒情表意的含蓄委婉，即“若隐若见，欲露不露”、“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等。（四）体“温柔敦厚”之旨，达厚人伦、成教化之要，即“温厚以为体”、“温厚和平，诗教之心”等。陈氏“沉郁”说思想上本于儒家的诗教观，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结了传统诗论注重真情实感、讲究蕴藉、神韵的观点，较为周详地表述了“沉郁”作为艺术观范畴的内涵。

### 三

以“沉郁”论诗文，来自论者对作品由一定的情志内涵决定的表现风格的感受。通过对“沉郁”的原始字义的考辨，也可以逐步印证古代文论家对作品风格的论断。《说文》：“沈，陵上滴水也。”此义已消亡，段注甚明：“谓陵上雨积停潦也。

古多假借为湛没之湛，如《小雅》‘载沈载浮’是。”“沈于水中”和“湛（沉）没之湛（沉）”都是沉入水下、质重不浮的意思，故又有“沉重”等语；引申为程度之深，故又有“沉思”、“沉痛”等语。用于文学范畴时，“沉”字多为深沉含蓄之意，既包含“重”（内容充实），也包含了“深”（感想深刻）。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讲七言律字法，以“沉实”与“虚响”相对（卷一），《诗归》引此语评杜诗。而“沉郁”二字成语，则有进一步的意义。郁（古“鬱”字，非古“郁”字）原为草木丛生、蕴积之意，引申为阻滞不通。而用于“沉郁”，则是描述一种愤懑、哀怨的精神状态，实即古典中的“郁陶”、“郁结”之意。《夏书·五子之歌》：“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传曰》：“郁陶，言哀思也。”《正义》曰：“《孟子》称舜弟象见舜云：‘思君正郁陶’，郁陶，精神愤结积聚之意。”按：《孟子·万章》象见舜语原文为“郁陶思君尔”，《楚辞·九辩》有“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句，皆为《五子之歌》语的化用。屈原《远游》：“独郁结其谁语！”王逸注为“思虑烦冤，无告陈也”。按：屈赋中用“沉”、“郁”字样处很多，最适于讲解诗中“沉郁”本义处莫如《九章·惜诵》中二句：

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佷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此处“沉”、“郁”在互文的二词中对举出现，描述烦冤恨痛又无处告陈的内心情感，可视为“沉郁”一语的语源，合于古代汉语词汇演进的常例。在屈赋诸篇中，这种“哀思”、“精神愤结积聚”、“思虑烦冤”的沉郁之情是其诗兴之所发，亦即《惜诵》“发愤以抒情”之意，因而李白有“哀怨起骚

人”（《古风》）之说。这是中国文学“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传统观念在抒情文学中的表现。屈赋是中国文人创作中“沉郁”之作的开端，而中国的文人文学起始即与“沉郁”的精神和文风结下了不解之缘。

#### 四

作为文学理论概念，“顿挫”主要指诗歌作品中言辞表现的曲折变化和音律声调的跌宕起伏。“顿挫”成为一个专用语汇，源于对文字著述中的语言特点的评论，起初并非仅指诗歌作品的语言。西晋陆机《遂志赋·序》中即用“抑扬顿挫”评冯衍的《显志赋》；在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文赋》中，陆机分论各种文体，有“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之说，把着意而为的这种音、义变化视为“箴”的主要特征，自此“顿挫”成为文学评论的术语。钟嵘《诗品》在评谢朓诗后说：“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虽是在讲诗人谈诗时的言行风貌，实际上也是通过对比讲诗中表情达意的语言风格。后来唐人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即用“感激顿挫”四字评价陈子昂的诗文。

杜甫称自己的作品“沉郁顿挫”。如果说，“沉郁”的诗风主要体现了杜甫内在情志、学识修养的自然流露，那么“顿挫”的语言风格则更多地见于他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体现了诗人崇尚奇峭和壮美的美学思想。除了杜诗、特别是后期杜诗中大量音节道劲、语势顿折的作品外，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中以“微婉顿挫之词”赞元结诗，也是这种追求的证明。随着杜诗影响的增大，“顿挫”也逐渐成为评杜甫乃至其他诗人的语言风格的专用语。如宋范温《潜溪诗眼》云：“如老杜《上韦见素》诗，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

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见素别，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后顿挫高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引）刘克庄《后村诗话》评许浑诗，认为在“抑扬顿挫”方面不及杜牧。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论唐七言歌行：“转折顿挫，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卷一）《杜诗详注·附编》引明屠隆评杜诗语：“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又引清吴斋贤《论杜》评杜诗句法的“顿挫感叹”。翁方纲《石洲诗话》也论及杜甫五律的“沉郁顿挫”（卷一）和李商隐诗的“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卷二）等。方东树《昭昧詹言》更是大讲诗法的“顿挫”，与其“沉郁”说相辅相成。清马荣祖《文颂》仿司空图《诗品》体例，内有《顿挫》一首云：“气鼓斯行，势郁乃倡。见似息机，弥复道上。水入壘塘，峡束惊浪。奋跃无前，控勒不放。万钧逆挽，玉钩力壮。戛摩啞哑，悬空激宕。”形象而又准确地描绘了“顿挫”之文那种既奔涌又羁束的文势。除此数家外，古代诗文著作中常有“顿挫”二字出现。今天的文学著作，也大都沿袭了释“顿挫”为表达的转折和音律的抑扬的说法。

## 五

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否仅把“顿挫”理解为创作形式上的要求就可以了？由原始字义看，顿：顿首，引申为停留、止息；挫：摧折。用于描述文字语言的特点，是语言的停顿，即指在连缀前行的流动的音节中出现着力停顿、高低抑扬的音调变化和意念表露的曲直、收放的节奏变化。这种变化，在带有应用性质的作品中是作者为强化阅读效果的



刻意所为；在以抒情为主的作品中，则遵循作者情感外释的特定要求。如《文赋》言“箴顿挫而清壮”，而箴是一种“通于官”、“警戒”、“御过”、有“德轨”作用的文体（见《文心雕龙·铭箴》），故《文选》李善注曰：“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张铣注曰：“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须仰折前人之心，使文理清壮也。顿挫，犹抑（仰）折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顿挫”的文笔是为作品内容的作用服务的。另几家注《文赋》者讲得更为清晰，如方廷珪曰：“箴以自砭得失，故须顿挫清壮。顿挫，谓不直致其词，详尽事理。”（《昭明文选大成》）程会昌《文论要论》引《国故论衡·辨诗》曰：“箴之为体，备于扬雄诸家，其语长短不齐，陆机所谓顿挫清壮者，有常则矣。”是讲文字表达。王闿运《湘绮楼论文章体法》曰：“箴当耸听，故尚顿挫。”则音、义兼有。按：陆机在文学理论史上首先明确地表述了文学的抒情本质，其“缘情”观贯穿于对诸种文体的研究中。曹丕《典论·论文》中的“铭诔尚实”在《文赋》中成为“诔缠绵而凄怆”的抒情特征的讲示；《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只涉及了文学创作的文彩特征，在《文赋》中则发展为“诗缘情而绮靡”，情内而言外。至于赋，《文赋》虽只言“体物而浏亮”，但陆机自作的《叹逝》、《思归》等赋皆情、辞俱富；《遂志赋序》评冯衍《显志赋》“抑扬顿挫，怨之徒也”，更道出“怨”的情感为形成“顿挫”文风的内在原因。

唐世诗盛，“顿挫”进入诗歌评论领域，并且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诗风而得到提倡。在唐人看来，“顿挫”虽是音调的抑扬变化，但一定是与雄阔、悲壮的也就是沉郁的情感内涵相表里的，“顿挫”二字本身已带有这种情感色彩。如前所说，

这也是崇尚壮美的美学观在诗歌创作上的体现。宋黄彻评杜诗，指出“同学少年多不贱”、“小径升堂旧不斜”等句中以“不”字易“无”字，“皆人所不敢用”，目的在于造成“语势顿挫”的效果（见《碧溪诗话》卷七），除格律的要求外，确有以字法的顿挫求得壮格的意义。这是唐诗、特别是盛唐诗区别于齐、梁柔靡之风的重要特征。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与“彩丽竞繁”、“逶迤颓靡”相对而言的“音情顿挫”，正是由充溢胸怀的“兴寄”、“幽郁”之情酿出的激楚峭拔的唐音唐调。在“顿挫”中，“音”与“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按：“音情顿挫”，原见《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赞》：“北海天逸，音情顿挫。”注：“顿挫，犹抑扬也。”也是在讲内在的不凡情志外发为“越俗易惊”的诗文。

由此可见，“沉郁”与“顿挫”既可以视为一个范畴，也可以用于互为因果的两个概念。在杜甫“沉郁顿挫”的自许及后人对杜诗的评论中，“顿挫”之词也是“沉郁”之情的表现。杜甫以“为人性癖耽佳句”（《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觅句知新律”（《又示宗武》）、“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称，在他的许多诗作中，都可以见出对字句、音律的“顿挫”效果的着意营造。但他总是置来自现实实际的沉郁情怀为首位，“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偶题》），惊心骇目、不避丑拙的字、句常见于诗中，却并未减其“顿挫”。《遁斋闲览》言：“杜子美之诗，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碧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引为“悲欢骄泰”。）“发敛抑扬”与“顿挫”同义，由“悲欢穷泰”的情怀决定。杜甫的“沉郁”与“顿挫”可以分论，有内外、体用之别；但惟“沉

郁”能成真“顿挫”，非“顿挫”不能表真“沉郁”，二者又本为一事。

## 六

方东树《昭昧詹言》视“沉郁顿挫”为一体，然而也有相当的篇幅专论“顿挫”，或言“顿断”、“顿住”、“沉顿”、“顿束”、“顿折”等，他如“突转勒住”、“倒卷反掉”等也是顿挫之意。观全书，《昭昧詹言》的“顿挫”说大要有三：一，“顿挫”是章、句之法，并且为古今佳作的共有特征。即所谓“章法深妙”、“顿挫之法”、“有往必收，无垂不缩”（以上卷一），“顿挫断住”、“用笔转换顿挫”、“顿挫束上，却用倒法，文法伸缩变化”、“换笔顿挫”（以上卷二），“章法文法，曲折顿挫”（卷四），“故为顿挫往复，以避轻便滑利顺直无留步之病”（卷五），“而衔接承递一串，不伤直率，以笔笔顿挫也。顿挫者，句断，不将两句合一意，使中相连，中无罅隙，含蓄成叶子金。”“大约诗章法，全在句句断、笔笔断，而真意贯注，一气曲折顿挫，乃无直率死句合掌之病。”（卷十七）等等。讲为音律如言杜诗“淋漓顿挫，音响绝凄惋”（卷十七）处很少。二，“顿挫”是作品气势有无和高下的关键。即所谓“词气抑扬顿挫”，“气势之说，如所云‘笔所未到气已吞’、‘高屋建瓴’、‘悬河泄海’，此苏氏所擅场。但嫌太尽，一往无余，故当济之以顿挫之法。”（以上卷一）“宾主往复历落，语势浩然，用笔转换顿挫，峥嵘飞动”，“文法伸缩变化，笔势浩汗莽苍”，“时时提笔，换气换势。”（以上卷二）“气势浩迈，跌宕飞动，顿挫沉郁”（卷四），“诗文贵有雄直之气，但又恐太放，故当深求古法，倒折逆挽，截止横空，断续离合诸势。”（卷九）“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

穷极笔势，迥不由人。”（卷十四）“大约有往必收，无垂不缩，句句接，句句断，一气旋转，而仍千回百折，所以谓之往复顿挫也。”（卷十六）反对“一顺平放”、“平铺直衍”、“直率”、“太快无顿挫”、“一直笔顺接”而乏“奇警”之作。换言之：既要有雄放的气势又须避免率浅之弊，必用“顿挫”法。三，由“顿挫”而达到文势的“浩然”、“峥嵘飞动”，是“桐城派”的“文法”、“义法”之论与其师姚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的具体运用。如卷十六评李颀《寄裴母三》诗曰：“此诗姚先生解最详，而曰：往复顿挫，章法殊妙，当思其语，乃有得。”方东树所论虽无很高的理论价值，但也从创作的角度较为集中地表述了“顿挫”的含义、用法和功效。

综观古代文学理论对“顿挫”这一范畴的运用和阐释，表现了不同层次的认识：

视为诗中音律变化的外在特点。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论长篇诗作：“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益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按：用“顿挫”状音响变化的效果也见于对音乐的描写，如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

不仅在音律，也在于文彩、章法的变化，是一种诗文之“法”。如惠洪《天厨禁脔》曰：“诗家尤贵遣词顿挫”，“夫言顿挫者，乃是覆却使文彩粲然，非如常格”，并归结为“顿挫掩抑法”。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曰：“翕辟顿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答周子书》曰：“开阖照应，倒插顿

挫。”《昭昧詹言》卷一讲“顿挫之法”，《白雨斋词话》卷一也讲词法中“有前后若不相蒙者”的“顿挫之妙”。《读杜心解》卷四评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之次句“初闻涕泪满衣裳”，言“于文势妙在反振”，“反振”即为顿挫之法。《沧浪诗话·诗评》称杜为“节制之师”，也着眼于杜甫诗法的顿挫有方。

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法则，更是内容的要求。如前文引《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赞》、《修竹篇序》皆言“音情顿挫”，《潜溪诗眼》评唐人小诗“其命意与所叙述，初不减长篇，而促为四句，意正理尽，高简顿挫”（《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五十四引），《艺概·赋概》曰：“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复致意’者。”

进一步说，是“沉郁”的个性、情感必然的言辞音律的表现。除前文所引陆机《遂志赋序》中语及诸家评杜诗“顿挫”语外，又如《岁寒堂诗话》评曹植诗中的“抑扬顿挫之气”（卷上），评杜诗中的“怀抱抑扬顿挫”（卷下），等等。

如此种种，虽有认识上的差异，但追求作品的委婉含蓄、变化生新，以求得更强的表现力、感染力，却是“顿挫”说或“沉郁顿挫”说的立论者和运用者的共同目的。不论单称“顿挫”、“沉郁”或是并言“沉郁顿挫”，“沉郁”情志总是或隐或显地处于主导地位。因而“沉郁顿挫”用于论作品的思想内涵时，“顿挫”二字即有悲抑苍劲的意味；而用于论语言风格，“沉郁”二字则又成为含蓄蕴藉的同义语。

本文所论简浅，但已可见“沉郁顿挫”作为文学理论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的诸种

关系。愿能在民族文学理论新体系的构筑中有砖石之用。

（原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 论语言的科学美

——兼论汉语民族性格之一

张 凡

科学一般总是与公理、定义、推理等逻辑思维以及各种实验相关联，在人们的印象中，它难得与美产生什么关系。近年来却出现了“科学美”一词，这是不是某些人的杜撰或是美学“泛滥”的产物？当然不是。实际上科学美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一个时期内由于一些学者片面强调艺术美面曾被冷落，近年来随科学、美学的深入发展，它重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自古以来，人们就感受到大自然、宇宙美，相信宇宙是有规律、有秩序的。古代的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都有一种从多样化中去追求统一的审美理想。古中国人曾处于领先地位（例如老子的对立统一观），但由于后来花了更多精力去研究人伦道德，忽视了对大自然所蕴含的和谐规律的深入探求，所以科学落后了。古希腊学者的心智为宇宙的奥秘、自然科学显示的美所吸引，他们执着地追求宇宙内在的秩序、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数的关系是统摄一切的要素、美在于和谐与比例的观点，并从音乐、雕塑、建筑，乃至天体的运行规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个观点对

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后科学家们力求以数学的完美形式来揭示大自然的内在规律。因为数学形式最能显示自然本质结构的简单、和谐与秩序。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科学美学的光辉典范。牛顿坚信，“自然界习惯于简单化，各类自然现象之间有它的内在相似性，自然界总是要保持自身的和谐一致的。”<sup>①</sup>到康德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和谐秩序，完全是大自然内部变化发展的结果，不必依靠什么上帝的神力。康德提出了星云说的假设并认为，“只要用引力和斥力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力，就足以说明大自然有秩序的发展了。”“自然界含有各色各样不同等级的多样性。”“一切事物都为永恒的和谐，依次联系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序列，这永恒的和谐使所有的环节彼此发生了关系。”比康德稍晚一些的法国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则认为，“自然的原因虽然简单，但其效果却很复杂，由少数的普适定律产生极复杂而众多的现象，这就是自然的经济性。”<sup>②</sup>到达尔文时代，科学美学观已从数理领域扩展到生物、化学等更多领域。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乃至后来 DNA（遗传基因）的发现为生物世界的和谐一致找到有力的证据，使生物世界显示出内在结构上的逻辑美、科学美以及发展变化的动态美。发展到现代，法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彭加勒则明确表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统一性和简单性作为科学理论美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更把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一科学美学理想视为一种信仰，一种对宇宙的宗教感情。他认为，在这种理想和感情的支配下，科学家可以据脱一切私欲的束缚而为科学献身。相对论就是在他一面为力学现象和电磁现象的统一而显示出的美所倾



倒，一面又感到它们不尽完美的情况下开始研究的。爱因斯坦正确指出，简单、和谐、思维经济等等，“并不只是指人的主观方面，是人的意识的自由创造，也不是人们为方便，为了节约脑力杜撰出来的。而是因为自然界本身的结构就是遵循着优化的原则。这就是说，大自然美的结构本身决定了它是最简单的排列。这种排列，这种秩序，就是自然界最经济的结构。”⑤

根据历代众多科学家实践经验及其科研成果的总结，我们可将科学美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简单面和谐一致的形式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即内在逻辑）规律。它所引发的美感与其他的美所引发的美感相同，是一种惊赞、快乐，深受感动的情绪；因为科学美的本质同其他美的本质一样，是在一种宜人的形式中显示了人的本质，是真与善的统一。不过，它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宜人形式特定为一种简单、和谐一致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所显示的美主要不是靠人的感官去感受，而是要靠人的心智去领悟；这里所说人的本质主要指人的智慧、才能，人的创造力，它的显现是通过自然事物内在规律的被揭露（如同谜底被拆穿）。如数学公式有许多都是对称的排列组合。试将  $(a+b)^n$  展开，其公式如下：

$$\begin{aligned}
 & a^n + n \cdot a^{n-1}b + \frac{n(n-1)}{2} a^{n-2}b^2 \\
 & + \frac{n(n-1)(n-2)}{2 \cdot 3} a^{n-3}b^3, \dots \\
 & + \frac{n(n-1) \dots (n-k+1)}{2 \cdot 3 \dots k} a^{n-k}b^k \\
 & + \dots nab^{n-1} + b^n
 \end{aligned}$$

即便不懂得数学，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便可发现公式中各项

系数、指数奇妙的、有规律的变化： $a$  的指数从  $n$  次起逐项递降至 0，而  $b$  则从 0 次起逐项递增至  $n$  次（所以起端是  $a^n$ ，尾端是  $b^n$ ）；而两端的系数则各为 1，次端各为  $n$ ，再次的两端也均为相同的数，且分别为  $(n-1)$  次展开式两项系数的和，恰相对称，排列起来则成为非常规则的三角形：

$$\begin{array}{cccccccc}
 & & & & & & & 1 \rightarrow (a+b)^0 \\
 & & & & & & 1 & 1 \rightarrow (a+b)^1 \\
 & & & & & 1 & 2 & 1 \rightarrow (a+b)^2 \\
 & & & 1 & 3 & 3 & 1 & 1 \rightarrow (a+b)^3 \\
 & & 1 & 4 & 6 & 4 & 1 & 1 \rightarrow (a+b)^4 \\
 & 1 & 5 & 10 & 10 & 5 & 1 & 1 \rightarrow (a+b)^5 \\
 1 & 6 & 15 & 20 & 15 & 6 & 1 & 1 \rightarrow (a+b)^6
 \end{array}$$

这是个多么简单而对称的公式！奇妙地和谐！而将任何复杂的数值代入公式都能迎刃而解。数学里如此奇妙的公式很多，它们如同悦耳的音乐实令人感到惊诧、快乐。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那和谐对称的形式简直就象是艺术创造，而它的内容又是那么精确地揭示了大自然中众多元素存在的规律。人们甚至据此表的排列而发现了新元素。事实证明：凡新发现的科学规律，只要尚未达到简单、和谐的地步，尚不能引起人们的赞叹，亦即尚未能显示出“美”时，也就必定不够“真”。因为大自然本来就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它是由结构层次不同的各类物质组成的，任何复杂的现象归根结蒂都是个简单的构成。

一切科学都不例外地具有美学意义。人类社会在本质上仍隶属自然界，所以社会科学尽管有其自身的特色，但在根本上与自然科学是一致的，同具有科学美的特征。语言学属

于社会科学，且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所以它本身乃至它所研究的对象——语言，自然也就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语言学（自然也指语言本身）或它的某一项规则显示出科学美，那么它就应该具备上述科学美的特征。下面仅以汉语为例试加说明。

首先看语音。历史的演变说明，汉语语音是朝着既简便省力而又响亮悦耳的方向发展的；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人类的实际需要。赵元任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文字的历史上，在口语里头，从古时候到现在，许多音变得简化了，例如古时候入声〔-p—t—k〕尾失掉了，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古音闭口的鼻音〔-m〕也失掉了，那么清浊的分别，本来是‘见、溪、群’，‘端、透、定’等三种发音的方法，现在多数地方就只有两种了，这样子一来啊，音就简化了。”“关于容易传递方面，有两点我感觉可以算是中国语言的优点，一个就是中国语言的音节的尾音的辅音（如果有辅音的话）都是宏亮的，因为只有〔n〕〔ŋ〕〔l〕，广东话固然有〔p, t, k〕收尾的，那占少数。”赵先生还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加以说明：一次在北京西车站遇一外国人叫远处的朋友，“dΔf, dΔf”，叫不应，赵先生很着急，想帮他叫“dΔfu”。<sup>⑥</sup>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语音的发展》一章中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这一演进：“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元音高化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拿‘歌’韵来说，上古是a，中古是ɑ，近代是ɔ，现代北方话一般是o（注：实际已变为更省力的e）。”元音的高化趋势显然是简便省力与响亮悦耳、易于传递协调发展的结果。“从中古到近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趋向于简化。最普遍存在的一个简化规律就是浊音清化”，带声（声带颤动）的辅音变为不带

声（声带不颤动），确实使发音变得简便省力了。“在十八世纪以前，不但齐撮呼的见溪群晓匣〔k、k'、x〕已经变成了tɕ、tɕ'、ç，连精、清、从、心、邪〔ts、ts'、s〕也变为tɕ、çt'、ç了”，“在京剧界中，见系字被称为闭音，认为应念tɕ、tɕ'、ç，精系字被称为尖音，认为应念ts、ts'、s”，“在能分辨尖团音的现代方言中，又有两种主要的不同情况：一种是见系齐撮字已经变了tɕ、tɕ'、ç，但精系字仍旧保持ts、ts'、s，如吴方言；另一种是见系保持k、k'、x，精系保持ts、ts'、s，如胶东半岛、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都属第二种或接近第二种。”<sup>⑧</sup>王力先生在这里所概括的意思是：古代分尖团音，现代部分方言中还留有它的痕迹；而现代普通话则不分尖团音，发音更加简便省力而且也更加响亮悦耳了。这与前而所引赵元任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又据“所谓开口和齐齿的交替，就是韵头i的插入和失落（如：街kai→tɕie，世çisi→ʂf，”“所谓开口和合口的交替，就是韵头u的插入和失落（如：拖t'a→t'uo，般puan→pan）”等音变规律的概括，都具体说明了元音高化、浊音清化的演进情况，汉语语音确实是循简便省力、响亮悦耳而易于传递的方向发展的。

声调做为音位的组成因素是汉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同一个音，利用它不同的高低调值表达不同的意义显然比用许多不同的基音传达信息要简便省力、经济得多。而且声调的历史变化也是同样遵循简便省力、响亮悦耳的方向发展的：一方面是声调的性质由音高、音长并重变为以音高为主，另一方面是短促的入声消失了<sup>⑨</sup>。这样的变化显然更利于信息的传递。

发展至今，汉语语音形成了一套简单整齐、协调对称的音位体系。汉语同一音位中不送气和送气的辅音是对称的（b、p，d、t，g、k）；鼻辅音（m、n、ng）从前至后恰与前面三组音分别相应；从发音方法讲，z、c、s和zh、ch、sh与j、q、x也是对应的，而j、q、x只同i、ü相拼，系统而整齐，这就便于学习和信息传递。（详可参见《现代汉语答问·语音》，张寿康著）汉语语音不仅形成了自身严整面对应的音位系统，而且与历史上的音系也有严整的对应关系。赵元任先生说：“在可能范围之内，一个音位系统要是跟历史的音韵相吻合，那就再好没有。”<sup>①</sup>例如北京音j、q、x，分别与历史上的g、k、h，z、c、s，zh、ch、sh成对补关系（前者总在i、ü之前，而后三者绝不在i、ü之前）。这就是所谓尖团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归纳出汉语语音有下列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发音简便、省力。如古音中费力的尖音在普通话中已消失，利用声调组成音位，元音趋向高化，辅音趋向清化等。
2. 音节响亮、悦耳。例如四声的区别以音高为主，古入声消失，韵头i和ü的插入及失落，尾音由母音和响亮的辅音构成等。

这两个特点显然利于汉语信息的传递。

3. 汉语语音形成了一套简单整齐、协调对称的音位体系。不仅其内部各音系有严整的对应关系，且与历史上的各音系也整齐、对应。这极便于学习、掌握，也利于有关的科学研究。

总起来说，汉语发音确是简便、协调的，符合我们前面

所概括的科学美的原则。

再看词汇。从古文献的文字记载来看，古汉语中虽有不少双音词，但实以单音词为主。发展至今，虽然也有三音节、四音节词，但不同于西方的多音节词语，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著）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根据。张寿康先生曾以其中《使用度最高的前 8000 个词表》为据，进行统计后发现：使用度最高的前 20 个词都是单音节词，前一百个词中只有 15 个双音词；而在 1040 个词中，单音节词是 577 个，双音节词为 460 个，前者仍多于后者，但已相差不远；至第 6000 词到 8548 词的约 2500 个词中，单音词只有 356 个，而双音词则有 2061 个了。<sup>⑩</sup>可见在使用度最高的 8000 词表中，使用度最高的虽仍是单音词，但从词汇总量上看，双音词显然是占绝对优势。书而语与口语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尤其在报刊政治用语中，双音词频率相当高，而口语中单音词使用频率显然高于书面语，但即便如此，口语中的双音词在词汇总量中也仍占压倒优势。<sup>⑪</sup>林汉达先生曾有一段关于汉语词汇的精彩议论，他说：“汉语的特点（也就是双音节语的特点）是在：为了分化同音词，单音节词发展而为双音节词；为了语言的精简，四音节词又能发展而为双音节词。比方说，我们必须把‘衣’说成‘衣服’，把‘架’说成‘架子’；可是‘衣服架子’就得说成‘衣架’……只有在双音节还不够用的时候，才用三个音节或四个音节。”“我们把‘衣’否定而肯定‘衣服’，把‘架’否定掉而肯定‘架子’，然后又把‘衣服架子’否定掉而肯定‘衣架’。这否定的否定是又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只有明白了这一层，才能体会

到咱们的词汇是又丰富又经济、永远向前发展的。<sup>④</sup>由这段议论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双音词既能满足人们更明晰地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实际需要，又十分简便、经济。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有些双音词的出现是为了声音上的和谐。吕淑湘先生认为，象（鱼）类、（药）品、（谷）物、（头）部、（省）分、（季）度等字，“都不是意义上不可缺少，而是带有衬字添音的作用的。”<sup>⑤</sup>可见汉语以双音词为主的发展趋势也是符合以简便和谐的形式来反映事物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就是以声音来传递信息）这一科学美特征的。

最后看语法。首先，汉语构词造句的规则具有简易性。不同于印欧语系（有人称其为综合语），汉语词与词的关系主要不依靠词本身复杂的形态变化，而是依靠词序排列和虚词的应用，词本身的形态则大多不变（有人称其为分析语）。如“我爱他”，换成“他爱我”，意思就变了，这句意的变化只靠“他”和“我”的位置颠倒；如果加一虚词“也”，就可使两个句子的意思统一起来，成为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即“我爱他，他也爱我”，这就是个复句了。“我爱他”，用俄语表示是“я люблю его”英语则是“I love him”；“他爱我”，俄语要变成“Он любит меня”，英语则变成“He loves me”。意思变化后，二者句中每一个词的形态都随之改变了（面颠倒词序意义并不起变化）。以第三人称为例，汉语仅有他、她、它三种形态（复数则加一“们”字），而俄语、英语均有十几种形态。

汉语构词造句还有另外一大特点是它各层次结构规则的一致性。这样使汉语语法更加简易协调，利于掌握、使用。不管汉语句型结构多么繁复，基本上都是个二分法，各层次结

构基本上都可分成两个部分。各层次两部分之间的构成规则也大体相同，是贯通一致的：

#### 一、主谓关系

- ①词素与词素组合成词。如：民主、国营。
- ②词与词组合成短语。如：他买的书。
- ③词或短语组合成单句。如：他买的书寄来了。

#### 二、动宾关系

- ①词素与词素组合成词。如：转身、换班。
- ②词与词组合成短语。如：去食堂。
- ③词或短语组合成单句。如：起风了。

#### 三、并列（联合）关系

- ①词素与词素组合成词。如：人民、生产。
- ②词与词组合成短语。如：勤俭节约。
- ③单句组合成复句。如：他帮助我，我帮助他。（此外还有与并列相当的递进、选择等关系，例句略）

#### 四、偏正关系

- ①词素与词素组合成词。如 

如	{	定名：火车。
		状动：飞奔。
		动补：震动。
- ②词与词组合成短语。如 

如	{	定名：伟大祖国。
		状动：哈哈大笑。
		动补：打扫干净。
- ③单句组合成复句。如：除非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他才会离开工作岗位。（包括条件、假设、转折、因果、连锁、取舍等关系，例句略。）

细分析起来，偏正复句中的各种从句实多为主句的状语或补



语关系，与词和短语的偏正结构也大体一致。除上述基本的组词造句规则有此特点外，还有些表情性很强的修辞手段也同此，即组词、短语、句子的规则是一致的，如对立式（用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将两个相反的词语联系起来，以突出强调某一意义）：

① 组词：天长地久。

② 组合短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③ 组合句子：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对于汉语这种从组词到造句既简单便利而又协调一致的规则，张寿康先生称其为“组装型的语言”，并进而推导至“篇”：“我们说，汉语是组装型的，就是说，汉语是由七级语言单位组装而成的。词素组装成词，词组装成词组，词和词组组装成句，句组装成语段，再组装成章（结构段），由章再组装成篇。”“而且，词、词组、句子、语段、章和篇的结构，其内部关系有一致性，如偏正、联合、主谓等。”<sup>99</sup>组成汉语的各级“构件”自有其独立性、自由性，而各级“构件”的构成，又都有个协调一致的规则。所以学习汉语的基本语法就有了很大的便利之处。郭绍虞先生曾具体分析过这种便利产生的原因说：“一个人当牙牙学语的时候，总是从词汇开始的。既然构词法与造句法基本一致，那么在认识词汇和运用词汇的过程中，自会于有意无意之间理解到词的组织形式……一个人从小就和这些词汇经常接触，当然容易理解语句的组织规律了。”郭绍虞先生强调汉语构词法与造句法的一致性只显示了汉语语法简便的一个方面；此外也还在汉语构词造句规则本身的简易性，如果规则繁复就不易形成词、语、句等几级组合的一致性，而且即便一致，应用起来也就不甚简便

了。<sup>③</sup>赵元任先生也以语言学习及应用中的实例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在语法方面呐，中国语言在世界的语言当中，算是比较容易的……例如中国三、四岁的小孩子的话，他在语法上，多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说英语的小孩子在这岁数还管‘throw’的过去叫‘froed’，管‘did’叫‘done’，管‘sau’叫‘seen’……”“即便是数的顺序排列，汉语也是异常简便而协调一致的：由‘一’数至‘十’，再由‘十一’数至‘二十’……‘三十’……‘一百’、‘二百’……西语则不然。如法语，管‘七十一’叫‘六十、十一’，数到‘六十、十九’即‘七十九’后，到了‘八十’，叫‘四个二十’……。这其中自然也有它的规则在，但总显得不够简便一致了。”<sup>④</sup>

总起来看，汉语从语音、词汇至语法都显示出一种简便省力而协调一致的特色。这种特色正是人类语言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显示出一种美。这种美既是自然美（就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言），也是科学美（就人具有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而言）。它一方面反映了人类语文发展的普遍规律，如：各种语言的发音都大量存在“辅音+元音”的组合，传递各种情感信息的语调相似（这些与人类的生理结构和机能密切相关）；各种语言中都大量存在双部句——一部说明运动变化（与所涉及对象），另一部则说明变化之所由（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运转根本规律的认识）；词义引申规律大致相同（如比喻引申），反训词的普遍存在，侮辱性语言所关涉的意义等（这些则反映了人类思维规律的一致性）。另外也与汉民族传统的思维和心理习惯有关。汉民族自古以来有尚简易、重实用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周易》就总结了这样的观点：“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

天下之理得矣。”这样的认识自然而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语言的变化、发展，汉语语法规则之简易性不能说与这种宇宙观没有联系。阴阳观又是汉民族自古以来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反映到语言实践中，可以发现不少它的影响，例如：汉语发音有其对应规律（见前述）；汉语构词造句简单而一致的规则是以二元为基础（主谓、动宾、并列、偏正、状动、动补、定名等）；古人写诗也将四声二元化为平仄。可见，汉语语法简便省力、协调一致的规则与汉民族的阴阳观也有密切联系。

以往，对于汉语简便的规则，人们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汉语曾被识为落后的、不发达的语言。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就曾这样说：“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中国语言的成就，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这些分词是很有用的，只不过比字头字尾之类较少分离变化而已。重要得多的，是思维规定在一种语言里表现为名词和动词，因而打上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辩精神。”<sup>⑧</sup>一些汉学家据此而认为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没有形态变化，因而没有名、动等词类区分，也就没有语法；总之，认为汉语简单、贫乏，常常一字多义，以致读汉语时要有很大的猜测能力。所以有人甚至曾断言汉语是停滞在原始阶段的语言。<sup>⑨</sup>一些中国学者也曾附和这种偏见。事实究竟怎样？下面就几个主要

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

1. 关于单音节。方块汉字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书写的，每个字确是一个单音节；但它们是书写单位，并非语言单位。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不同于多音节的印欧语系，而且词汇丰富，这势必造成汉语音节单位总数多（包括四声约有一千三百八十个）<sup>⑧</sup>，这对学习汉语发音（尤其是对西方人掌握四声变化）带来一定困难，但与音节单位总数少因而多音节词汇占统治地位的印欧语比起来，它又有便于记忆、便于传递的优越性。同样的内容用汉语传达比用西语传达要节省许多时间，而且响亮清晰（见前述）。可见汉语词汇的音节少未必就是缺点，恐怕倒是利大于弊呢。不错，现代汉语的词素仍多是单音节，但这给汉语的灵活利用以造成修词的丰富多采乃至得天独厚的形式美带来极大便利。其实，考察起来，许多种语言的语素也都是单音节的（如英语和俄语），只不过没有汉语单音语素之自由灵活罢了<sup>⑨</sup>。

2. 关于“简单、贫乏”。其实，汉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之一（《中文大辞典》所收单词有三十七万多条）。在静止状态下，汉语词汇根据其自身意义或形态（如带有子、头、儿、者、然等不同词性标志的字）能够大体划分出不同词类是毫无问题的；即便在语言实践中灵活利用起来，根据它们在句中所处的语法地位，也能不费力地判断其词性。汉语有自己简便而协调一致的语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语法的语言。汉语词汇的音节短促和语法规则的简便使得汉语语句往往显得简短，这是否说明汉语不利于表达复杂、精密的思想内容？恰恰相反。“尺寸经济不但能够节省时间，并且还可以在一个观念里头多抓住些复杂的成分。因此能够运用较复

杂的思想”。<sup>⑧</sup>句子的长短与所表达内容的繁简是两码事。汉语表达复杂意思的长句与附加成分繁复的欧化长句不同，它运用起来相当灵活，有其自身的民族形式，这从古人的文章和《毛泽东选集》中可以找出许多例证。给汉语戴上“简单、贫乏”的帽子完全不合适。

3. 关于一词多义。某些词义由于其中个别词义不明确而出现含混不清的现象，这在各种语言的实际运用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唯汉语有这个问题。英国语言学家坎伯荪对此曾有专门研究，他根据西方语言的特点，把语言的多义现象分为歧义（一个词含有两种以上互相否定的词项意义）和模糊，又将模糊划分为指称模糊、语义不确定等四种类型。<sup>⑨</sup>可见一词多义的现象是人类各种语言所共有的。这是不是人类语言中的缺陷？以往人们的回答往往是肯定的，因为根据传统的观念总是以为精确才是美。随着科学的进步，尤其是数学领域中统计数学、概率论、模糊数学的相继兴起，人们认识到不精确、模糊、朦胧也是一种美。片面追求精确的结果反而不精确，不美。形容一个美人的高矮、胖瘦、神情、姿态等等，能用十分精确的语言吗？那样写绝描绘不出一个活生生的美人，而只能塑造成呆板的人体模型。所以概念模糊往往是语意表达以及修辞上的实际需要，是一种语言美，根本不能视为缺陷。此外，如果孤立地分析一个句子，往往会产生歧义，但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则根据书面语言的上下文意义或说话双方所处的环境及各自的文化背景等等，则可使人准确无误地理解而不致产生任何歧义。最后，根据说话人的实际需要，也可能出现故意造成的含混（这不同于前面的模糊美）。至于确属表达不清的毛病，那也绝非人类语言

或汉语自身固有的缺陷，它完全可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得到克服。

4. 关于汉语是否发达。从前面所引黑格尔的话看来，他认为汉语是缺少逻辑词汇的不发达语言：对思维规定缺少专门和独特的词汇（如介词、冠词），特别是名词、动词缺少客观形式标记。后来有些语言学家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有明显形态变化的词汇就是所谓打上客观形式标记的“逻辑词汇”，例如：有格的变化叫做名词，有时的变化的叫做动词，有格的变化也有时的变化的叫做分词，没有格的变化也没有时的变化的叫做虚词。德国施莱赫尔据此把语言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词根语→粘着语→屈折语。他认为印欧语属于后者，汉语则属于最初级的无形态语、孤立语、词根语。瑞士索绪尔称汉语词汇为“超级词汇典型”<sup>⑧</sup>，因其不能再加以分析、论证，实则与施氏是一个意思。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也曾认为，汉语因无形态变化而只靠词序和辅助词来表示语法意义，以致极端紧缩和贫乏。

能够凭词汇没有复杂的形态变化、语法结构比较简单，就断定现代汉语是停留在人类初级阶段的语言吗？我们说不能。实际上，回过头来看看汉语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古汉语、上古汉语在许多方面比现代汉语要复杂。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参考的实例。从词类来说，例如：（1）上古名词（主要是国名、地名、部落名）前常冠以“有”为标记（有苗、有莘、有夏等），后来又演变出人称前的“阿”（阿谁、阿娇、阿瞞等）。虽然不是所有名词前都有如此标记，但这些标记只能用在一定范围的名词前则是事实。为什么其它名词没有类似标记：是已经消失了抑或尚未

及产生？这还有待考证。然而，确曾存在过的一些名词标记现在是消失了，只在一些方言中还留下些痕迹。产生了一些词尾标记，往往用来表现特殊情态或补足双音节，如老头儿、老头子、甜头、想头、桌子、椅子等。它们不是名词的普遍标记。(2) 上古汉语动词前常冠以“爰”、“曰”、“言”等为词头，虽然主要出现在《诗经》中，但却反映了当时的民间口语。后来这些词头也消失了。词尾“了”“过”“着”则有表时态的作用，但在书面语言中却是独立的方块字。(3) 上古人称代词具有相当整齐的系统，各词间都有对应关系：吾、余、予和汝相配，我和尔相配，卯和若相配，台和而相配，朕和戎相配，它们之间有一种类似“变格”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吾和我的分别：吾字一般处于主语、定语的位置，我字处于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吾字不用于宾语。在第三人称中，其字一般用于定语，之字用于宾语。到中古时期，人称代词发展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原来人称代词的‘变格’逐渐消失了，‘吾’与‘我’在语法作用上已经没有分别了，‘其’字也不专用于领格而可以用于主语和宾语。”(4) 上古汉语中的疑问代词总计原有十几个，根据音、义的近似关系可以分成三大系，分别表示人、物、地点、方式等；发展至今，常用的只有谁、什么、怎么、哪儿（或哪里）等几个词了。声音相近、意思相同而职能上或许有些差别（未经考证）的近指代词斯、此、是、兹等，演变统一为一个“这”了。(5) 表情态、范围、谦敬、否定、肯定等标记着众多在应用范围上具有细微差别的大量副词，也由于历史的演进而大大精减了。<sup>④</sup> (6) 兼相反二义的反训词（如“受”，在古代既当“接受”讲，也当“交给”讲，黑格尔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的思辨

精神) 在古汉语中曾存在不少(参见徐世荣《古汉语反训集释》, 其中收反训词 505 个,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后来也随语言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大大减少了。从语法来说, 例如: (1) 古汉语语词的顺序虽然大体也是主、谓、宾, 但具体到宾语位置又有许多变化, 最突出的是疑问句及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其中还包括复指成分等复杂情况), 后来这些特殊格式也渐趋消失。(2) 古汉语词类还可以活用为使动、意动、为动等复杂格式, 后来它们也逐渐演化为易辨理解的兼语式等固定格式, 变得单纯多了。从语音说, 现代汉语发音比古汉语简便、省力, 更易于传递, 前面已经述及, 此处不再重复。另外, 古汉语中曾经存在过的具有语法意义的音变已大量消失, 所剩为数不多者基本已固定为词, 失去语法意义了。这自然也使汉语发音、语法更趋于简化。

总之, 许多事实说明, 从上古汉语演变为现代汉语, 大体上是个由繁杂趋向简明的过程。古汉语专门而独特地表示某种思维规定的词汇很多, 不少名词、动词有客观形式标记, 后来却简化或消失了。当然也有例外, 如量词, 殷商时虽已有量词, 但为数极少, 一般“原始天然单位(相对于度量衡单位) 的表示方法是在数词后面再加同样的一个名词。例如殷墟卜辞中所见: “羌百羌, 人十出(有) 六人。” 汉代以后才发达起来。以致现代汉语中有个、只、块、条、幢、栋、座等众多表示天然单位的量词(当代汉语中的天然单位量词是否已开始了趋于减化的过程, 有待进一步考察)。这说明各种词类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然而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可以想见, 人类最初的语言必定是极简单的几种声音符号, 后来才逐渐复杂起来, 汉语势必也是如此。发展至上古汉语, 已



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单至复杂的过程；从上古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又简历了一个由繁入简的过程，但这绝不是倒退、重复历史上曾存在的简单过程，而是向更高层次的简便、实用、科学的方向演进。与科学美的规律由简单而杂多，再由杂多而简单一致的演进情况相似，语言的发展同样是个螺旋式的发展进程。

各种不同语言演进的事实正在证明这一点。所谓综合性的英语、俄语等都正在向分析性语言发展（尽管十分缓慢），词尾变化逐渐减少而过渡到依靠助动词、介词等起语法作用的词，例如本世纪在英语中已用“more”、“more”来取代双音节形容词中的“er”和“est”，助动词的变化也减少了。语言变化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智慧的进步不仅仅表现为分析力，它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概括力。这种思维能力的进步自然也会反映到语言的变化发展上。黑格尔曾断言：“在各民族的不发达的、原始的状况下，语言比较丰富，——语言随着文明的进展和语法的形成而逐渐贫乏了”。<sup>④</sup>施莱赫尔承继黑格尔这一观点，提出“语言退化论”，认为语言是在史前时期形成的，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语言不再继续发展，且开始退化瓦解。这种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根据语言演进的事实，有些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进化论”，还有些语言学家改变了对汉语的看法，如高本汉就说：“早先的学说把中国的语言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它还未进到变形的阶段。这种说法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的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注：实际从前面所引实例看来，未必是语尾），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理论分析力。现代的英语，

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步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它更为深进了。”<sup>⑧</sup>由此，早先的汉语落后论转而变为“语言无所谓先进与落后”，“各种语言都是好的，适于本民族应用的”。其实，这种笼面统之的提法，不一定利于语言科学的深入探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至少认识到这样一点：语言的变化规则繁杂时并不标志着它正处于最发达的阶段；相反，根据科学美的原则，由繁而简，规则渐趋简易谐调的语言，才是更发达的语言。

### 注 释

①参见《科学美思想史》第269—281页（徐纪敏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同上，第326—430页。

③同上，第555—676页。

④参见《语言问题》第149与第222页。（赵元任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⑤参见《汉语史稿》第二章《语音的发展》第十三节、第十七节、第十九节（王力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同上，第十六节。

⑦参见《语言问题》第36页。

⑧参见《现代汉语答问》第104—105页（张寿康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年版）。

⑨参见《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报刊政论语体中前4000个高频率词列表》与《生活口语中前4000个高频率词列表》（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⑩参见《汉语是不是单音节语》（林汉达著，《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中册收，第282页，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⑪参见《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吕敬湘著，《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中册，第288页）。

⑫参见《汉语组装语法述略》（张寿康著，《语文月刊》1989年第四期）。

- ⑬参见《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下编《总论（下）》3·汉语语法的简易性（郭绍虞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
- ⑭参见《语言问题》第221页与第42页。
- ⑮参见《逻辑学·第二版序言》（黑格尔著，杨一之译）。
- ⑯参见《批判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严修著，《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册，第188页）。
- ⑰参见《单音节语问题的实质》（彭楚南著，《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册，第175页）。
- ⑱同上，见第170页。又可见中册，第273页。
- ⑲参见《语言问题》第225页。
- ⑳参见《符号、语言与艺术》第220页（俞楚章、叶舒宪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㉑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81—185页，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㉒参见《汉语史稿·历史形态学》。
- ㉓参见《当代英语的变化》（英国 Charles·Barber 原著，王宁节译，载《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三期）。
- ㉔参见《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原著，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㉕参见《批判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严修著，《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册，第189页）。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